京华遗韵

版画中的帝都北京

Imperial Peking Illustrated





李弘 著

中信出版集团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Imperial Peking Illustrated





京华遗韵

版画中的帝都北京

李弘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封面

文前

献词

再版小序 收藏版画心

初版前言

第一章 明末清初的印象

一、想象与现实有多远？

二、“神父版画”名噪一时

三、见到了燕山脚下的中轴线

第二章 指天画地的盛世

一、奠定江山的帝王们

二、站在角落里的英使侧影

三、四城九门建筑拾贝

四、精雕细刻的美好时光

第三章 阅兵祭天下坡路

一、江山代代不如前

二、暗夜里的同治大婚

三、八座小炉子祭先皇

第四章 刀笔刻深强权时代

一、街头竖起了公示牌

二、开放的帝都什么样？

三、末代皇朝落日余晖

第五章 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一、市井老街上打个招呼
二、花样繁多的自娱自乐
三、饮食一条街上的小门脸儿
四、众生之相面面观
五、在家千日好，出行一日难
第六章 收藏一幅永远的帝都
一、如画的皇家宫城
二、拆不掉的城墙在哪里？
三、步步是景，回味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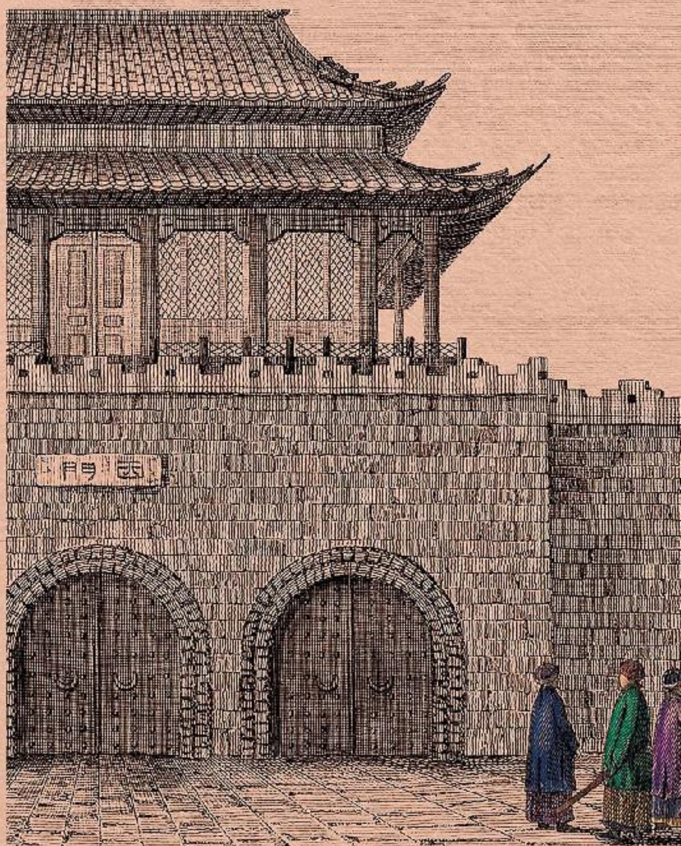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封面

京华遗韵

版画中的帝都北京

Imperial Peking Illustrated





李弘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文前

纽荷夫的目光不禁投向京城雄伟的宫殿，周遭的一切都令他感到新奇诧异。北京的春天黄沙漫天肆虐，就是通过他的描绘，首次为海外知晓。这里的大街，“没用砖石铺地，因此，阴雨天出外办事（好在并不经常发生），脚下总是泥泞难行。在干燥的季节，西北风猛烈刮起，夹带着微小细密的沙粒，扑面而来，路上的行人在风沙中挣扎前行，几乎无法睁开眼睛，那比脚下的拖累还要难以忍受。此地居民亦有抵御风沙的高招儿，就是用纱巾把整个头部都包起来”。三百多年后的京城，一到西风黄沙季节，仍然常常上演这样的街景。

吴芳思

英国著名汉学家，大英图书馆中国部前负责人

《中国的魅力召唤——从马可·波罗读到J.G.博兰德》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献词

献给

我的母亲张贵今

父亲李德贤

Roy and Joyce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再版小序 收藏版画心



有一些年，我潜心怡情的一大乐趣，是徜徉在旧书小店里，翻寻西人笔下的古旧中国，特别是描绘帝都北京的零碎纸片。记得有一次在维也纳，店主打开常锁的地下书窖，由着我独自随意翻看。书窖的拱顶一波一波的，相互衔接，是一个巨大的通透的空间。里面灯光昏暗，阴冷潮湿，寂静无声，时间就像溶洞中垂下的钟乳石，凝结成从地上堆到屋顶的书柱。在杂堆乱放的书纸中，我一个人左翻翻右翻翻，掸掸灰，凑到跟前看看是什么语言，若想找到自己心仪的宝贝，其实比大海捞针还难。二十几阶的楼梯在身后诡异地攀上去，通过一个上翻的小门，洒进一束暗白的日光。我不时回头抬抬眼，生怕有人会把门突然关上。又懵然觉得，往昔就被这一束光照亮了，若隐若现，勾引着我一步一步走回到从前——寒夜烛光下读书的那个从前。

真想重现这个实景，让大家和镜头中的我一起，怯怯地移动脚步，摸摸索索。可惜，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今天这样能干，我没有留下任何影像信息。缺席了画影，文字再生动也少了佐证，这样的遗憾，大家可能都有体会。

留下可见的形象信息！千百年前，人们就有这样的追求，几道简单的勾勒，往往无言胜有言。曾几何时，睿智的先人发明了一个办法，不但能留下形象，而且能广为传播，那就是制作版画——制版印刷出来的线条画面。

我第一次邂逅西方人绘制的中国版画，是在展售厅里，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那是20世纪的90年代，我与先生去古书店闲逛，墙上挂着一排风格别致的画作，镶在考究的镜框里，边展边销。说它们别致，是因为我从未见识过这样的作品。近看，上面的线条简单粗疏，远看却形象立体完整，

有些着了色，明快清晰，借用鲁迅的话说是“或拙如画沙，或细如擘发”。先生停步在一位古人面前，就是下面这幅画中皇帝的传令官，凝视了良久，我站在旁边也跟着看。传令官的坐骑是扬蹄向前的大白马，他腰板挺直，神采奕奕，背着圣旨正准备扬鞭启程。画面上，天也阔地也宽，衬托出人物的高傲自信，胸有成竹；鲜艳的色彩，更渲染了圣旨在身的庄严与气势。先生看着看着就说，他想付钱买下这幅画。为什么要买它？我问。这位大员的长相，画得不伦不类，高鼻子深眼，根本不像清朝官员。他的骑马姿势，想象加上夸张，借着西洋的画技，显摆着皇朝的威风，不真实，不是出现在电影中的样子。我嘟嘟囔囔，缺少好感，但并没有影响先生的热情。他不但买下了它，还坚持挂在家里的墙上，让来往的亲戚与朋友共同欣赏。

大白马和我天天见面，不期然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它到底是谁画的呢？在什么场合、什么时代画的？画家要表达自己的何样观察，又传递着何样的信息？好像在七月里攀山，天空飘来一片云彩，洒下一头雾水。正迷惑着，有一天在朋友家的书架上，我碰巧翻到了叶笃义先生的首版译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扉页就揭开了这幅画作的身世。它的原作，是一批水彩画中的一幅，在老家英伦刚刚过了两百周年的生日。创作它的画师是英国人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他受到过良好的绘画专业训练，1793年随英使马戛尔尼勋爵访问了北京。此版画风格中西合璧，尽管对中国人的面部骨骼与表情画得还不够得心应手；清人洋做派，有意取悦了西方人的欣赏品味。



这就是我先生喜爱的圣旨传令官。他背上背着的是一份很长很重要的文件。下一站继续往前站传递的马匹及官员正等在驿站外。除圣旨外，朝廷的邸报也都是靠这样的方式从京城传到全国各地



CAM-HY

Empereur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orientale,
agé de 41 an et peint a l'âge
de 32.

F. Ertinger del. et Sc.

17世纪90年代西方人眼中40多岁的康熙皇帝，面部丰满，目光坚定

两百多年了，骑着大白马的传令官成了版画中的佼佼者。虽说年代足够久远，但古旧版画的出身比较卑贱，算不上高贵的艺术品类，作为文物，市价始终平平。它们捕获了我的欢心，是因为我发现这个品类的画作，特别会讲故事。为古旧文字描述提供佐证，它们最尽心竭力。

探究一张版画的出身，会告诉今人什么故事，又为往昔佐证了什么？

首先，它们讲的是西人孜孜不倦的东方猎奇故事。好奇心，是探索未知时空的起点。不管物质的世界、人伦的世界，还是魂灵的世界，没有打破沙锅“纹”到底的劲头，就不可能找到进入的大门。年深纸黄的版画背后，有一双蓝眼睛在滴溜溜地转，流露的是强烈的猎奇情结。在我的收藏中，最早描绘中国人的一幅西方版画，出现于16世纪末。欧洲人先画中国人穿什么、吃什么、做派如何，然后他们图解中国人学什么、信什么、心灵寄托何处。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制度、风土民情、舞动与凝固的艺术，都被他们的探秘之笔浓描艳绘，形象与文字一起，几百年前被老外当成了宝贝，带出了国门。

或许可以说，好奇的欧洲人，只捕捉到明末以来帝王君临天下的皮毛和外表。在同一个时间段，中国人也曾出洋，但画外洋风情的就少多了，书写外洋的也少，也就是说，皮毛也没有摸到多少。康熙皇帝的版画肖像，有多个版本，当年能在欧洲印上千张，足以说明这是一位人格高尚、胸怀宽广、心系百姓，且才华卓越的帝王。大清国人呢，谁会知道英国搞了个光荣革命，法国出了个“太阳王”？更不会有人感兴趣，画画这些洋夷的国王长得是什么模样。

今天的国人，一批一批出国旅游探险考察，了解外族的历史风情，交流见识，不时提出带有挑战意味的观点，这可以叫西蕴东撷吧，比起东蕴

西撷的好奇心，晚了几百年，不过，工具也先进了几百年。每次观光回家，我们都会反复摆弄手机里的照片，看自己在异域的珍贵留影，在微信朋友圈里与人分享。西人昔日借助版画，异曲同工，把游历的采风之眼，锁定在了一个个永恒的瞬间。

就是在这种对皮毛好奇的基础上，一种文化开始对另一种文化抽丝剥茧，抽出五颜六色的光彩。

除了好奇，版画中还蕴藏着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态度。

西方曾对中国进行过文化侵略，还有野蛮的武力征服，为了商业利益，留给中华民族不尽的屈辱，这是小时候的教育，烙印在头脑的深处。不错，大量的版画，刀刻墨写，堆积着陈年的中西冲突，以形象信息佐证了西风东渐的侵略历史。1900年庚子之乱时，法国报刊登载了一些场景报道，亦利用版画，着力再现了暴力血腥。近年有些老版画被重新印出来，加上新的文字渲染，重现了当年的暴力血腥事件。

这些是历史画面中的一面。我的收藏告诉我，历史画面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非我族类的洋人，对中华民族曾经执有真诚的赞誉心。他们既在进行着“文化侵略”，也辛辛苦苦地进行着“文化输出”。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以艺术和文字的方式走进西方，西方人至今还享用着前辈留下的图像与文字盛宴。

其中的一顿美餐，是以儒学为主导的文化渊源——孔子的肖像、历朝历代的圣人、先秦礼教的社会景象，都曾经深深刻写于版画师的刀笔之下。17、18世纪之交，他们的喜好又转向明君圣治——顺治、康熙、乾隆，都有西人精心绘制的标准像。2017年8月，英伦的《金融时报》登出了2016年最佳图书奖的长名单，其中的一本是英国人邓肯·克拉克讲阿里巴巴的，封面上站着世人熟识的中国商界偶像——马云先生。这是当

代洋人对国人的一种赞誉。退回去几百年，在平展展的小羊皮或烫金牛皮的封面下，西方人赞誉的不是网络虚拟帝国的商业精英，而是真实帝国的至高统治者。他们也曾千里迢迢，前来拜见这些东方帝王。


Lessons from turmoil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n prize longlist

The long list

Andrew Hill introduces the 15 contenders for the FT's award for the most compelling account of modern business

个人形象登上图书的封面，是一种赞誉与尊重

说到对皇朝的尊崇，我们一定要跟着西人的目光，聚焦版画中的帝都北京。这里是中华一统大帝国的神经中枢。它的四城九门、紫禁皇城、宫苑大殿、寺庙宫观，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座座高峰。通过科举殿试，京城汇集了全国的士子精英。这里人杰地灵，神州之大，无处可与皇家之城、首善之都比肩。谁执掌着最高的权力，自然谁就应该获得最高的尊崇，最高权力坐落在哪里，自然那里就会收获最高的赞誉。

帝都北京落座西洋版画，时间已经到了明末清初。这些版画立即成了中华帝国的形象大使，带给西方一个集大成的印象：东方帝都秩序井然，

天子脚下的子民过着富足、和平、有尊严的生活。

从大白马传令官的身上，是不是读出了乾隆时期的信息？当其时，大英帝国与大清皇朝之间尚未起火升烟，英使是为了通畅国家之间的贸易，前来礼节性觐见英明的皇帝。因而，画家对马与人的构思，没有受“政治正确”的阴影笼罩，清朝官员在他的眼中，就是如此英姿伟岸。传令官从马背上跳下来，个子比健硕的大白马还要高上一头。一幅画讲了一个故事，18世纪末大清的国力与威风，它开出了一张盛世证明。

古旧版画的作者，不但采访了皇帝官吏，也探视了天子脚下的子民。

19世纪是西方版画的爆发期，帝都的形象，虽比不上“五口通商”城市的颜值，也着实风光了一番。特别是1860年以后，旧报纸中经常会蹦出有关帝都北京不起眼的豆腐块，平实的画面呈现着寻常的生活。

彼时的寻常，肯定与今世的理解不同。但是归根结底，寻常之人，都是进化大潮中的小沙粒，生命薄如蝉翼，生存就是硬道理。不管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政权与政权之间怎样打打杀杀，老百姓总要躲过风风雨雨，连接起市井街头的每一天。在书商阴冷的地下室，我最想找到的就是寻常画中的寻常人，把他们搬到阳光下，体会当年的那颗寻常心，与寻常的京城日子。

街头的茶馆，冬日的冰上出行，老人遛鸟，孩子们抓蜻蜓，男人当街拍卖，女人问卦算命，这都是平日里的生活，当地人司空见惯，不会大惊小怪，外人看见，却会觉得是奇风异景，赶快按下相机的快门。北京大学美学教授朱良志，通过本书看到这些第一次在国内曝光的版画，惊讶中带着宽慰，说：“这部著作的角度很巧妙，它以西方画家描绘的北京形象为线索，展现了有关这个古老帝国的珍贵记忆。”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对文物见多识广，但未曾听说有此类遗物存世，评价“它把当年西人

的想象与现实的差距、今天我们的想象与古代的差距，汇集一册，让西人了解美丽的古国，让今人了解勤劳的古人”。他们也体会了版画中的寻常，从中提炼出了珍贵与意义。

寻常的版画上，往往没有高超的画技，没有华丽的装饰。它们绘画的原本，根本找不到了，雕刻的那块原版，早已被丢弃、被损毁；手中捧着的，是薄薄的一张纸片，着黑白墨迹，往事如烟，遗韵隽永。

好奇心是一种性格，赞誉心是一种态度，寻常心是一种选择。西洋版画在笔画刀刻中透露了“三心”的故事，佐证着帝都的非凡、帝王的威严与子民生命的坚韧。

上面说的这些话，是我收藏和写作时的心路历程，当时有点冲动，要以自己的态度与选择，把西人所作的帝都版画编成书，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它们。本书的第一版《京华遗韵——西方版画中的明清老北京》出版于2008年。我的冲动有了一个结果，互不关联、并不起眼的零碎纸片，跨越了三个世纪（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一次按主题凑合在一起，拼贴成相对连贯的场景述说。书出来之后，我才知道，喜欢古旧版画和帝都北京的朋友还真不少，此书让大家一饱眼福，也提供了收藏版画时的检索。后来，我在一些书文中看到熟悉的画面被引用，倍感欣慰。2009年及2010年，在热心人的帮助下，藏画先后在世纪坛艺术馆与中国大剧院展出，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观赏年逾百岁的书报原版，更使我喜出望外。对许志明、王立梅、冯光生、韩朴、王凯迪、James Wang等人的厚爱与帮助，我至今深为感念。

感谢财新网与中信出版社的编辑们，特别是黄维益和沈家乐，她们建议8年后我再版此书，让新一代的人通过这些形象信息，重缀北京的往昔碎片，聆听失散了然而并未失去的故事。皇朝远去的凌乱脚步，或许也

有助于通畅首都通向未来的路径。

本次重版，原书中的英文被拿掉了。这有点可惜，我希望今后用更好的办法加以弥补。以前的工作很忙，在第一版的出版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编辑版画，重版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集中笔墨与画中人闲聊，多花点闲情在古建故宅前流连。以前的资料，主要在英文古书中寻查，现在的互联网是百科大全，修订了我以前的误解，补足了遗漏。第一版的读者会发现，本版添加了不少以前未见的图片，也增加了文字的篇幅。

还有一件事，在此告知读者，本书与它的姐妹篇《京华心影——地图里的帝都北京》是同时出版的。这两本书的时间跨度差不多，事件基本重合，都止于大一统的大清皇朝垮台之年。不同的是，《京华遗韵》侧重于形象，《京华心影》侧重于地标。后一本书对时代背景交代得较多，议论也比较多，与此书可以参照来看。

书籍让人与时俱进，但有时它也推动人与时俱退。退一步不但天地宽，眼界也随之拓宽。唯愿再版同样得到读者的喜爱，和我一起捕获版画中的好奇心、赞誉心、寻常心。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初版前言

一、画好中国人很费劲

西方人用图画的形式描绘中国，始于16世纪晚期，即明末清初之际。在此之前，波斯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都曾到过中国，他们只留下过很

少的文字记录。第一次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书籍，出自13世纪末一位威尼斯商人的手笔，就是那本夹杂着道听途说的《马可·波罗游记》。它亦实亦幻，笔触动人心弦，叙说东方有一个神奇美丽、富庶繁华的帝国，被一位英明宽容的大汗统治着，城市里宫殿连片，美轮美奂。那里城乡商业发达，驿道通往更多的城市，他们还发明并使用纸币，绫罗绸缎物美价廉。马可·波罗挑动了数代欧洲人对这个遥远国度的无限神往。可惜，20世纪的历史学者，用严谨的方法一考证，戳穿了马可·波罗的大话，证明他根本没到过中国，至多只是听来往的商人述说，加上自己奇思妙想的杜撰。（编者注：此为作者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真是遗憾，马可·波罗如果能拿出一张写实的版画，或许能够对着怀疑的目光，再做一次分辩。

其实，元代的蒙古人，一直打到了匈牙利，把东方古国的名字一路带到了东欧。从那时起，欧洲人已经在心里为中国人画像了。

随着西方航海技术的发展及海外开拓欲望的膨胀，在中国明末清初之际，一批批欧洲探险家来到了亚洲东部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寻求新的海上贸易机会。16世纪上半期，在中国广东沿海一带活动的主要是葡萄牙人，后来还有西班牙人，他们用白银交换中国的瓷器、丝绸、棉布等。这些探险家兼商人，对异族的文化兴趣寥寥，自己并没有著书作画，他们在大明的见闻经历，往往是回国后口述，由其他人加工出版的。西方的文字记述，一下子就从威尼斯跳到了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与德国的奥格斯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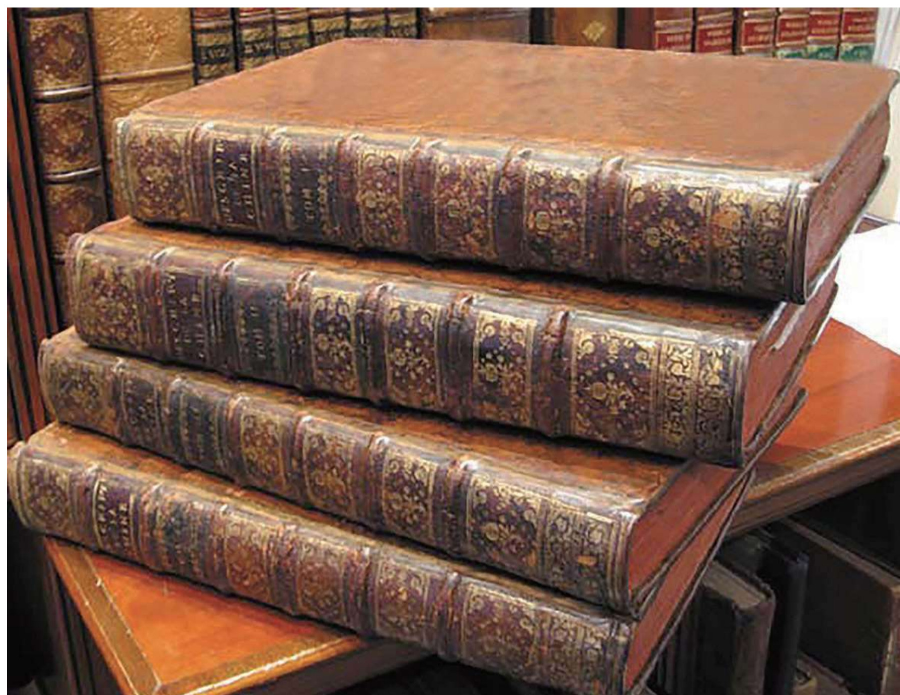
后来的画家根据《马可·波罗游记》创作了一些插图故事留世，人物场景充满西方色彩的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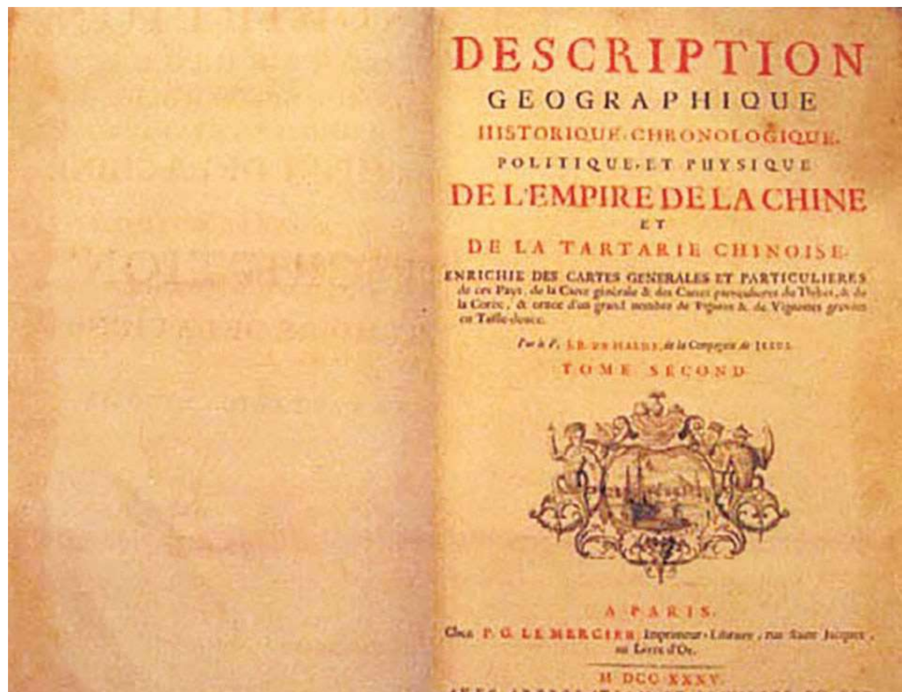
对应明代的西文出版物，数量很少，甚至没有留下原作者姓名。彼时已经有了中国人的形象信息，本书在第一章就选用了几张。它们透露的信息，奇思异想多于真相，寻求知识的努力，重于实证的价值。第一位在北京住下的传教士利玛窦，画了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也是这个时代的作品。目前没有发现他绘制的中国形象传世，也没有发现他绘制的中国地图。神父自己的画像，也是在他辞世后，由从未踏足中国的罗马神父根据想象绘制的。这些史实说明了什么？说明早期的版画极为珍稀。在西方的图书馆里，如果有这个时代关于中国的几张纸片，那可是镇馆之宝级的藏品。

16世纪后半期，耶稣会向世界各地派出传教士，更多神父来到了中国。他们要定期向梵蒂冈书面汇报传教情况。由于路途遥远，海路传信艰辛，在亚洲各国的传教士被允许每年向耶稣会报告一次。传教士们在书信中，一方面赞叹中国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发展起来的古老文化，另一方面又虔诚地希望这个源远流长的东方帝国，能够皈依西方人信仰的上

帝。他们关注中国的文化、教育、社会组织结构、思想观念及民俗百态，勤奋地向外输出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与政治制度。

这些书中通常附有大量版画，是西方雕版作者基于真实文字描述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它们是版画中国的鼻祖。不过这些版画，只有少量可以追根寻源到北方，因此在本书中的出现也很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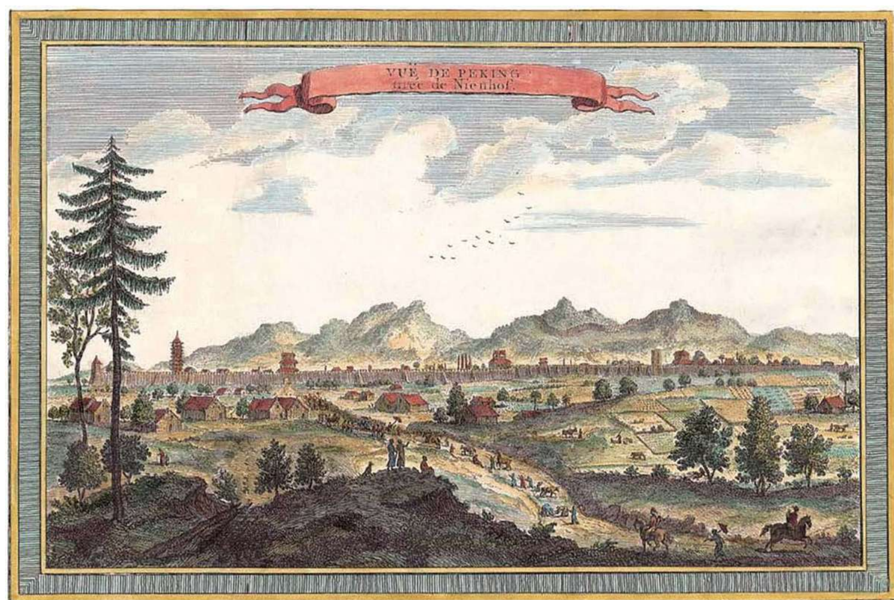


这些流回欧洲的文档及传教士个人的书信，在17、18世纪得到了整理并在欧洲出版，许多关于明清朝廷及传教士活动的伟大著作就是这样完成的

依据亲眼所见绘制中国题材插图的第一本著作问世，时间已经到了1657年。它的作者是荷兰人约翰·纽荷夫（Johan Nienhoff），书中包括多幅在西方收藏界广为人知的版画。纽荷夫以一个小职员的身份，1656年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使团访问了北京。当时清朝顺治皇帝刚刚即位不久，荷兰人对新皇朝寄予厚望，希望得到大清朝廷对荷兰在中国沿海开展贸易的恩准。纽荷夫作画的这本书中附有150张版画，其中有许多是他基于亲眼所见亲手绘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70年又出版了第二部纪实著作，其中也附有场面壮观的插图。时隔三百多年，至今仍可在西方旧书市场上看到这本书的全本，弥足珍贵。

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来自欧洲的许多团体，如俄国的外交使团、

法国的传教士团及一些商团，往往会随团带有专业绘画师和记事官，负责沿途记录所见所闻，就地写生，实景入画，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描绘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同时也将西方文艺复兴后成熟的绘画艺术带到了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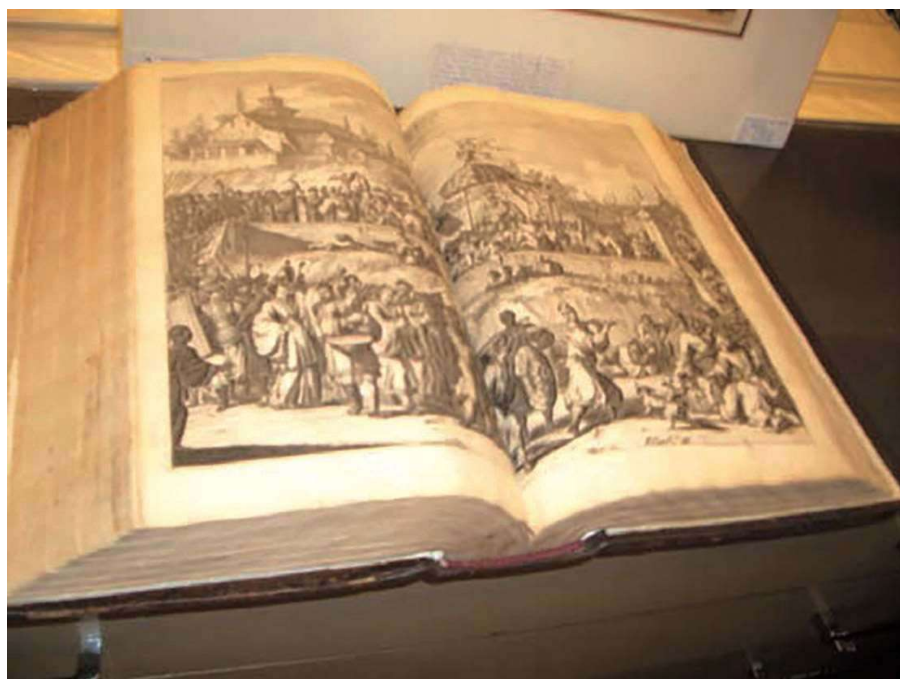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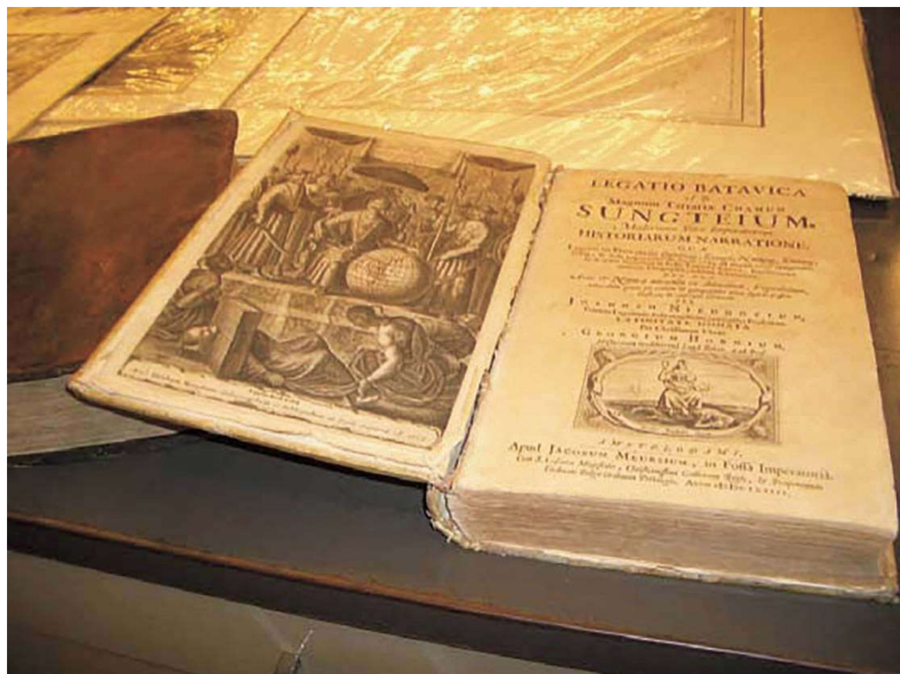
纽荷夫的北京印象，被多次印刷，有大同小异的多个版本，后来成为许多中国城市画的背景

荷兰人曾经画过顺治皇帝和他的皇后。不过荷兰人以及早期的法国人都没有在画好中国人上下功夫。西洋版画写真水平的第一次飞跃应归功于威廉·亚历山大。1792年，英国第一次派遣外交使团来中国，画师威廉·亚历山大随队前往，他在中国访问期间画了大量的速写。在回到英国之后，他对这些速写进行了二次创作，把铅笔画的速写改成了比较大的水彩画，为后世留下了一批代表西方当时水彩画水平的写实画作。亚历山大在回国后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出版了几部著作，除了把这些精致的水彩画制成铜版画外，还首次将中国风景画以彩版印刷，这使我们今天不但可以看到真实的人物场景，还可以还原亚历山大作画时眼中所见的

真实色彩。当时出现了不少中国人物肖像画，知名的画师包括史贝霖、乔治·钱纳利、巴洛，后者也是英使团的成员、绘画名家。

这些人与中国人最为熟悉的西洋画师郎世宁不同，后者是乾隆皇帝御用的，画作虽然惊世骇俗，但没有皇帝的谕旨，出不了紫禁城（除了在巴黎偷偷留下的复制品）。而英国的这些画师，是自由聘用的，他们的作品，要印书，要商业化。他们还在广东训练了一批中国画师，被载入史册的名字，包括林呱、福呱等。19世纪初，西方关于中国的版画果实累累，离不开上面这些人提供的丰富创作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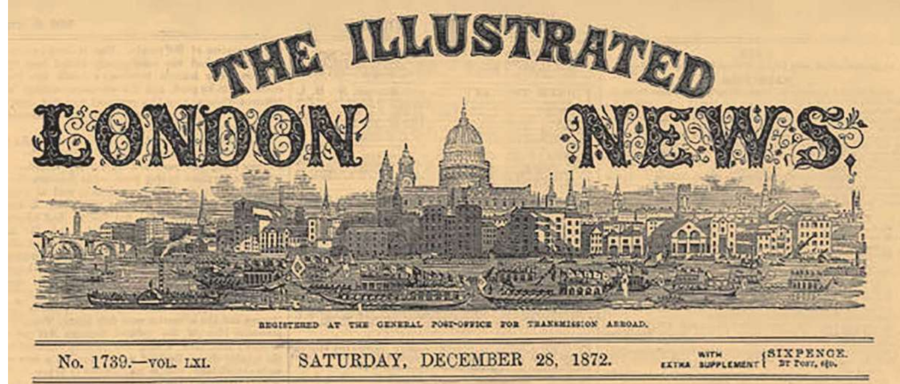


荷兰商团两次访问清初朝廷，留下了画作丰富的两本纪实游记

继亚历山大之后，英国人制作的版画长期独占鳌头。1843年，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在伦敦出版了《中华帝国》一书，这部大型版画著作是集历史上有关中国的绘画之大成。这些版画覆盖了中国从南到北数十座城市、数百个人物，对中国建筑、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做了细致入微的描画，景色美不胜收，人物精细逼真。更为令人惊讶的是，托马斯从未到过中国，他的铜版画创作完全是基于前人的画作，大部分是旅华画家的原创，加上版画雕刻家的再创作。他的这本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一版再版。许多书后来被拆成单页，填上鲜艳的色彩后，镶入镜框挂在墙上，成为一代又一代西方“中国迷”的珍藏。

19世纪初彩色印刷的中国风景画

巴洛试图比较中国人与南亚人的脸型差异。不懂得骨骼结构，画出来的中国人看着就像洋人



六便士就能买一份厚厚的《伦敦新闻画报》，里面常常有关于中国的版画。现在已经被人摘出翻译整理，编辑成书

19世纪中期的英国正值其全球殖民发展的全盛时期，交通工具的发展日新月异，通信工具也面临着新一轮的变革。由于图书出版周期过长，插图内容老套，不能满足欧洲读者追逐实时形象信息的欲望，新的通信工具应运而生，创办于1842年的《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引领了这一新潮流。这份报纸把版画与新闻报道编辑在一起，每周一期。英国另一份有影响的创办稍晚的报纸叫《画报》（The Graphic），也以版画新闻见长，常常图解中国。在法国与德国都有相同类型的报纸出现。通过这种媒体工具，西方读者与世界的距离被大大拉近。

版画最后的一个繁盛时期是大清最后的50年，除了画报新闻，当时的书籍也普遍使用了版画插图。摄影技术来到中国后，版画与照片的形象信息，有二十多年互补互用，出现过版画照片，也有照片版画。一直到20世纪初期，摄影图片可以被大量复制，清晰度大有提高，版画在书报中才彻底被取代。



画报的外派记者都是即景写生的高手，他们不辞辛苦，带着画板画笔，到各国写实、写事、写史。这些草图画完后传递回伦敦，大约也要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由那里的版画师在木板上雕刻并及时见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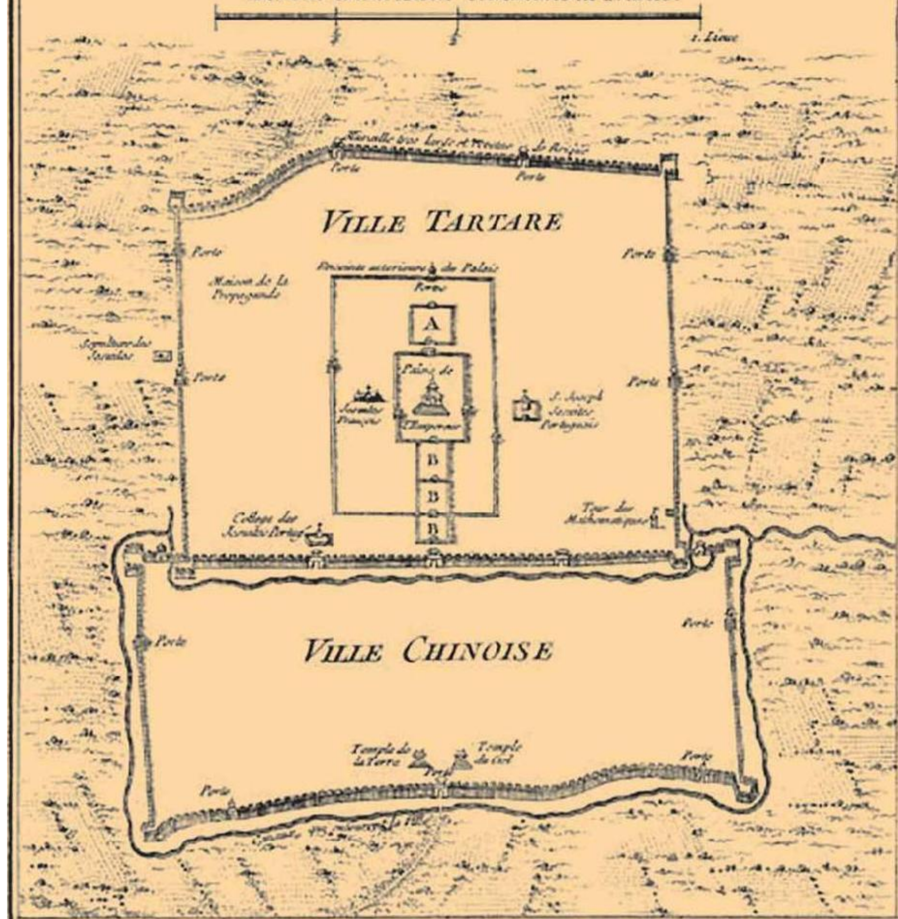
二、先荣后辱的帝都

1421年，明朝永乐大帝定都北京，开启了北京作为明清两代近五百年帝都的历史。北京不仅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壮丽的文化奇迹。北京拥有举世闻名的紫禁城、金碧辉煌的牌楼庙宇，有数以千计的胡同、风格独特的四合院，还有皇城文化蕴育出的帝京臣民。大家会觉得，西洋版画，最火最多的应当就是北京版画吧？真实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北京在明清时期设置了许多障碍，不是一座自由进出之城。西方撰写的中国专著，数量最多的是关于18、19世纪的开放城市，如广东的城市及五口通商之城。本书所辑西洋版画中，绝大部分均明确标明背景地点就是北京，部分绘画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的景色，从人物衣着及建筑特点上，可以看出与当时中国南部景致的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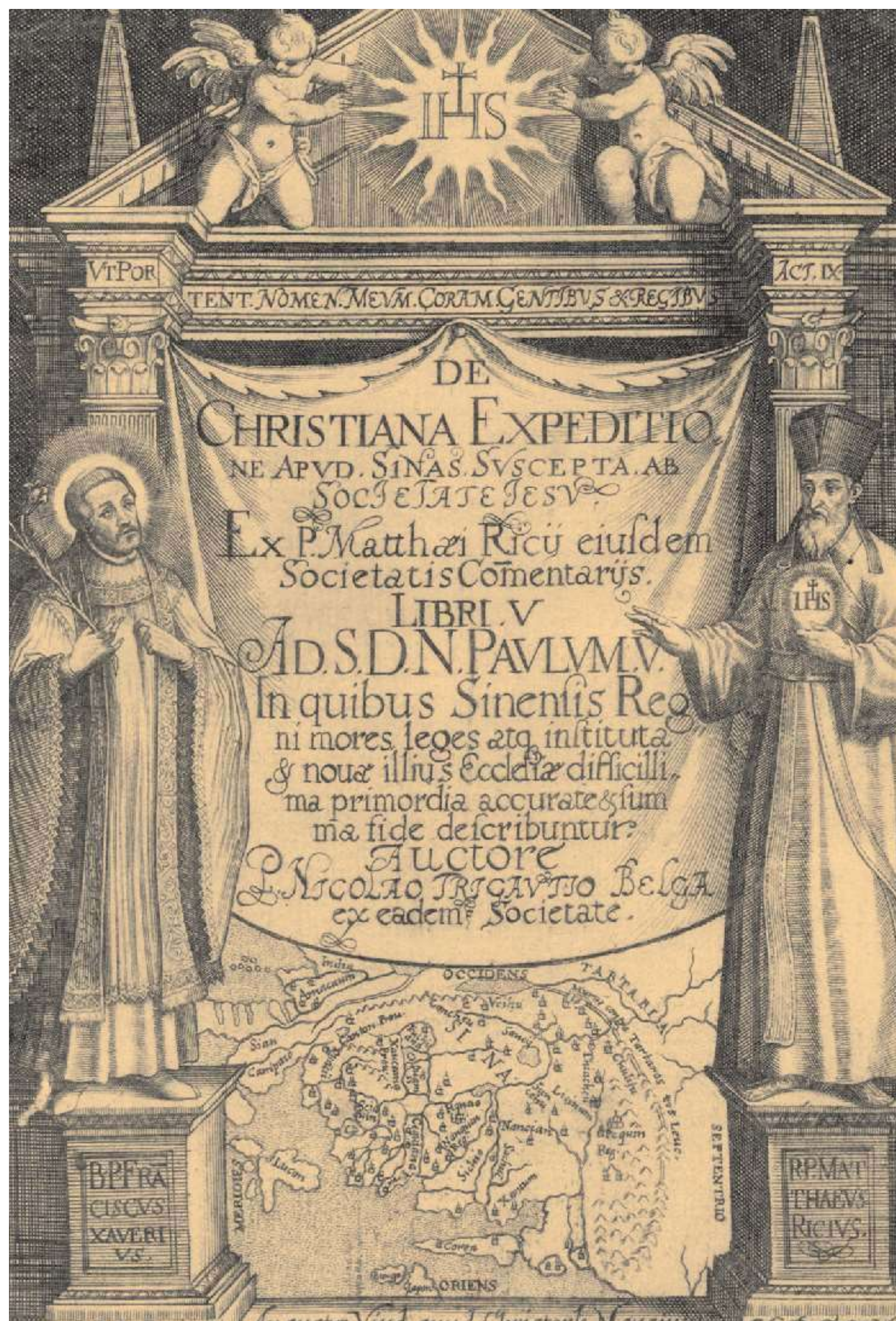
显不同。

明朝初年，中国政府实行海禁，外国人不许登陆中国领土。除了活跃在宫廷的传教士外，到过北京的西方人如凤毛麟角。清初，在顺治、康熙朝，西方人有机会在北京停留，但也只有得到皇帝的恩准，才可在北京居住。洋人观察帝都的缝隙虽小，但晚明的形象信息已经通过画笔流出了京城。

第一个上了西洋版画，又与北京相关的人是谁？他是徐光启。而他能得此殊荣，与第一个来京传教的意大利神父利玛窦直接相关。利玛窦在北京去世不久，他的形象就在德国上了版画。为表彰徐光启对天主教传播的贡献，后来画中的利玛窦身边总是站着徐光启，时间应当始于大明垮塌之前。



西方最早的北京地图之一，比广州的地图晚出了几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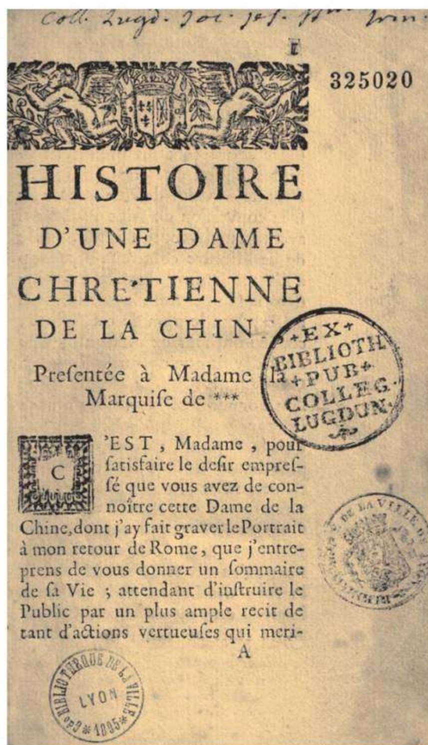


1615年，此图出现在利玛窦与金尼阁神父合著的一本书里，利玛窦与圣徒同在。圣徒那个位置，后来为徐光启所取代

如果只看版画上的中国人，明末清初著名的还有几位，如英国画家克内

勒爵士为一位清官画的油画像，他叫沈福宗，来自南京，1688年跟着神父旅英到过伦敦。这位画家的作品真是了得，其作品中有我们熟悉的哲学家洛克与青年天才牛顿的半身像，可见沈长官能请到他的油彩，是多大的荣耀。另外还有一位，是徐光启的孙女，坎蒂大·徐，她不但自己受洗，还在江南帮助传教士设立了几十所教堂，传播福音。1686年，巴黎出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作者是比利时神父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坎蒂大是主推的形象。




325020

HISTOIRE D'UNE DAME CHRETIENNE DE LA CH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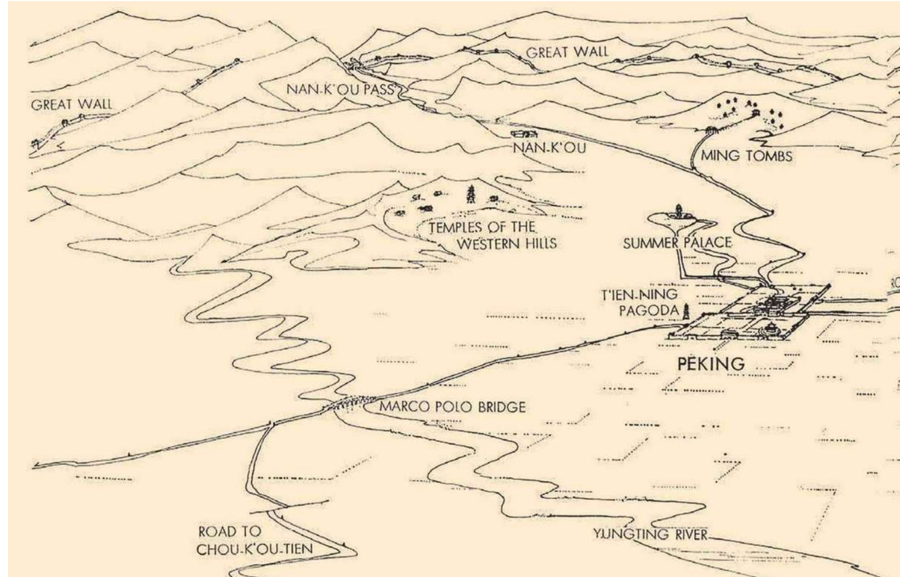
Preſentée à Madame la Marquiſe d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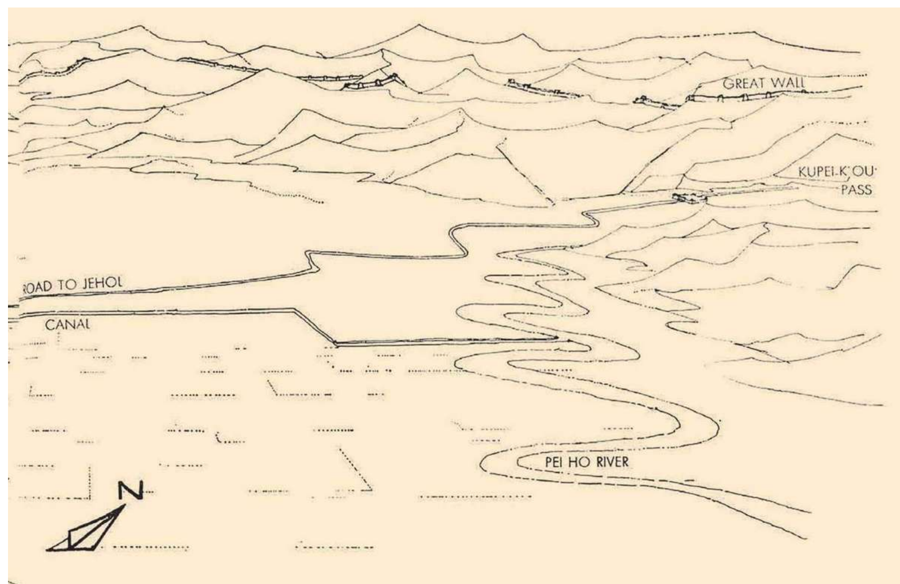
C'EST, Madame, pour ſatisfaire le deſir empreſſé que vous avez de connoître cette Dame de la Chine, dont j'ay fait graver le Portrait à mon retour de Rome, que j'entreprens de vous donner un ſommaire de ſa Vie ; attendant d'inſtruire le Public par un plus ample recit de tant d'actions vertueuſes qui meri-

A

EX BIBLIOTH. PUB. COLLEG. LUGDUN.
BIBLIOTHEQUE DE LA VILLE LYON 1895

受洗的基督徒坎蒂大，此像标注的地点是南京





北京地图，显示了白河、长城、热河的方向以及十三陵、南口和西山

17世纪中期以后，描绘北京风物的版画开始小批量出现。帝都的封闭，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了转变，洋夷不但被允许开设自治的公使馆，还可以应邀进入紫禁城与皇上及太后当面议事。19世纪后半期的北京版画数量大增，惟妙惟肖地勾勒出了老北京的人物风貌。

当我接触到这些西方版画，并情不自禁地追溯其中的故事时，才发现外国人的“北京热”已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因为时间足够长，就能从版画的主题与表现形式上看出西人心中帝都北京荣辱的变化。

这类西洋版画存在了约300年，这正是西方从中世纪走向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时代，是列强在全球殖民的时代，也是中国从大一统皇权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明末清初至康乾盛世，西方画笔对帝都表现出无比敬畏之情：皇城建筑被描绘得庄严、整齐、宏伟、辉煌；徐光启、坎蒂大、沈福宗的衣着相貌，表现着中国人的尊严与稳重。但随着历史的推进及清朝对外政策的演变，画家的画笔也从恭敬转向俯视、调侃，甚至冷漠。到了清朝末年，出现在西洋版画中的大清皇都呈现出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城市满目疮痍，众生目光苦涩，而列强则趾高气扬，街市上华洋杂陈，紫禁城中皇权威严扫地。一页一页翻过去，你肯定忍不住会对这个形象跌落的过程发出感慨。



清末一个小老外走在前门大街上，没有人叫他帅哥，他也没把中国人放在眼里

除了看“自由落体运动”，西洋版画中的北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外国人猎奇的文化视角。北京人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建筑园林、伦理礼仪，西方人都觉得异乎寻常，并着力渲染，这就使得国人由于司空见惯而忽略的一些场景，由西洋版画保留下来。比如驴车走在路上的颠簸，穷人在阳光下晒太阳，当年就算是有相机，恐怕也没人愿为他们拍照。还有一些景象，如同治皇帝的大婚，光绪皇帝在北海被人拉着跑冰车，就是借你几个胆子，也绝对无人敢去为他们拍照。所有这些，老外画起来不吝笔墨，也从不发怵，他们的版画，就像今天打开了一个“翻墙”软件才能进去的网站。

围绕着京城几百年的变迁，本书对所辑版画进行了编排。我查阅了中外史籍，以期对版画所描绘的年代、地点、人物与场景做出清晰的说明。这是一件乐在其中的工作，也是一件耗费巨大精力的工作。尽管做了大量努力，还是有许多资料无法找到，对许多画面的描述不够准确，或者挂一漏万，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能谅解并帮助我补正。总之，编辑版画的目的是希望梳理一些脉络，使读者更容易在版画的历史长河中游历，品味逝去已久的点滴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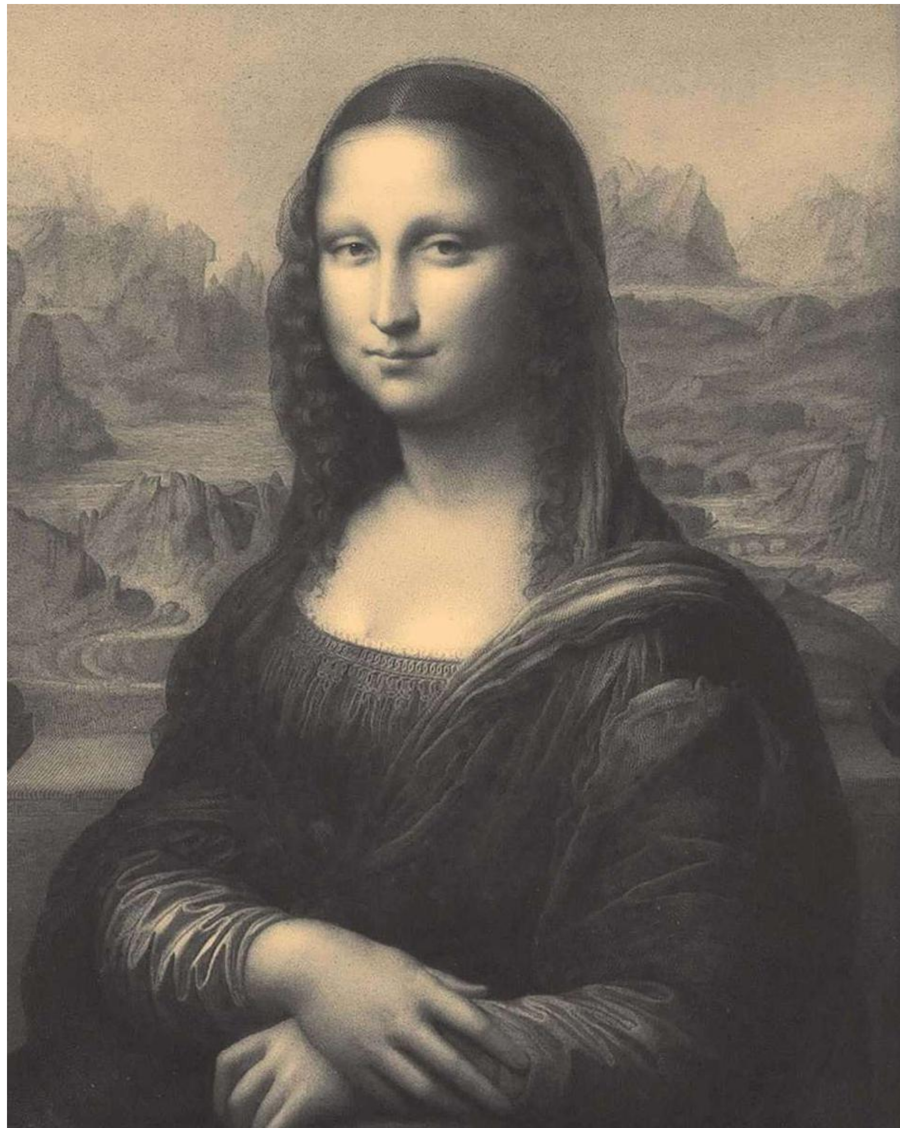
三、希望年轻人也爱看

2005年7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法国“卢浮宫馆藏版画——法国版画400年”展览，让中国人有机会欣赏到西洋版画，见识到西方版画的成就及其感染力。许多版画的原创基础是油画、水彩画、相片或任何速描。制版人要忠实于原创精神，努力再现原作面貌。在卢浮宫馆藏版画中有一幅蒙娜丽莎的铜版画，尽管是黑白的，但是通过对刻板精细的掌握及对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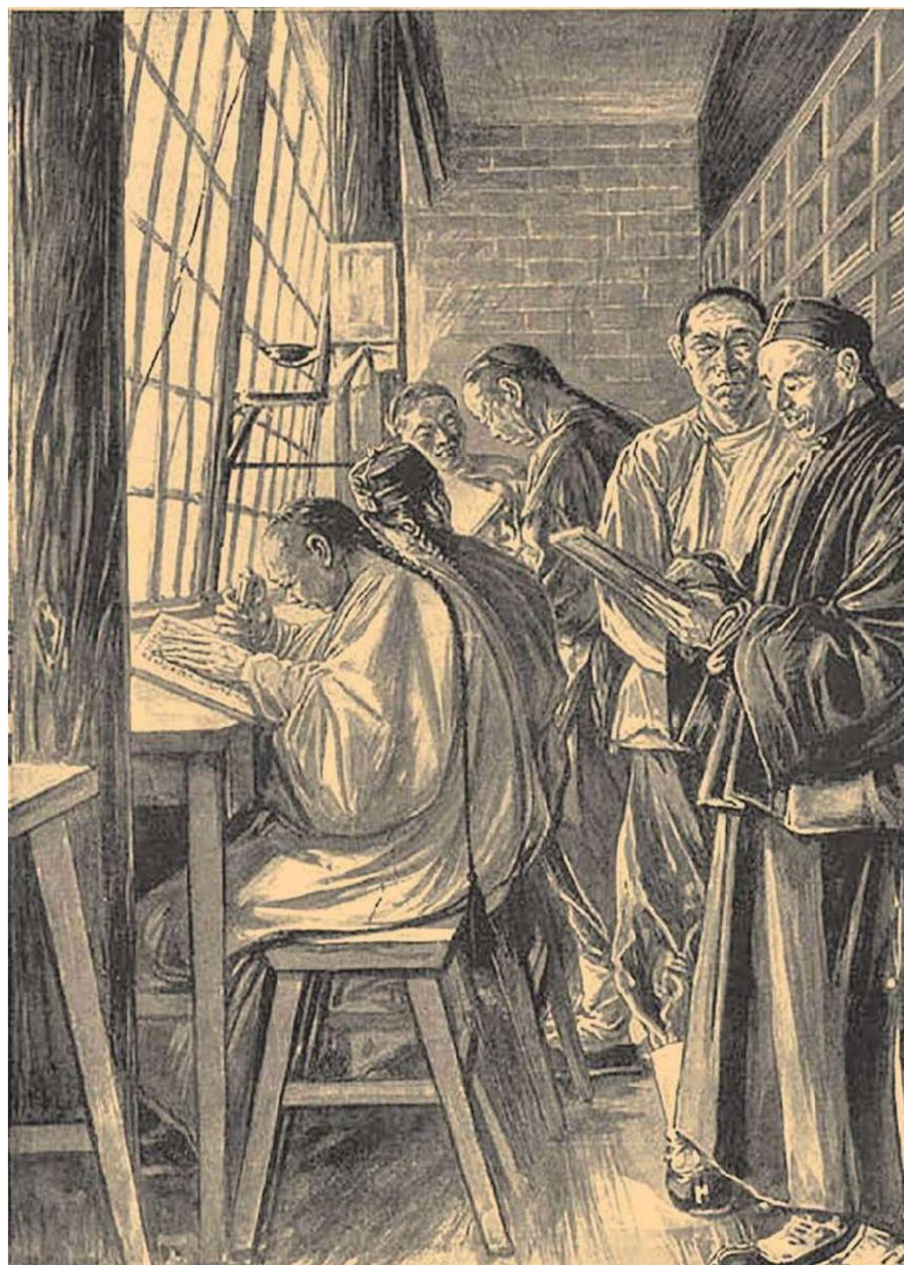
的运用，这幅铜版画惟妙惟肖地再现了达·芬奇原创的艺术水平，使蒙娜丽莎的微笑传遍了当时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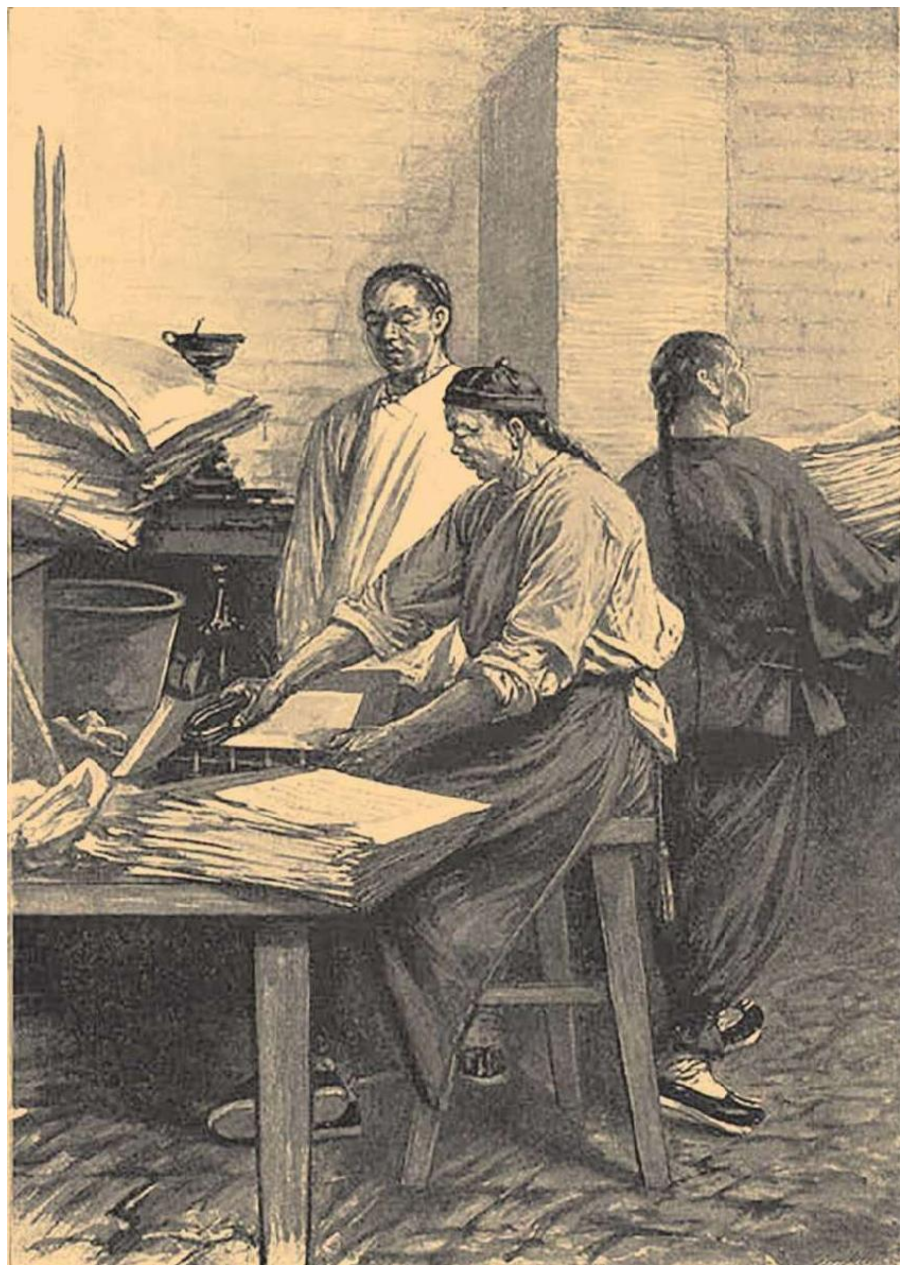
本书收集的很多西方版画都是非常忠于原创的，例如把亚历山大的版画与其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或香港大学博物馆的水彩画原作对照，基本无二致。不过，好多版画的原作已不知所终，有些版画的原创比较简单粗糙，而制版完成的画作却完美精致。现在资料表明，在西方，雕刻艺术的历史可以说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但将雕刻、制版、印刷及绘画结合在一起，却还是一门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年轻艺术。铜版画最早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德国。西方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画家兼版画艺术家是德国人丢勒。他生于1471年，其家庭世代为金匠。丢勒从小就有绘画艺术天分，一生中创作了许多绘画作品。他将绘画制成铜版，并大量复制，被视为西方第一位绘制版画的艺术家。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国家艺术馆保存着丢勒最完整的版画精品。

16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三百多年，是版画大行其道的年代。它们被大量用作书籍的插图，或制作成专业画册，或者以版画装饰画的形式，承担着将形象信息广泛迅速地传播给大众的任务。许多历史地图也是通过制版印刷才广泛留传于世的。从制版工艺来说，可以分为凸版、凹版、平版和孔版等形式，从制版材料来说，又可分为铜版、铁版、木版等。由于不同版材在质地、硬度及制版难易上存在差异，制出的版画又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木版印制的版画显得线条有力，黑白分明，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和感染力。但因为木材不易精雕，木刻版画不够细腻，尤其印制达到一定数量后，细节会逐渐模糊。而铜板，正是优在既可以制作大画幅，又可以保持微雕细节，方便印刷。有经验的人观看古旧版画，总能看出它们是如何制作的，譬如画面细腻还是粗糊，显示它是版面挺刮开印的那几张，还是刻板磨秃后印出的那几张。



18世纪法国人制作的西洋版画，具有收藏价值





西方人用版画表现的中国人在刻板与印刷



中国的绘画师，他们学得很快，有些画被拿去制版印刷

在版画发展的历史上，还出现过许多其他制版印刷方法，如石刻、平版印刷等，在欧洲的不同国家，喜欢使用的方法亦不同。照相技术出现后，还有以相片为基础制作的版画，可以明显看出照片的特征。

在铜版与铁版上雕刻印刷的版画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木版的缺点，本书收藏的这些精美细腻的画面大部分是在金属上雕刻的结果。金属版保存的时间更为长久，在许多年后，还能在原版上重新印刷。蚀刻技术与雕刻技术不同之处在于它改变了单纯线刻的效果。方法是在版的表面铺上一层可以被酸蚀的物质，蚀刻工具与画笔相似，可以在版面上随意挥洒，然后用酸将不显示部分腐蚀掉。蚀刻版画可以多次修版，套色印刷，做工精美，但这样的版画存世数量较少。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自己的雕版制画历史要比西方久远。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懿宗咸通九年（868）雕版印刷的《金刚经》卷就有着线条细腻、轮廓清晰的众佛像，是现知世界上最早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图像，原图珍藏在大英图书馆。自唐以来，中国出版了大量附有插图的书

籍，版画制作工艺水平相当高超。20世纪的文化大师中，出了两位杰出的版画拥趸，一位是鲁迅，另一位是郑振铎，后者收藏了许多明清版画插图精品，还出了一本奇书《中国版画史略》。本书也插入了几幅清末的中国人绘制的关于北京的版画，感兴趣的读者亦可以此与西方版画相比较。



中国人的套色版画，家庭除夕夜，充满欢庆气氛

清代北京城里有位非凡的版画收藏大家，藏品可媲美世界上任何高手，而且主题大都围绕着帝都。你知道他是谁？他就是住在紫禁城里的皇上。从康熙到雍正到乾隆三代，皇上热衷的艺术品类之一，就是版画。它们都是一套套刻出来的，有中国人擅长的木板画，也有请洋人加工制作的铜版画，面世后都藏在紫禁城东部的武英殿中，后世称为“殿版版画”。其中有几个名版享誉天下，如康熙的《万寿盛典图》、乾隆的《八旬万寿盛典图》，把隆重装点的北京城从西华门一直画到西郊，人物如火柴棍，不下千个。和皇上的御制佳品相比，西洋版画的政治分量太轻了，但是从社会题材、写实水准、风趣情感的角度来比，那西洋版画的评级是要高出好几截的。

用版画画报作为媒体宣传工具，清末的北京紧赶慢赶，欲赶上上海人的

步伐。1902年，帝都出现了为国人开民智的《启蒙画报》，此刻晚了上海逾20年，落后欧洲整整60年。而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与作画技巧方面，这份画报实在乏善可陈，以至我很难在其中找到一幅，借用于本书中。

由于版画可以重复大量印刷与广泛传播，不像绘画作品那样稀少珍贵，但每张版画都是经过数道工序制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与情感，可以说每幅都是原作，流传至今殊为不易。版画与照片相比，追溯的年代更为久远，而且由于可以二次创作及着色，画面也更加具有艺术感染力。

本书的成功，要感谢我的父母在历史方面的造诣和对我的支持。还要感谢我的先生马思齐，他从一开始就有着和我同样大的投入，兴趣始终不减，很多时候，是他开车带着我到英国的小城小村，耐心地搜寻这些历史遗珍。

上了年纪的老北京人，最容易在书中找到眼熟的身影，像冬天护城河上溜冰的大爷，赶着马车、骆驼进出城门的乡下人。我的朋友们会告诉我这是他们父母爱翻的一本书。随着父母一代的离去，书中的景象会脱离任何人生活的记忆。那么，年轻的一代人还会喜爱看这本书吗？将来还会不会有帝都版画400年展？希望翻完这200多页，大家能得出自己的判断。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一章 明末清初的印象



1617年的亚洲，大明是右首中部蚕豆的形状，旁边标注了中国人

一、想象与现实有多远？

最早到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他们于1514年第一次到达南海的伶仃岛，要求登陆进行贸易，未获明政府批准，遂在水面上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1557年，葡萄牙人通过贿赂明朝官员，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开始利用澳门作为他们与中国沿海港口做生意的“特区”。从此，葡萄牙人建立了一个连接欧亚的贸易海路，开辟了从葡属印度的果阿（Goa）到南海再到日本海的航线，将欧亚贸易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当时的葡萄牙国王每年都要亲自任命商船船长。船长带领船队跨过重洋，到中国来交易金银器皿、绸缎和瓷器。

明代在隆庆朝之前一直实行海禁政策，特别是严格禁止与东洋人的贸易。葡萄牙人只许驻留在澳门，每年可派几名代表坐船到广州做生意，但不允许他们在陆地上过夜。严守此规，葡萄牙人没有可能深入内地，

也不会到过中国的北方。

但根据现在发现的非常零散的一些著述，证明这些商人曾到过京城。例如一个在中国犯了罪的葡萄牙人，曾从宁波经南京被押往北京。大概他的罪行不过寥寥，所以还有闲心沿途左顾右盼，后来又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人。他提到普通中国人见了官吏，非常恭敬，甚至战战兢兢。对官吏讲话、提供服务，百姓都要屈膝跪地，让前者看起来更加威风八面。他曾坐船经过大运河，见到了船民的水上生活。尽管自己对官员也是惧怕三分，这位在押的犯人还是承认，中国当时的官员选拔制度很有效，审理案件也甚为公正。他结案的运气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葡萄牙人的故事，肯定被一个荷兰学者听到了，他的名字叫让·范林斯霍滕（Jan H. V. Linschoten）。此人游历广泛，热衷于探索各国人文地理。他曾到过非洲及葡属亚洲的很多地方。16世纪末期，荷兰已是雄霸亚洲贸易的欧洲强国，但在中国，他们强不过葡萄牙人。范林斯霍滕选择在印度果阿为一家葡萄牙人的公司工作，遂有机会接触曾驻留中国的葡萄牙人，听他们讲述在当地的所见所闻。1598年，范林斯霍滕出版了一本书，名叫The Itinerario，其中洋洋洒洒地提到了大明中国的内陆。可以推断，此书基础素材的获取，与当年马可·波罗的渠道，可能相差不远。范先生的故事讲得没有马先生那么逼真炫耀，他的书，也从来没有那么出名。

不过在我的笔下，可以让范先生出出名，倒不是以他的文字，而是以他的图画。仅凭与葡萄牙人唠嗑，范林斯霍滕画出了一张中国及远东地图，相比同时代的利玛窦在华绘制的世界地图，范氏的中国地图虽略有完善，但与真实情况仍差之千里。那个时代的东方认知，就是这个境界，至今，这张图在欧洲仍有不菲的收藏价值。

范林斯霍滕画的人物像比他的地图更有意思。下面的两张画，都是出自他的手。这是在现代西方最早出现的中国人——确切点说，是明代中国人的形象，它们的原图，据说保留在意大利米兰的一家图书馆。你可以对着此画抱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哪里有大明人？那背景不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吗？然而，对当年的欧洲人来说，这些人可是真有东方风情，特别是穿着黄色袍子的那位男士，把他头上帽子正一正，不是很像明代官宦的乌纱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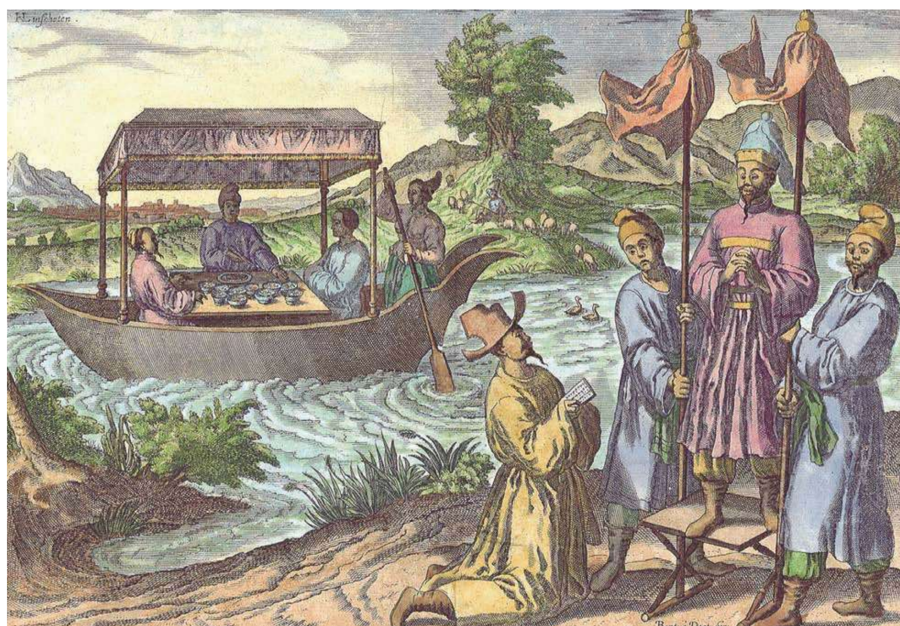
范林斯霍滕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物形象准确与否，对观者感到抱歉。关键的是，他要用这些形象来说明，中国的内陆是相当发达的，他们人人衣着得体，长袍拖地，意味着生活很富足。男人们抄着手，瞪着眼，面容平和大度，一个普通女子，手持鲜花，悠闲雅致，大国天朝的子民，品性跃然纸上。范先生在书中推而演之，把中国的社会道德，定位于进化的高级阶段，远超南亚沿海热带尚未开化的国家，也优于正在挣脱中世纪束缚的欧洲。

画上的中国人，不像是生活在南方，因为他们的衣服，看上去太保暖。葡萄牙人说得绘声绘色，范先生举一反三，加上了自己丰富的想象。这四位画中人，一百年里被欧洲人奉为经典。17世纪初有一张亚洲地图，其上代表中国的两个人，不折不扣，抄袭的就是范林斯霍滕。

另外一幅图，范先生的发挥就更出格了，有点令人忍俊不禁。你看啊，听说官吏都高高在上，八面威风，范林斯霍滕就在他们的脚下塞了个小板凳，下跪的人也不是老百姓，应当是个戴着官帽的小吏。杭州以北，中国人习惯大运河上的生活，范林斯霍滕就把他们画成稳坐钓鱼船的样子，大老爷一边在破浪前行，一边摆出连汤带菜的一桌大餐。马可·波罗没有提到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范林斯霍滕的船中大餐补上了这个细节，摆个姿势，让人看清楚大老爷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1598年的版画，是范林斯霍滕靠创作“请”来的中国人



大运河上的船户生活。事实上有没有这么惬意，就不得而知了



图上的这些人，还没遇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难题，因为他们是大明子民。每个人都有编号，标注不同的身份

今天看来，范林斯霍滕这些所谓写实的版画，演绎和夸张的成分太大。一直到17世纪中期，画说中国，不过构筑出一个东方童话。有两个主题，在早期的这类绘画中出现得最多，一个是衣饰的考究与其代表的社会地位，另一个是老百姓见官的典型场面。

想象中国是那个时代海上冒险家的梦。哥伦布于1492年从西班牙的费罗岛起航时，幻想着一直向西航行，就能到达中国，遇见身穿绫罗绸缎的庄园贵族。捷足先登的葡萄牙商人，拿着简陋的望远镜，从伶仃洋朝着北方看，天高皇帝远，模模糊糊。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们对此却看得分外清楚。想象中的观察得出了想象出的结论，东方帝国，政治清明，社会祥和，民众富足。如果没有新的绘画师出现，这样的想象，在西方人脑海里是抹不掉的。

范林斯霍滕的绘画之后，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等国的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

士，纷纷踏上了中国大陆。他们不满足于给葡萄牙人当二传手，把掀开东方神秘面纱的任务当己任。这是天主交给他们的神圣责任，鼓舞着传教士勇敢地向帝都北京进发。



衣饰华丽的人物特写。远处似有剧场，男人可能是戏中人物，女眷是小脚，不知是看客还是演员



一个外国人描写的大官出行：“远处正在鸣锣开道，呼声震天，不用说，肯定又是哪位朝庭要员经过此地。人群一下子慌乱起来，前冲后拥，不管挤到哪里，他们都像凝固在那里，呆呆地站立在原地，目视着八面威风的大轿通过。”

二、“神父版画”名噪一时

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不像葡萄牙人那样偷偷摸摸零散上岸，他们是有组织、有使命的。他们不遗余力，用虔诚的信仰叩开东方帝国通向天主的大门。他们不贩卖货品，也不贪物质实利。

早期的传教请求与上陆的通商努力一样，均被明末皇帝们拒之门外。被

视为东方福音之父的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曾制订过在中国传教的详细计划，遗憾的是，他始终没能踏上中国大陆一步。1552年，他病逝澳门。今天澳门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堂，继续着他的事业。

第一个踏上中国大陆的耶稣会传教士，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学识广博，具语言天分，记忆力超强，曾在罗马学院学习神学与哲学，对数学、天文学颇有造诣。范林斯霍滕靠想象作画的那年，他正在一个人艰难进京的路上。其实他1582年（万历十年）就抵达澳门，曾被地方官引荐到过北京，但直到1600年，他才阴差阳错，侥幸在京城栖身。十几年的磨难让他明白了许多道理：中国不是罗马教会想象中的宗教荒野，它具有高度发展的文化与智慧，老百姓祭拜神灵、祖宗与上天，有自己根深蒂固的伦理渊源；与其拿西方的天主生搬硬套，不如从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入手，改变中国人对“上天”的盲目崇拜。通过进呈自鸣钟、《万国图志》等稀罕物，利玛窦得到了万历身边几位大臣的信任，最终心想事成，在北京设立了自己的小教堂。利玛窦能读写汉语，尊重儒家文化，喜欢钻研中学，做了许多有利于东西交往的事。其中的一件，就是试图说服罗马的教会，尊重中国人的祭祖仪式，因地制宜传播主的福音。



基于传教士的描述，杜赫德（Du Halde）绘制出中国人婚礼的场面



这是威尼斯著名出版商Aldus Manutius在1500年左右出版的一本书，它扉页上印着海豚缠铁锚的书商标识。这是最早的现代书标之一。据一些考证官说，此书中提到的“Sener”，就是中国

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个出版圣地，就是自由贸易港口城市威尼斯，它大力推动自由阅读。从15世纪到16世纪末，那里出版的书籍，不时有只言片语提到迷人的东方帝国，现代西方把这些书列为关于中国的古籍之首。不过，它们都是在炒马可·波罗的冷饭，放在今天，可能就叫剽窃。16世纪最后的20年，也就是利玛窦到访京城的年代，西方人才第一次看到中国人使用的方块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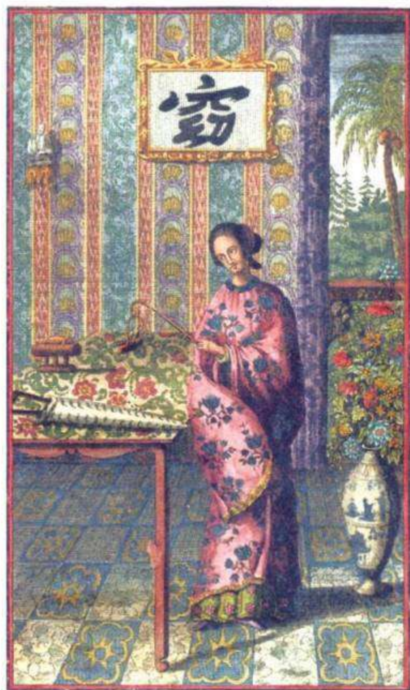
利玛窦的深入与勤奋，把中国从道听途说的虚构，还原为书信记载的事实，在元代开放的东西“自由行”之后，第二次打开了欧洲人窥视东亚帝国的大门。1582——1610年，他笔耕不辍，积累了大量观察实录。1615年，一位在北京追随他的神父金尼阁，把他的笔记以拉丁文编辑出版。这本《中国纪事》，全景描述明代的城市乡村与人情，震惊了西方的神学院。它太受重视了，几个国家忙不迭地将它翻译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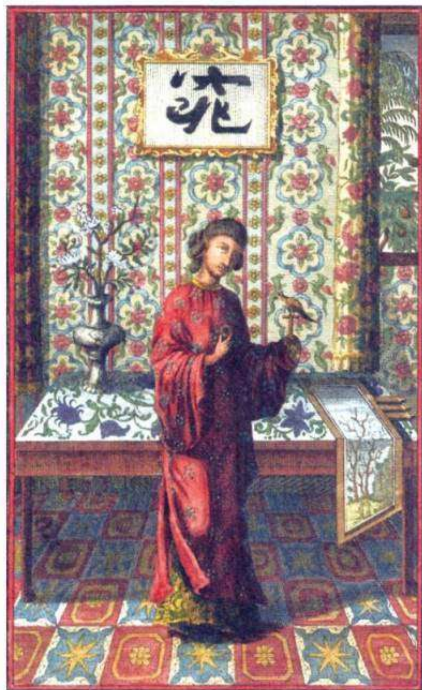
从传教士编纂的书籍中看到帝都北京的版画形象，欧洲人还要等上几十年。有图有真相，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大费工夫。当年名震欧洲的“中国通”，都是忠实的天主教学者，属于耶稣会与其他的教会。值得一提的附有插图的早期书籍有好多本，其中一本是德国神父、学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67年写的，拉丁文本的书名叫《中国画册》，附有70多幅版画，形象地展示了中国从南方边陲往北的各种景象。另一本是神父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著作《鞑靼战纪》，记录了满族人攻打大明广东府的战争经历，书中出现了地图。还有一本是法国神父、历史学者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出版于1735年，书中有大量版画，还有在康熙皇帝的谕旨下由法国传教士到各地测绘制作的地图，使其成为名噪一时的中国宝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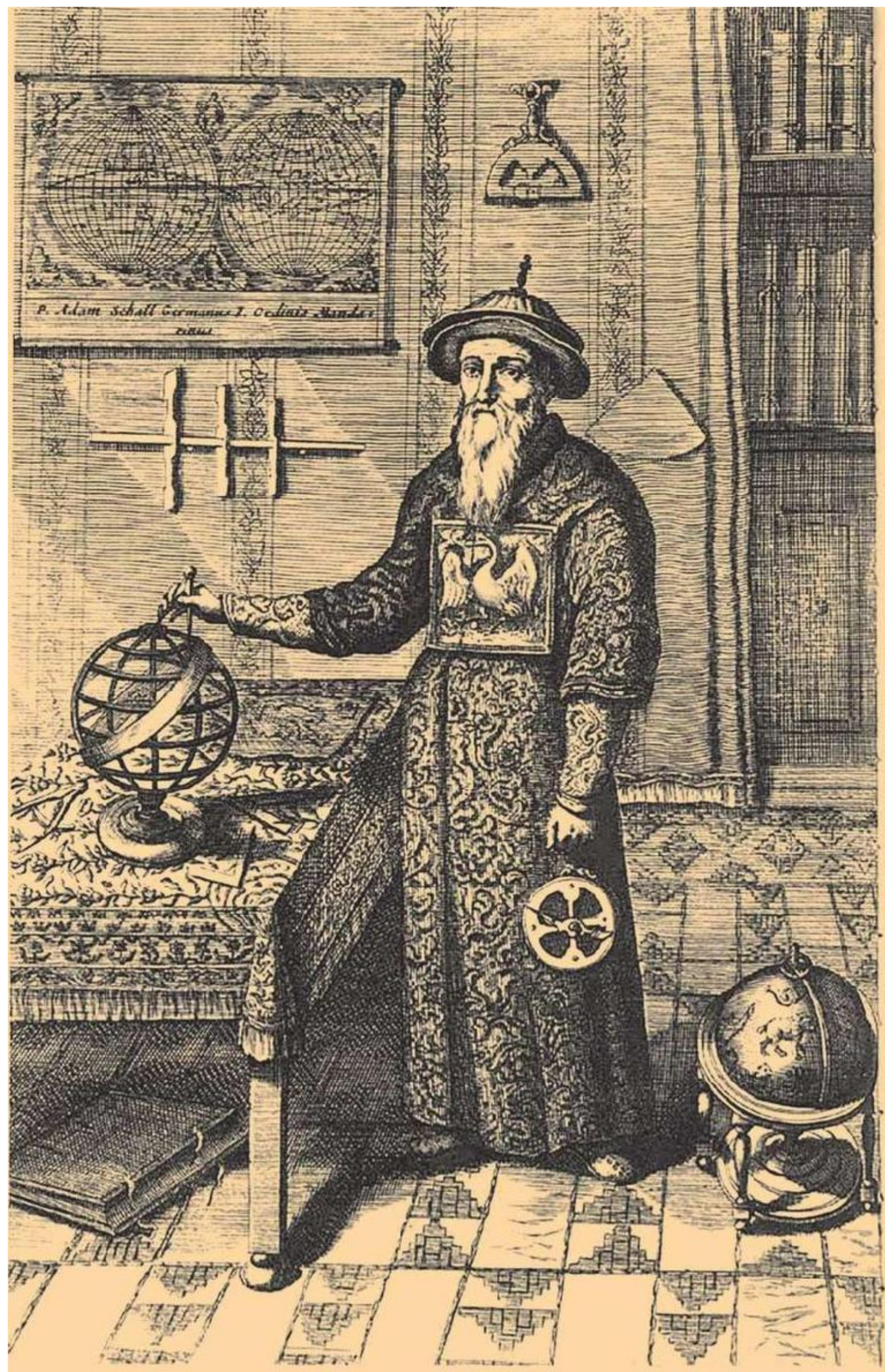
利玛窦身边站着的徐光启，首次出现在基歇尔的书中。他们二人过从甚密，一起翻译西文书籍，都是在京城发生的事

除了传教士送回的信息，神父们也广泛借助商旅游人之作，例如照搬或改绘荷兰东印度公司职员纽荷夫的作品。在尚未有版权法的时代，许多画作会在略做改头换面后在不同的书籍中出现。有时书散落了，只剩一张单幅的版画，书商也搞不清它的原始出处，往往张冠李戴。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对这些文字与版画追根溯源，总能发现其是西人在东南沿海以及在北京所做的第一手观察。





基歇尔书中正在逗鸟的两个“窈”“窕”淑女，一定是有人看到过的场景



汤若望神父身着朝廷一品官服，手按地球仪，墙上挂着世界地图与绘图仪，地下放着一本西式大书。此图未标示的地点，一定是北京，朝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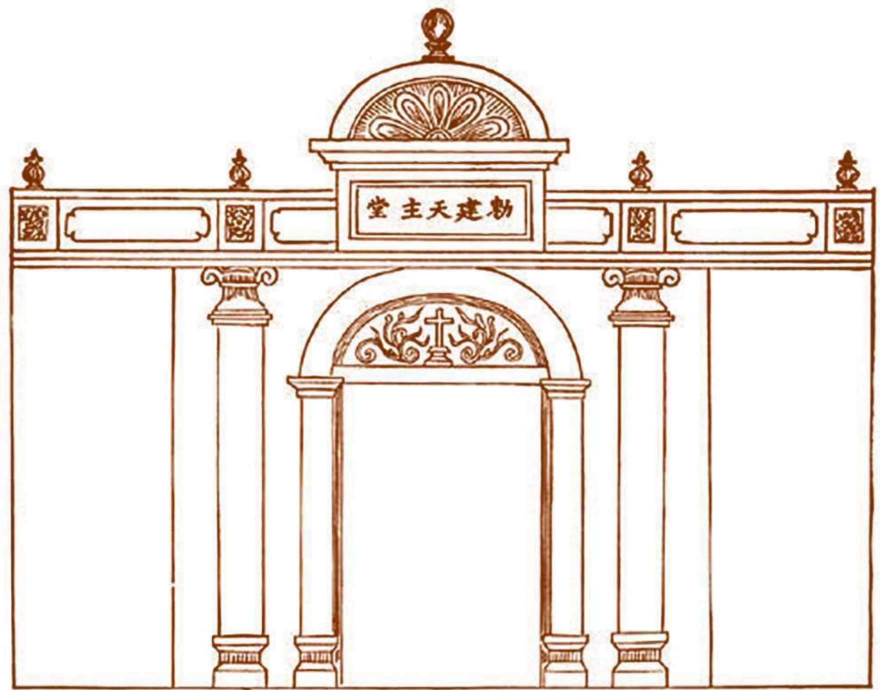
开放此时达到顶峰

利玛窦之后，有两位既活跃于明清朝廷又出现在学者书中的传教士，他们是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与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正是这二位神父的生平，第一次带我们实实在在走进版画中的帝都。

汤若望在中国的经历，可以成为扣人心弦的戏剧题材。他于1591年出生在德国一贵族家庭，1620年抵达广州，先后多次入京，当过崇祯皇帝的钦天监副，帮助编修《崇祯历书》，制造天文仪器，还帮助濒于灭亡的明朝制造红衣大炮，抵御李自成农民军及关外满洲人入侵北京。明朝灭亡后，他又毫无保留地把自已的知识与忠心交给了清摄政王多尔衮，继续安居于天主堂在北京的南堂。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逼迫下吊死于煤山，皇帝的嫔妃将被发配到远方荒凉的边城。汤若望在北京亲身经历了这场动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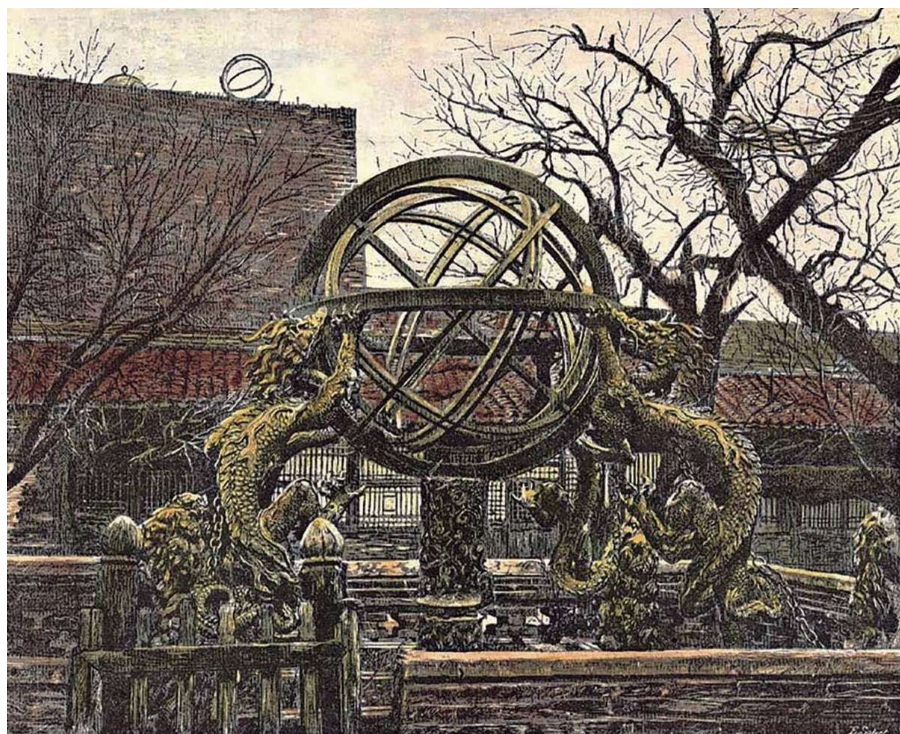
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的大门。它坐落在宣武门，俗称南堂，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经皇帝特许，由利玛窦创建。现存建筑是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重建的，此门现已损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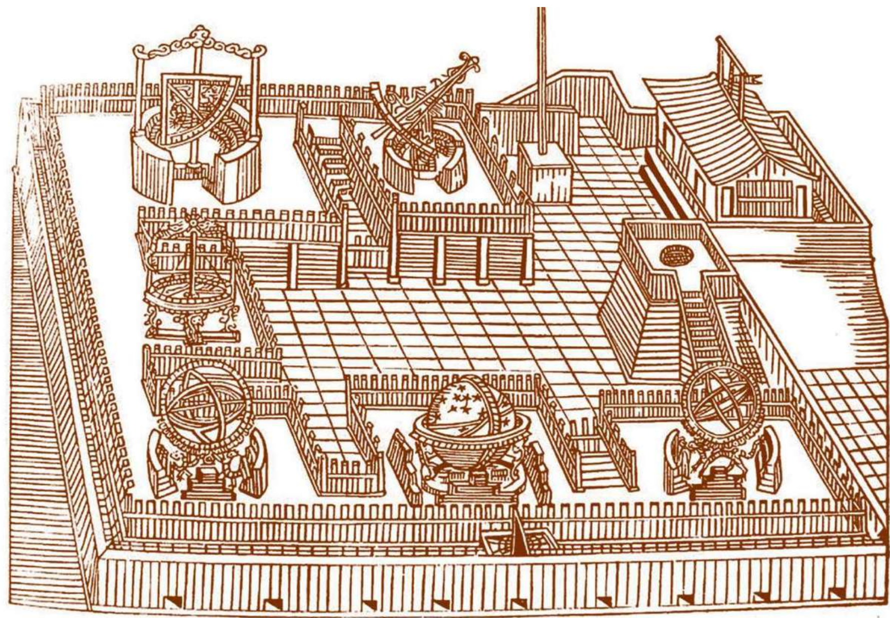
南怀仁着清朝官服的标准像。除了手势不同，南怀仁每次在版画中出现，身后也是汤若望的那些标配，圆规、三角板、地球仪、地图，还有耶稣会的标识

1645年（顺治二年），清朝颁布了由汤若望等编纂的新历，并宣布汤若望任钦天监正。之后，因为卷入了清初宫廷政治，他的命运起伏跌宕。好在他是在荣誉中辞世，身后得到康熙帝恩恤，与利玛窦一起，长眠于北京阜成门外一块幽静的墓地。

南怀仁是由汤若望推荐进入钦天监的，他的贡献主要是在北京观象台原有仪器的基础上，设计督造了六架欧洲天文仪器，使中国天文仪器的精度达到了空前水平。南怀仁对清代大炮制造的影响也非常大。这些功绩，足以使他成为中西科技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



观象台上的浑天仪，以照片为底的版画



古观象台全貌，以手绘草图为底的版画

围绕着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京城作为默认的背景，悄悄漾入了西洋版画。从明末到前清几代皇朝，有一类作品，我把它们定义为“神父版画”。下面再看几张带有神父形象的画作，在西方，它们曾经为神学界熟知。

在清前期的几位皇帝中，顺治始终与传教士保持了较好的关系，对汤若望尊敬并信任。据传，顺治皇帝英年早逝，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曾在皇二子和皇三子之间徘徊不定，汤若望提出选择生过天花而具有免疫力的皇三子为帝，即后来的康熙。一个西方传教士能够左右皇位继承人，可见顺治对汤若望的信任程度。

由于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祭祖、祭礼等礼仪采取了妥协态度，康熙皇帝也在一段时期内表现出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容忍与支持。但出于各种原因，康熙又转而采取了严厉的禁教措施，并将一些传教士驱逐出境。历史只给予传教士在中国和平传播福音的短暂机会，从康熙末年到清朝

灭亡，清朝政府再也没能与西方神学和谐相处。西方还出现过乾隆皇帝离开宝座，举手做出耶稣救世模样的画像，这显然是以已度人的虚妄之作。



大胡子的汤若望指着地图，在向英俊的顺治皇帝解读天象，背景可见中式宫殿的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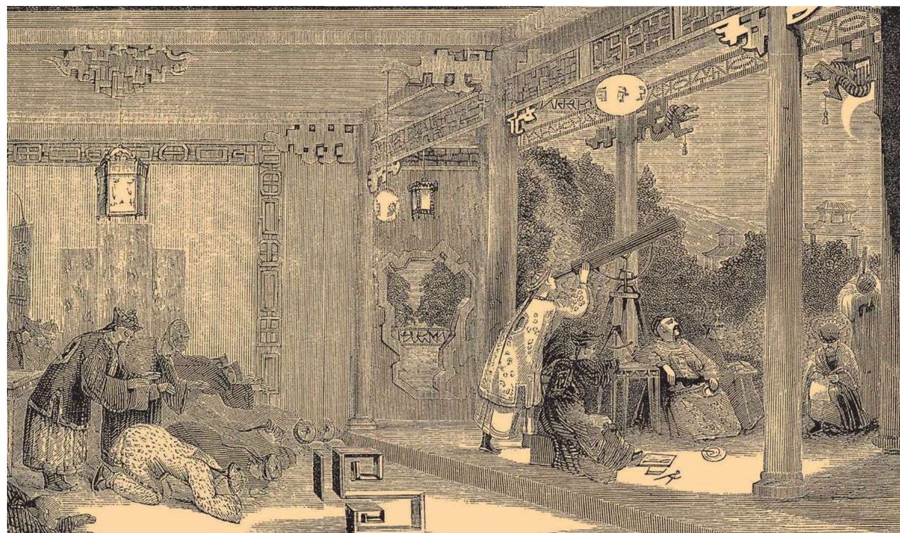
康熙皇帝巡视教堂，身边有文人武将，神父弯腰却不跪地。此场景是想象的，但皇帝巡视有可信的依据



17世纪法国工厂Beauvais Manufactory编织的挂毯，传教士在向中国皇帝讲解天文地理，这场景和现实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



乾隆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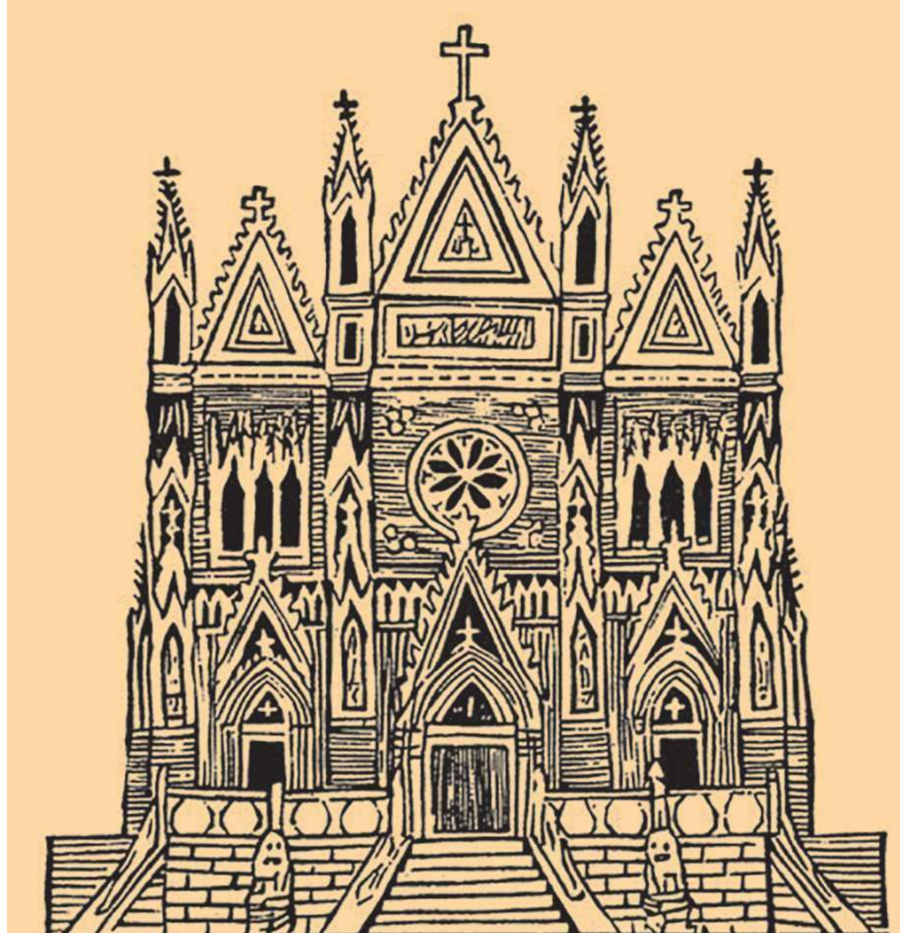


清朝钦天监官员观察日蚀。有人坐在那里摆弄仪器，观测记录日食，另一些人诚惶诚恐，磕头下跪，求老天爷开恩。只有一人站着，长长的望远镜延伸了他的目光

“神父版画”亦把清朝与西方科学交往的愿望与成果留在了想象的场景中。例如，大清的官员曾认真地学习西方的天象知识，使他们原本自信的、不可动摇的政治伦理基础有了科学的支撑。西方人把哥特式的教堂建在了北京，皇宫、城墙与四合院交相辉映的皇城接受了另类建筑。今日出游只要留意，仍可在西方宫殿、教堂和庄园的墙壁上发现“神父版画”的流光溢彩。



北堂一角



东堂正门

上图中的这两座教堂在义和团运动中均有损坏，古旧版画记录了它们的原貌。西方一些城市当时也引入了中式建筑，如亭台、花园，但那只是为了观赏，建在了宫廷庄园的围墙之中。在北京，教堂无遮无拦地建在了大街旁，在天朝的控制下，偕同钟声打进来一线精神光芒。城里的信徒受众都可以推开教堂的大门，进去祈祷。这里有一种文化开放的往迹，版画提醒我们不要从国家记忆中抹掉。



清初的一位天主教信徒



杜赫德描绘的官员出行阵势，此画首次出现在神父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的著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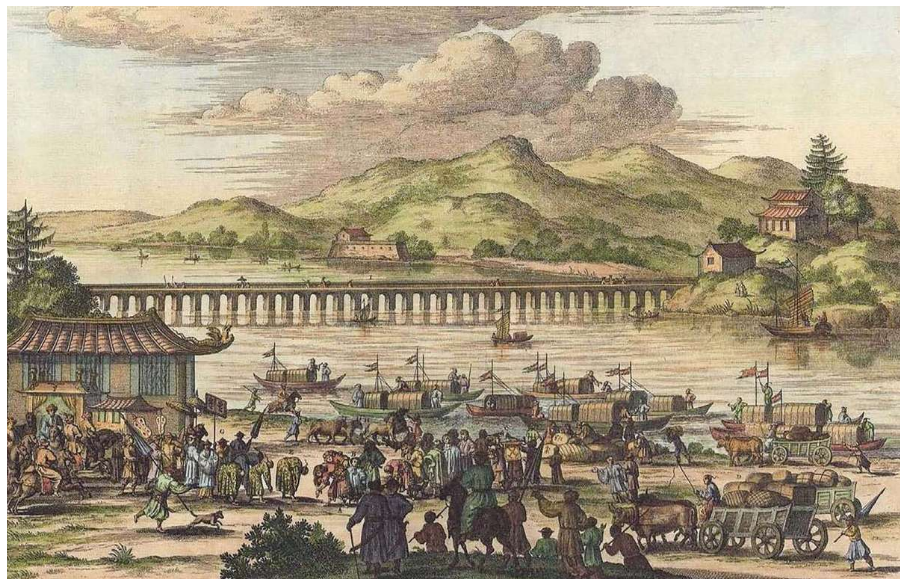
前呼后拥，羽旗华盖，来的其实只是个八抬大轿的官员。我查了一下大清朝的规定，如果是在京城里当官，三品以上的，在城里只能乘“四人抬”，出了京城能乘“八人抬”。如果是京城的皇亲国戚，那抬轿子的，就可以超出八人、十人，皇帝本人，最多可以达到三十二人。老外在欧洲见到过鞍前马后、护骑如墙，可还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招摇阵势。就前前后后的随员人数，杜赫德并没有夸张，而且，这还根本没有达到皇上出行的配备。

传教士曾打开一时的水龙头，哗哗哗地流出来自中国的信息。但是想要引来大西洋的圣水，浇灌中华大地，罗马的耶稣会与天主教神父们，还须仔细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

三、见到了燕山脚下的中轴线

时代列车开到17世纪的中国，捷足先登的葡萄牙人，还是热衷在东南沿海谋取小利；耶稣会士呢？从京城到沿海州府，还是孜孜不倦地传扬着中世纪的宗教精神。1655年，也就是清朝取代明朝11年后，一拨从南亚来的欧洲人登上了列车，他们举着中国人从未见过的荷兰旗，兜里装着新鲜的资本主义文明。这趟列车，二百多年里只有一个目的地，就是冲向京城。

荷兰人为什么是从南亚来？因为在明朝末年，今天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大岛曾经是荷兰殖民地，也是欧亚贸易的转运站，今天的雅加达当年叫巴达维亚，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基地。17世纪的世界，荷兰最早发展了资本主义组织，有贸易公司，还有银行和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卫普，都是迅速崛起的商业中心。从南亚北望的市场，令人垂涎欲滴，但觊觎已久的荷兰人不敢造次，他们想尝试通过现代外交，实现与中国贸易的“合法化”。那是什么意思？皇朝圣旨即法，合法，就是得到皇帝的恩准。但从万历到崇祯，皇帝谨守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训，所有的外国使节，在他们的概念里都是贡使，带来的东西，都是前来朝拜“天朝上国”的贡品。皇上怎么能与蝇营狗苟的商人谈贸易条件？晚明社会奢华糜烂，朝廷贪婪怠政，为洋人赚钱盈利的买卖，根本不会提上议事议程。



荷兰人曾数次出访京城。图为商团在通州上岸，受到皇帝特使的迎接

顺治朝经营了十年，荷兰人估摸着时机来到了，他们要用资本的语言，说服京城新朝新政，说服年轻的异族皇帝，解放思想，改弦更张。

马可·波罗写于300多年前的那本书，仍然是北上的模糊向导；传教士传回欧洲的大部分书信正在编辑中，对了解大清的内政没有什么帮助。这就是说，北京之行对荷兰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政治冒险。这些人并不代表荷兰政府，而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只是一个商团。为了商业利益，什么冒险都是值得的。

在这支一行17人的商团里有一个专司记事与绘画的小职员，名叫约翰·纽荷夫。他的任务并没有商团大使觐见皇帝那样重要，但他却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作品，即《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书中的许多版画原作是纽荷夫在途中即景创作的，这是欧洲人第一次描绘亲眼见到的中国，相比同时期由传教士绘制的版画，纽荷夫画笔下的中国，显然具有更高的真实性，他开创了版画

中国的一个新的类别，权且称之为“商旅版画”吧。



近景看运河中的帆船，大船有好几层，架着复杂的桅杆绳索，挂着小旗子，两岸道路很宽但不平坦

此类版画，除了纽先生的大作，还出现在有一本纪事中。它也是荷兰人写的，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团造访京城相关。清初数年的时间里，京城几次见到高鼻深眼的荷兰人，他们一次次碰壁却不气馁，一次次继续北上。1664年，一位商团使者还在北京见到了未成年的康熙皇帝。由于这些上访时间紧凑，版画的主题相通，所以下面的介绍，就把它们作为一个类别的版画，穿插在一起叙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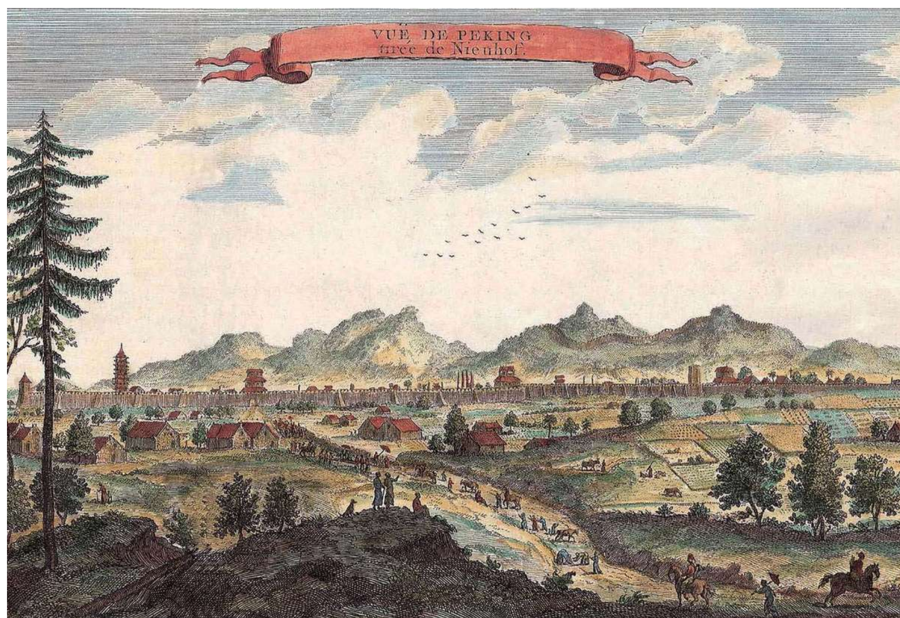
1655年7月18日，纽荷夫的荷兰商团在广州一港口登陆。1656年7月16日商团到达通州，当时算作是京畿重地。纽荷夫的书记录了一年的行程，像广东府如何与皇帝传书沟通、大清的地方官与汉人官吏如何行使权力、从南到北的交通设施、沿途的民生百态，这些以前不为外人道的

见闻，开始曝光在西人笔下。

历经了种种艰难，商团终于到达京城东郊，纽荷夫不顾旅途辛劳，找了一块高地，支起画架，迫不及待地把眼前几十里的风光尽收笔下。传说中的巍然帝都尽在咫尺，可以想见商团成员定是欢呼雀跃。



荷兰商团看到的景象，图题是“通州”。远望城墙坚固齐整，河道宽阔，小船扬着风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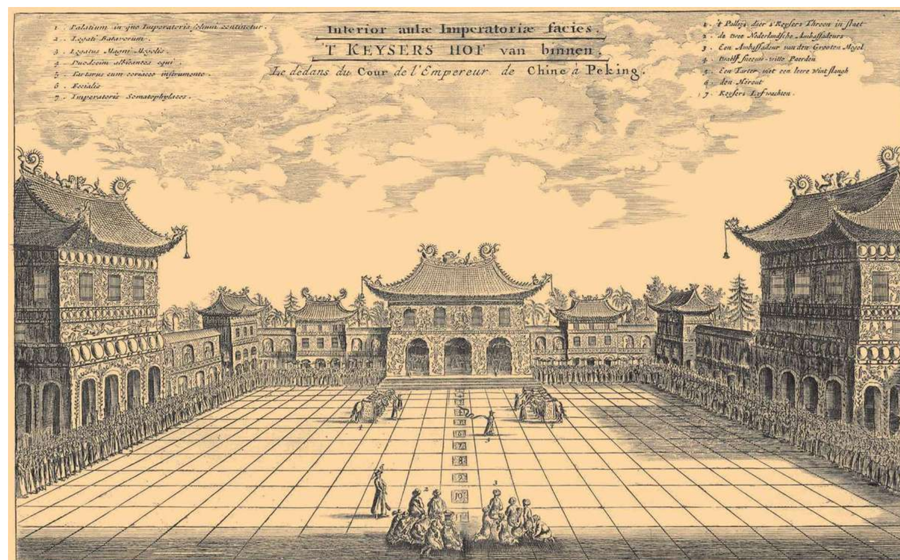
350年前燕山脚下的帝都

上图中远远望见的是宽阔的护城河，带有垛口的城墙，城里的建筑高低错落，气势不凡。黛色的西山，以高大巍峨的身躯，护卫着脚下的宁静，山上可见向后蜿蜒伸展的一段长城。大地上是片片四方的田野，收获在望；一条大路人来马往，径直通向皇城的朝阳门。城中高大的建筑，从南往北猜，应当有天宁寺塔、前门，然后是紫禁城中轴线，从此它将以列队的高门大殿闻名于世。建筑的顶子都被涂成闪闪发光的黄琉璃色，耸立在一片绿色的树梢之中，透明的空气中，飘荡着城市的活力与轻快。

这是西方人第一次描绘京城美景，虽然仍粗描简绘，凭空想象的元素已经少了很多，像教堂尖顶和石头城堡。从16世纪开始，这样的城市整体写生画已屡见不鲜，荷兰人首开风气之先。这幅北京城版画，时间上可以说是名列前茅，早于我在西方看到的许多城市版画。我还看到过一幅远眺南京的版画，风格上大同小异，只是中轴线不同，远方亦不见长城。

商团从朝阳门进入北京城。皇帝派车马和鼓乐手专程到通州迎接，商团前后有兵丁簇拥护卫，煞是风光。这给了荷兰人很大希望，认为皇帝很快会开恩接见他们，并接受公司的通商请求。但接下来的事情就有些不妙了。皇帝派来的大臣先是对商团带来的大部分礼物不屑一顾，因为它们并不比宫里那些传教士的礼物更出色，继而对世界上是否存在一个叫“荷兰”的国家表示怀疑。商团团长费尽口舌，还拿出了荷兰的地图。但是对清朝的大臣们来说，荷兰的政府设置及其在海外的殖民地管制制度，是前所未闻的奇谈怪论，完全不符合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猜想这帮荷兰人可能是一群海盗，世界上根本没有“荷兰”这个国家！这种误解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海外知识的贫乏。宫里的传教士生怕其他国家抢占与中国贸易的先机，因而对商团的到来恶语相向，这也使朝廷官员难辨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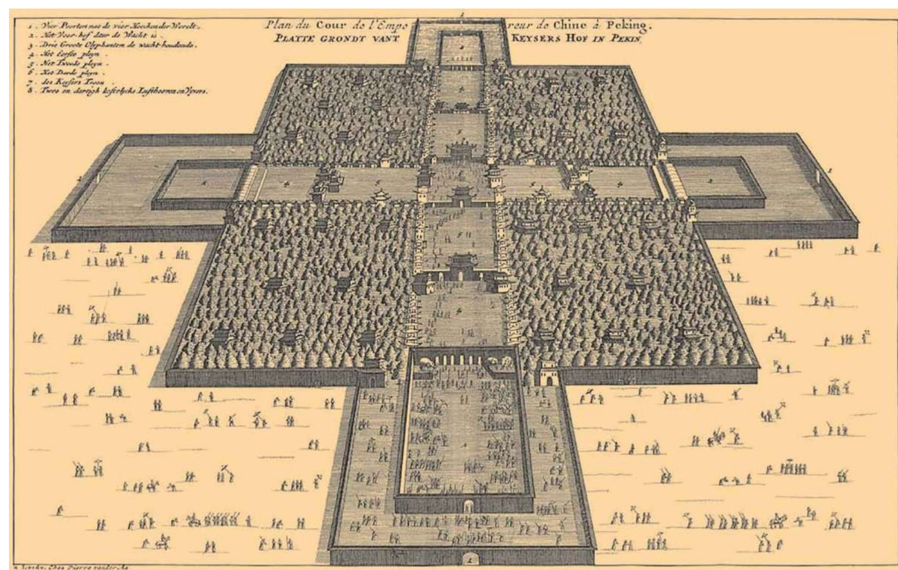
假。



皇帝接见使节的广场上铺着2英尺（约60厘米）见方的地砖，不但使得广场很有气势，也起到了让来宾定位的作用。荷兰使节被告知要跪在第十一块方砖之后的地方。在皇上出现之前，他们在那里对着高高的大殿朱门，一遍一遍行三跪九叩之礼

经过几番质询，荷兰人终于说服了某大臣，并得到了顺治皇帝接见的谕旨。1656年9月2日，皇帝将接见荷兰商团。纽荷夫不惜笔墨，记录了这次接见的许多细节。当日凌晨两点，皇帝的卫兵就已到达商团驻地，手执灯笼在黑夜中领路，带着商团成员从午门进入了紫禁城。这给了纽荷夫近距离观察这座宏伟皇城的机会，他发现紫禁城的建筑结构与他们驻地的庙宇的结构很相似，只是规制放大到不可思议的倍数。过了午门是端门，然后是太和门。在太和门内的院子里，起码还有三群人也在等待皇帝的接见，其中有印度的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他当时正在筹划修建他什神庙，有拉萨的达赖喇嘛使团，有蒙古的王公。这些人服装、神态各异，加上院子里的几十个清兵，聚在9月份的一个清晨，已是难以言表

的奇异景象。更奇特的是，借着朦胧的晨曦，他们看见院子里还有三头体形巨大的黑象，像石雕一样站在大殿的屋檐下。



故宫平面地图。纽荷夫只能顺着自己的脚步，记录宫中的地形，当然会挂一漏万。可贵的是，他画出了由数座大门连接起的中轴路线。在第三座大门的两边，有两圈象房，不知是出自想象，还是他路过时真的看到过



顺治皇帝，被画得扭着腰站在宫里，手中还握着权杖。如果你熟悉路易十四的肖像，不难猜到这姿势是从哪里学来的

顺治皇帝在乾清宫接见了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一共15分钟。各种仪式一样不差，荷兰商团成员早几日接受了训练，专业地恭行了磕头礼。但皇帝始终默不做声，神情庄严威仪，举止高贵稳重。几个月后，圣旨下来了，皇帝慷慨恩准，允许“洋夷贡使”今后每八年到中国港口停泊一次，

可带四船交易货物，其他贡品进献紫禁宫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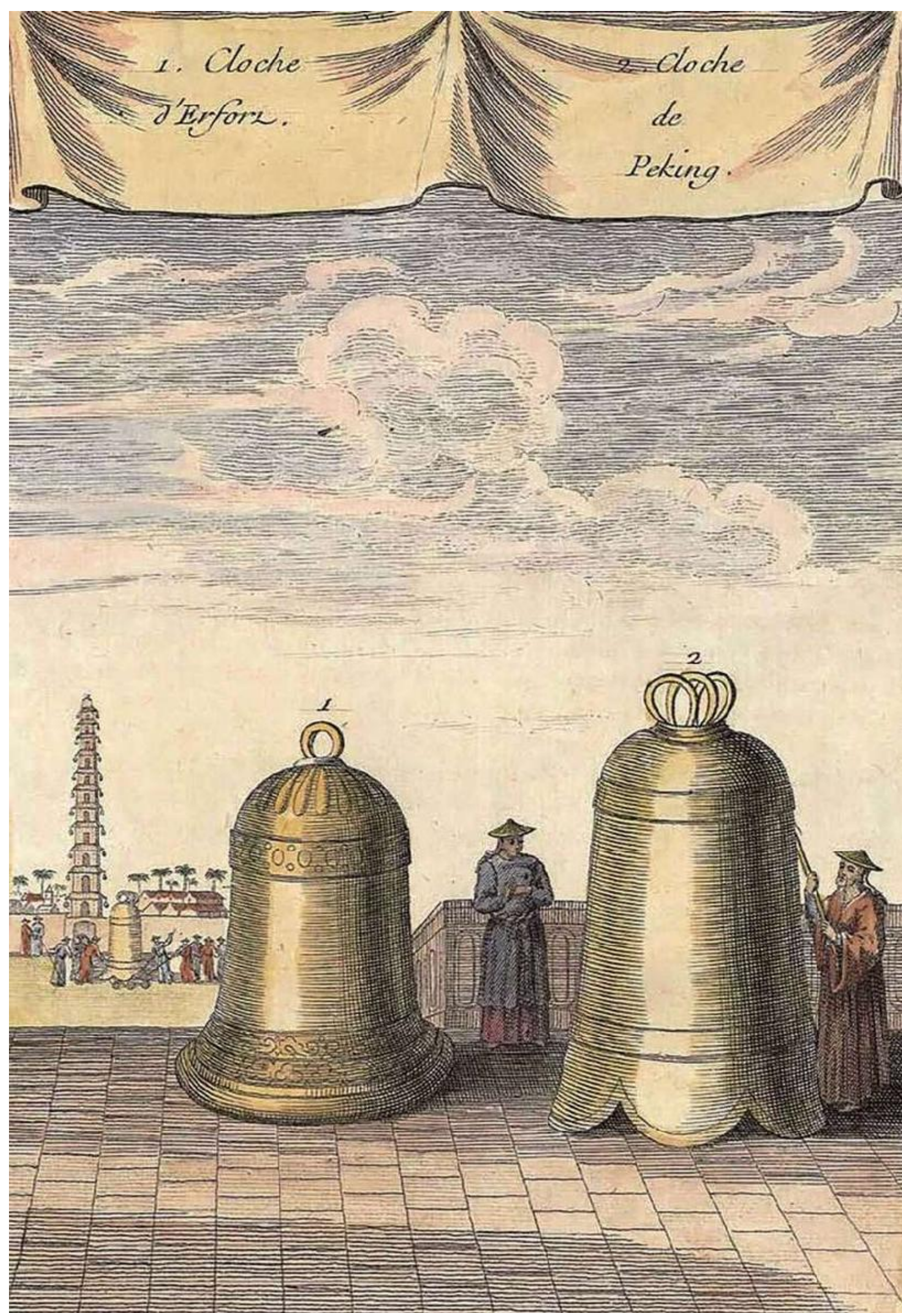
15分钟，历史耸了一下肩膀，顺治皇帝、清王朝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就这样擦肩而过。以此刻为界，现代西方人开始妄议并试图改变、颠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政方针。

荷兰人是第一拨走进京城的艺术家，不过，他们的眼睛不是照相机，他们也不想看到什么就画什么。延续着前辈的想象与虚构，组织画面要有激情与夸张。这样一来，纽荷夫的笔下就没有制约，天南海北见到过的人种，存在的不存在的场面，任他重新编排，放在随心所欲的地方。荷兰人借着午门前的广场，展示了自己在亚洲开疆拓土、连接欧亚贸易市场的视野与雄心。

反正这种有着“国际主义精神”的版画，既不是给中国人看的，也不是为学者们考证用的。

想象中的大聚会。画上的注释：1.中国皇都北京；2.中国人；3.日本

人；4.鞑靼人；5.中国军士；6.泰国人；7.马卡色人；8.爪哇与马来人；9.喇嘛；10.满族官员；11.互致问候仪式；12.塔的名字；13.城楼的名字



这张商旅版画是中外大钟比个头。左边这口是哪里的宝贝，我还说不清，右边这口也有待考证。按说作者应画北京的永乐大钟，大明末年，这口佛家大钟已闻名于世，其底部也如图呈一浪一浪的圆弧形。此画操刀人一定没有亲眼观钟，对中国人所铸之钟之硕大，想象得根本不到位。6.75米高的永乐大钟，旁边可以四个人叠罗汉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二章 指天画地的盛世



乾隆皇帝与他的大臣们，一人正在跪叩

一、奠定江山的帝王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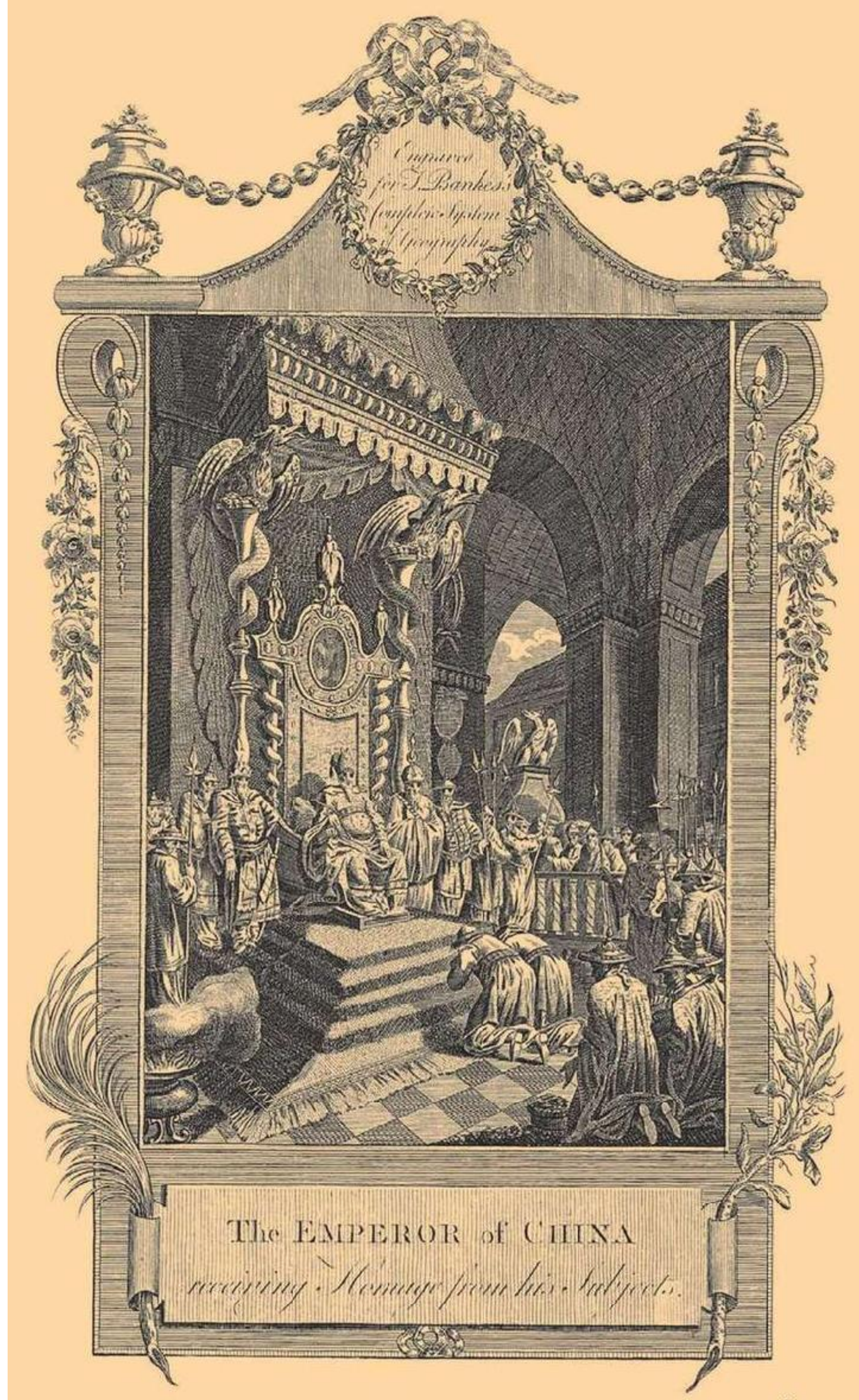


1692——1695年，俄罗斯使节义杰斯谒见康熙皇帝，留下此版画。画

中卷发洋人顺从地叩拜在地，绝无讨价还价之意

听说一支北部游牧民族取代了至高无上的明王朝时，西方的汉文化粉丝们一片惊慌。本来，他们把长城外的民族都称为鞑靼，分都分不清楚。那里地广人稀，各民族四处游牧，自元代以后，明王朝对北方很少关注。现在皇权易手，大陆中部的文明，面临被落后蛮族带回到黑暗中的危险，如欧洲中世纪经历的灾难。但满族人坐稳江山不久，京城里的洋人却惊讶地发现，除了喜欢纵马驰骋和男人剃发留辫外，清朝的统治者正在力图全面继承汉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经历了内战、查理二世复辟、光荣革命；法国遭受了专制，继而又发生了流血革命；北美洲则打了一场独立战争。在西方人忙于政权重组的慌乱时期，中国却皇权日益巩固，库银充裕，国力强盛，疆土不断扩大，起码在表面上，这是属于中国的鼎盛时代。而欧洲诸国，大都还在崛起的起跑线上蹲着呢。

西方人的刀笔，与他们的文字一样，聚光于皇朝与皇帝身上，里面没有调侃轻慢的意思，有的只是倾慕赞颂。我常常奇怪，版画上的皇帝，总是脚下有一个简陋的方台子，坐在一张比普通椅子大不了多少的椅子上，这就算是有了皇权的威严了吗？后来，看了莎士比亚的舞台剧才算明白，原来英王就是这样出场的。剧中的国王，总是语言犀利横蛮，与臣子唇枪舌剑，而版画中的皇帝，无法为自己发声，只能用台子、椅子拔高他们，营造出戏剧一样的气氛。



这张图里的舞台奇异壮观，但搭配仍是风马牛不相及，大清皇上还在演

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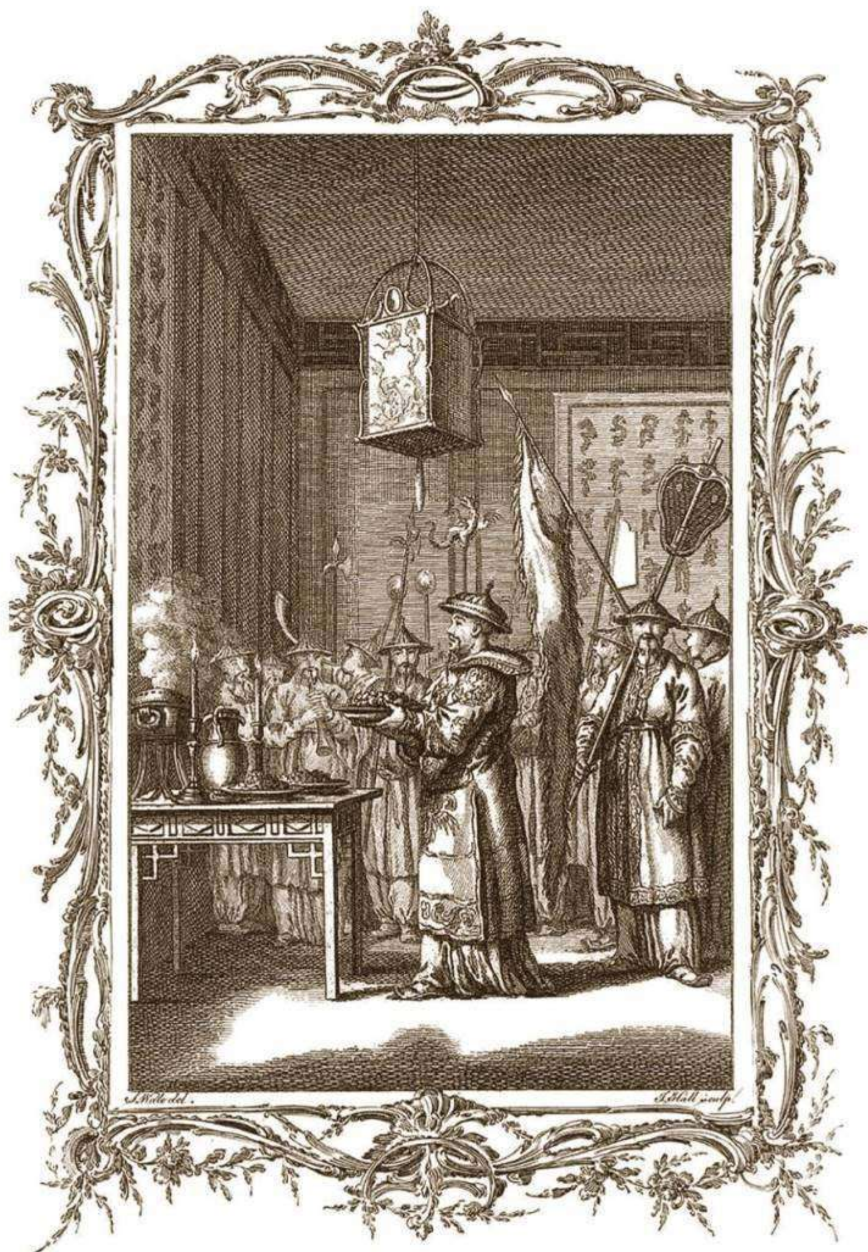
皇帝先农坛亲耕图

西洋版画倒也不只是虚头巴脑地画表演，它们还是抓住了清朝皇帝做过的一些实事。立春之日，皇帝率百官在先农坛亲耕，迎春鞭牛，便是其中的一件。满族是狩猎民族，祭祀先农诸神和太岁诸神，亲行耕礼，是尊重汉族传统。同样，皇上的钦天监每年要颁发满文和汉文的《时宪书》，即正式的历书，指导百姓一年的农事，也是关心民生。内容简单的《时宪书》要展示皇帝奉天承运的至高权威，当然，皇上也会命权臣下些功夫，保证它具有足够的科学性。



清官奉旨向农人颁布皇历《时宪书》

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顺治，继续开疆拓土，为全国的统一和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真正奠定清朝盛世基业的，是他的儿子康熙皇帝——中国历史上最受尊崇的皇帝之一。康熙在亲政之后，首先争取到了朝廷中的满族人对其统治的支持，同时又以其精明的政治手腕，如颁布诏令，强调遵守儒家道德准则，举行科考、殿考，宽待反清学者，并起用他们来修《明史》，等等，使汉族士人相信他对汉族传统文化的尊重。康熙一朝，台湾最终被收回，中俄边境划定，西部的准噶尔叛乱被平定，清朝疆域广袤，对边远地区的统治日益巩固。这些事，外国人看得清楚，成就主要归功于康熙帝的雄才大略与军事才能。



皇帝在祭祀，祭祖，也祭孔。文化演进会产生神圣的精神，世俗权威对之也要充满虔敬之心。以西方人的观察，中国最为神圣的精神是孔教



KONG FU TSE or CONFUCIUS
the most Celebrated Philosopher of China.

闵明我书中的孔子像，1704年出现在伦敦



西方少见雍正皇帝肖像，此幅像为钢笔素描

无论是顺治、康熙还是雍正，版画中的风采屈指可数，也就是说，西方人并没有积极为他们散播个人颜值崇拜。特别是雍正帝，很自恋，穿上常人的衣服，摆出各种姿势让洋人画油画，但出了紫禁城，洋人不认识他。

堪称版画明星的皇帝只有一个，即爱新觉罗·弘历。他的光辉形象，不仅在故宫收藏的西人画作中居首，在海外流传的版画中，数量也是空前绝后。乾隆对绘画艺术十分着迷，并且懂得用绘画的方式来传播皇帝的排场与威仪。他在宫中长年留驻中外画家，也使得版画的创作有了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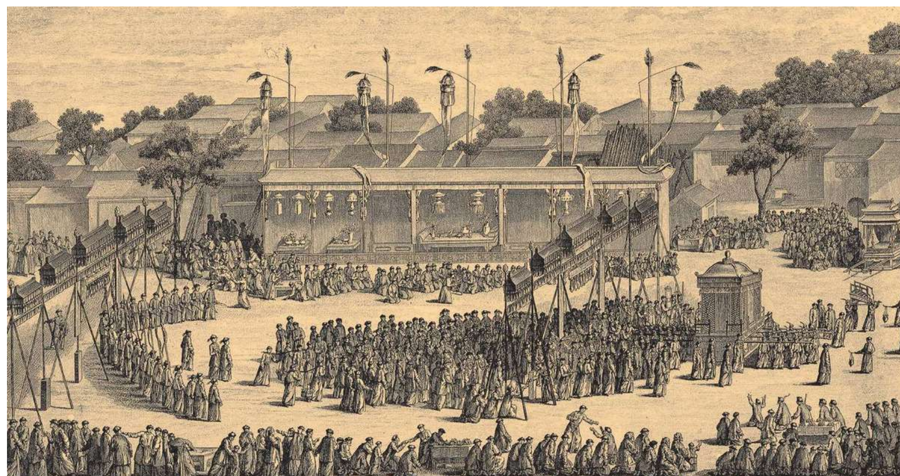
不对劲的是，画中人不似御用画家郎世宁笔下的皇帝，那个马上治天下的“十全”伟人，也不像宫中留下的帝王像，正襟危坐，神色威严。相比之下，版画中的皇帝不值得细看。可是不要忘记，当年郎世宁笔下着朝服的帝王像，并未被张扬出去，法王、英王也没有这样的标准像，在世界上，当年这样眼对眼和你平视的帝王，除了康熙，可能也就乾隆一个。多少西方学者，希望透过这双眼睛，看到层层高墙后面，统治偌大一个帝国的心机与手腕。

紫禁城武英殿印制的版画，带有乾隆皇帝身影的，有多套平定边疆的得胜图，八十大寿盛典图，南巡、西巡盛典插图，等等。平定新疆准噶尔部达瓦齐及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分别发生在1755年和1758年，乾隆皇帝和清军一路凯歌高奏地回到皇城。为了宣扬天威及赫赫战绩，皇帝首次起意，谕令中外画匠绘制规模宏大的画作，还别出心裁，钦命朗世宁等四人制作了16幅表现平定准噶尔全貌的战图，并送到法国巴黎制成铜版画。1773年，16幅铜版画连同画稿及铜版原版全部运回中国。浪漫的法国人颇有心计，他们背着朝廷，复制了这一套铜版，并在原来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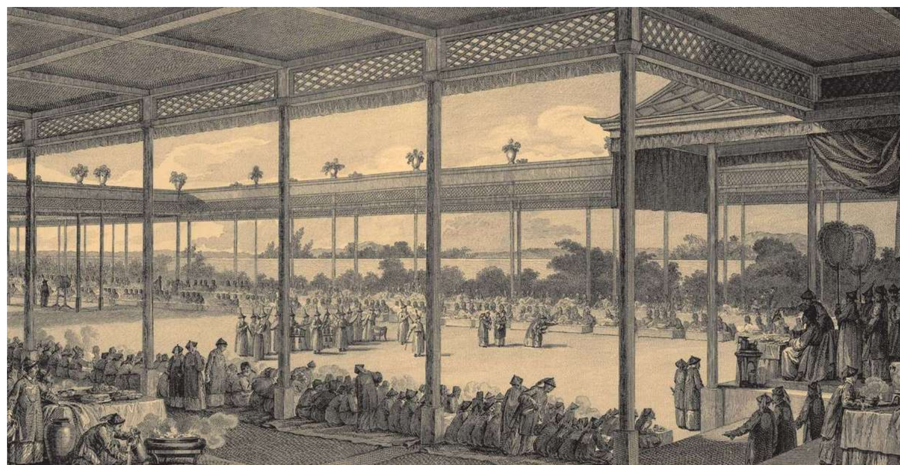
品上又增加了8幅。这24幅颇具震撼力的优秀铜版画，悄悄在欧洲流传开来。



1776年乾隆的一幅中年标准像：貂皮大氅，红顶帽子，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此图为三张相连的版画之一，应在当年法国人复制的铜版上印刷的，比宫藏版画画幅要小。它表现的场面，是乾隆平叛后率部回到北京，背景为京城大街，沿街搭了许多供台与彩楼，大队人马前呼后拥。乾隆坐在二十八抬大轿中，轿夫身份低，人都画得小了一号，旁边还有两人，抬着下轿的小梯。沿途除担任警戒的兵士外，也有许多北京子民目睹了这一盛况



这是一系列版画中间的一张，表现乾隆爷80寿辰时大宴群臣的场景，据说有千叟赴宴，天下只有国宴堪比此宏大的饭场



冰轿上坐着的应是乾隆爷，此日的热闹，是出发去观看冰嬉。满族人祖居白山黑水，喜欢溜冰滑雪。入关后，八旗兵每年冬季仍举行溜冰练兵比赛，皇帝也会登上北京庆丰楼，观看溜冰表演，并为优胜者颁发奖品

经过几代帝王的经营，此时的大清江山基业已固，中原一百多年来没有大的战乱，如日中天的朝廷有吃喝，有玩乐，一片阳光普照。版画中大都看不到地上的阴影。再往前走，皇朝的日头可就要渐渐偏西了。

二、站在角落里的英使侧影

与欧洲老牌海上强国相比，英国登上对华关系舞台的时间要迟到了一百

多年。但它一出场，阵势就非比寻常。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委任马戛尔尼勋爵为正使，率领一行百多人的使团赴北京谒见乾隆皇帝，并于次年到达北京。皇帝当时已83岁，再过两年就要成为太上皇。和珅等一干大臣，谎称英国使团是专为恭贺圣寿前来朝贡的。实际上英使的目的，是要得到其他欧洲人所未得：一是享有在北京长驻外交使节的权利，二是获得优惠的贸易条件，绝不能再让荷兰人、法国人占得先机。使团中有两位名留史册的人物，一位是乔治·斯当东，另一位是威廉·亚历山大。前者写了一部详细记载历时两年出使经过的著作，书名就叫《英使觐见乾隆纪实》。后者则以其深厚的艺术修养，绘制了上百幅有关中国风土人情的水彩画，其中大部分至今仍保留在大英博物馆及世界各大博物馆中。这一书一画，为后人留下了当年使团从天津到北京再到热河，及在北京滞留6个月的珍贵时光。





亚历山大所绘北海行船，有人在忙于生计，有人借水路出门，也有人在赏景



斯当东书中的马戛尔尼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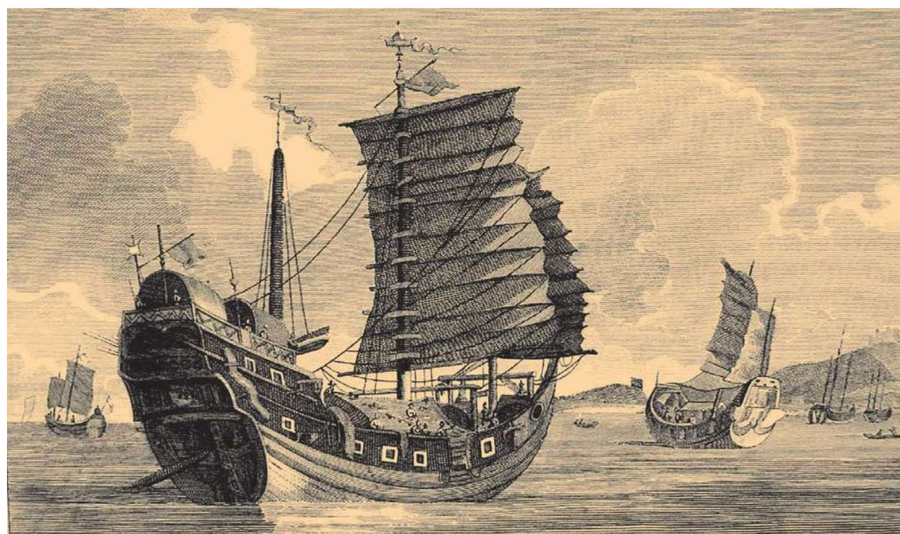
使团离开天津驶入津通大运河，接棒荷兰人继续冲击京城贸易封闭的防线

使团于1793年8月到达天津，改乘中国的内河航船，驶入了大运河，向北京进发。斯当东说这些内河船看上去很体面，船舱高大，空气易于流通，所用木材却非常轻，整个船吃水不超过18英寸（1英寸约为2.54厘米）。白河水面上穿梭着各式船只，中国内河运输的繁忙，这里是一个缩影。在天津到通州一带的运河里，生活着许多水上人家，他们的生活方式，使来自岛国的洋人感到新奇惊讶。

使团乘坐的船停在河中，吸引了许多百姓沿岸驻足观看。按斯当东的估计，当时沿岸生活的人口有十万之多。斯当东写道，月明之夜，坐在船上，听到水面上无数船只东来西往，扬起此起彼落悦耳的歌声。这些以船为家的劳动民众，对自己的生活还是知足满意的。赏心悦目的版画，描绘了英国人对帝都的第一个印象。

使团到了通州，就弃河登陆，斯当东记录着他们走过的四十里铺、十八

里店、八里庄、六里屯，还有三里屯，最后来到了朝阳门前。映入眼帘的北京东郊，“铺石的路面上挤满了人，商店、作坊和顾客之多，处处体现出兴盛繁荣的气象”。大队人马的路过，吸引民众离开自己的摊位，挤在路边观看这些奇装异服的来客，但使团过去，他们马上散去照顾自己的生意，没有发生任何混乱。使团就这样在一聚一散的人群中走着，穿过整个京城，出了西直门，目标是皇上的秋季行宫——圆明园。



英使团在白河中见到的大帆船。在这些帆船上建有许多小房间，估计可以乘坐50人。这些船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大运河运送京城所需的各类货物



白河水面上布满了各式驳船，一旦大船抛锚，就要靠驳船将货品运上岸

几个小时的行程，英国人对帝都的评价如何？斯当东告诉他在英国的读者：“初进北京大门，第一个印象是它同欧洲的城市相反，这里的街道有一百尺宽，但两边的房屋大多是平房。欧洲的城市街道很窄，房子很高大，从街的这头向那头一望，两边的房子好像互相倾斜，靠在了一起。北京空气流通好、阳光充足，人们表现得非常活泼愉快。”

此时的大英帝国雄心勃勃，盛气上腾，他们能这样形容北京，还是值得后人欣慰的。当然，斯当东接着说道，北京的街道都是土路，不撒水就尘土飞扬。除了皇宫之外，其他的地方，并不像以前传教士书中讲的那么美好。大不列颠的首都伦敦，商店、桥梁、广场与公共建筑的规模，

是超过了东方帝都的。每个人对自己熟悉、倾注了感情的城市，都会觉得比其他地方好，英国人的这些话是内心实情，也没有什么贬低北京的意思。



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斯当东看到一个大庄园，并把它画了下来，这是本地一个大富豪的宅第。正面有三座大门，门外有两根40英寸高的旗杆，白天悬挂标明尊贵身份的旗帜，晚上悬挂灯笼



使团中的一位英国工匠，不幸因病在通州亡故。英国人决定把他葬在当地，此图上的巨大古柏、小小的坟头、上面的十字架，都令人感慨。中国人非常珍视自己祖先的坟墓，每年要按时扫墓，修理塌陷的地方，根除野草。地面上的小土堆，表示下面有个棺材，住着祖先。英国工匠享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可是谁来为他扫墓呢？斯当东知道，日久天长，坟地的痕迹也就随之湮没了

1793年9月14日，马戛尔尼一行终于在热河见到了乾隆皇帝。之前，和中堂与使团代表就面见乾隆是叩头还是行英式屈膝礼等细节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实际接见的时间是相当短暂的。自尊自大的乾隆皇帝，更像他的祖爷爷顺治，而非爷爷康熙，对一个区区岛国的朝贡，只

有一个小时的兴趣。他宴请英使，赠送礼品，还赐予马大使儿子一个荷包，但就是不谈国家大事。洋人留在京城？这事儿不予讨论。优惠的通商安排？政府的现行政策不能修改。马戛尔尼努力斡旋，最终也不过是赢得了几个月的光阴，虚掷在清兵严格守卫的四城围墙中。

绘画师亚历山大应当比使团其他成员都兴奋，因为6个月是不短的时间，他有了宝贵的机会来观察和描绘京城与京爷。在他之前的几百年中，没有几个西方人能按照中国人的骨骼结构画出中国人的面部神态，亚历山大做了第一次尝试，他画了几十张中国人的特写，并在1805年将它们结集成书——《中国人风貌》（The Customs of Chinese）。其中男男女女的相貌，比让·范林斯霍滕笔下的大圆眼睛、纽荷夫笔下顺治的扭腰站相更贴近真实。若说还差了点火候，就是亚历山大把中国人的鼻子都画得高挺，个个达到了今日影视帅哥的标准。1800年左右，这些优质彩色印刷品上的中国人，迷倒了西方，在后来的几十年时间里，他们成为无可匹敌的形象大使。



乾隆皇帝在热河接见了英国使团，右下角可见马戛尔尼勋爵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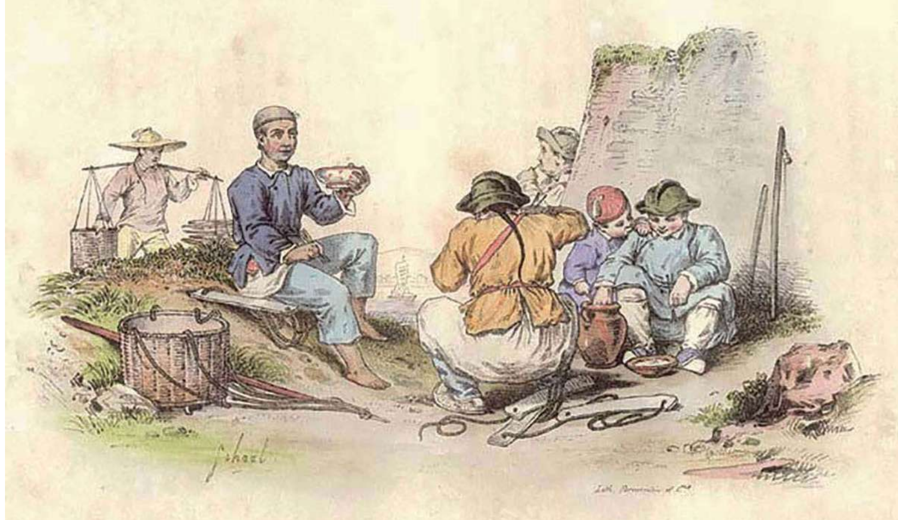
83岁的乾隆皇帝，神采奕奕，不像是那个年纪。他的座椅与坐相，是英国人的想象，仍然带有西人的尊崇，只不过已是最后的散目余光

在斯当东的印象中，中国的官员一般是“态度温和文雅，对人一见如故，谈话大方爽快而随时流露出自我称赞，对自己的民族充满优越感”。而中国的老百姓见了官，“外表非常拘谨，有时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但私下

里，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无拘无束”。斯当东观察了北京人的生活后，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生性好动，有进取心，是一个耐苦坚强的民族”，和生活在热带的民族相比，“中国比较靠北的气候使他们变得能干而有决断力”。这些文字描述，被亚历山大以及另一位绘画师巴洛，惟妙惟肖地留在了画像中。



岸边居住的一家人



纤夫和脚夫的晚饭



这张图上的一家子都生活在船上，家中成员还包括几只鱼鹰，小男孩的背上绑了一只葫芦，这是当时最好的救生工具



巴洛是团里的财务主管，这是他笔下的清代文官。每张版画都是黑白印出后，再手工彩绘，色彩都是独一无二的



英使团见到的清兵“战虎”。斯当东说，这种以服饰扬威的士兵到底是什么队伍，他一直没搞清楚，不过这种形象给人的印象过目难忘



弄算盘的街头商家，指法画得不对。算盘的个头巨大，但算盘珠差着呢

斯当东在书中大喷中国绘画与音乐。说中国画虽画法和着色都很好，但因为缺乏适当的阴影，整个画面没有精神，又说“中国的乐键不协调，音阶不完善”。亚历山大没有说那么多，他就是不停地画。街头表演、戏剧艺术，还有城墙城门、各式建筑、人物特写，是他最大的兴趣所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活生生的乾隆时代，是亚历山大为我们挑出来的一个个凝

固瞬间。比如说戏剧，就有许多张画。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庆祝八十寿辰，特别请了扬州及安徽的戏班到京演出。乾隆下江南时，特别喜爱这些文武双全的连台大戏。经宫廷这么一追捧，这些艺术形式就在北京落了地，奠定了后来京戏的基本套路。后来热络的京剧当时在北京尚未形成，亚历山大描绘的舞台及人物，已然有了京剧服饰及表演的味道。



舞台上的武士



这场大戏是在天津看的。尽管不太明白戏里的故事，剧场内色彩鲜艳的布置，剧中人物身上的服装，大声的唱念，震耳欲聋的鼓镲，令使团成员大开眼界

MOU-LIE-OUHA



Hau[1] yé[2]-to[3] sien[4] ouha[5]
Yeu[6] tchau[7] yeu[8] jie[9] lo[10] tsai[11] go[12] kia[13]
Go[14] poun[15] tai[16] pou[17] tchou[18] moun[19]
Touie[20] tcho[21] sien[22] ouha[23] oul[24] lo[25]

Combien est délicieuse[1] cette[2] branche[3] de fraiches[4] fleurs[5],
Un[6] matin[7], un jour[8], elle[9] tomba[10] dans[11] ma[12] maison[13];
Moi[14] le possesseur[15] je ne la[16] porterai point[17] hors[18] de ma demeure[19];
Mais[20] je veux[21] garder la fraiche[22] fleur[23] et[24] être heureux[25].

Hau[1] yé[2] to[3] Mou[4]-lie[5]-ouha[6]
Man[7] yuen[8] ouha[9] kaï[10] soï[11] pou[12] kouie[13] ta[14]
Go[15] poum[16] tai[17] tsai[18] ye[19] ta[20]
Tai[21] you[22] koung[23] ka[24] ouha[25] gin[26] ma[27]

Combien est[1] délicieuse cette[2] branche[3] de Mou[4]-lie[5] *fleur[6],*
Dans[7] le plein jardin[8] des fleurs[9] s'épanouissant[10] librement[11], aucune[12] ne surpasse[13] celle là[14];
Moi[15] le possesseur[16] je porterai[17] cette[19] branche[20] cueillie[18]:
La porter[21], cependant[22] craignons[23], que[24] la fleur[25] les hommes[26] seront jaloux[27].



巴洛二百多年前记录下来的中国民歌《茉莉花》。一百多年后，意大利音乐大师写的歌剧《图兰朵》中有一段美丽的民歌曲调，现在我们知道了它的源头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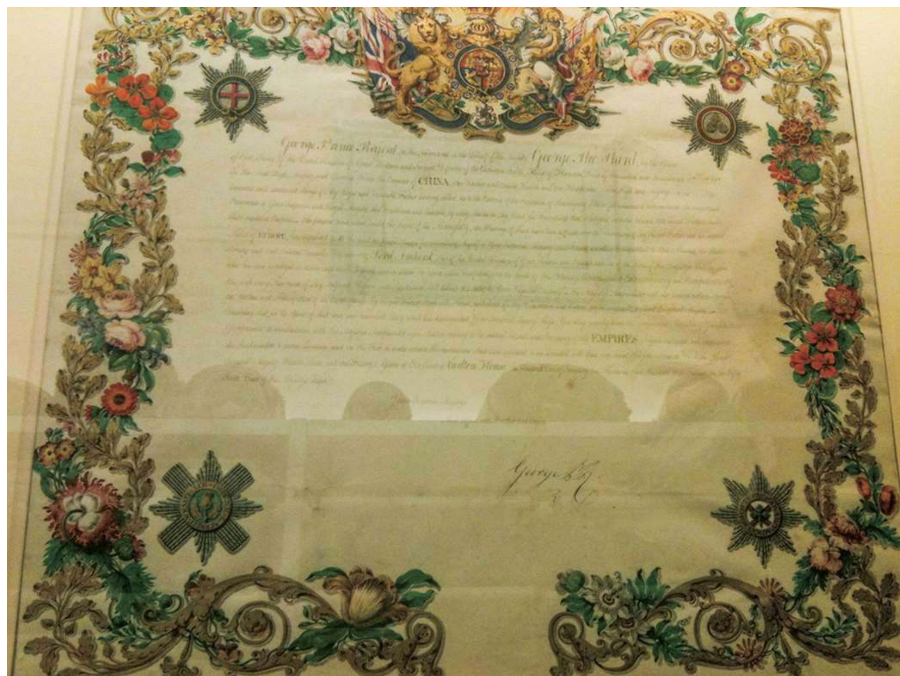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绘制的西直门。城墙，城门，箭楼，瓮城，护城河，石砖桥，一切比例都不对，颜色上得过于靡丽。但我相信，坐在城外一里地驿站的小坡上，亚历山大眼前的景致就是这么壮观，城门就是这样高耸，色彩有碧绿有朱红。画中流露出中式建筑对他心灵的震撼。他也没有掩盖城市缺少精心维护的样子，如破损的城外牌楼、坑洼不平的大路，护城河两岸也未筑河堤。往上看，皇朝长空白云，基业坚实；往下看，是光着膀子推车的菜农、拉着驴车出城的平民



亚历山大也绘制了热河避暑山庄，当时还在继续修建，乾隆在这里接见了英使。此幅画是后来基于亚历山大绘制的山庄图改绘的

亚历山大的风景画显示了他对中国建筑、园艺及人们休闲娱乐方式的欣赏。在北京纪实绘画史上，他的画地位重要，连接了神父版画到19世纪的写实版画。斯当东不喜欢北京的平房，说它们千篇一律，不好看，但他承认中国人懂得园林艺术，“中国人在一块土地上点缀天然景色，使它们显得壮观的本领无与伦比，同时中国人也懂得如何运用天地造化来布置园艺”。

继马戛尔尼无功而返后，英王又派出阿莫斯特勋爵率领的使团到北京谒见道光皇帝。他们的命运比第一个英国使团还不济，道光皇帝实际上把他们逐出了北京。与亚历山大对北京丰富美妙的绘画相比，第二个使团对北京的形象描绘是一片空白。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静静地躺着当年没有送出去的一封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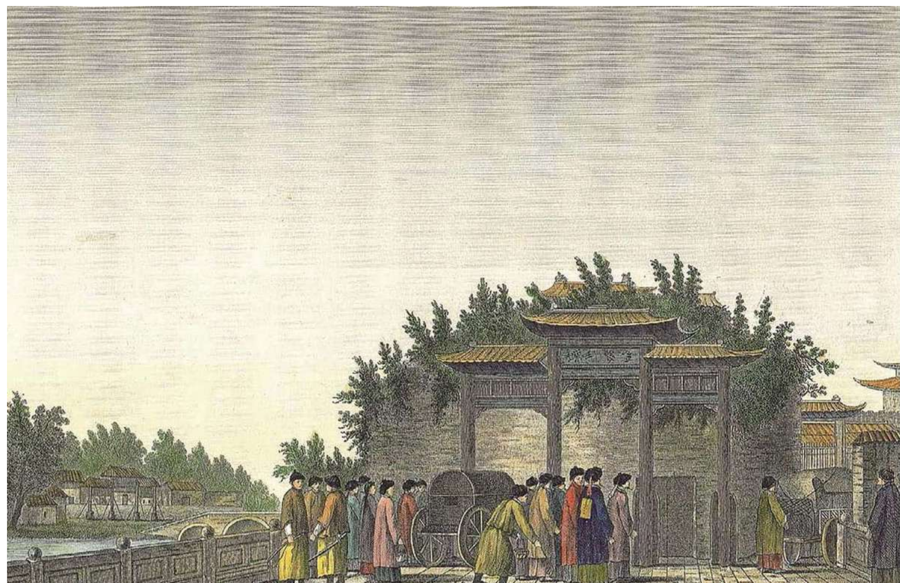
此国书有20英寸×30英寸大小，完全手工绘制，不知何时才可以与马戛尔尼带来的国书摆在一起

三、四城九门建筑拾贝

说到建筑，就想说说我对旅游观光的一点体验。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次两次的走马观花，很难让我感受它的人文底蕴。不过古蕴深厚的城市风貌，不论是自然景色，还是人力创造的建筑，都能让我马上眼前一亮，不必花心思懂历史，也能立刻受到感染，举起相机，与古建筑一起留个影。对大多数人来说，理解城市内在的奥妙，总是从感触它的外在美妙开始的吧。

两百年前来华的游客，想必也有同样的感触和嗜好，只不过相机是没有的，有的可能是风景写生的底子。亚历山大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被英国使团花钱请来作画。还有另一些“旅友”，他们不请自来，绘画完全出于

艺术爱好与欣赏美景。19世纪初年来到北京的法国人金涅（M. de Guignes）就是这么一个另类。我们有幸看到他的专业落笔，而这样专画帝都古建筑的作品，真的很稀少。



北京的街头牌楼与河道两边的石雕护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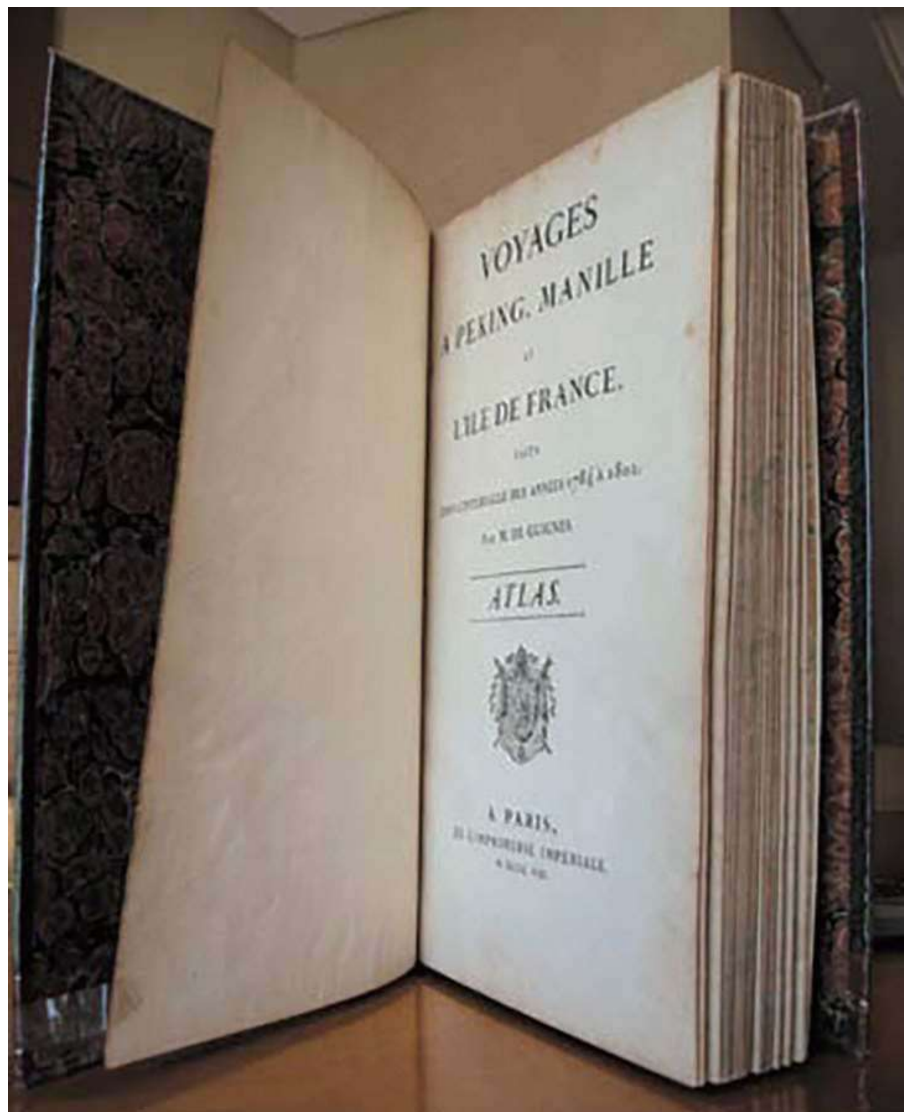
金涅的专业是中国文化与语言，1783年，他作为法国公使被派驻广东，那时外国公使还不可进驻京城。1794——1797年，他陪同荷兰商团来到北京。商团团长为贸易通商忙活，金涅为画版绘图忙活。1808年，他的《北京之旅》（Voyages a Peking）一书出版了，记述描绘了他在北京的见闻。他的画风是取景大而化之，不精于人物，更缺少人文关怀，突出的特点是原汁原味，不加渲染，以平实朴素取胜。若画如其人，金先生一定是做事一丝不苟，耐得住寂寞，城砖要一块一块地画。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刻板的画并没有得到多少人夸赞。

金涅看到的帝都，已被明清两朝的数代皇室消费了将近400年。大清朝入关以后，迁入大批满族官员入京，分布在内城及京畿等地。为了解决

他们的住地问题，摄政王多尔衮下令汉人统统搬到外城，即以现在正阳门为界的崇文、宣武区内。到了乾隆年间，为了保证内城的纯洁性，乾隆又下令要求所有的会馆、戏楼、商号等三教九流人士全部搬到外城。这样就形成了外国人形容的北京四道城墙的格局：最内层是紫禁城；第二层是皇城，是皇亲国戚居住的地方；第三层是鞑靼城（Tartar City），即今二环路到前门一线，是满人八旗居住的地方；出了今正阳门以外的二环路以内的地区才是汉人可以居住的中国城（Chinese City）。

金涅带我们观光的，就是这样一座不新不旧的古城。说它不新，是因为画上的都是明代就有的古街古建；说它不旧，是由于画上的细节显示，经过几百年的使用，城墙地面的砖石还是见棱见角，不见磨损。今天紫禁城中的砖石，风蚀雨淋，棱角圆滑。倒退200年，金涅让我们看到了京城的青壮年。

他的城图，别有意境，也充满疑惑。



金涅的书共有四本，其中的一本全部是版画。我没有读过他写下的文字。他写实，又把实景按自己的眼光虚构布局，我一边看场景，一边还是猜不透他的构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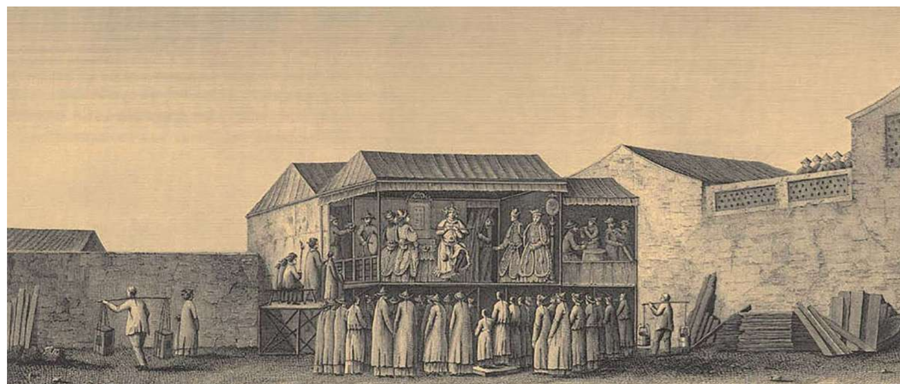
这张图上也有谜语。西门，哪一座西门？紫禁城的东华门与西华门是同一形制，城门为外方内圆。这两座门均为连接紫禁城与皇城的重要枢纽。清代皇帝、皇后、皇太后归天后，梓宫即由东华门出，因此，民间也称东华门为“鬼门”。西华门是去乾清宫，以及后来去军机处的重要通道。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京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一行就是从西华门仓皇出逃的。这张画是进了西门看到的景象吗？它总是开左手边那一扇大门吗？在20世纪，从内部拍摄的东、西华门也不多见，我没有找到和门洞形制相似的西门

比如说第90页的那张画，我能猜出他画的是北海大桥附近。旧时大桥的两边，各站着一座牌楼，东边那座上面写着“金鳌”，西边写着“玉栋”。仔细看这幅画上的牌楼，四个字竟然都在上面。后面的灰墙，推测起来就应当是团城。金涅肯定是亲眼看到一群人聚集在北海此地，那河边的岸墙，团城里面的绿树，包围在中间的一个高轮马车，这是一个什么场景？画面为什么不给我们讲故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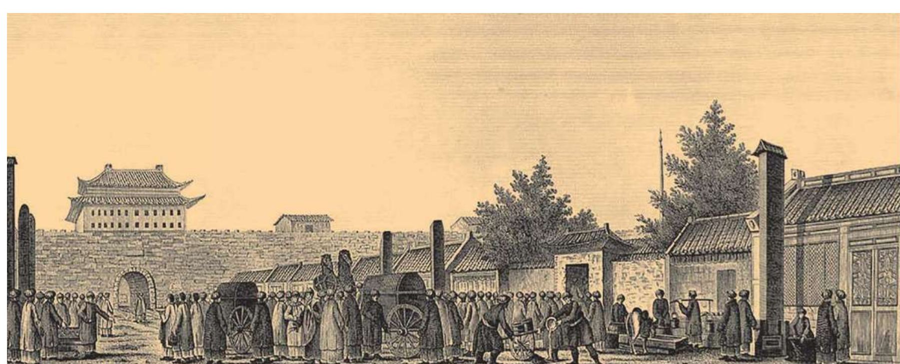
北京城中有四重城墙，二十余座城门，金涅沿着它们绕啊绕啊，估计已经分不出差别。我也不必再追究了，画哪一座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被修成这样的形制，很好地发挥着城门的功能。



皇城的一座门。我猜此门可能是地安门，或西安门，或东安门，它们均为同一形制，面阔七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黄琉璃瓦顶。仔细看看，又觉得对不上号，这里面阔只有五间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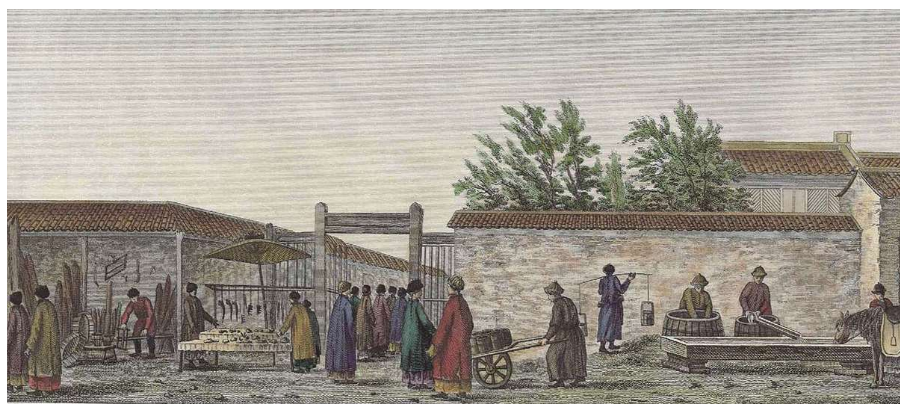


这座街头戏台很有意思，为双层结构，人站在地面上仰视，清晰可见二层边楼，应为包厢。这种双层戏楼在中国曾很普遍，至今还有一些保留下来。颐和园里帝后们欣赏音乐和戏曲的听鹂馆也是此类建筑。把戏台子修在路边，一定是为小民演戏的



这可能是中国城的一座门，看不见城楼、瓮城、箭楼、左右闸楼等。不过此画的焦点不在城门，而在当街的过往行人。大街很宽，两旁有商铺，放着喂马的水槽，当得起繁华街道的名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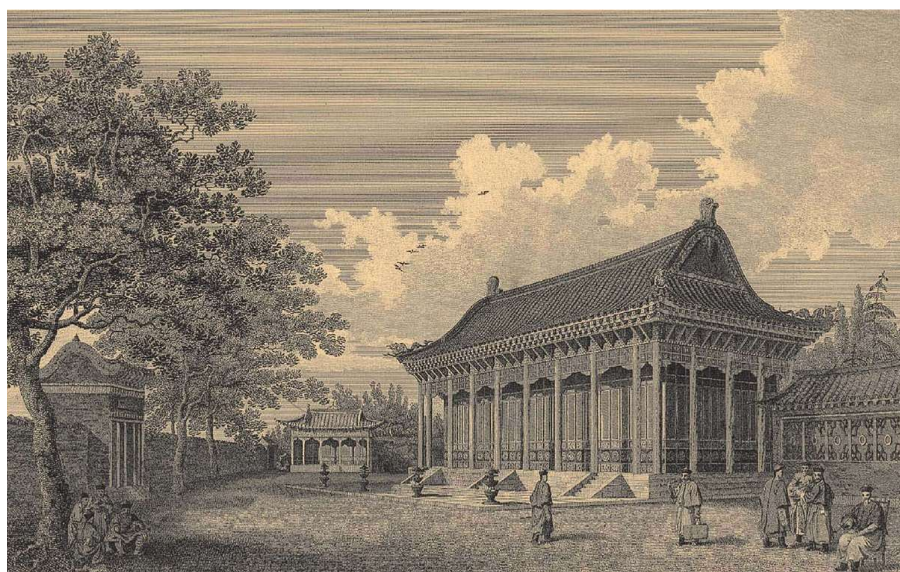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比金涅早10年到过圆明园，他绘画的风格可大不一样。亚历山大看到的正大光明殿是乾隆晚年时的景色，殿内悬挂着中国的古画、英国贵族钟表商制造的钟表，还有插着孔雀毛的大扇子；大殿中央是皇帝的宝座，进门处有两只铜皮大鼓，皇帝到来前就会敲响；大殿周边的树木，枝繁叶茂，绿意盎然，整个画面生机勃勃。



这应当是一个胡同的进口。大清在胡同口修了上千道栅栏，看来就是这个样子。胡同外边有做买卖的街头小摊，独轮车夫似在送水来，马夫正在用牲口槽子喂马



金涅的这一张版画，让我们见识了皇帝在圆明园里的娱乐。这显然是一个杂耍场。看来圆明园不但建筑上具有中西合璧的风格，取悦皇帝的表演也是土洋结合的把戏。从这张画可以看出，金涅根本不在意写人，本来杂耍场要让人开心大笑，可这里的人像码号的火柴，排着队傻傻地站在那里看着。斯当东在北京时曾参加过一场宫廷庆祝会，在他的眼中，侍奉皇帝的臣子黑压压一片，本身就很壮观。遗憾的是这群观众只有男人无女人，缺少西方男女一同参加庆祝时的那种热闹及愉悦气氛。金涅的画大概就是在证实斯当东的画吧



亚历山大所画的圆明园一角

康熙登基20年后，清朝江山已固，国库充实，皇上自然要修几处豪华舒适的园子供自己享乐。1684年，康熙南巡归来，在北京西北郊仿江南园林营建畅春园，作为在郊外避暑听政的离宫。1709年，康熙将距离畅春园北一里许的一座园林赐给第四子胤禛，并亲题园名“圆明园”。后经雍正的几次扩建，圆明园占地面积由原来的六百余亩扩大到三千余亩。此后，圆明园不仅是清朝皇帝休闲娱乐的地方，也是他们会见大臣、接见外国使节、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园中最有名的一座大殿叫“正大光明殿”，雍正经常舍弃紫禁城的太和殿，跑到正大光明殿听政议事。因此这座大殿也就有机会成为西方绘画师写生的对象。

四、精雕细刻的美好时光

在关于北京的所有版画中，最精致美妙的作品当属托马斯·阿伦的《图解中华帝国——社会建筑风俗》一书中的插图。这部书初版于1843年，之后曾用各种语言再版。书中共有124幅铜版画，每幅都是精雕细刻，人物、景物细致入微，生动传神。托马斯是英国人，从未到过中国，也未涉足亚洲，他的许多雕刻可以在之前旅华画家的作品中找到原创基础。例如他画的北京西直门、北海、正大光明殿，显而易见是参照了亚历山大的画作。19世纪初年居住在广州、澳门的西方画家如乔治·钱纳利（Goerge Chinnery）的作品也可以在此书中找到身影。不过，书中也有一些版画要归功于托马斯的天才创作。在香港大学图书馆里，现在还收藏着他临摹的前人画作《南京报恩寺塔》。正是由于他的灵气，他的版画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尤其是那些美轮美奂的建筑图景，令人感觉这不是版画，而是摄影作品。更绝的是每幅版画后都附有一两页的说明，把背景交待得清清楚楚，令人相信这就是彼时中国的实景。尽管该书出版时中国已进入道光时期，中英已开始第一次鸦片战争，版画中完美的建筑及中国人恬静的形象，反映的仍是西方人对大清帝国兴盛时期的印

象。不过托马斯的文字也使用了一些不恭语言，书中多幅版画记录了在南方边境上的中英冲突。世界在变，大清还是那个大清，子民还是以前的子民，但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不再平和，更不是一味地赞美了。



京城王爷府





在家打牌的女眷

站在新桃换旧符的门槛上，阿伦的版画，咱们也分两面看。一面，它们呈现的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旧时代，社会等级，士农工商，世态炎凉，拿20世纪的新文化一照，肯定是一副封建、特权、愚昧、守旧的嘴脸。但有人也看到了往昔美好的一面。那传统悠闲的生活方式，屋里家外的高雅精致，洋人以为好，咱们也不应妄自菲薄，以为都是不好。我有朋友看到这些版画，爱不释手，一定要让我买来，挂在她们家里墙上。在慈善拍卖会上，也有朋友出高价，就为拥有那么几幅。这不是说明，阿伦替我们留下的诗情画意，仍拨动着不少人忆旧怀古的心弦吗？

阿伦的有些画，文字注明了是在北京或京郊，有些也是他综合南北景色的混搭。我们拿来几幅，慢慢品上一品。

图题为《京城王爷府》的这张画，原先是一位皇亲国戚的家，后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大臣的府第。院中的建筑集中了一切可能的中国艺术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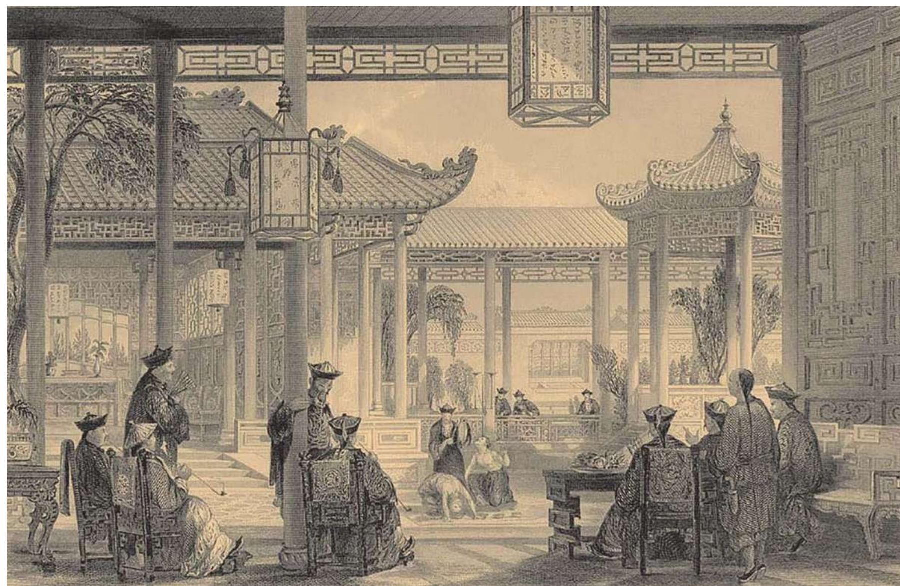
造，而门庭、房檐过道，包括家具、灯笼的设计，或者体现着自然界的鬼斧神工，或者象征着某种中国传统文化或宗教的信念。这一切不仅是为了赏心悦目，也是为了陶冶情操。在离中庭不远的地方，是这个家庭的内宅，不过这里是外人不可以踏足的私密地方。房地产商都喜欢标榜英伦贵族风范，这不，自家的院子就是样板。

阿伦写道："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检验着一个国家文明的发展程度。"洋人是这样认为的，中国人没有这个议题，他们相信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大清妇女的地位，在阿伦的眼中，处于未开化与文明社会的中间阶段。这是什么意思呢？处在社会底层的女人非常惨，苦不堪言，如果是贵族，命运却截然相反，女人是家中的鲜花，得到无比的呵护，养尊处优。王公贵族家中的女眷，也是一个小社会，处在最高层的，是家中的女主人，其他女人都围着她转。内庭的嬉戏与娱乐花样繁多，一群女人围在八仙桌边打牌是常见的一种。这种牌比西方常见的扑克牌要细长一些，而且张数要多很多。在这样外有湖光春色，内有雕梁画栋的美妙景致中玩牌，孩子有用人照看，女人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中国的杂技艺术是一种原始的、神秘的娱乐项目。不但在中国，整个亚洲都盛行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这天午后，风和日丽，大院里的宾主刚刚结束了一场盛宴，接着就开始欣赏技艺超群的杂耍表演。官员们散坐在亭廊中，院中间是一群表演者，其中有一个像算命先生的人，手中拿着算命签。随着锣鼓声响起，艺人们轮番上场，他们各怀高超绝技，常常令人瞠目结舌。

这间宽阔的宴会厅（见下页图）好似清代家具的展厅。餐桌、餐椅、花架、鼓墩、橱柜、宫灯，房梁上还吊着一条大木鱼，摆设极为豪华。当年有个西方人，被邀前往参加这场家宴。据他的记录，这种宴会的过程，有点在模仿西餐的习惯，不过大部分习惯对西方人来说是很新鲜

的。例如在北京，夏天里端上的水果都是冰镇过的，冰是冬天就从河里起上来的。这是一种奢侈，但等级比较低的官员也可以享用。当时最能体现身份的菜肴中包括鱼翅、燕窝、熊掌等。许多科举出身的大臣出身清贫人家，完全靠自己的才华与勤奋，才有了今天的一切。家宴的环境、菜肴与仪式都要张扬，才能显示出这里的主人已经具有不凡的身份和地位。有没有注意到主人的座椅下还压了一张四方的炕桌？从来不知道炕桌还能这样用，以提升主人在饭桌前的地位。主人高人一头地坐在上面，正在与主客干杯。在对面的墙角下，一组乐人正拉着唱着。除了那张巨大考究的雕花餐桌，今日高级饭店里的一切排场，原来不过是老祖宗旧日里的家庭乐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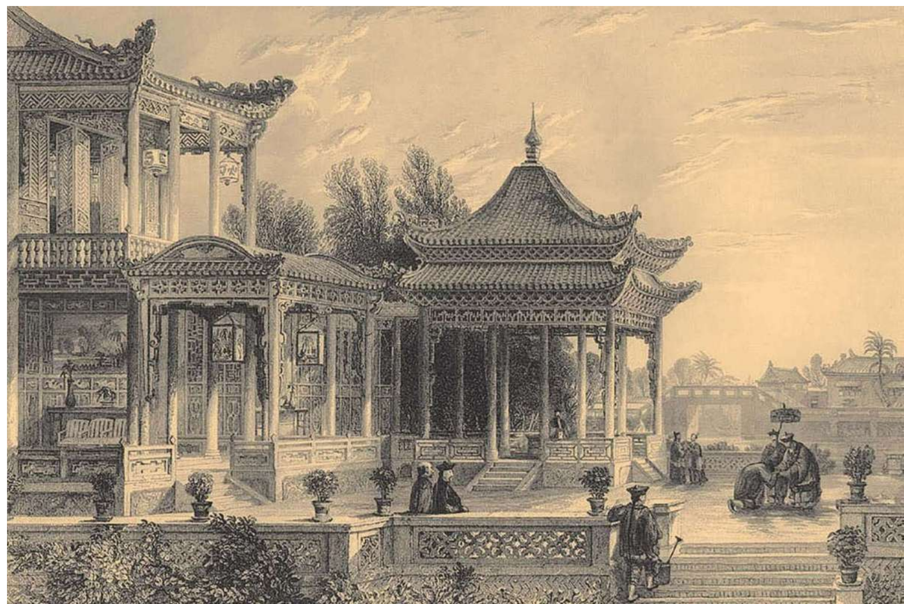


大臣家中的特技杂耍



高朋满座的晚宴

在通州有这样一个大户院落，占地宽广，规模宏大，重门叠户，院落深邃（见下页图）。此图只显示了其中一进院落，可以见到数不清的廊柱与屋檐。这是一个在京城做大官的官员的乡下大宅。这座被阿伦命名为“星望大宅”的庄园坐落在白河边上，从河堤一路走来，沿途绿树荫翳，人工湖泊星罗棋布，河道上架着精致的小桥。一个来访者刚刚跨上院中的台阶，给主人磕头下跪。主人或者是从京城到乡下来消暑休息，或者就此结束了自己御前侍奉的仕途生涯，从此安度晚年。



星望大宅

大宅修建得如此豪华，而大清的经济正在走下坡路，皇上与英国人打仗，都在四处化缘。一个官员，这一辈子，雪花银他可真贪墨了不少。

阿伦也画了女眷的闺房（见下图）。这里住着的是一位高官夫人还是一位大小姐？她的卧室外有梳妆台、百宝阁，是外人难以窥见的禁地。只有身为朝廷高官的丈夫、孩子或丫鬟才能进入内院。这让洋人更感到神秘好奇。他们听说，这些女眷后宅的布置格局大同小异，但装饰摆设无言地宣示出女主人的身份地位。京城王公大臣的太太、小姐都有许多用人服侍。此图中的大小姐，一手举着含在嘴中的长长的大烟枪，一手举着一面小镜子，悠闲地由女佣摆弄着头饰。在她的化妆盒中摆满了眉笔、胭脂等化妆品。“三从四德”的伦理约束，令一般女孩子得不到正规的教育，能读写的人并不多。京城中有不少女子爱好音乐，在大小姐的房间里就有一个女伶，正在弹拨着乐器，陪伴着女主人一同消遣闲散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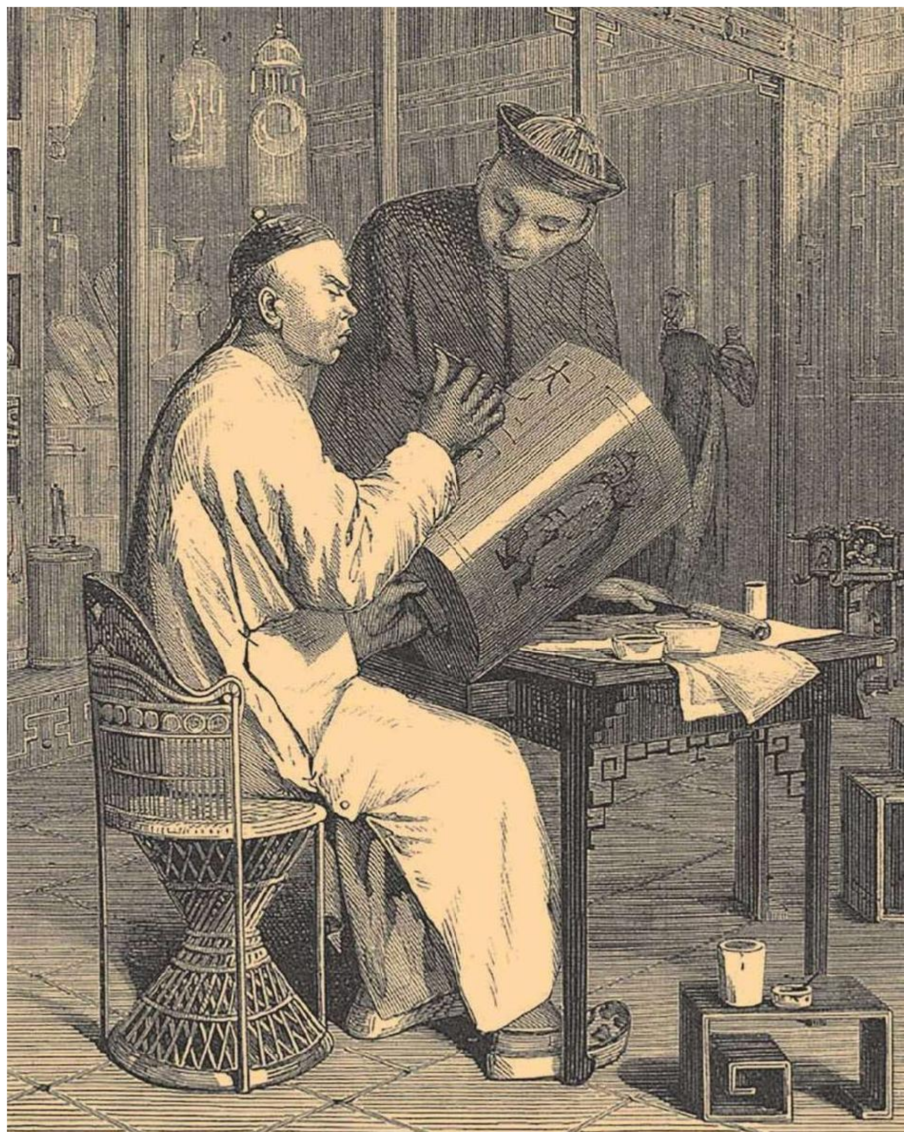


女眷的深闺内室

中国许多传统的起源都可以追溯至遥远的年代。悬挂灯笼就是这样一种文化韵味悠远的传统，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按照大清律例，京城的大户人家到晚上都必须在门口悬挂自报某宅某府的大灯笼，街巷里的行人也要按规制提着灯笼照路，各种车马夜间出行更是必须点灯，有些河道也会一夜灯火通明。英国使团到京城时，每天夜里所点的灯笼都有数目的规定。不言而喻，灯笼制造业已然成了一个兴盛的行业。最美、最新鲜的颜色都被应用在灯笼上；各种可以使用的材料，如竹子、硬木、丝绸、牛角、金银、石头都能够在灯笼制作上找到用场。中国人在一盏小小的纸糊灯笼上所用的心思和手艺，令人赞叹。北京的这家灯笼铺（见下图），货架满盈，琳琅满目，厂店一家，货真价实，肯定是当年高官显贵寻灯必登之门。



北京的灯笼铺



心灵手巧的灯笼工匠。他坐的竹椅，像是南方的货品，但他制作的灯笼，说不定会去星望大宅呢

中国男人的辫子，一直是西方人关注的话题，进而引发了西方人对中国帽子的兴趣。这间名为“三合帽”的店铺应是当时较为有名气的帽子铺。货架上的商品种类繁多，一个伙计正在整理货物；掌柜的在为顾客介绍帽子，拿出几顶帽子供他挑选；旁边有一位吸着烟袋等候的客人，伙计

殷勤地为他沏茶。这幅图画中加了一个细节，是店铺门口的和尚正在敲着木鱼儿化缘，不知买主和卖主会不会注意到他。这也是个亦南亦北的画面。但是那些厚厚的帽子，还是在北方戴舒服一点。



中国人的辫子和帽子

通州离北京有19公里距离，坐落在白河边上。虽没有北京城内那么繁华，但作为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口岸，通州是南来北往货品的一个重要交易市场。超过百龄的老北京人都会记得到通州采购鲜货的经历。下页图中可以看到已靠岸的帆船。在运河中长途奔波的船民，上岸的目的是喝喝茶，歇息歇息。一个特殊的场面吸引了画家的注意力，他把卖小猫的背篓贩放在了画面的中央。为什么猫咪买卖在通州会有市场？一个解释恐怕就是老鼠多。岸上多，船上也会跑进去，如果运输的是粮食，这就太危险了。借着喝茶的空当，认真挑一只吧，今后，它将会和船主一家生活在运河上。



通州府的宠物交易及茶摊

合上托马斯·阿伦的书，我们走进道光、同治两朝主政的帝都北京。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三章 阅兵祭天下坡路



皇上好像坐在午门外检阅御林军，形象看不清，只觉得喧闹腾腾

一、江山代代不如前

阿伦的书，还不能合上，因为上页这幅画，还是从中抽出来的。

这是道光皇帝正在进行军事检阅。阿伦在书中说，紫禁城午门前广场宽广宏大，集结在广场上的御林军声威浩荡，特大号的战鼓擂得地动山摇，高声的喇叭吹得震耳欲聋。清朝的禁卫军由八旗子弟担任，道光时期的这些绿营兵从未上过战场，也完全不知道他们将面对的西方列强的厉害。这时的欧洲，工业革命引发了军事实力与手段的根本性变化，现代武器彻底替代了传统冷兵器，欧洲人的海上霸权与军事扩张正以无可阻挡之势冲破任何传统国家的防线。中国的王朝还处在以农牧业为主的封建时代，宣扬的仍是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尚武精神。

午门阅兵，是大清入主紫禁城后的传统。据记载，每年皇帝都要在大殿前亲自检阅御林军。康熙、乾隆平乱得胜回朝，也常常组织这样的盛

事，场面曾入版画，可以看到军士整齐列队，威武雄壮。阅兵是皇帝展示自己受命于天、皇权至上的机会，带有宣扬皇恩浩荡、国运昌盛的含义。

此画一眼望去，场面很大很壮观，我过去以为是单纯的阅兵，仔细一看，其实出场的人物很杂，有骑马佩箭的兵士，有敲鼓的乐师，有人在下跪，有人在闲谈，放在一起，仍是想象中的洋洋大观。阿伦让我们最后一次站在午门，体会皇上的一统江山。再次合上阿伦的书，这样的风光只能高高地竖在书架上了。



道光是清兵入关后大清的第六位皇帝，皇朝开始从早期的高潮走向晚期的麻烦

自从打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在西方版画中的形象（见上图），就不再是传教士笔下的那种标准像，他的面前也不再是一群下跪的臣子。像这张画于1850年的道光皇帝，宝座、如意、朝服、站着的小太监，都更真实了一点，只是对视者的眼神少了点诚惶诚恐。

道光皇帝的儿子咸丰被称为苦命天子。从1850年到l861年咸丰在位的11年中，中国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又爆发了持续5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忧外患，败绩不断，面临崩溃的东方大帝国由一个毫无经验与阅历的青年皇帝来勉强支撑。下面这幅版画显示，咸丰皇帝在西方人眼中，清纯柔弱，完全不可比肩中年的康熙与晚年的乾隆。



这幅版画登出不久，咸丰皇帝就在内外交困中一命呜呼了



同治皇帝在位13年，辞世时只有19岁。有西方版画，把他画成未成年的

幼主

这几代皇帝，一代弱似一代。他们在西方版画中出镜的机会，却越来越多。特别是同治和光绪皇帝，他们的形象不再仅凭想象，西人的画笔，接近了皇帝宫墙后的生活。

二、暗夜里的同治大婚

宫墙后有一项大工程，对皇朝江山永固至关重要，那就是皇帝的大婚，毕竟有后才能有接班人。

在清朝11位皇帝当中，慈禧太后的儿子载淳，也就是同治皇帝，有几大纪录入了帝王青史：其一，他是清朝最后一位以皇室直系血统继承皇位的皇帝；其二，从他开始，清朝皇帝再也没有生出儿子来。这样一个绝后的皇帝，娶亲却搞得空前隆重，因为他是继康熙皇帝之后，二百年中第一位以帝身在紫禁城里祭拜天地神明、敬拜祖宗高堂、祥龙迎娶瑞凤的。大清正渐入“同治中兴”佳境，朝廷上下自然乐于取悦皇帝的母后，把事情办得风风光光，如同国家大典。在此我们能够以当世之眼，重观彼隆重之时，要感谢一位洋人，他用文字及绘画，第一次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制作了皇帝大婚的版画纪念册。



为了迎娶皇后，大清门开始修缮装潢，披红挂彩

同治皇帝刚刚13岁（1868），慈禧太后便开始操心皇帝的终身大事，亲自谋划大婚数年。迎娶的日子定在了三年后，即1871年农历的十月十六日，西历应当落在了11月。几天前，《伦敦新闻画报》的特派记者兼画师威廉·辛普森（William Simpson）特地从伦敦赶到了北京，报纸可不能放过这桩大新闻，它的魅力，太吸引西方的眼球。辛先生想方设法，目睹了大婚的重要过程，并用自己的画笔，将壮观的场景展示给好奇的英伦读者。

辛普森的创作，我在不同的书店一共找到了7张，有几张是我为它们找专家上的色。不知道关于这件事，是不是还有散落在各地的版画。不过7张已经很不错，足以还原出当年大婚的铺张豪华。今日有钱、有颜值、摆大谱的婚礼，如果和这皇家的招摇来个比拼，结果仍会黯然失色。



新娘子家门口的景象



新娘的家到紫禁城之间的大路

新娘进宫，仪式搞得很磨人，一定要绕道大清门，还要停在门里，由宫

里的嬷嬷向她讲解婚事的程序及宫中生活的规矩。然后，她要被一步步抬过千步廊，才能来到紫禁城南门，就是今天的天安门。这一路可长呢，正好从广场纪念堂的南边走到城楼子下边。现在除了天安门，其他建筑都没有了。辛普森的创作为我们画了一条声势浩大的娶亲之路，也顺便帮我们留住了天安门广场140年前的样子。

同治要娶的这位姑娘，娘家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家世显贵，与皇家沾亲带故，据说她家的高门大院坐落在东四一条胡同里。辛普森跑到人家门外去追星，只看到大门上花团锦簇，门外、院里都没有什么动静。原来时候早了，抬送嫁妆的仪仗队还没有到门口呢。



华盖如海的迎亲仪仗队，向新娘的家进发

皇帝大婚之前，要在这条路上撒一层黄沙，有人告诉辛普森，这是皇家独享的颜色。实际上，用黄沙铺路另有隐情。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要坐轿经过这条路，无数陪嫁珍宝也要经过这条路，可它坎坷颠簸，路过就扬尘，实在让皇家丢尽了脸面。要是有钱修路，哪能用黄沙来对付事儿

啊，结果流传出皇家颜色专享的说头，老百姓自己寻开心而已。

据辛普森说，一连五六天的清晨，这条路上的嫁妆仪仗队，前脚接后脚，遮天蔽日，像大蚂蚁搬家一般。得感谢各省官员争先恐后的进贡，东西多得不能尽数，其中一张娶亲图中还有大批的活物（见第125页图），能搜罗到的天下珍宝，统统被集中到了京城。17岁的小皇帝，收获了大把的“忠心”，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也挣足了面子。

十月十五日的下午4点，迎娶新娘的队伍浩浩荡荡，从紫禁城向新娘家进发。按照大清皇室的规定，迎娶皇后要遵循一套非常繁复严格的规矩。远远望去，迎亲队伍前面是羽锦华盖开路，这是皇家最高尊严的象征。华盖的顺序、颜色、举旗人的爵位，都有严格的讲究。带领这支队伍的，是骑着大白马的皇叔，即道光皇帝的第五个儿子端亲王，他是整个婚娶仪式的司仪。最后面是抬花轿的队伍。抬轿人的行头，据亲眼所见者说是红袍上带着白点，显然下面的几幅画都被点错了颜色。每位轿夫都经过严格筛选，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他们已进行过无数次训练，有时轿中要抬着一碗水，要练到一滴水都不洒才算合格。

仪仗队的行动有严格的时间表，事先已请风水师精心算好。新娘上轿，大约在夜里11点钟，迎亲人马要早一点到新娘家大门前吹打，营造迎亲的欢乐气氛。午夜前，大队人马必须离开新娘家，否则就不吉利。从新娘家到大清门，要走半个多时辰，午夜12点前新娘一定要进入紫禁城。在大清门听完宫中嬷嬷的点拨，新娘要在凌晨2点前到达宫中。看来大婚这件事，古往今来，皇家平民，都是喜欢折腾一整夜啊。

午夜迎娶的队伍是个什么阵势？辛普森为我们清点了一下，人员计有：端亲王骑马上，48匹小白马由内侍牵着，32人举旗，48人撑着华盖，后面又跟着20顶形制相似但色彩各异的华盖，192人提带“囍”字的灯笼，

然后是骑在马上的其他亲王，迎娶新娘的32抬大轿，后面还有100个骑兵，200个步兵，无数供桌与华盖。除此之外，沿途遍布清兵，骑马的禁军头领来回跟着巡视。



新娘子的大轿过来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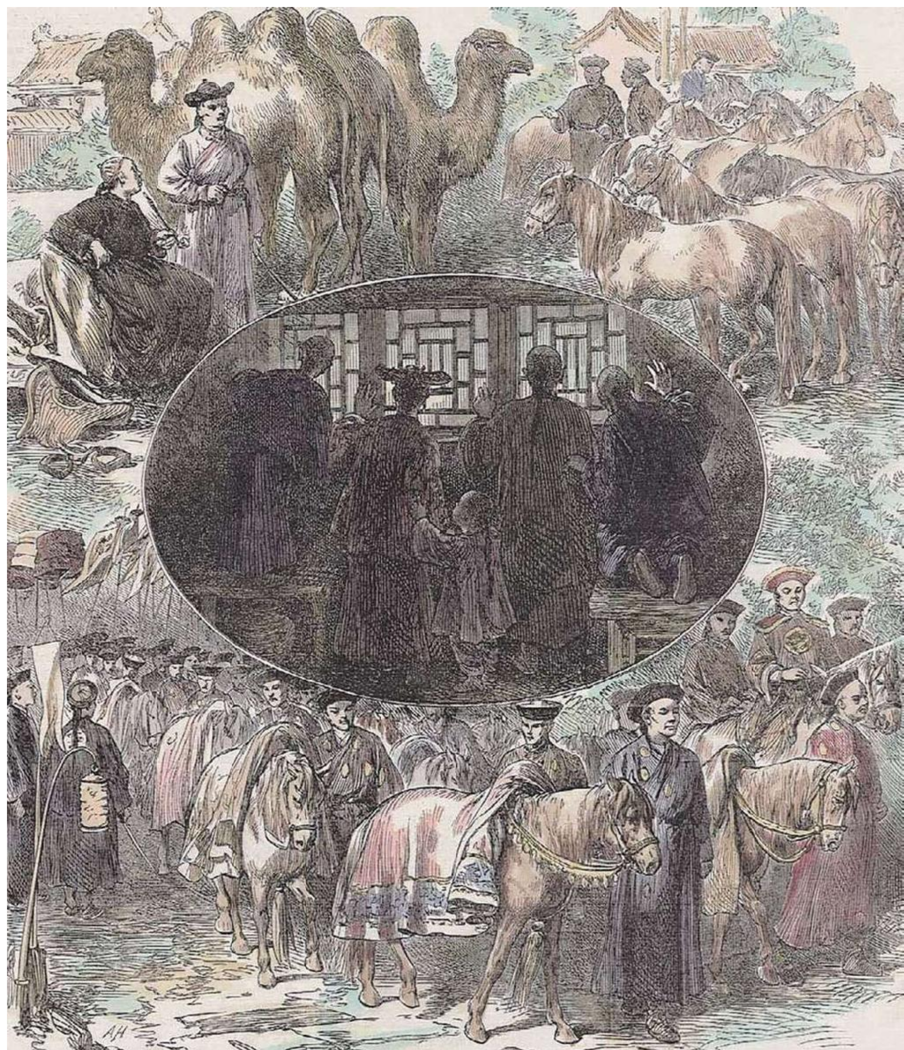
32抬的新娘大轿，稳稳地缓慢前行。精致的轿子，庄重典雅，轿身周围是黄色的帷幔。沿街的屋檐挂着花灯，路上也摆放了无数花灯，清兵手中举着“囍”字灯。想象月光里坐在大轿中的新娘淑静端慧，容德甚茂，心里充满对宫廷生活的憧憬，是不是有点中式的浪漫？此刻谁能想到“蕙质兰心秀并如，珣瑜颜色能倾国”的皇后，不过两年多的时间，就在同治帝诡异过世后，在寂寞中香消玉殒了呢？

新娘的花轿走过之后，迎亲行列还长长的呢，所以辛普森的笔不能停，继续画着。下图中看到两顶如北京一般人家用的轿子，也有8人抬，里面坐的是新娘的婢女，抑或只是刚刚册立的后位牌匾。十月十六日的早上，其实是同一天的凌晨，太后为皇上选好的其他嫔妃才能坐轿入宫。

她们是不能走大清门的，只能走紫禁城的北门。



大轿后面还有得看



窥视婚礼与贡品进宫的场面

上图没有那么花里胡哨，中间的那些背影，说明画的是昏暗中的偷窥。

普通人家的婚娶，会在白天举行，很少有像皇家这样既大张旗鼓又偷偷摸摸地进行的。听到风声的皇城居民，谁不想挤靠在迎亲经过的大道上一睹盛事。但皇帝的大婚，浸透了皇圈圈里面的内斗，是天朝江山传宗接代的私事，哪是凡夫俗子可以随便观看、妄加评论的。朝廷早早贴出了告示，迎亲数天前，城市得清理戒严，只要有仪仗通过，任何人不得

上街，更不得驻足观看。从图中可以看到，每次队伍行进时，还有拿着皮鞭、棍棒的兵勇站在队列旁边，严防任何闲杂人等靠近。当不准出街观看的指令传到东交民巷那些驻华使节耳朵里时，他们都忍俊不禁：按西方的逻辑来看，如果不让人看，干吗搞那么大的排场？这逻辑西人实在难以理解。

好在临街的四合院都有倒座，幸运的一家人可以聚在窗户前，用手将窗纸捅个窟窿，向外偷看，孩子们也跟着在屋子里起哄。有这么一家子，明白了辛普森的意图，同意让这几个洋人加入他们。大家贴着窗户，一看一晚上。呦！这么多的骆驼、马匹，这么多的绸缎驮在马上！瞧瞧咱们的皇上，多气派威风，子民暗地里数落着，怎么就挡不住这洋鬼子进城，也挡不住这几个洋人暗地里写写画画。

所有的排场过了之后，还有一个小插曲，这是辛普森听宫内的太监讲的。同治皇帝在大婚前从未见过自己的新娘，洞房花烛夜好像也没有打动他的心。十月十五日子夜过后，他实在熬不住困顿，在新娘入宫之前，早已进入梦乡。直到两宫太后不断差人催促，他才被小太监唤醒，迷迷糊糊地来到坤宁宫前，按着要求走了一个过场，然后又回到自己就寝的殿内，继续他的美梦去了。江山、传承、人生大事，对一个不识世外桃源的帅哥来说，就是一帮老人搞出来的冥顽不化的制度，不是吗？同为皇帝梦，原来也有代沟。



皇帝大婚，慈禧太后特意为儿子打造了一套喜瓷，底子亦为显示皇家特权的黄色。此为黄地喜蝶纹花觚，也应当是仪仗抬着送入宫中的



中国人心中最有神秘感的建筑，天坛祈年殿上接天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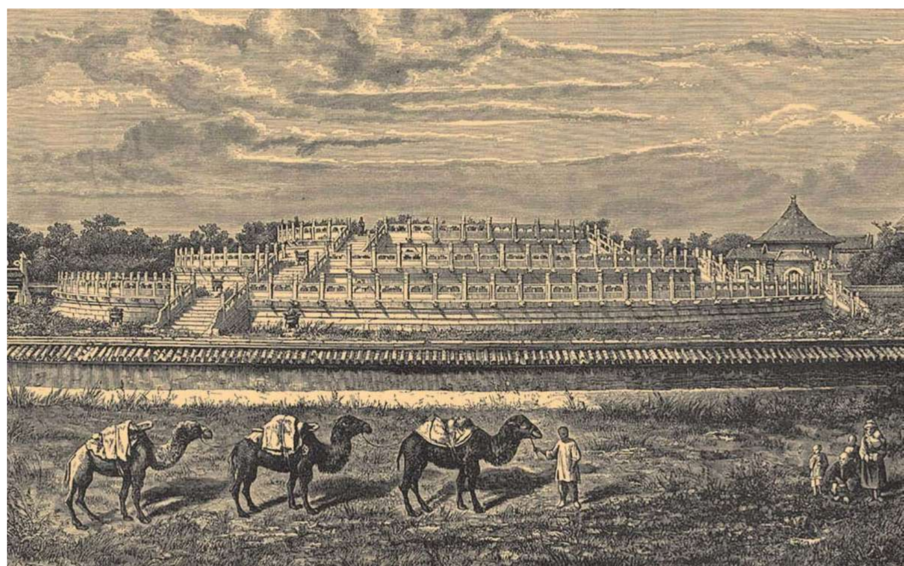
三、八座小炉子祭先皇

同治皇帝不到20年的生命，乏善可陈，留在版画中的逸闻却挺多。这一节，还讲他的故事。

1872年12月21日，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冬至，同治皇帝结婚不到一个月，来到了天坛，按大清的祖制，举行冬至祭天仪式。按照已宣布的圣旨，祭天后的第三天，即12月23日，两宫太后将正式结束垂帘听政，同治皇帝即可亲政，握有真正的皇权了。从这些日子的安排上，可以明白祭天的这日有不同往年的意义。

“上天”是中国最高权威的象征，尽管“天”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与实体，但每位皇帝都宣称自己是受“天”的旨意，行使治理“天下”的权力。明朝永

乐大帝在紫禁城东南方向数公里处修筑了天坛，使祭天活动具有了最为庄严的地点与形式。清代基本沿袭明制，乾隆年间，曾对天坛进行过大规模的改扩建，祭天仪式做得更加隆重壮观。法国有拿破仑皇帝登基大典的油画，英国有维多利亚女王亲临伦敦世博会的油画，以此艺术，帝王形象与帝国雄威得以传扬四海。皇帝祭天的场面，直至同治朝，没有艺术家亲眼见过、画过，白白浪费了天意下达人间的机会。只有那么一次，还是前一节里的熟人，记者辛普森，带着他的六名同人，像希腊天神普罗米修斯，用画笔悄悄为西方人偷来了东方的“天火”。



围墙外远望圜丘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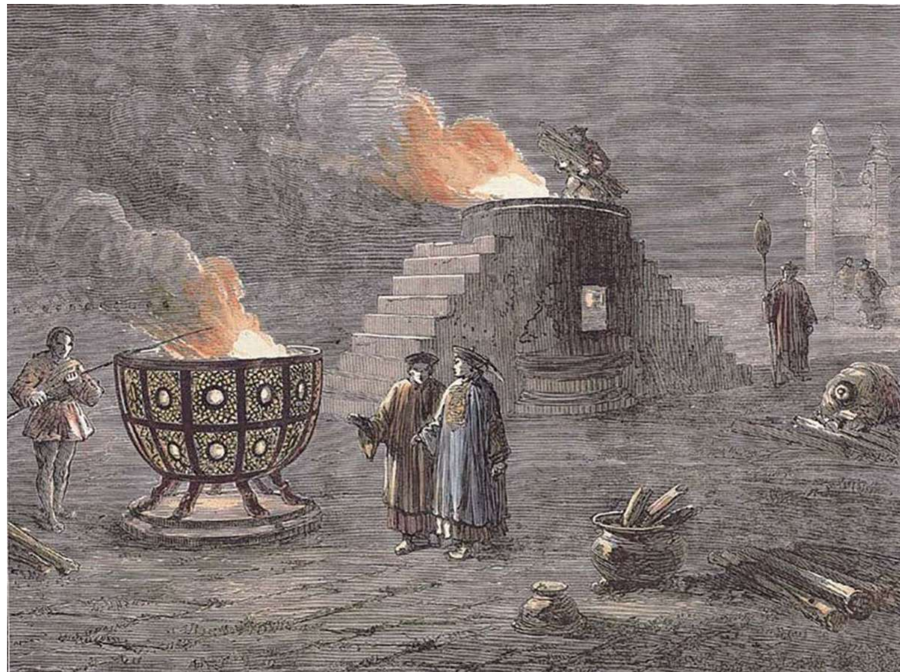
数九寒天的一个晚上，这帮西洋人从墙洞子溜进天坛。他们见到了几个护坛人，上来就打听以往祭天的旧事。老人们粗略地回想起咸丰朝见到过的景象，在辛普森听来这就像是口述历史的珍言，于是统统收集起来。后来作画时，辛普森把天坛的北方画得绿树葱郁，烘托出上天为大地带来的生命与生机，而不是同治冬天祭天时萧瑟的景象。引人注目的还有三头骆驼，它们驮着细软，不知是不是为祭天而用。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世人记录下来的皇室祭天仪式。我只找到了四张版画。它们现场感颇强，但混杂了辛普森的想象。另外，中国人也留下了天坛的地图与画面，我在此插进了两张，以弥补辛先生视角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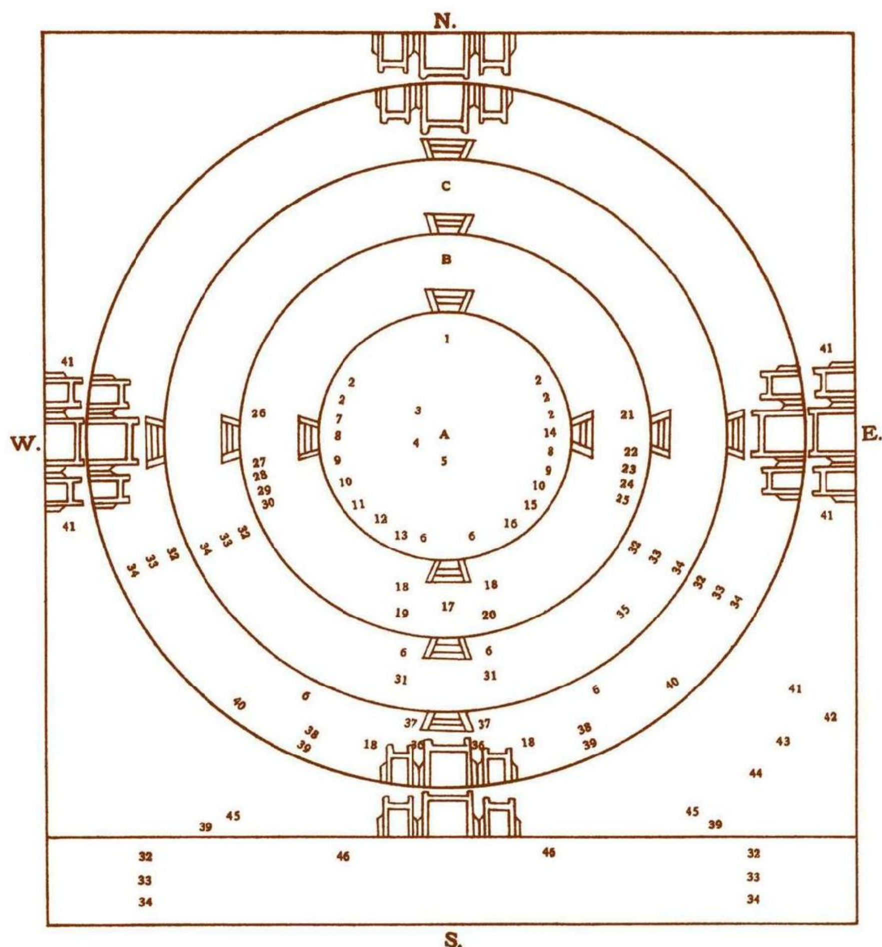
时间回到那年的12月20日，祭天前一天的傍晚。同治皇帝的舆轿由一头大象牵引，在大批卫兵的簇拥下，出了午门、大清门、前门，直奔天坛。按照祖制，他必须在子时赶到天坛，在斋宫睡上半夜。祭天时辰为第二天日出前七刻，即凌晨四点一刻，时辰一到，斋宫鸣太和钟，皇帝起驾至圜丘坛，钟声止，鼓乐声起，大典就要正式开始了。

摆放祭品的祭台，上面铺着极为精美昂贵的丝绸，看不出游牧民族的粗犷狂野。祭天前一日，会有专人将准备好的牺牲杀死，然后放在牺牲炉里焚烧献祭。祭炉一共有九座。中间一座大的叫燔柴炉，焚烧的祭品是祭天的，牺牲也是敬献给天神的，要沿着台阶上到炉边才能上去添火。它的周围，是八座小一点的铁铸燎炉，分别焚化配位的供品，祭祀的是清朝的前八位皇帝，即同治的祖先。别小看了这八座小炉子，说“君权天授”那是用来震慑人心的，真要夺取江山，靠的是祖宗们浴血奋战，通红的炉火，烧的就是一家一姓的香火，烧给那些胆敢不忠不敬皇室的权臣们看。要是这八处炉火不旺，满族就要失去继续统治中国的政治能源。

祭天仪式是非常庄严繁复的，它的程序都写在《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当中。祭奠的程序依次分为迎帝神、奠玉帛、进俎、行初献礼、行亚献礼、行终献礼、撤馔、送帝神、望燎。下页的示意图也是根据这些典制画出来的，天坛的中央标号为1的地方，是留给“上天”的，周围的供桌，摆放很多的祭品。至高无上的皇帝此时只能站在第5号的位置。



祭天开始前燃烧牺牲。似乎听得到噼噼啪啪的火焰响，也在祈祷保佑皇朝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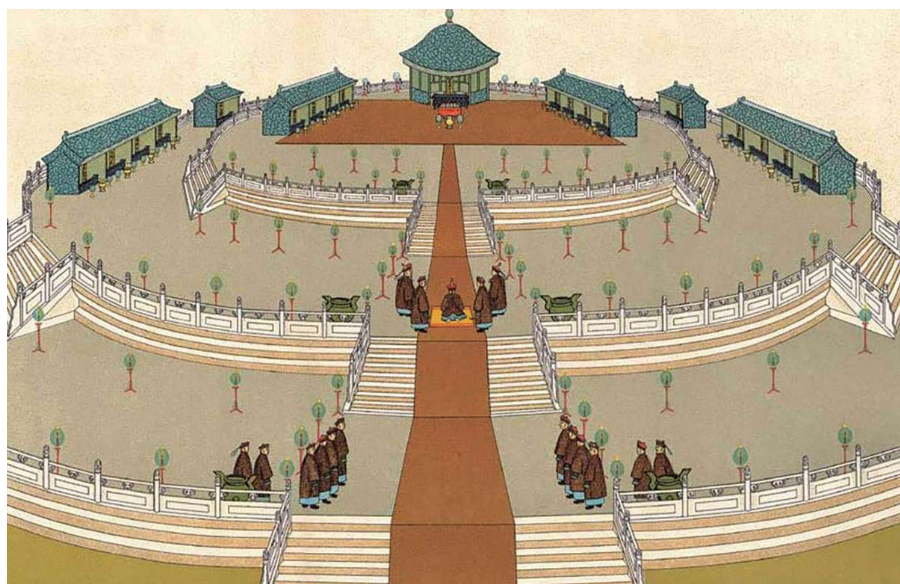
祭天位置示意图

如图所绘，曙光微熙中，可以看到天坛四周被轻烟笼罩，音乐声响起，祭师起舞。延续了几千年的世界上最古老最宏大的祭祀就要开始了。皇帝在他的重臣陪同下，手握玉璧缓步登上圜丘祭坊的第二层台阶。然后他会跪在上天面前——这是唯一高于他的权威——诚谨唯诺，窃窃私语，声音只能让自己与上天听到。

祭天的现场是不是眼前的画面，我不知道，估计辛普森也没有看到。上天给予西方人的迷惑已经有几百年了。法国的启蒙学者弗朗斯瓦·魁奈，

在评论东方专制的时候，反复纠结“天”的概念，他说：根据中国人的解释，天是统辖上苍的一种精神，他们将上苍看作大自然这个造物主最完美的造化。上苍的样子总是引起人们的崇拜，让人深切注意自然秩序之美及庄严。

中国遍布各地的大小庙宇，总有乡民在敬天拜地，就是上不了圜丘的护坛人，也有他自己敬拜的去处。然而，在东方的大地上，北京天坛，是“天”这个自然造物主最完美的造化，辛普森描绘的绿野、圆坛、金黄盖幔、大理石护栏，是中国人心目中自然秩序之美及庄严的最高体现。



中国人画天坛与西方的画法有所不同，辛普森的视角高，是从上往下看，而这张天坛图，一步一登高，是人在爬向天际



正北的上首至高无上，留给上天

“18世纪的古老中国伸张出去并迷惑了她的未来征服者，给欧洲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但西方的进步文化却注定在19世纪及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要粗暴地侵略中国，席卷并彻底改变了这个古老的国家。”英国东方史学家赫德逊，后来这样解说古老的“上天”和它眷顾的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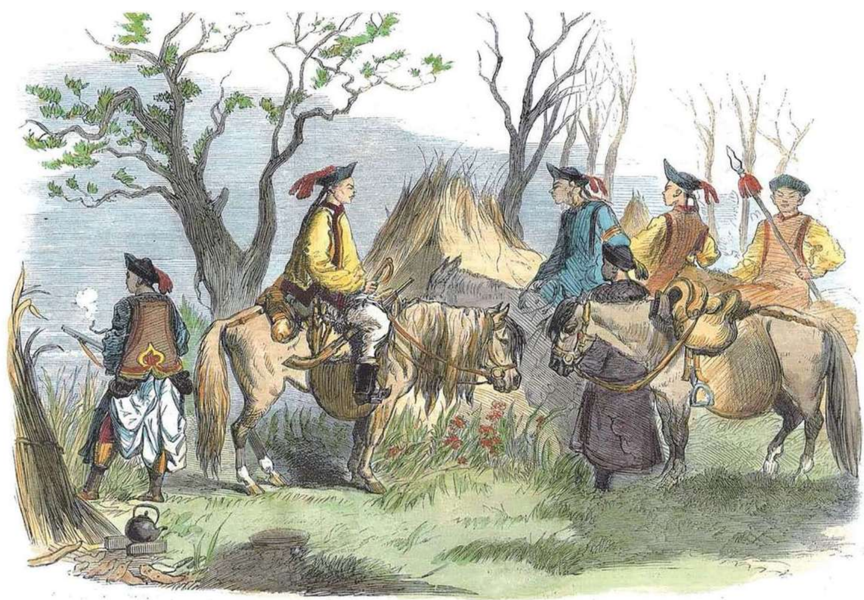
同治一朝，当年着实让国际社会吃了一惊，清政府自己也像打了一剂强心针，居然在鸦片战争后中兴起来。这并不是那个五岁登基、亲政一年就死掉的皇帝的功劳。值得怀念的大事件，与他垂帘听政的母亲有关，与他的亲叔叔有关，此外还与几位在镇压太平军、捻军与回族叛乱中崛起的地方大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有关。小皇帝的大婚与祭天，无论把正史拉成多长的画卷，也会被暗夜星光笼罩，不值得国史追寻者一看。

遵行了两百年的仪式，还在隆重地搞，大婚要庆祝，祭祖要庄严。到头来，只剩下了几张版画，还不如为了大婚烧制的瓷器，上不了拍卖的台

案。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四章 刀笔刻深强权时代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守卫京郊的清军兵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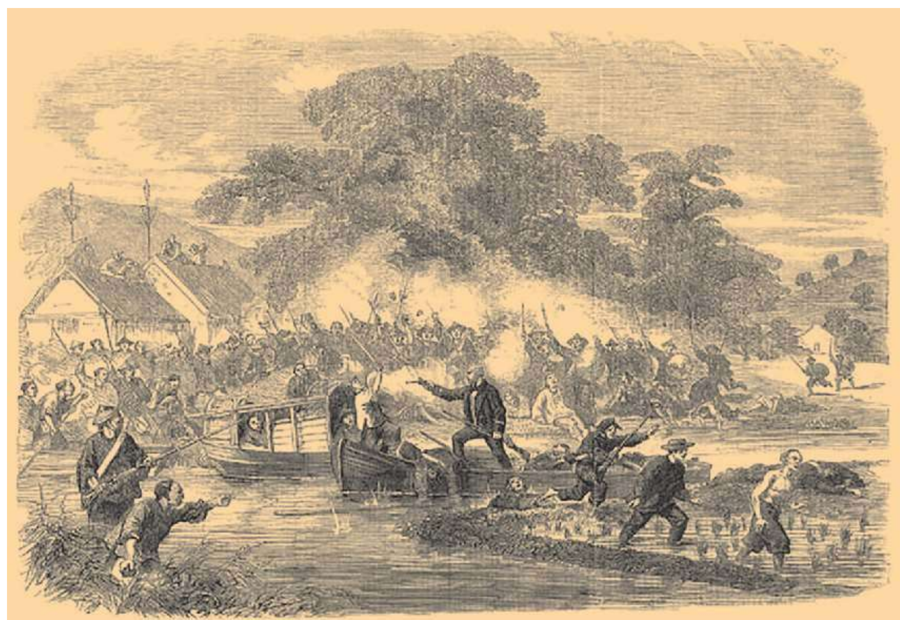
一、街头竖起了公示牌

英王两次派遣使团到中国，希望与大清朝廷谈判开放南方门户以通贸易事宜，两次出访均无功而返。清政府仍满足于皇朝的地大物博、自给自足，完全不愿理会这些白人洋鬼子的要求。1840年，中英之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列强开始以武力打开中国门户。战争从广东一直打到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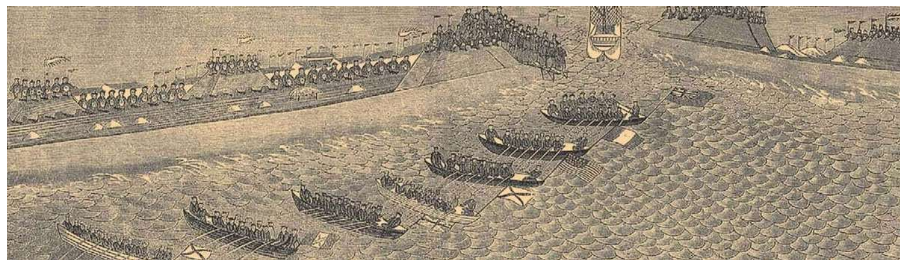
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同意割香港岛、赔款、开放广州等五个口岸，等等。此战中，北京的朝廷君子动口不动手，以为这样便可以止住洋人的无理取闹。

19世纪50年代，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获得的利益，远不能满足它们的需求，更何况，道光、咸丰两朝，以皇帝为首，根本没有打算认真履行签订的什么协议。1854年和1856年，英、法、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开放中国全境、鸦片贸易合法化等要求，均被清政府拒绝。双方各执一词，不打一仗，洋人达不到目的，清政府也不会轻易认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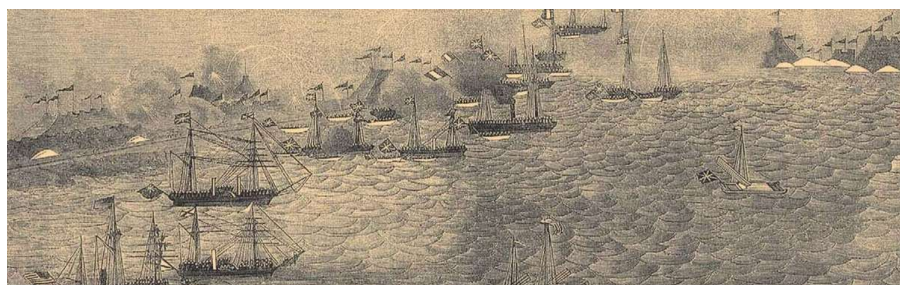
1856——1860年，英法两国与大清之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方想打，一方怕，战火一直烧到帝都北京。



点燃战火的，还是广州沿海那帮挑衅的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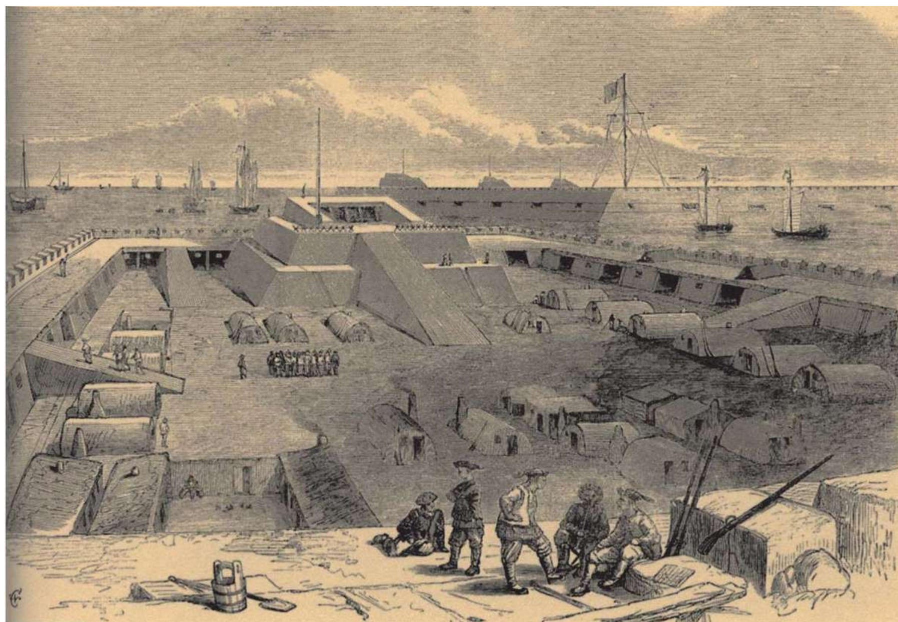
英法联军在海上向直隶总督递交议和条件书，海面风平浪静



两天后战火骤起，海上掀起大浪

英国先是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命令英军驶入珠江，炮轰广州城，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广州打了一年，英国人天天盼着火星子北飘、皇帝老子火烧眉毛，但北京还是动口不动手，没有发来任何圣谕以改变贸易不均衡的现状。英国人如梦初醒，这帝国还真是一张大鱼网，广州府衙只负责漏水，没有权力去堵住条约执行中的漏洞，要想让各个海关认洋人的法律，首先得改造皇帝。1858年初春，英国人联合法国人成立英法联军，第一次将舰队开进白河，闯入了北京的门户——天津，摆出攻打大沽的架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英国皇家海军舰旗及法国、美国、俄国国旗。1858年5月18日的交涉，似乎只要皇上知趣承认过错，只武力威慑一下，也可以不打仗。但两天后，交涉还没结束，英法联军突然开炮攻击大沽炮台。清军怎敌得过西洋炮舰的轰击，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大沽守军的铜炮——赤衣大将军，就全部成了侵略者的战利品了。



战前的天津大沽炮台

说着说着，这帮野蛮人就要在帝都门口开战了，这下朝廷可慌了手脚。守卫京郊的清军，即便不似版画上的那么寒酸，手持标枪和简单的火枪，也绝不是英法火炮的对手。无论如何，不能让洋人到北京来捣乱。天朝还有没有人啦？咸丰皇帝向阶下大声喊道，快去天津服个软，再糊弄一下洋人，签个他们喜欢的协议，只要不进京城，皇权就还是妥妥地攥在我的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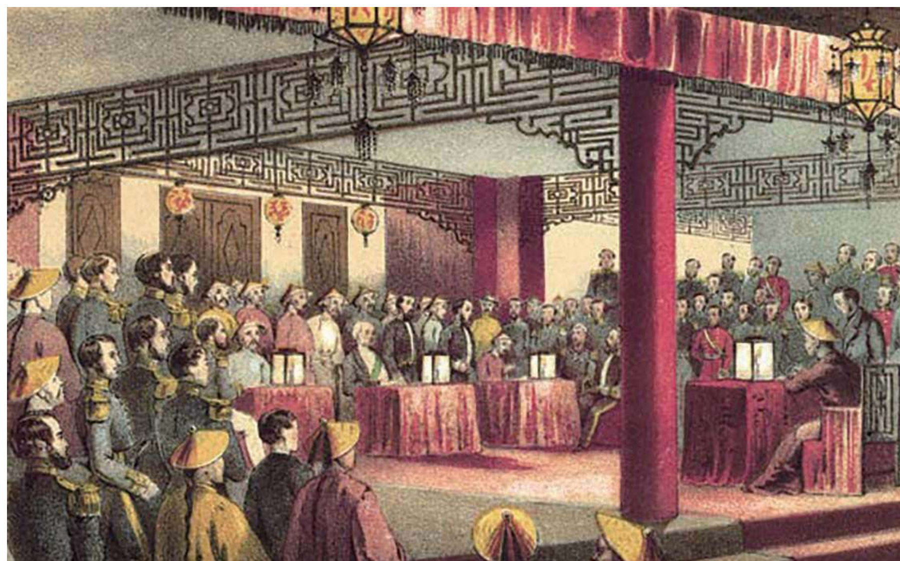
第一个去天津的钦差大臣耆英，洋人为他刻板画像。他晚年困于战争，朝廷内外都输得很惨

爱新觉罗·耆英被派赴天津与英法联军交涉。耆英曾于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代表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是后来李鸿章“条约外交”的前辈。皇帝以为耆英能与鬼佬周旋一阵以解危局，但没想到英国人受过他的骗，不想再理他。耆英后来回到北京不久，咸丰帝就找了个借口令其自尽。

折了耆英，仗也打不赢。无奈，1858年6月13日，皇帝的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赶到天津，先后与俄、美、英、法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签订后，联军陆续撤离天津。然而，此时的咸丰帝对条约内容越想越怕，于是命令大臣桂良等与英、法交涉修改《天津条约》的内容。

英法联军认为得到的还不够，怎能容你变更条款往后退？更糟心的是，他们又一次发现，签约都是权宜之计，是皇帝的阴谋，这天下是一家一姓的，其他人签字画押都不做数。皇亲耆英两面不讨好，皇帝赐他死，他以前签订的条约也一起送终。1859年6月，离《天津条约》签订不到一年，英法决定再次进入白河，攻打大沽炮台。咸丰赶紧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赴天津勘筑双港、大沽炮台，增设水师，并想法与英法联军交涉。但此时洋人斩钉截铁，一定要攻入北京面见皇上，多次交涉毫无结果。列强想要得到的利益，比以往更多。

向大清朝廷宣战这么大的事儿，前线指挥官不可意气用事，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英军需要一个刺激政治家的借口。1859年6月25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双方发生激战。本陷于被动的清军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拼死抵抗，打出了一点威风，大败英法联军，联军多艘舰艇损坏，死伤四百多人。失败的消息传到欧洲，引起英、法国内主战分子的喧嚣，他们叫嚷着“实行大规模报复”“占领北京”。战火烧向京城的借口有了，帝都在劫难逃。以自由贸易为目的的文明交往，一步步堕入野蛮侵略的可耻深渊。



《天津条约》签订现场。从庄严的大厅、肃穆的气氛、平等摆放的签字台来看，有理由相信，这一次朝廷是认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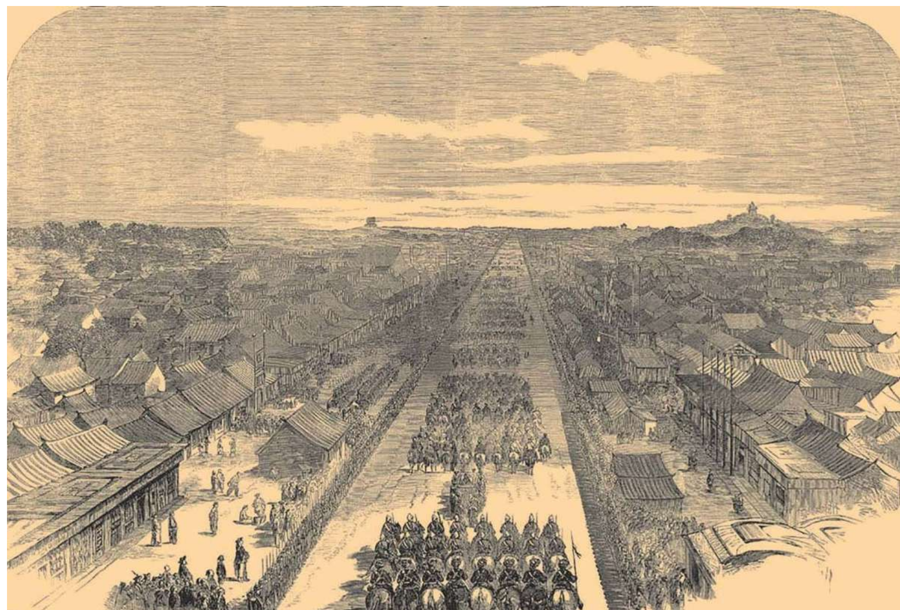


感叹士兵的勇气。与英法联军的枪炮相比，他们的装备落后了几百年。这场战争，事关道义、武器，也事关经济实力



八里桥大战，可见英法联军的装备

1860年2月，英、法两国政府再次出兵，扩大侵华战争。8月，大沽炮台失守，侵略者长驱直入，占领天津。英法联军乘胜向清政府提出和谈，但条件极为苛刻，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此后，英法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发，在北京通州八里桥，联军遇到了清军的顽强抵抗，然而，主帅僧格林沁率先逃走，军心动摇，八里桥防线被撕裂。次日，早已被英法联军吓破了胆的咸丰皇帝带着后妃和一批官员一溜烟跑到热河避暑山庄躲了起来，只留下其弟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



英法联军列成方阵进入北京



英法联军通过安定门，门上旗帜已换成英、法两国国旗

皇帝在处理这两次战争冲突中，刚愎自用，听任无知暴戾之气泛滥朝廷，对外部世界毫无求知欲望，粗暴践踏战俘人权。乱子闹大了，他抛弃子民首先出逃，把一场可以控制的外交纠纷，推入绵延数月的战乱。京城已无朝廷国威，英法联军一路浩浩荡荡开进城来。

英法联军于1860年10月6日攻占了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圆明园。

在将园中的珍宝洗劫一空后，10月18日，英军首领额尔金下令火烧圆明园。借着初秋的西风，圆明园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建筑就这样毁于野蛮的侵略者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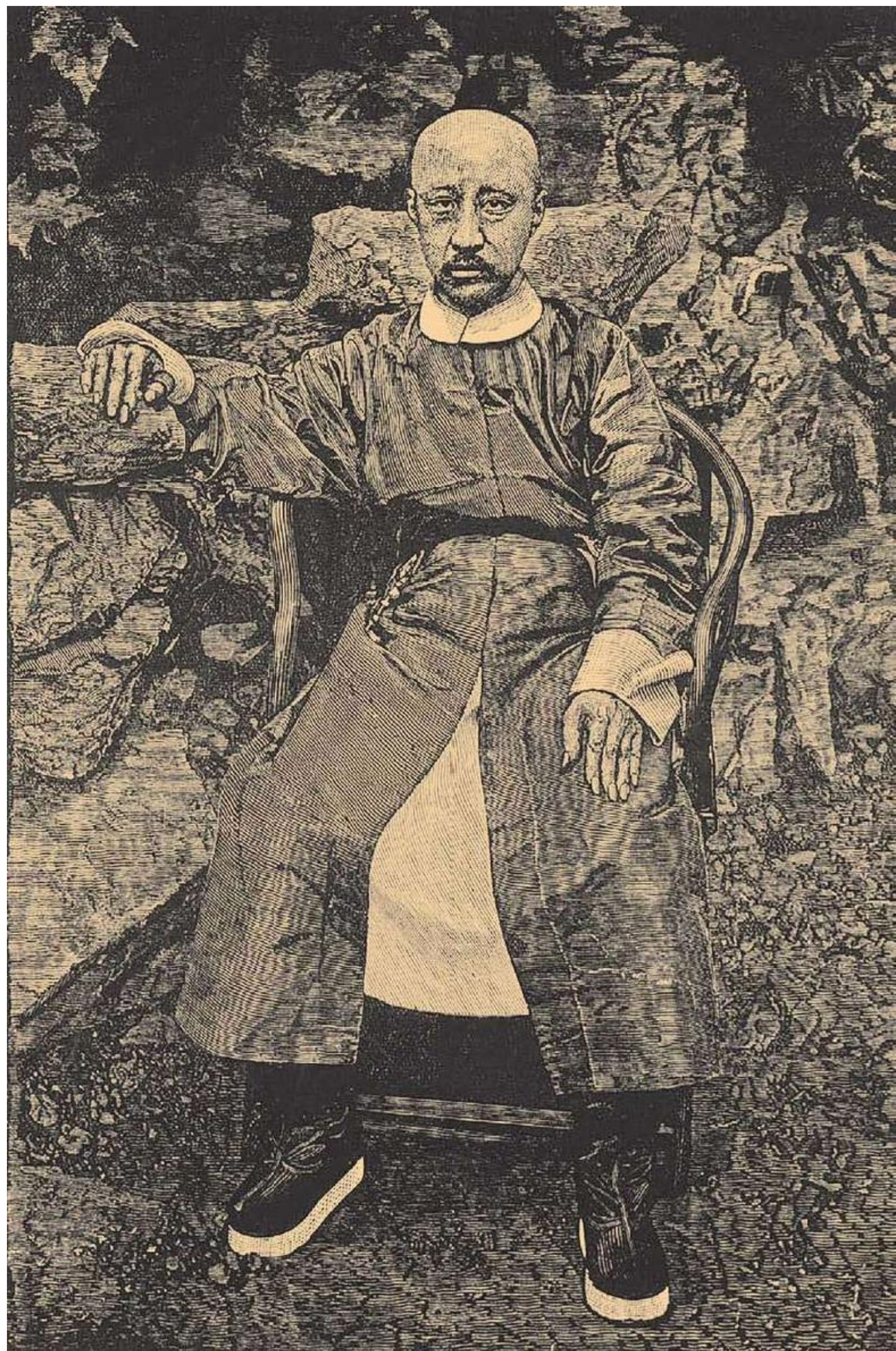
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那时的安定门与我们现在从高速路上看到的德胜门箭楼的感觉可不一样。从上页下图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城门多么巍峨高大。但是在工业化武装起来的洋枪洋炮前，这些城门再也担当不起闭关自守的功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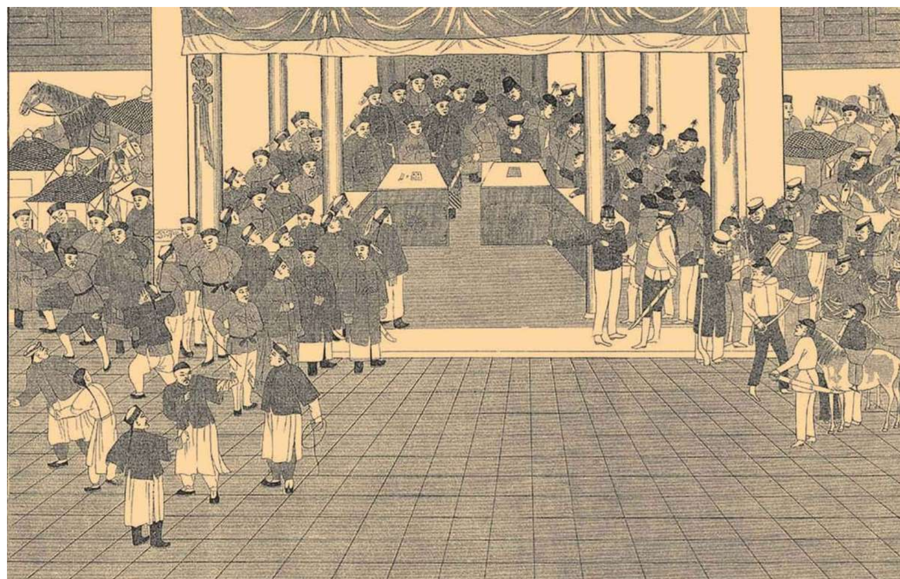
英军统帅额尔金是坐轿进入北京城的。这是我从1861年1月《伦敦新闻画报》上看到的，有一整版大



法国人刻印的版画，表现联军在颐和园抢掠、欢庆，之后把园子烧成一片灰烬



恭亲王奕訢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位值得记述的人物



中国人画的《北京条约》签订现场。看上去场面混乱，站在场外的洋人带着刀剑

留在北京应对洋人的奕訢是道光帝的六子，1860年他27岁。当年10月24日，他在北京与额尔金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北京条约》。在条约中，英国人特别指明，签约是政府行为，恭亲王的签约全权代表皇帝的意志，皇帝以后再也不能责怪臣属、出尔反尔。这是大清“条约外交”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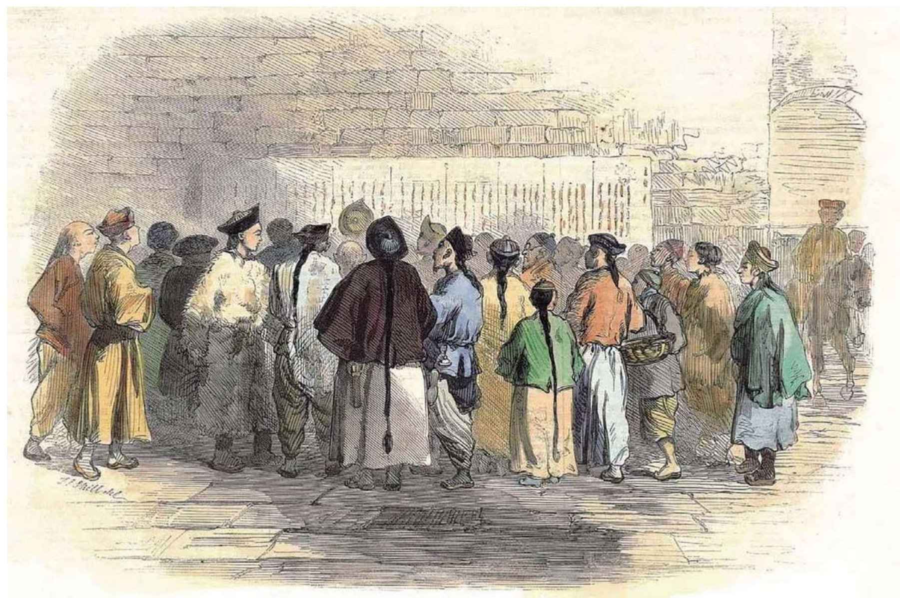
英法侵略者终于达到了目的。用他们的说法，签约代表着“实现了和平”。在各主要城门口，联军将签约的条款写成大字报向京城百姓公告，并陈述他们的行为如何合理合法，包括烧了圆明园。对北京的民众来说，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洋鬼子可以自由行走在天子脚下，还耀武扬威地贴出告示。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向街头，呆呆看着无可奈何的巨变。

明明是闯入了中国的家园，杀了人，放了火，侵略者反要清王朝赔偿入侵的费用与损失。根据《北京条约》第三款，仅对英国人，清王朝就要

赔款800万两白银，第一批50万两白银必须在1860年11月30日前交到天津。



街头的条约公示牌和围观百姓。近70年前，马戛尔尼勋爵穿城而过，商户行人可没花这么多时间围观



世道变了！这等事过去没有听说过。邻里人家默默无语地看着。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呢？



赔款在清军押解下送往天津。画面清楚地描绘出国人痛恨无奈的神情



对死于狱中的外国人予以赔偿。站在旁边监秤的那位官员，是不是长得

面目狰狞？

这次英法联军进入北方，带来一个与版画中国有关的新气象，就是照相技术出场，照片成为形象信息的载体。最早的一批照片，拍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影像。不过，很多照片完全不为公众所知。在伦敦维尔康姆图书馆珍藏着著名摄影家约翰·汤姆森的玻璃底片，尺寸巨大，有数百幅之多，它们是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拍摄的，部分于70年代在伦敦出版。2009年，全部玻璃底片被运到北京世纪坛艺术馆，和我收藏的版画相邻展出。两展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汤姆森的照片忠于眼前的对象，但主题的表现不如版画生动，属于随意进行的情景创作。街头的条约公示，监秤官员的狰狞面目，还有押银清兵的愤恨，照片上你就看不到。

1880年以后的20多年，版画与照片在图书中共同出场，相得益彰。有些版画，就是以照片为底的再创作。像恭亲王奕訢的那张肖像，本是汤姆森的佳作，但若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亲王长什么样子，还得借助版画刻印。这个时代，可以称为“影像版画”的时代，有影像，有版画，有版画中的影像。如果想收藏版画家独立的艺术创作，要把时限划在1860年以前。在那以后，许多版画可以看到照片的影子，在画面布局、比例上虽更显真实，意境却有些呆板单调。

法国人制作了一本版画集，有20多张，渲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宏大场面和胜利者的狂欢。它们充分利用了版画创作的自由度，过于煽情想象。关于1900年的庚子之变，德国人、日本人也做过这类的版画。它们的艺术性不强，流传不广，也不受收藏者的喜爱。

二、开放的帝都什么样？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北京的历史进入前所未有的时代，西方人在皇

帝鼻子底下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可以保持本国原有的习俗，也可以超越原来四夷馆对洋人的制约，在京城随意走动。同样受到第一次国际化浪潮的冲击，版画中的北京也日益华洋杂陈。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清的外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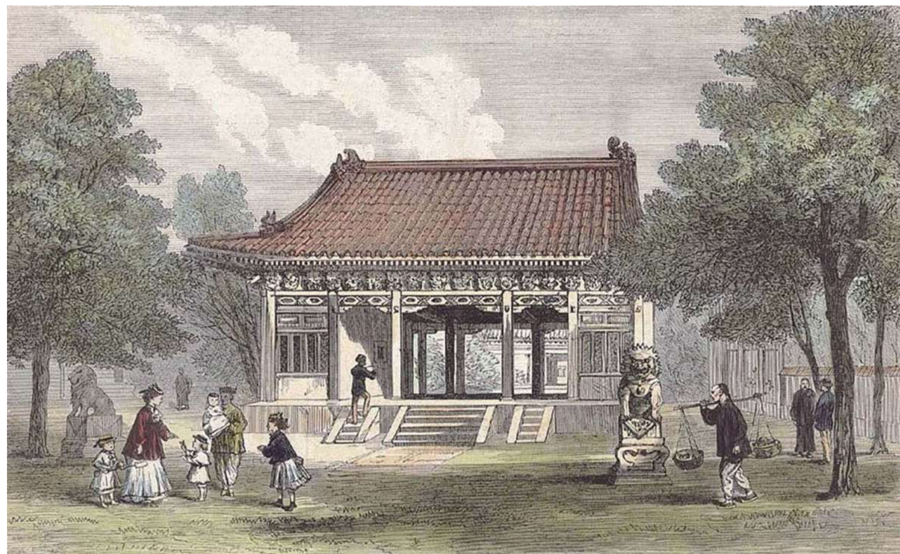
为满足列强与皇帝直接对话的强烈要求，1861年，大清建立了第一个外交事务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地址就位于东堂子胡同49号，原为晚清大学士赛尚阿宅邸。为了在外国人面前显出气派，原大宅门被改成衙门式大门。第一任总理大臣为恭亲王，掌管对外事务。这是洋人盼望已久的大好事，以后在大清办事，有门可入，有法可依。

这座建筑于1985年被拆除，京城又失去一个历史的见证，实在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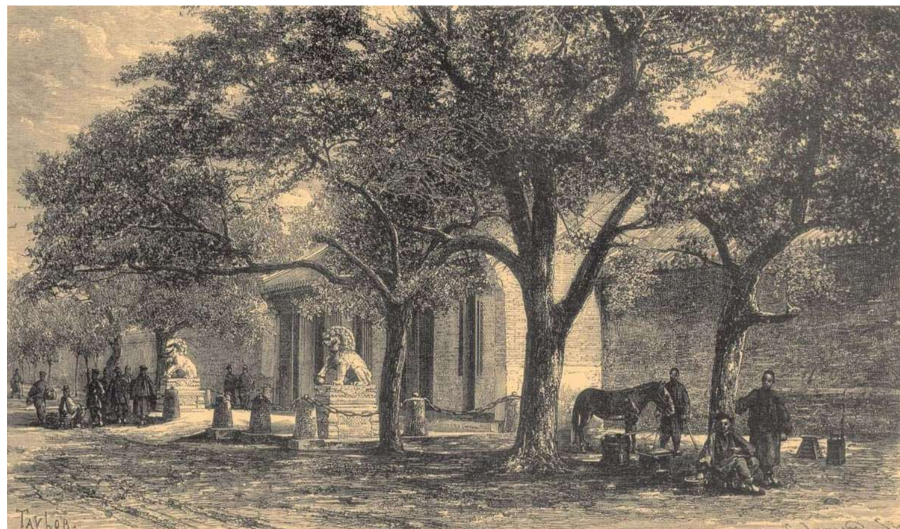
英国人在北京有了大使馆。1861年3月26日，英国驻华使馆正式开张。使馆的大院占用的是梁公府，地点在东交民巷以北的正义路西侧，御河的西岸，这里原是王府、衙署、民宅聚集之地，东交民巷是前门以东至崇文门以西的一条街。梁公府原是淳郡王之孙奕梁的府邸，是一组坐北

朝南的四合院建筑群。此画中的大门是做了英使馆后改建过的。

英使馆当年的医生后来写了一本书《北京与北京人》，详细描绘了英使馆的建筑及其活动。其中有一段写道："英使很快迷上中国的古董艺术品并开始收藏。这吸引了那些古董商贩经常到使馆门前来叫卖。其中亦有在1860年火烧圆明园时偷抢的东西。"



1870年英国公使馆外景，门前没有岗哨



1870年法国公使馆外景，门前旷阔，树木郁郁葱葱。如今，改造过的大门仍在原地

1860年以后建立的使馆，基本上沿用的是以往王府的旧居，例如日本使馆占用了肃亲王府。到1900年，根据《辛丑条约》，才将此区划为使馆区，修建了碉堡，安装了铁门。

俄国人进入北京的时间比其他国家要早一百多年。1689年，中俄签署了《尼布楚条约》，康熙帝批准将东直门内北大街的一座关帝庙改为东正教教堂，允许俄国人按他们的宗教习惯进行祈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人也在东交民巷修建了公使馆，并在城东北雍和宫的旁边得到另一块地方。

从这几张图可以看出，上面画的建筑有照片做参考，光影逼真，而人物则应属另加，举止虽然做作，但画面变得更有人气。

不仅外国人可以在北京派驻外交使团，大清也开始融入西方国际社会。这张图（见第154、155页）绘的是大清国派去英伦的使团。中间站立的洋人是一位美国人，名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他曾任美国驻华大使5年。蒲安臣主张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一致，应帮助清政府巩固统治，而非动辄使用武力威胁，同时，他认为清政府应忠实履行已签条约。蒲安臣因此得到了清政府的好感和信任，恭亲王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之言听计从。蒲安臣退休时恭亲王为他举行了告别宴会，并聘请他出任驻欧代表。



1870年左右俄国人的教堂，地点在东交民巷的西头，在1900年被义和团烧毁



清政府的英国使团与蒲安臣。房间里不冷不热，中国人手里却都拿着扇子，不知画者寓意为何



1861年在法国举办了世界博览会。难以想象大清朝廷办事的效率，冲突刚刚结束，就能派出参展团，其中必有融入西方的诚意。图为展览上的中国展品。我曾在伦敦的沃里克博物馆看到一套清兵战服，或许就是图中的这套留在了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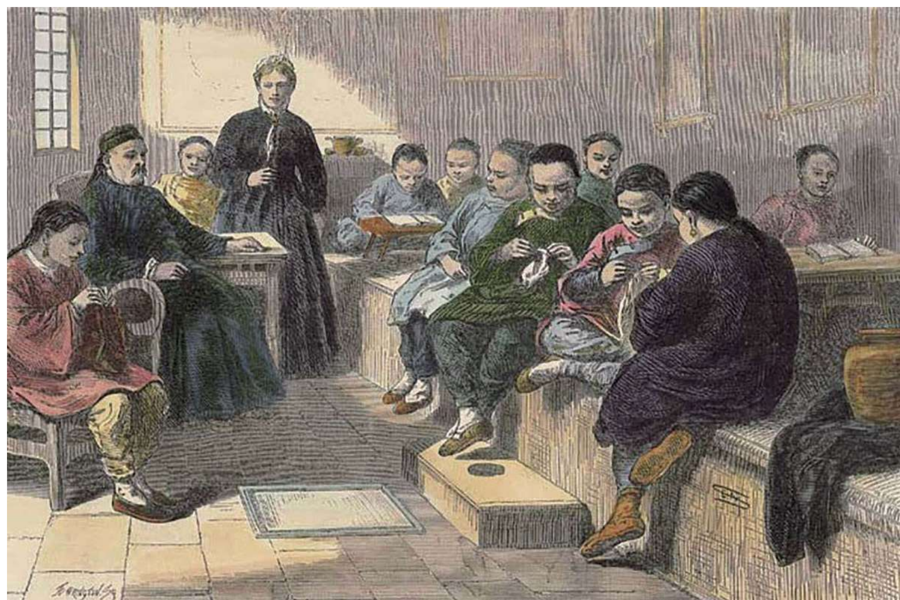
19世纪70年代，外国人开始在北京设翻译学校，还建立了育婴堂、女子学校及男校。

下页上图中这座男校的校舍、教员与学校的设施，咋一看，以为就是一座私塾，但这是新式学堂。从墙上挂着的地图可以看出，这里会教孩子们西方地理，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为了保证这些学生能够参加正常的八股考试，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还是孔孟之道，方法仍旧是小男孩站在那里，死记硬背。外国人来绘画的时候，这位教书先生穿着一件特殊的马褂，表明他祖上曾是皇室的宗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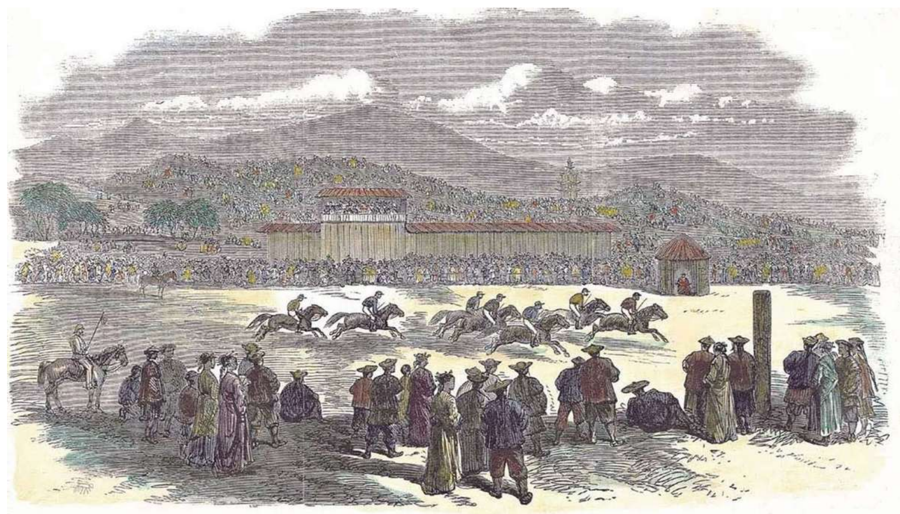
大部分的女孩子是无法入学的，教会为她们办起了女校。下页下图中有一男一女两个洋人，房间里干净光亮，地上铺着一块石板，上书文字，像西方教堂常见的样子。女孩子们有的在做女红，有的在读书，脸上露出轻松愉快的表情。



男子学校所受的西方影响，从墙上挂的地图可以看出来



教会办的女子学校



北京南郊最早出现的赛马场，许多中国人也跑去观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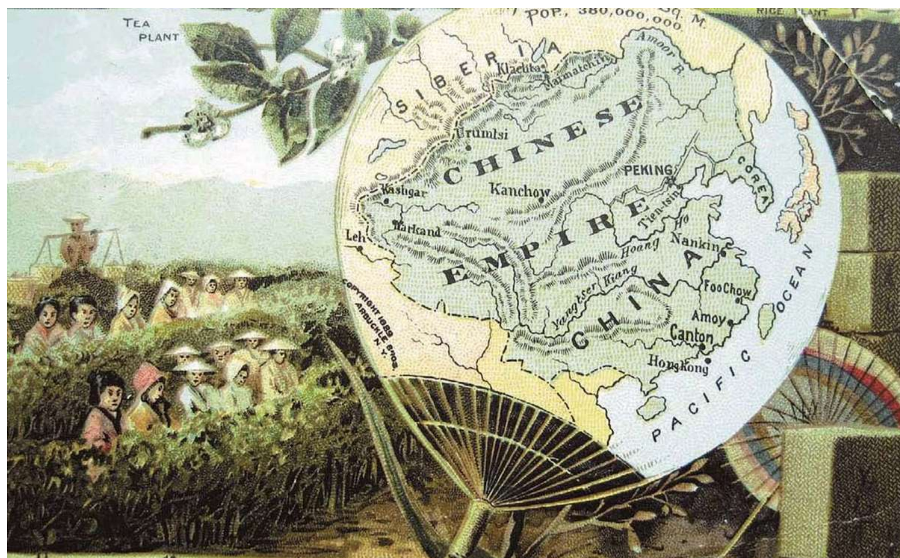
在北京郊外一块干涸的河滩边上，欧洲人修起了一座跑马场，这片地方叫望河楼，本属于皇帝的一座行宫，可以远远地看到西山。这里有一座塔，周围是清代宦官的墓地。马场周围环绕着农田，绿柳成荫，景致优美。19世纪中期，望河塔仍然保存完好。截至1867年，跑马比赛已举行

了四届。上面这幅图画表明，当日来参加跑马比赛的不但有外国使馆官员、他们的太太，还有清朝的一品大员。当天的天气非常好，这些外国人聚在一起很愉快，不过，最后还要抱怨一句，马场的地面太硬了，影响了赛马的成绩。

版画承担的一个任务，就是报道洋人们在北京的生活，满足西方的视觉向往，也吸引更多的人到东方探险。



19世纪下半叶北京的一大名人，是大清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爵士。他引入了英国的体制帮助大清管理海关，目的之一是用海关收入做担保借款，支付大清对列强的战争赔款



从17世纪起，西方人就开始大量进口中国的茶叶，并养成了喝茶的习惯。这是一张1889年美国纽约兄弟公司宣传中国进口茶叶的小画片。小竹扇上有一个信息引起我的注意，它指明中国当时的土地面积约为45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有3亿8千万，中华帝国的面积覆盖了从蒙古到南方广阔的地区



在一个驻华使节的厨房里，不但有他从西方带来的管家、女佣，还有中国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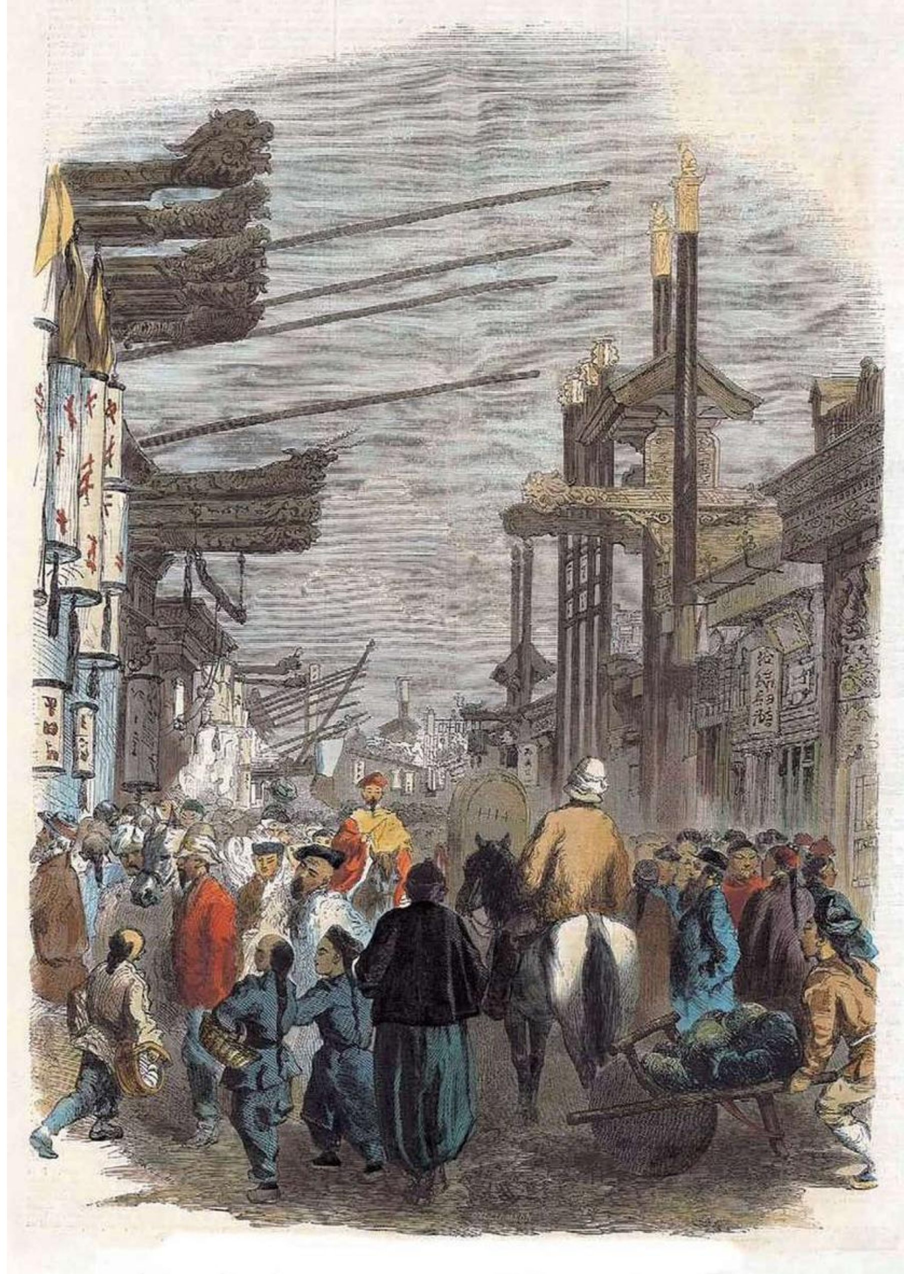
洋人在采购瓷器，这是他们的最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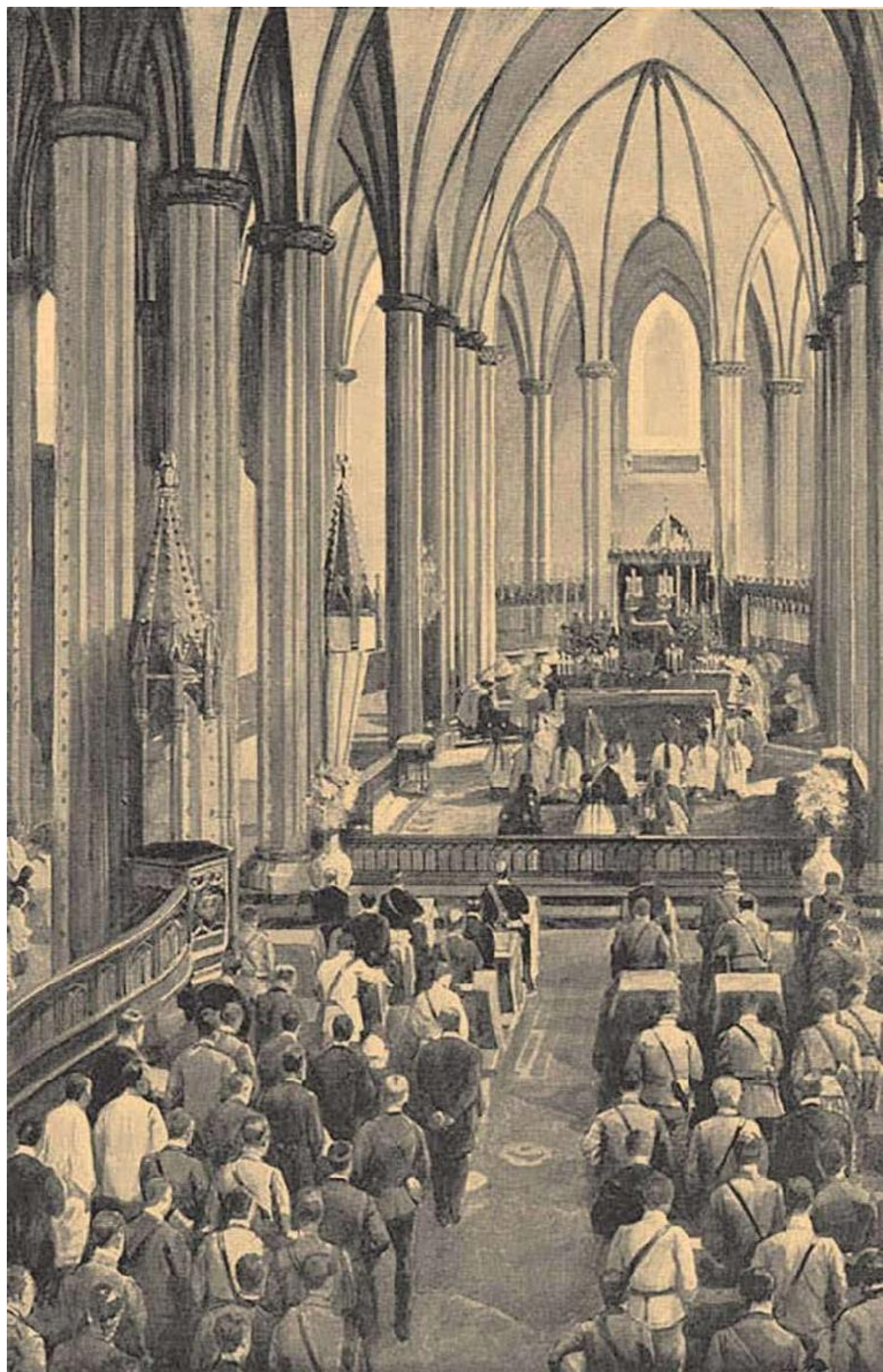
此图注明是北京下午茶时间。喝茶的房间是中式的，但服务与享用的方式是西式的



在北京街头遇到洋人，已是司空见惯。图中景象发生在繁忙的街市。杂货摊上有卖竹编器的，有推车卖菜的，路边有鞋铺，洋人正当街讨价还价。正面骑马的洋人，正和他的朋友握手，挡住了后面两位骑马的大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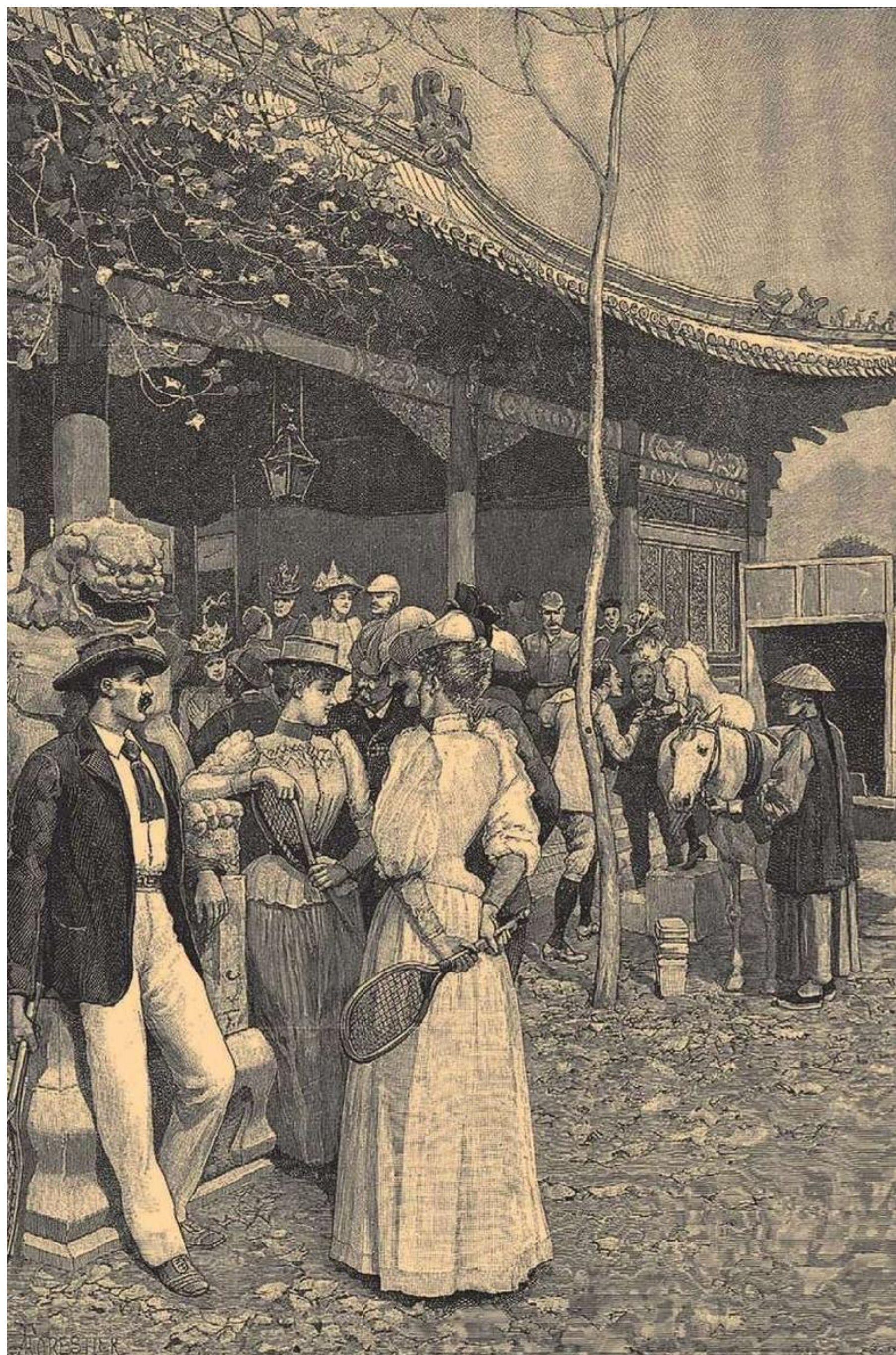
这张图上，人群熙熙攘攘，从路边伸出的龙头梁和招幌，可知这是一条高档的商业街。大胡子、小胡子洋人都在徒步逛街，挤在穿着羊皮大氅的富人与提篮子的小孩子中间。迎面对行的是一中一洋，好似特意象征着东西方在这里的相遇



这是北京西什库教堂的内景。这座教堂的前身是康熙赏赐给法国传教士的蚕池口天主教堂，1888年搬到了西什库。教堂外景的版画很多，内景

却极为少见，可以看到中国信徒也在此一起祈祷。这座教堂至今仍开放，一百多年了，内景没变，只是前来祷告的信众，已不是此图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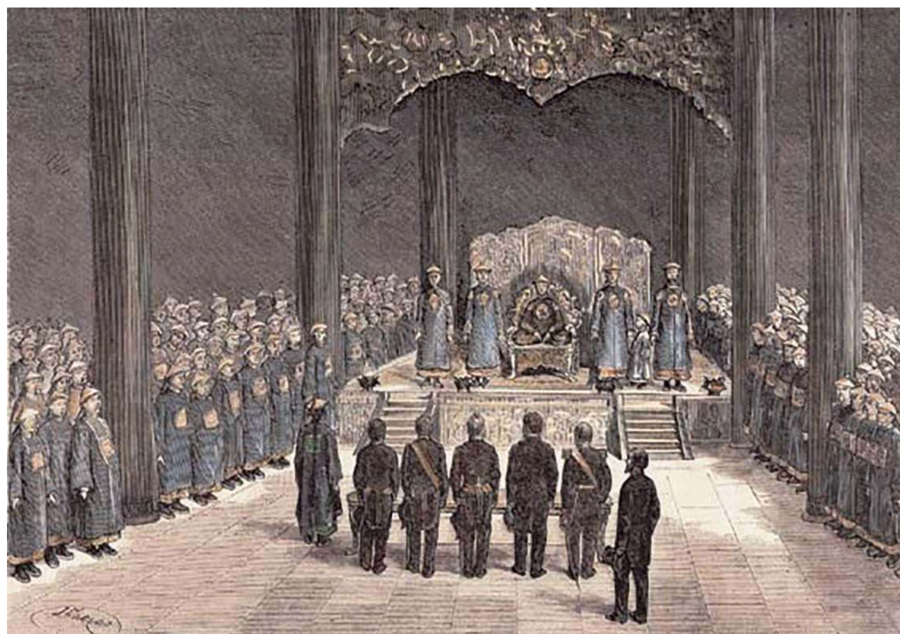
这并不是京城第一次对外开放，却是第一次开放得五彩斑斓。20世纪末，除了正义路一带灰砖红瓦的小洋楼建筑，当年的热闹早就随风而散。



北京英国使馆门前一景。一帮老外准备出发打网球，他们完全保持了西式的装束，在中式宅门与石狮子的衬托下，优雅高贵

三、末代皇朝落日余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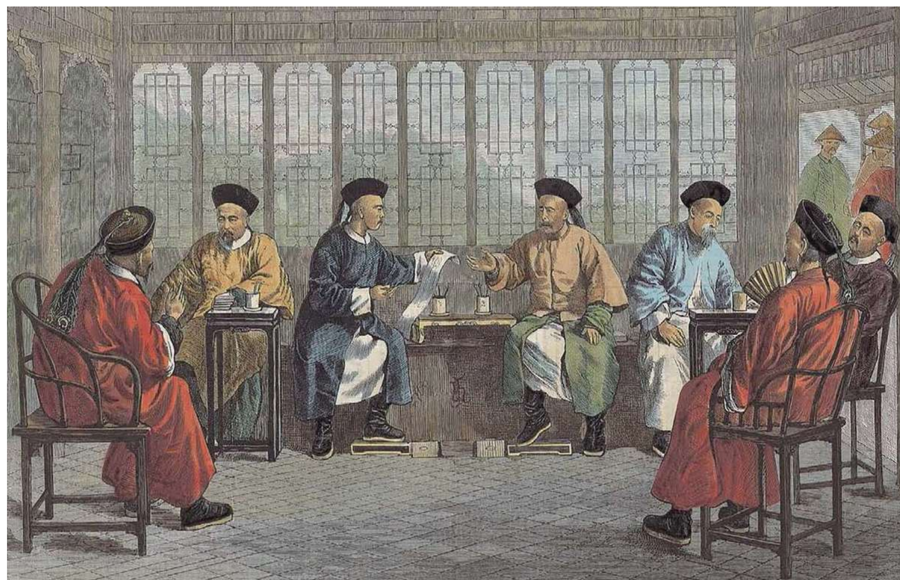
大清晚期，西方版画中的皇上，再也见不到康熙、乾隆的威严。画笔下的敬畏之心，早已荡然无存，宫廷的那点神秘感，也烟消云散。原来外国人是与地方官冲突，现在都成了与京城皇权的直接对抗。专权的慈禧太后、窝囊的光绪皇帝、掌握外交和军事大权的洋务派首领，及朝廷几任总理衙门军机大臣，都在版画中反复出现。文化交流，提升了大清宫廷政治在西方的透明度。在西人眼中，媒体曝光很重要，当时英国的首相、大臣、爵爷、统帅，包括维多利亚女王，都是画报新闻的常客，就如同今天英、美竞选时政客在网上的出镜。大清官员的形象曝光率极低，在国内等于零，要看就得出国去。



19世纪80年代皇帝的一次外事活动

同治朝的军机大臣，是1872年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奕□、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人（见下图）。在那个动荡多变的年代，这些人

被历史激流推到与洋夷打交道的风口浪尖上，其中许多人代表着与朝廷主流传统不同的“新派”，推动了同治时期洋务运动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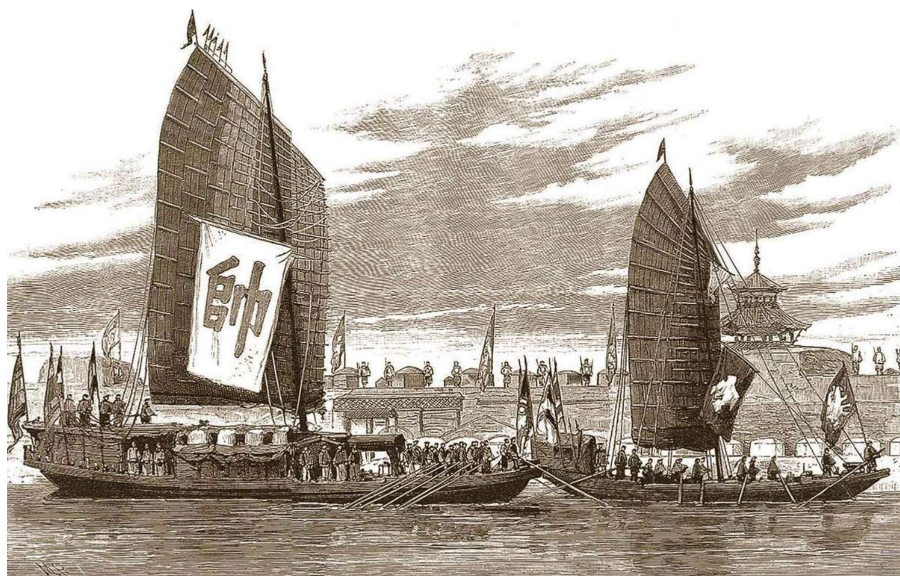


同治朝军机大臣在军机处

与200年前英使觐见乾隆时的情景相比，在北京趾高气扬的外交官们，再不必为向皇帝磕头而苦恼，连屈膝礼也免了，浅浅的一个鞠躬，就是他们对羸弱落后的清王朝最后的一点恭敬。上图记录的是法国人的一次宫廷会见。他们刚刚在越南和清军打了一仗，迫使朝廷承认那个国家今后是法国的宗属国。面对着一排法国人咄咄逼人地向龙椅走过来，清政府决定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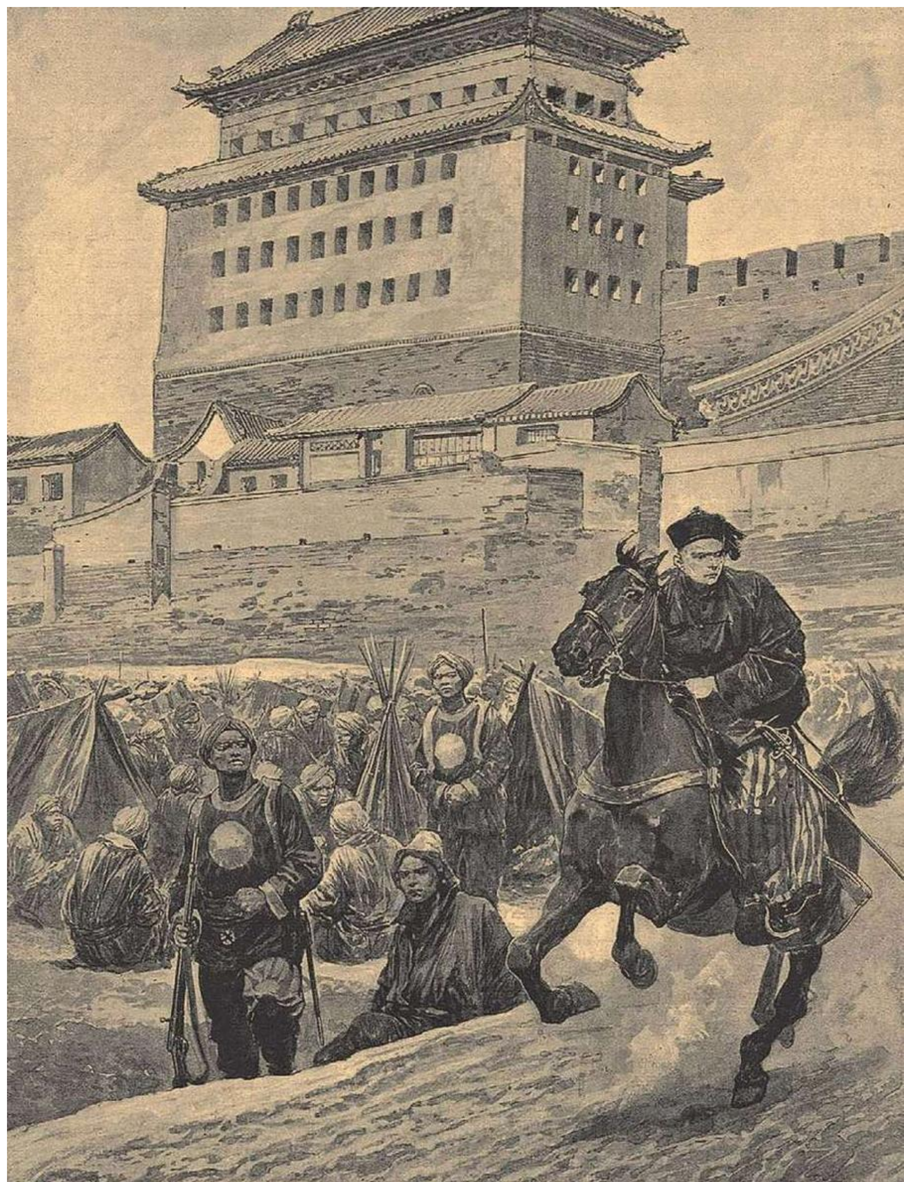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三员大将，从左至右分别为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醇亲王奕（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爷爷）和北洋大臣李鸿章。醇亲王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恭亲王的弟弟，后来帮助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整颐和园，就是他干的好事。这张版画明显是照片复制品，但一点不比照片效果差



李鸿章的总理旗舰。相信这是西方人的揶揄，嘲弄大清千年踏步不前

前面这幅版画是1894年即甲午年在英国见报的，当年的日本人看到如此英武的海军统领，会不会倒吸了一口凉气？年中发生了甲午海战，三位大臣还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在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清军的北洋舰队损失惨重，但主力尚存，如重整旗鼓，仍可再战。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派系的实力，将心爱的几艘战舰深藏避战，从此再未派上用场。1895年3月，海军衙门在成立十年之际被裁撤，清政府海上防守的策略化为泡影。4月，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生活在20世纪初的国人，都认为李鸿章是误国罪人，他代表清政府与日本人签订的《马关条约》及后来与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他的名字永远和民族的耻辱连在了一起。但是看看他当年乘坐的总理旗舰，与二千年前诸葛亮借箭的草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哪里抵得过西方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战舰？为挽救大清将亡的国运，李鸿章也算是鞠躬尽瘁，奈何国无实力，回天乏术。李鸿章70寿辰时，慈禧太后曾亲书寿联“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他死后，大清政府称誉他，列强各国也给予了他高度的赞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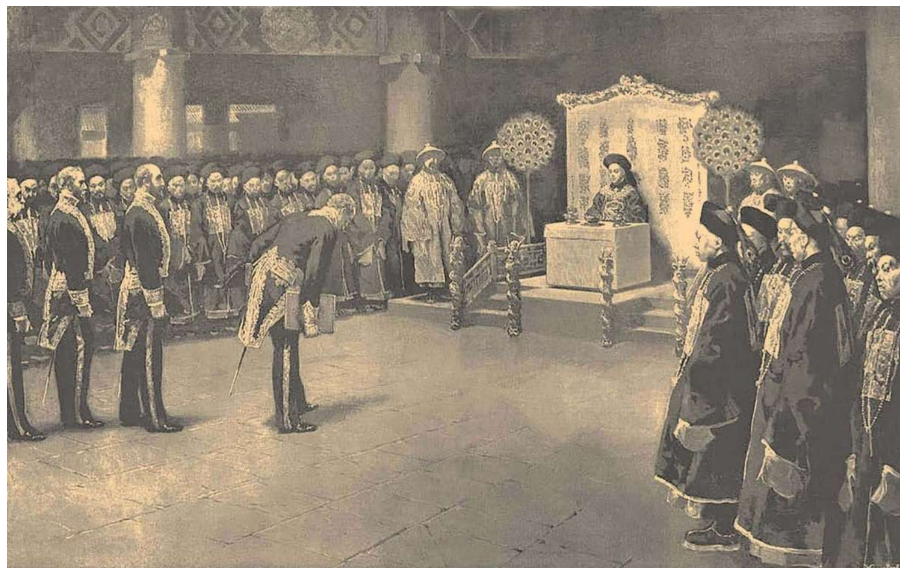


甲午战争爆发后北京街头的景象。可以感受到京城民众的愤怒，但马上的勇猛派不上用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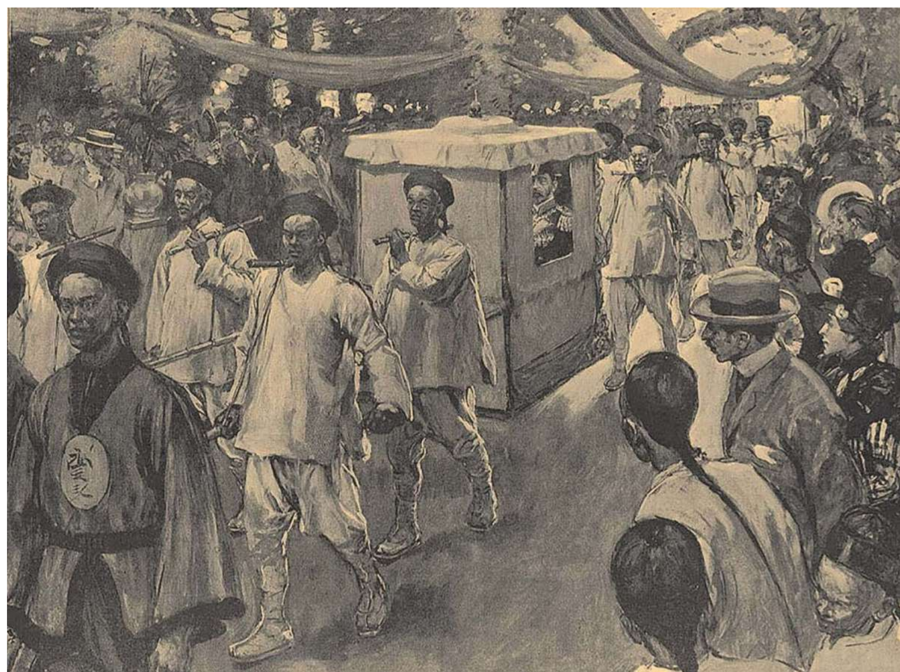


1895年北京郊区村民与洋人对峙的一幕。几个洋人在清兵的护送下，要从此村借道。尽管朝廷与清兵已被洋人打得颜面扫地，但这个小村的村民可不怕洋人，借路也没那么容易。他们把几匹高头大马团团围住，一定要给洋人点儿颜色看看。直到清兵拿出了洋人的护照与过境文书，村民才放行，也算为老百姓出了口气

1894年是慈禧60岁的生日。用中国台湾已故作家高阳先生的话说，从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独子夭折，到1884年中法战争，再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老天就是不让慈禧过一个称心如意的生日。在一片丧权辱国的愁云惨雾下，举国欢庆是不能的了，颐和园也不敢去了，慈禧只好在宫里摆摆场面。外国使节也看到这是个机会，为一己私利继续向大清皇帝施压。结果就是朝廷做出让步，请列强代表到紫禁城见皇帝。先不说能达到什么目的，列强能够堂而皇之地蹬着锃亮的马靴踏入紫禁城，已使朝廷失尽了颜面。更愚蠢的是，皇帝还允许西方人一起来，让强盗们成群结伙，在瓜分中国时利益均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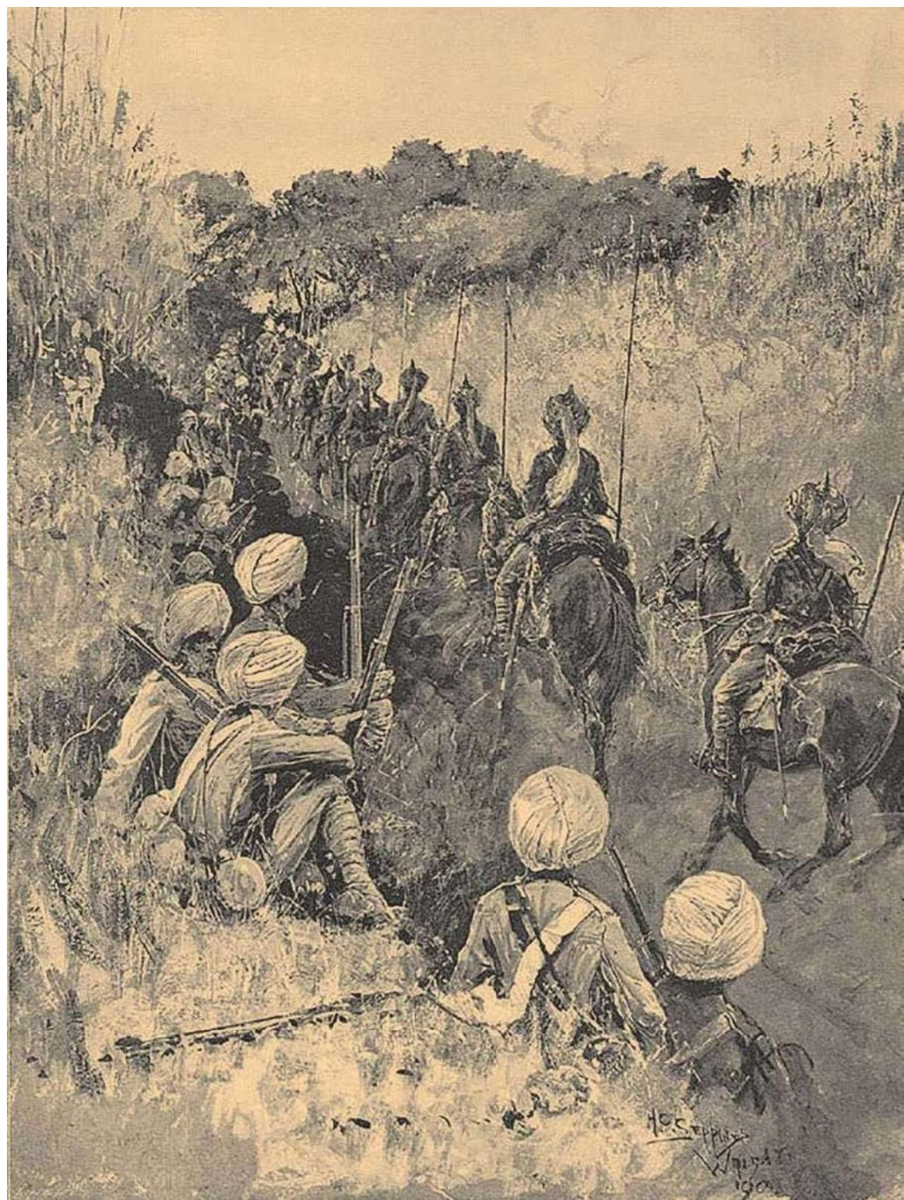
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宫中接见外国使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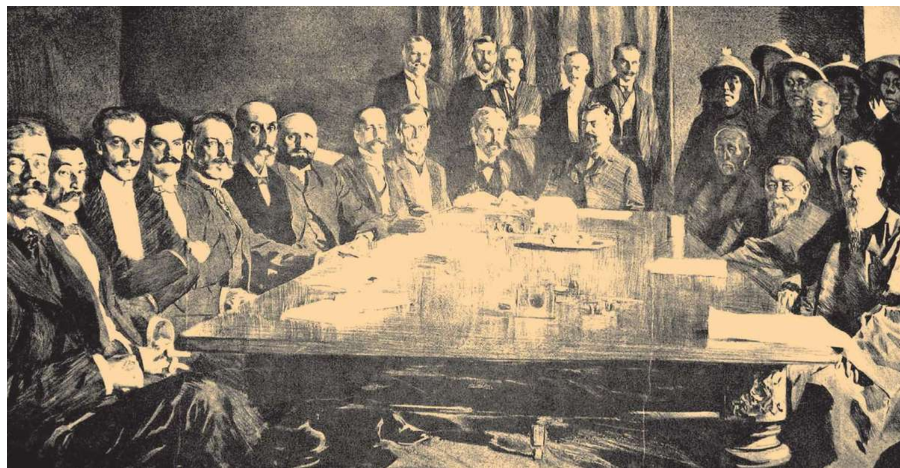
1898年普鲁士王子亨利来朝，坐着简陋的轿子进城，慈禧在紫禁城接见了他



清朝的统治者们对洋人既惧怕，又千方百计地巴结；而自己的统治明明已是千疮百孔，还偏偏喜欢摆谱，自欺欺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慈禧和光绪皇帝接见外国使节。光绪和前几年相比又年长了几岁，阅历也丰富了几分，但是他再也没有自由独自接见外国使节了



英国的印度雇佣兵是八国联军中的一支，正在向北京进发，最先突破崇文门城墙边的水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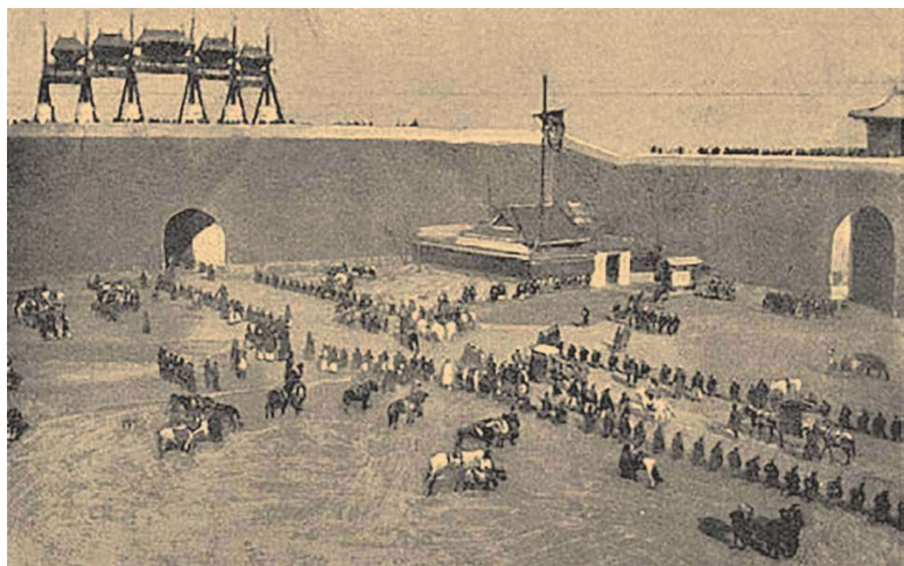


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把前门楼子给轰塌了，逼着朝廷又签了一份卖国条约，强盗反而获得了4.5亿两白银的赔偿。《辛丑条约》是20世纪初大清签订的第一份卖国条约，也是对“老佛爷”向西方列强开战的惩罚。签约后，李鸿章、奕劻与各列强代表合影。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一个曾拥有最强国力、人口为世界之最的强国，从此被列强联手瓜分。坐在右手边的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不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步入穷途末路的象征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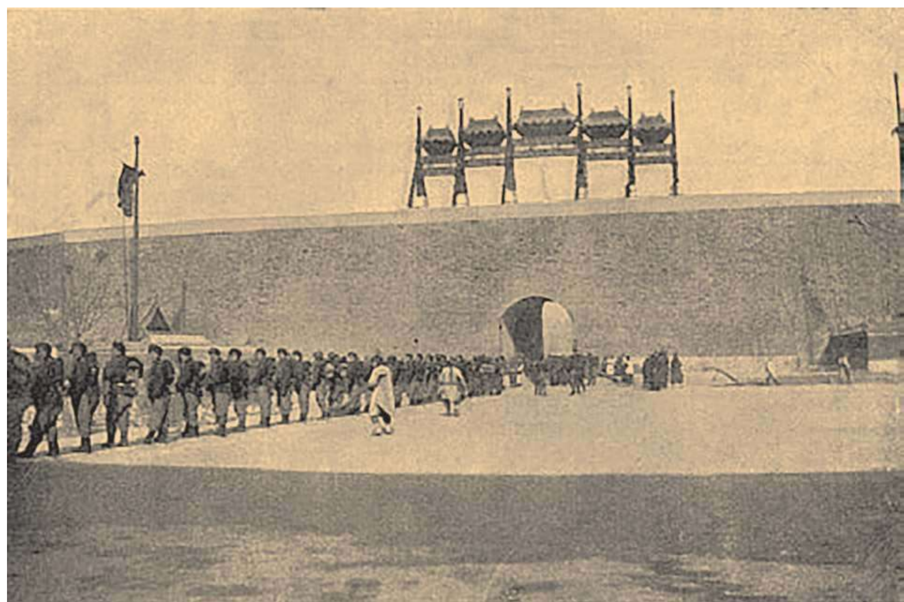
1902年1月，风雪过后的北京天寒地冻。在西安流亡一年多的慈禧，在李鸿章与列强签过协议后，终于可以动身返京了。站在炸平前门楼子的城墙上，外国人居高临下，观看皇帝和太后进京的队伍，还拍了许多照片。



流亡回京的慈禧、光绪一行走进大清门。英国画报上登出了当日天安门前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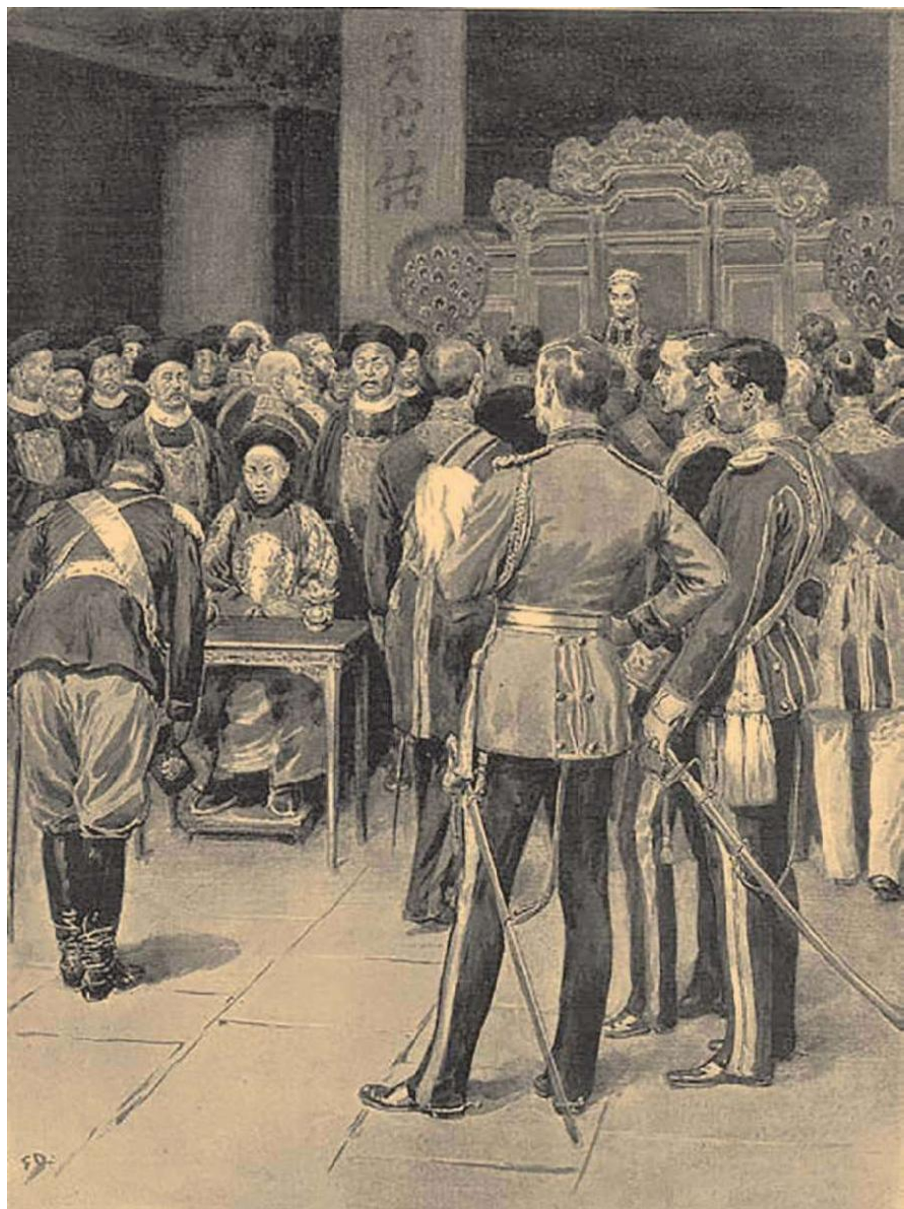
从前门五牌楼看过去，前门楼子完全塌了，在内城墙基上，用彩纸临时搭了一个怪异的牌楼，孤零零地立在上面

上面的这五张图，仔细看看，它们不是版画，是第一次出现的照片印刷品。但是有些人物，又不像是照片实景，特别是在前排总是直对着镜头的那些人。无疑，他们是印制照片时加上的版画人物。与光绪皇帝的大轿进入京城相比，可以看出差别。

那时的皇帝在西方人眼中还是比较开明的，是革新派的代表。也正是由于外国使节的压力，才使慈禧有所顾忌，没有早下手将光绪除掉了之。面对着这样一群立马横刀的强盗，一个唯唯诺诺的皇帝，一个颐指气使的专横老佛爷，加上一堆目光短浅的王公大臣，等待着他们的只能是灭顶之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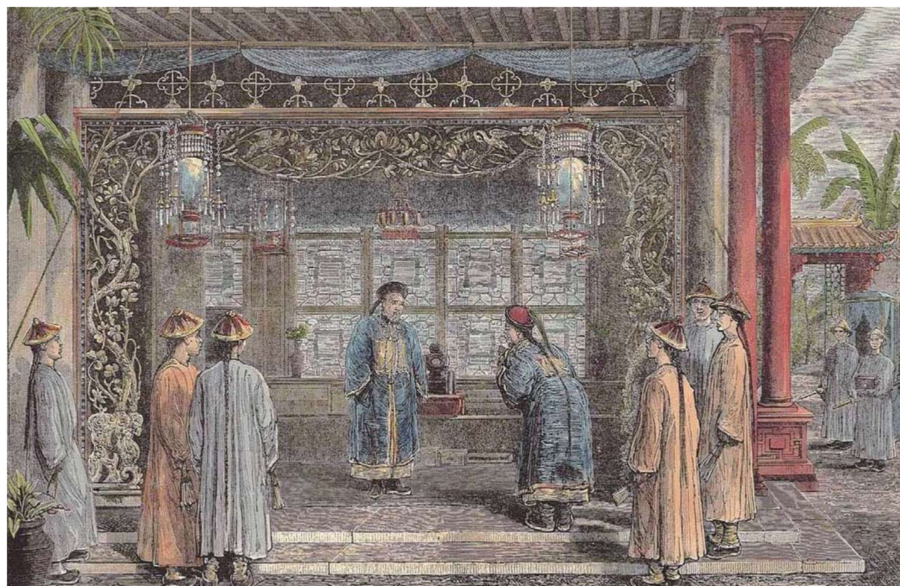
只有8人抬的大轿进京，里面抬的是流亡回京的皇帝，旁边下跪的是全副武装的清兵



这是1902年1月28日慈禧和光绪皇帝在紫禁城接见各国使节的场景。慈禧坐在象征皇权的宝座上，而光绪皇帝只是屈居下位，面前的条案不如一张八仙桌。外国使节上前向皇帝鞠躬，但是谁手握实权不是一目了然吗？许多书籍和电视剧中都描述过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淫威下的窘况。此图登在当年报纸上，皇帝的窝囊相，比史书记载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五章 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雕花的门罩，厅堂的隔扇，悬珠吊灯，中式的梁柱，美轮美奂，还有屋檐下卷起的幕布，这里就像是刻意布置的舞台一样迷人。正面站着一位大员，腰杆挺直，朝服胸前带着补子；对面的一位，腰弯了３０度，头上帽子的顶戴看不清楚，但带着花翎羽毛，朝服背后也带着补子，可见官位也不低。他的身后站着三位随员，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柄扇子。这场景可能发生在哪儿呢？大概不是在戏场，也许就在总理衙门前

一、市井老街上打个招呼

想象一下你生活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可能是在伦敦新建的大公

寓里，也可能是在任何一个乡村的庄园。每个周末的早晨，有一份报纸，叫作《伦敦新闻画报》，或是叫《画刊》，就会送到你的家门口。坐在早餐桌边，你可以浏览最近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不但有文字报道，还有生动形象的现场实景描绘。前面的几页，是伦敦海德公园里阿尔伯特亲王纪念亭刚刚对外开放的消息，再翻几页，看到了新当选的首相、自由党的领袖格莱斯顿的画像。画报的插页，有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大幅套色彩印，喜欢就可以拿来贴在墙上。还有最新的肥皂广告，画面是一位小姐，她姣好的面容，靠的是肥皂的清洗保养。巴黎最新流行的服装也按季出现在新闻里，刚刚攒了点钱的中产市民，正小心算计着如何追逐法国的时尚。

亚洲、非洲、拉美的新闻，政治换届、金融市场、军事战争、世风人情，轮番被画报报道。在几个特定的年份，不出所料，关于中国、关于北京的报道一定会上头版头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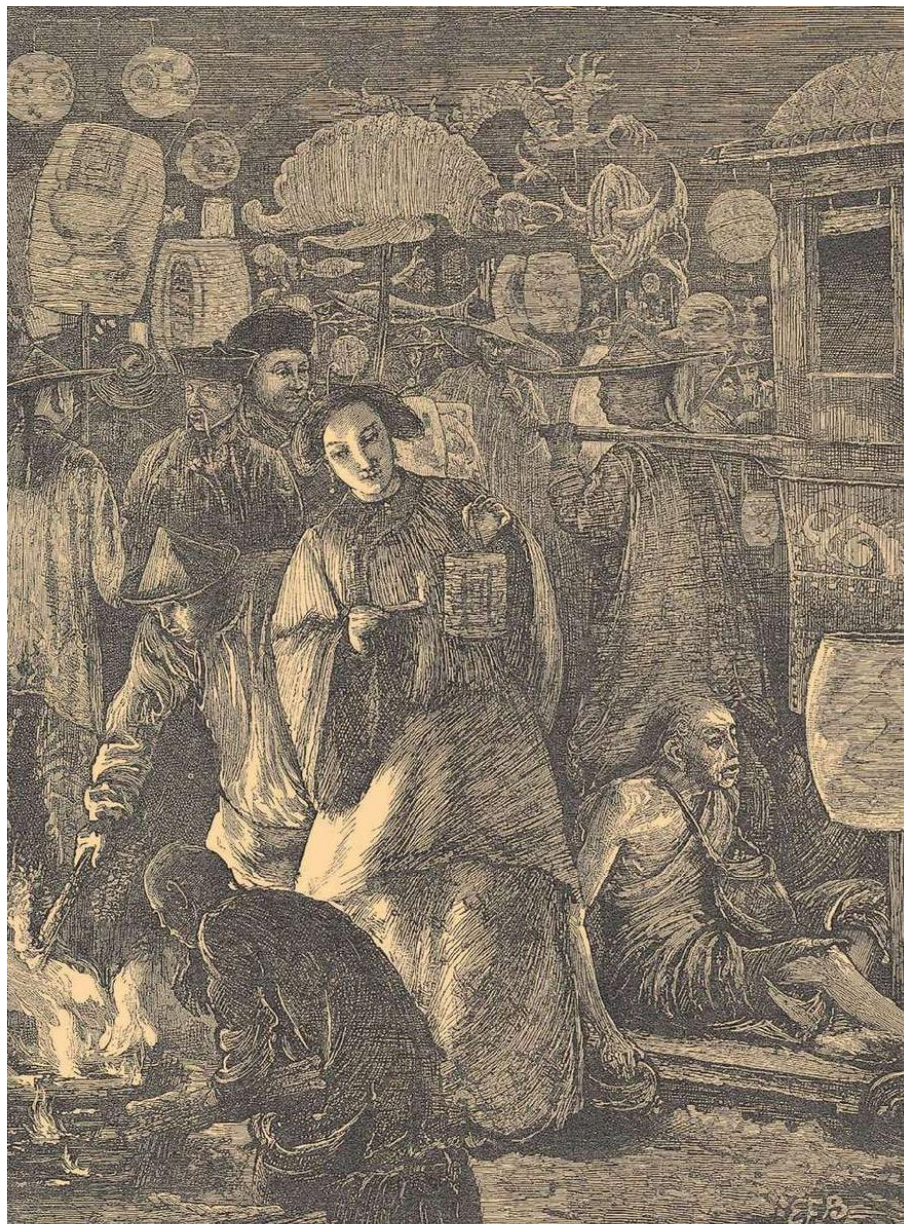
近年已经有人把《伦敦新闻画报》60年来有关中国的报道与版画整理成册出版。这个工作量，我知道可不小。20年前，在一间经营了三代人的古书店，我问老板，有没有关于中国的版画？他愣一愣神，说，有哇，在地下藏书室，你可以自己去翻哪。15年前，我再问同样的问题，老板说，看看这一大摞，我已经帮你都裁出来整理好啦。10年前，听到同样问题的人，给出一脸抱歉，哎呀呀，所有的京城版画都被香港那边的书商收拾走啦，随出随要哇。5年前，我都不愿意问了，因为答案基本上是一样的，就这几张，没有了。一看价钱，得，我也不想要了。

我感兴趣的是上不了头版头条的豆腐块，它们是京城大爷婶子们的家长里短，老人孩子的自娱自乐，小民的吃喝住行。这一节，我们先在街头巷尾转转，见识一下地地道道的帝都北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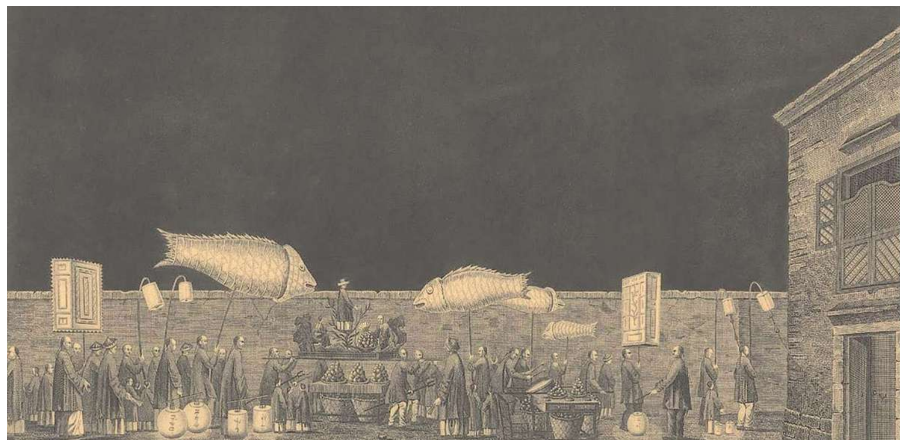
图题为大宅门前偶遇的一幕。不止是大官出门进门讲究礼数，京城四合院内外应当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面。有身份人家的院子，总是有几进，每进院都有不同功能，来人进出，要懂得拜见的规矩。《红楼梦》有一回里说：皇上发下了加盖御宝的文书，荣国府里上上下下都紧张，“惟恐各诰命来往亏了礼数，怕人笑话”。有些客人只能在进门处候着，亲近点的才可以进二进院，低一级的官员要向高一级的官员行礼，并且要礼数周全。礼仪越繁复，说明主人的身份越重要。

初到北京的西方人常常不明白，“再见”为什么要连说三遍，客人才转身出门。“不要”“不要”“不要”，重复了三遍，最后可能还是恭敬不如从命。

北京的灯市从明代就很兴盛。按习俗，春节后正月十三至十七为灯节，十五为高潮。据《谈经》记载：“灯贾大小以几千计，灯本多寡以几万计……灯之贵重华美，人工天致，必极尘世所未有，时年所未经目者，大抵闽粤技巧，苏杭锦绣，洋海物料，选集而成。”从这些文学记载中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出灯品制作之精，烛月交辉之丽。根据当时西方人的描述，灯火最辉煌的地方是东四、东单到崇文门一带，男男女女都可以出街，活泼的女子自己燃灯寻乐，富家女子坐在香车粉轿中，挤路穿行。这张“灯节之夜”图（见右页图）上把奇形怪状的大灯笼、街头人挤人的气氛，描画得活灵活现。左下角火焰的着色耀眼，想见此时夜已深，人未散，即使坐在地上、衣衫不整的浪子，也还沉浸在观灯赏光的喜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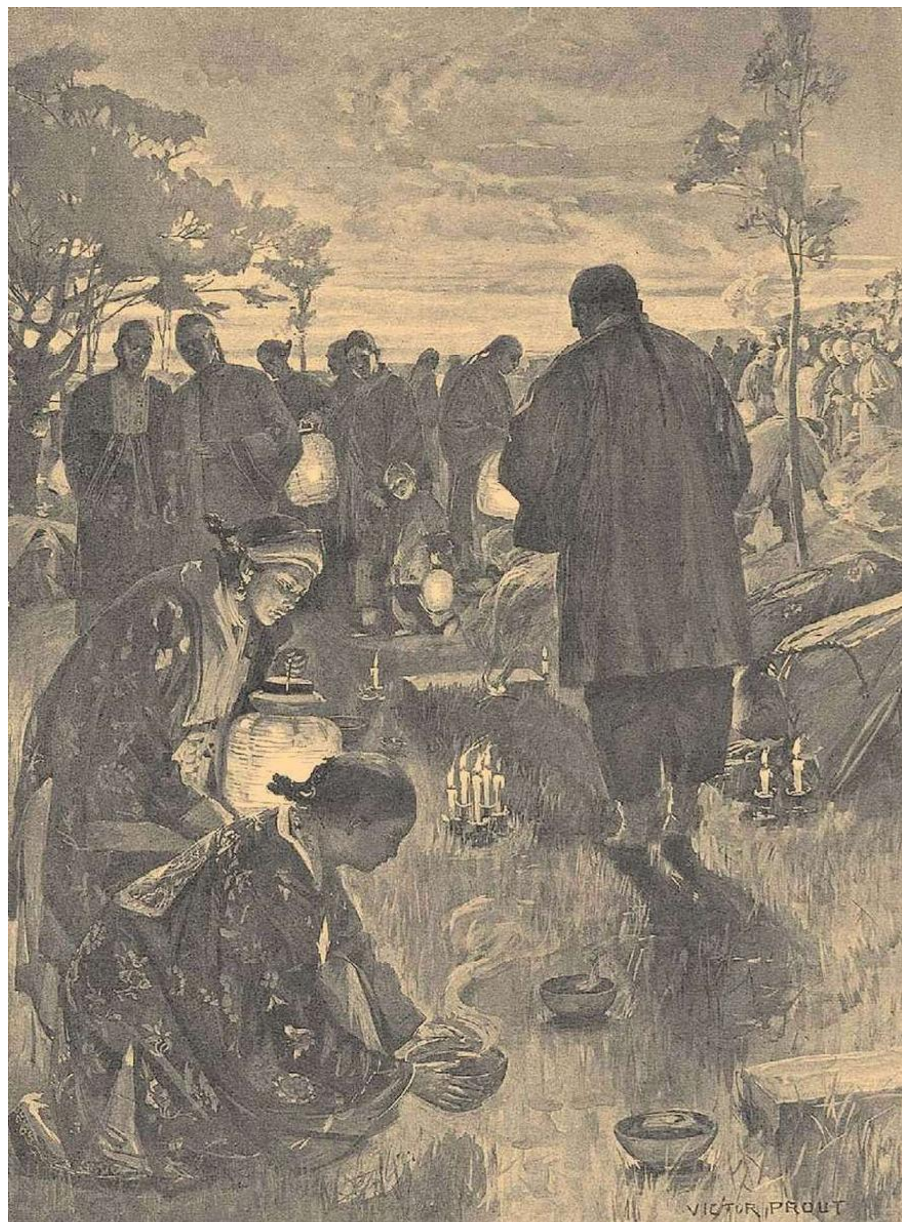
灯节之夜人头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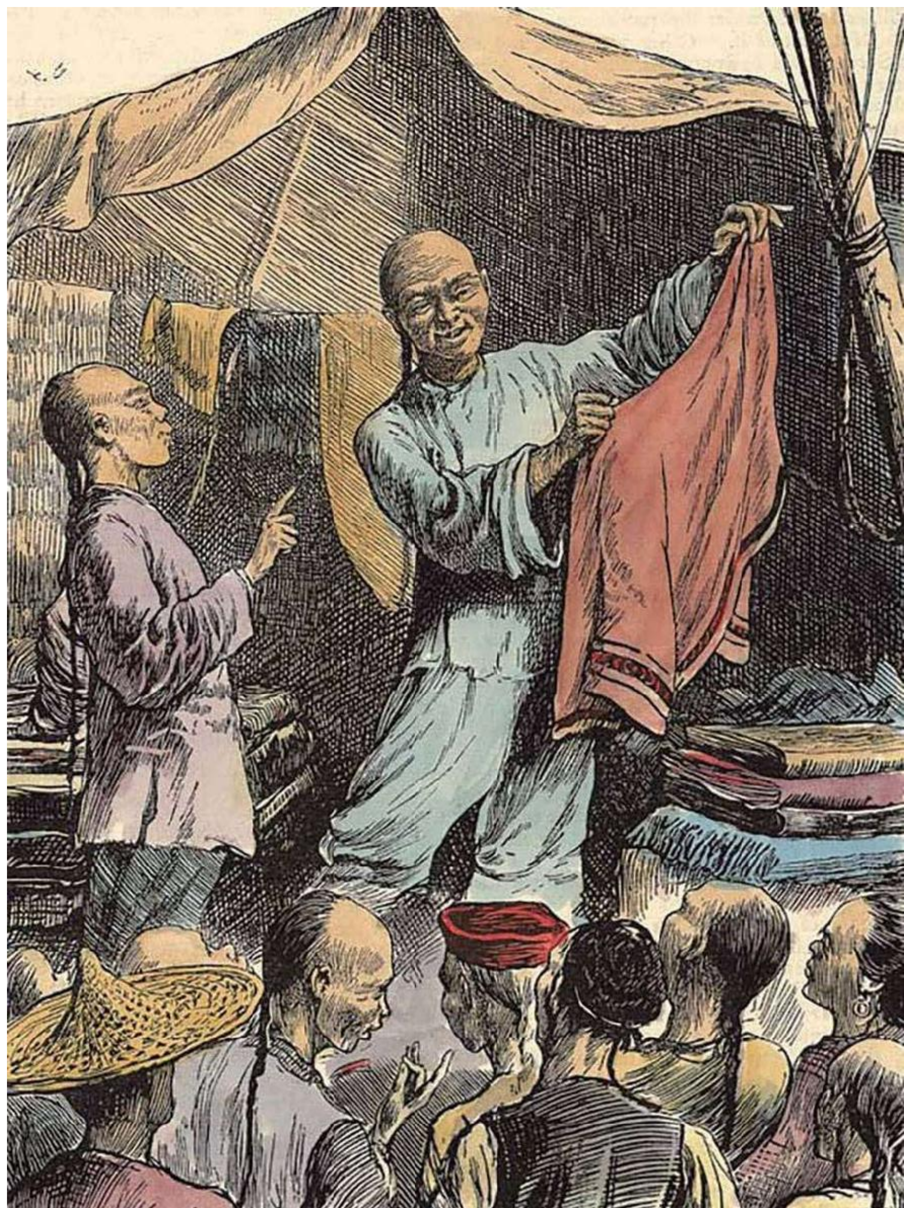
月夜天高任鱼跃

19世纪初法国人金涅画的灯节（右页上图），画风和第二章第四节的那些版画一样，带着夸张，但又说不出故事。那一根杆子撑起来的大鱼灯，肥硕逼真，游荡在漆黑的夜空。还有一人高的方形灯笼，像个大衣柜，真的假的，只能由着金涅的画笔，恣意膨胀着我们的想象。我的解释是，灯节的夜晚，把鱼灯笼做得硕大无比，光亮十足，为的是日子红火，年年有余。

随后的一张我原以为是清明节祭祀的场面（右页下图）。祭祀祖先的坟墓，也会点起烛火。但这张图的场面不像是简单的祭祀。草地上来了许多人，他们提着灯笼，点上了蜡烛，好几只大碗放在地上，余烟清渺。人们在下跪磕头。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庄重的集体行为，似乎全村人都出动了。



全村人都来了



当铺街头拍卖



女子找人算命解忧

当时北京的当铺很多，投资者不少是王公贵族，来典当的大部分是八旗子弟。满清的八旗子弟可以从朝廷领到钱粮关饷，但他们总是月初大手大脚，月末则靠典当生活。穷人也常靠当铺接济不虞之需，他们既无珠宝，又无古董，只有几件衣服，想着等事成之后，手头周转开了，再把

衣服赎回来。但大多是到了日子仍旧没钱，衣物就被当铺的伙计当街吆喝着给卖掉了。

中国人讲究运相命相，遇事喜欢找人算算，据说颇为灵验。现代人可以批判这是封建迷信，但想想当时既没有今天的通信工具，又没有心理医生，有了想法能找个算命先生卜上一卦，也是减压的一种方式吧。上图中的女子衣着体面，浓眉大眼，头发梳得像江南的大家闺秀，脸上略带期盼。不知她是为自己，还是为远方的娘家人算命解忧。



清兵当街练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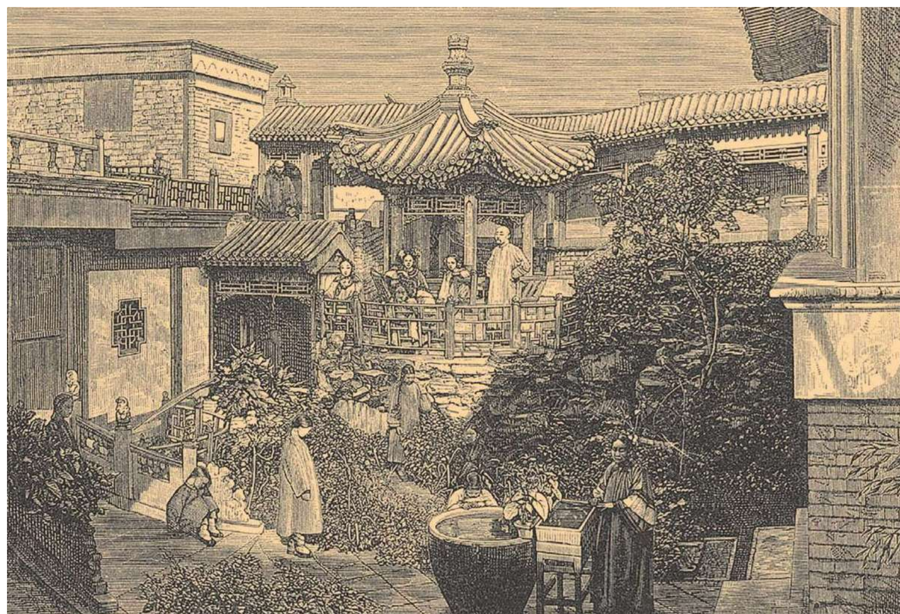
聚众飙骑的小痞子

按照清朝的规定，旗人绝对不许经商，只许挑差当兵。据说东安市场原址就是一处练兵营，常可以见到清兵当街练箭。尽管当时世界早已进入热兵器时代，八旗兵勇崇尚的还是祖宗传承下来的习武传统。箭如果射得好，可以在军队中得到更快的提拔。此图（左页上图）中的人穿着考究，每个人都一脸的认真。拉弓的人姿势英俊潇洒，引来一班人观看。写生的西方人一定觉得暗自好笑：这样训练出的清兵在洋枪洋炮前派得上什么用场？

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后，西方外交官常驻北京，西方文化影响日盛。城里年轻人最时髦的事，就是像西方人一样骑马取乐，特别是那些八旗子弟，闲来就在城中聚众飙骑，辫子向后扬起，马蹄卷起漫天黄土，行人避之不及。这种张扬的消遣成了年轻人的时髦标志，他们嘴里叼的也不再是传统的大烟袋，而是洋烟卷。

下图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似乎以照片为底而作，是一官员的内院，里

面有仿江南美景建造的庭院。



一处大宅院的内景



临街的作坊



街头出大殡的队伍

此图（《临街的作坊》），似乎也以照片为底，但看人物的位置，版画加工的痕迹明显。这是北京的一处瓷器小作坊。当年的烧窑制瓷不在北京，这些人做的是描彩精加工。

北京对逝者移棺入葬的讲究极多。根据逝者的身份地位、家庭状况不同，出殡规则均有区别。送葬队伍中烧活多、杠数多、卤簿（仪仗队）多，可以肯定是王公显贵人家出大殡。“神父版画”风行以来，出殡图一直是个热门画题，主要是几十人、几百人的仪仗，吹吹打打，哭闹声响彻一条街，太让旁观者震撼。西方人丧事从简，死后的一切要听从主的召唤和裁决，中国人却风行活人决定死者的“前程”，并“福荫”后代的命运。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驾崩，留下了出殡的照片，预示着国运的转折。左页下图中这家大户的出殡，若是家中的顶梁柱去了，不知一家子还能否延续旧时节的风光。

满族人打入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代皇上发了谕旨，要所有大明的遗民“皆

着剃发”，是为剃发令。那时的发型并不是我们后来习惯看到的阴阳头大辫子，而是将头颅四周的头发都剃掉，只留头顶如铜钱大小的一点头发，结个可怜的老鼠尾巴。1647年广州剃发易服令里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新令刺激男人街头斗殴，互抓小辫子，阿Q和小D在鲁镇就这样僵持过半个钟头。雅政其实真的不雅观。下图是清初两位互不服输的小痞子，金钱鼠尾成了出气的把柄，撕咬得血流满面。劝架的人惊得不知所措，小辫子都横飞起来。



“金钱鼠尾”当街斗殴，抓住小辫子，暴戾残忍





剃发大街市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是子民归顺新皇朝、保住性命的通行证。只洗脑表忠心是不够的，通行证不能揣在兜里，而必须顶在头上。刊行于1880年德文报纸上的这张版画，显示有些人的通行证还是“金钱鼠尾”，有些人已经改为“阴阳头”，辫子从老鼠尾巴变成了一条粗粗长长的黑蛇。理发匠一个人担个剃头挑子，走街串巷，是当年可以万众创业的行当。一帮理发匠聚在一起的，叫“剃头棚子”，有时有点，聚个热闹，也比比谁的手艺好，谁辫子编得漂亮。

说到头顶盘辫子，我忍不住想起张爱玲在《怨女》起首的一段文字，哑然失笑。邻家有一个木匠，盛暑天是这副打扮：

天热，把辫子盘在头顶上，短衫一路敞开到底，裸露着胸脯，带着把芭蕉扇，刮喇刮喇在衣衫下面扇着背脊……紧靠着墙走，在黑暗中忽然有一条长而凉的东西在他背上游下去，他直跳起来，第二次跳得更高，想把它抖掉，又扭过去拿扇子掸。他终于明白过来，是辫子滑落下来。

这个场景发生在上海，但也可能上演在北京盛夏的街头。昏黄烛光里一人独行街上，像黑蛇一样的东西，幽幽滑落在背上，惊得自己连连跳脚。张爱玲描写辫子捣鬼，真活灵活现。

二、花样繁多的自娱自乐

皇城满族的八旗子弟，是一批有身家无忧虑的“闲人”，聚在一起，想着法子找乐。民家玩不起高贵的物件，但也可以因陋就简，搞些“淘宝”一样的乐趣。几百年下来，形成了老北京的素情雅趣，有养鸟、玩鸽子、抖空竹、抓蝈蝈、斗蛐蛐、放风筝等等。满族人从关外带来的习俗，逐渐流进了京城的民风血脉。

这些玩乐，是当年的广场舞、唱红歌，画家不禁驻足观看，现场写生。

提笼遛鸟是京城胡同里的一景，至今城内外此风不衰。有些鸟养着是为了观赏，有些是为听它们悦耳的鸣叫。各人养的鸟不同，聚在一起，主人们就开始聊鸟，话音里透着对自己的宠物的骄傲。下图中蹲着的两个人在看蛐蛐罐，一人叼着长烟袋杆，指指点点。他们头上戴的像是官帽，腰间挂着荷包、玉器，看着就是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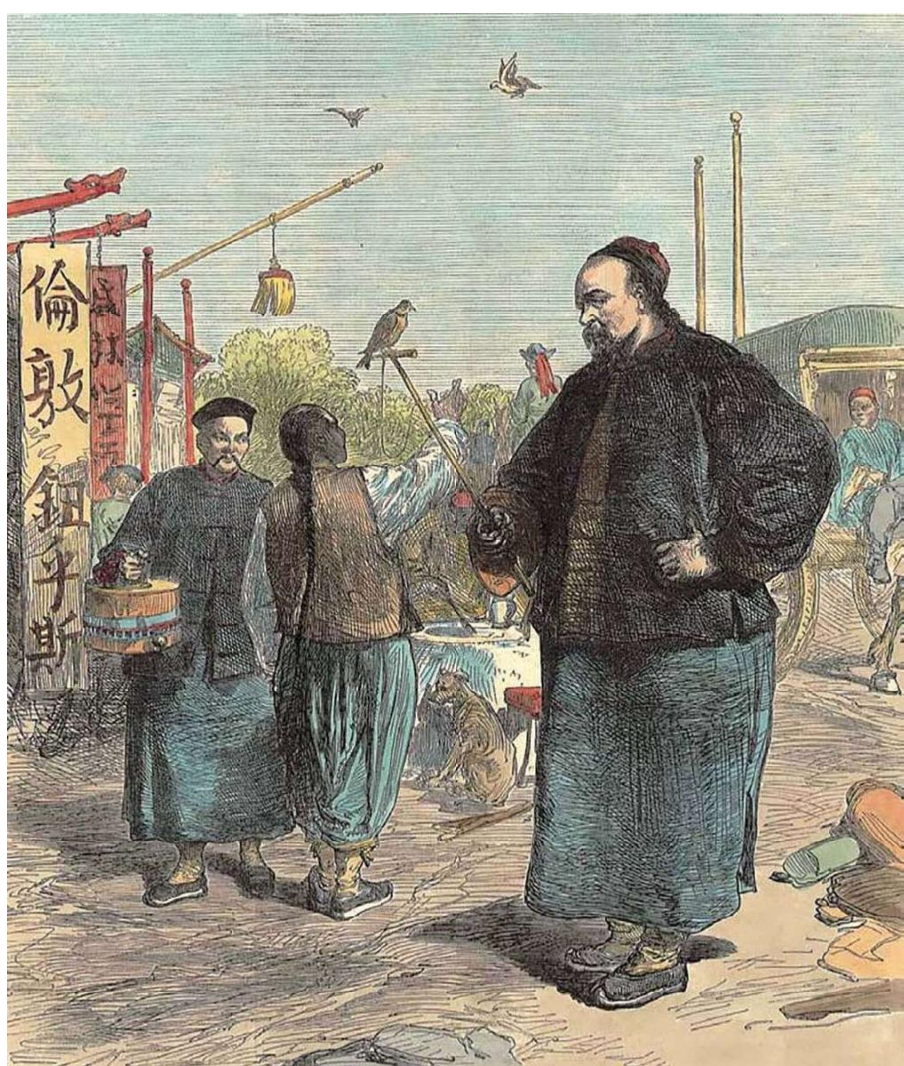


提笼遛鸟斗蛐蛐

训练猎鹰是游牧民族的拿手好戏，但熬鹰以至去掉它们的野性，对习惯于自由翱翔的雄鹰来说是件很残酷的事。训练有素的老鹰会与人终生为伴，它们是猎人的最佳搭档，“不见兔子不撒鹰”，一旦撒出去，不但是兔子，狐狸、黄羊甚至凶猛的狼，都逃不掉猎鹰的厉爪。下图中的人，或者是驯鹰猎人，他们已经放弃了训鹰打猎的生活，到京城来，是做猎鹰表演，也能有所进项。一鹰一人，同样透着雄性遒劲之美。



架鹰的猎手



架鸟逛街的大爷

除了提着笼子遛鸟外，带鸟出门的一件工具是一根绑着细绳的架子。据说这架子制作精致，在鸟落脚的地方用真丝线一圈圈地缠绕，然后用特制的胶多次涂刷，这样架子就变得无比结实，鸟儿站在上面不会打滑。上图中是鸟友的一处聚会地，但不知为何挂起了“伦敦钮乎斯”的幌子。这位大爷全神贯注在自己的鸟上，一副目无旁人的模样。

下图描绘的是童趣，我从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那里听到他小时候捉蜻蜓

的故事。蜻蜓喜欢在傍晚时的水塘边寻找美味的晚餐，这就为孩子们捉蜻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们在小绳的尽头绑上一小团棉花，在空中飞舞，蜻蜓不顾一切追逐这顿“美餐”，咬住了棉团就不松口，结果成了孩子们的战利品。此画只有一手机大小，湖边童心逐虫趣，跃然纸上。



小哥湖边跑着捉蜻蜓

孩子们冬日里的另一件乐趣是滑冰，不论是护城河还是一片水塘，都能给他们带来一段欢快的时光。旧日北京的水量很充盈，有护城河，几个海子，到处有小水潭。那时的冬天严寒漫长，冰冻三尺不足为奇。小伙伴们可能就在自己的后院找到了一片运动场，正滑得顺心得意呢，一不小心，这位小爷摔了个四脚朝天。



小爷冰上出洋相



谁家的蛐蛐最横？

还有一件孩子们喜欢的事儿是抓蛐蛐（或者蝈蝈）、斗蛐蛐。但能玩出花儿的还得是里道老手。当年抓蛐蛐斗蛐蛐的冠军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20世纪的文物界泰斗王世襄，却依据这一玩活做了一门惊世骇俗的大学问。其中描写抓蝈蝈的一段文字，让人读来如身临其境：“捉时左

手擎罩，右手戴手套，骤然掩之，受惊一蹿，正入罩中。此时我与蝈蝈，皆怦怦心动，只一喜一惊，大不相同耳。”



暖日下的对弈

抽着烟袋，晒着太阳，两人有一搭无一搭地在下棋。彼时象棋好像没有民国时期那么兴盛，桌上摆着的棋很简易。戴眼镜的老者若有所思，画家将他的影子淡淡画在墙上。对手看起来也是心事重重，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

说书也是民间常见的一项娱乐。下面这幅版画笔刻简洁，但生动地勾勒出说书人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神态及听书人如痴如迷、聚精会神的表情。说书人凭三寸不烂之舌，使成千上万没有文化的老百姓，通晓了自

己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并口口相传下来许多妙趣横生的民间故事。



当街说书的艺人

这个顶碗把式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包括许多外国人，头上顶着包头的是印度的锡克族，属于大英帝国在京城的驻军。表演者一人单足立地，头上顶起十只碗，另一人手中牵了只大狗熊。那时候北京郊区还有狗熊出没，民间艺人训练的狗熊表演深受市民喜爱。它们会钻火圈，爬木杠。特别是在主人收钱时，狗熊会双手作揖，鼻子里发出“哼哼”的声音，令

人忍俊不禁。我小时候在和平街新建的四层楼前，曾经看到过这类表演，也有顶碗、耍猴之类的把式。同类自编自演的街头小品，在欧洲城市旅游时，偶然还会在市中心的表演场地看到，但在京城，除了节庆，已难觅踪影了。



街头的杂耍艺人



戏曲表演班子



划旱船

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喜欢戏剧，喜丧场合都离不开艺人表演。本页上图中这五个人唱了一台戏，有说快板的，有拉单弦的，有敲鼓的，有吹唢呐的。但是艺人被视为最下等的阶层，尤其是这种跑江湖的街头艺人。

划旱船在中国北方是一种广为流传的民间表演。《日下旧闻考》中就提到北京每年春节期间都有划旱船的演出。这张画（见本页下图）笔道简洁，绘画者的功底却不简单。女人跷着三寸金莲，敲鼓的顺带耍狮子头，划船的老汉技在脚下，心无旁骛，这些动作入了画，绘出了划旱船的噱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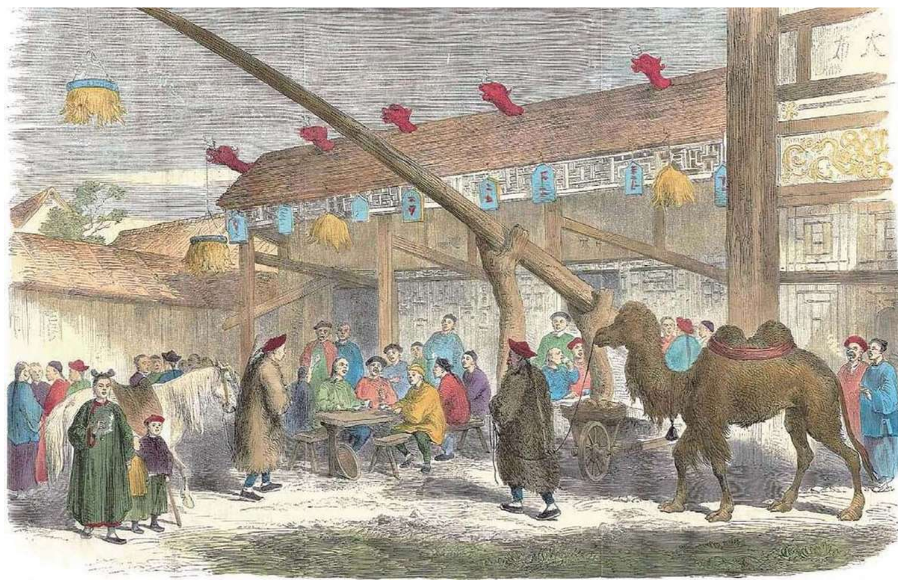



中国戏剧中的神话人物，长着一副怪异的西洋面孔，像古希腊的众神一样，首先通过版画进入了英语世界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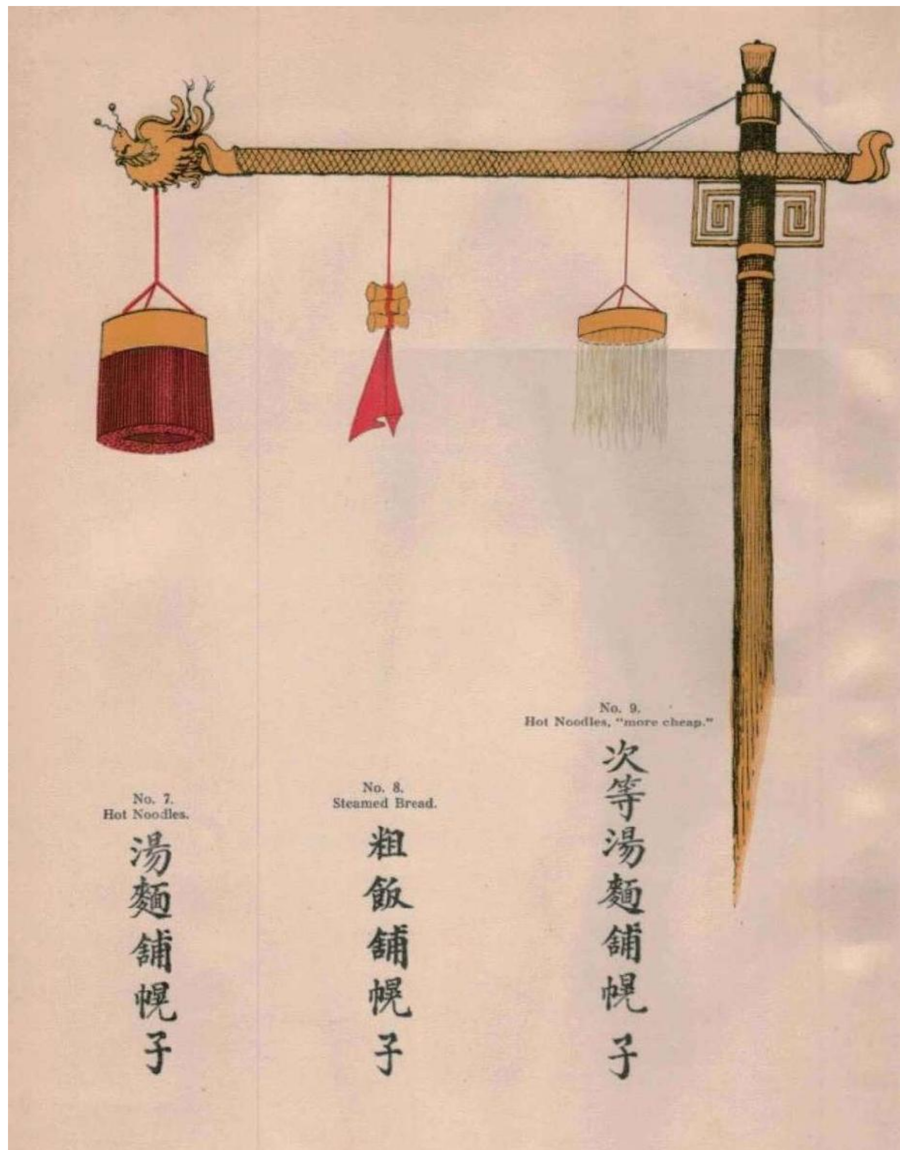
三、饮食一条街上的小门脸儿

20世纪50年代，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写了一出戏，名叫《茶馆》，将清末民初京城的饮食男女，生动地留在了艺术舞台上。19世纪，生活在北京的西方人用画笔也做过同样的事，京城街头吃喝的老少，生动地留在了纸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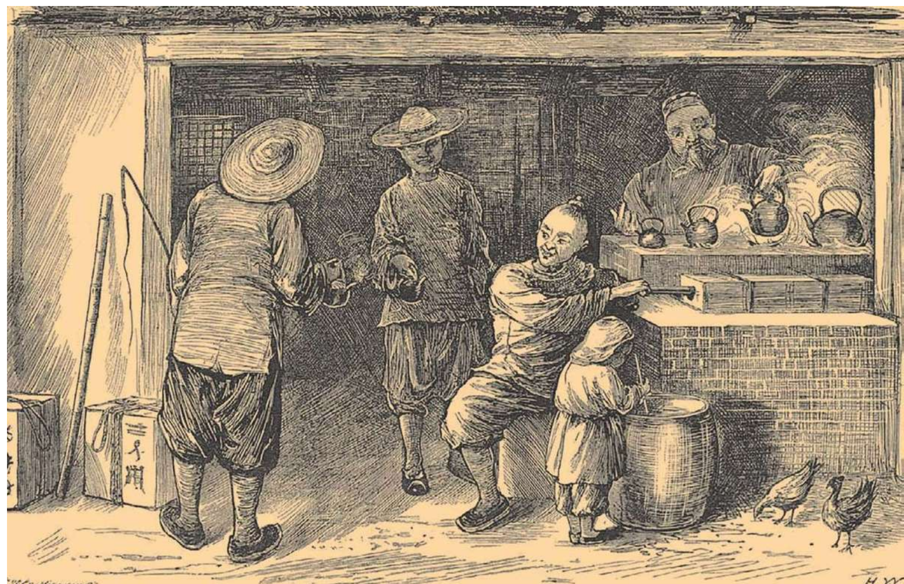
巴黎有坐在街上喝咖啡的游客，伦敦酒吧中挤满了豪饮啤酒的小市民，京城则有这样坐在半露天茶馆的大爷。伸出来的长杆子上，吊着一团黄布条，是茶馆的幌子，老远一眼就能看出来。20世纪英国人出了一本书，专门介绍京城商街各个行业的幌子，多至上百种。它们与招牌不一样，是属于本业主的，挂在门上。幌子是属于某个行业的标志，用长杆子伸出到街上，显眼招摇。现在留下来的，有红白两色走马灯似的理发馆幌子，沿袭老商家的都见不到了。茶馆前有一人身披大皮袄，牵着骆驼走过来，时间应已入冬。但天气显然并不寒冷，坐在长凳上品茶的人，谈笑正欢，有的正在观看来往的行人。



北京街头的茶馆



20世纪初京城饭铺的幌子，等级很明显，没钱的去次等汤面铺子，别走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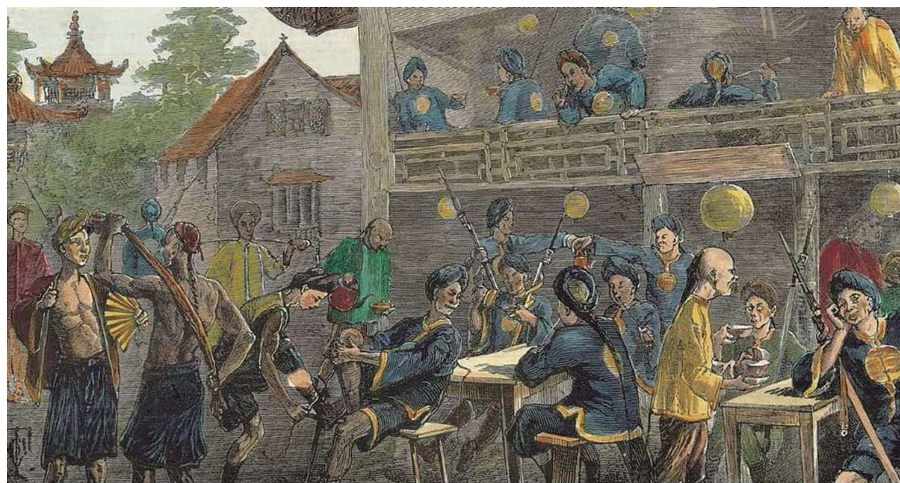
拉风箱的茶馆

1793年马戛尔尼的使团进入北京时，曾注意到北京街头有许多这种开放式餐馆与茶馆。斯当东刻意描写了他所看到的烧茶烧饭用的风箱，有些餐馆的地上放着和英国相似的灭火器具。上图中的风箱是中国的传统扇火工具，直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地方还在使用它们，我自己在农村时就拉过。大炉子上摆了一排由小渐大的茶壶，茶客每人手里提了一把，不知这是什么喝茶的习俗。

茶馆的内装修，桌椅都蛮奢华考究，与今日京城高档茶馆相比，毫不逊色（见右页图）。这是商量隐秘大事的好去处，这三位志士仁人，有人在讲述，有人在沉思，确像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恰逢世纪之交，甲午战争已结束了6年，在茶馆里居然见到日本女子的身影，她的参与使男人的计谋更复杂化了。



一家比较高雅的茶馆



一家热火朝天的茶馆

关于茶馆和饭馆的版画很多。比如上图这张，看得出这天真是太热了，暑气逼人，路上的人又扇扇子，又搓膀子。一群兵爷来到茶馆，他们衣着整齐，怀里拥着长枪，点了大碗茶喝，上下两层楼都坐满。这是个什么日子，兵爷从何而来，喝完茶向何处去，不知道，留住的是一个充满了时代生活气息的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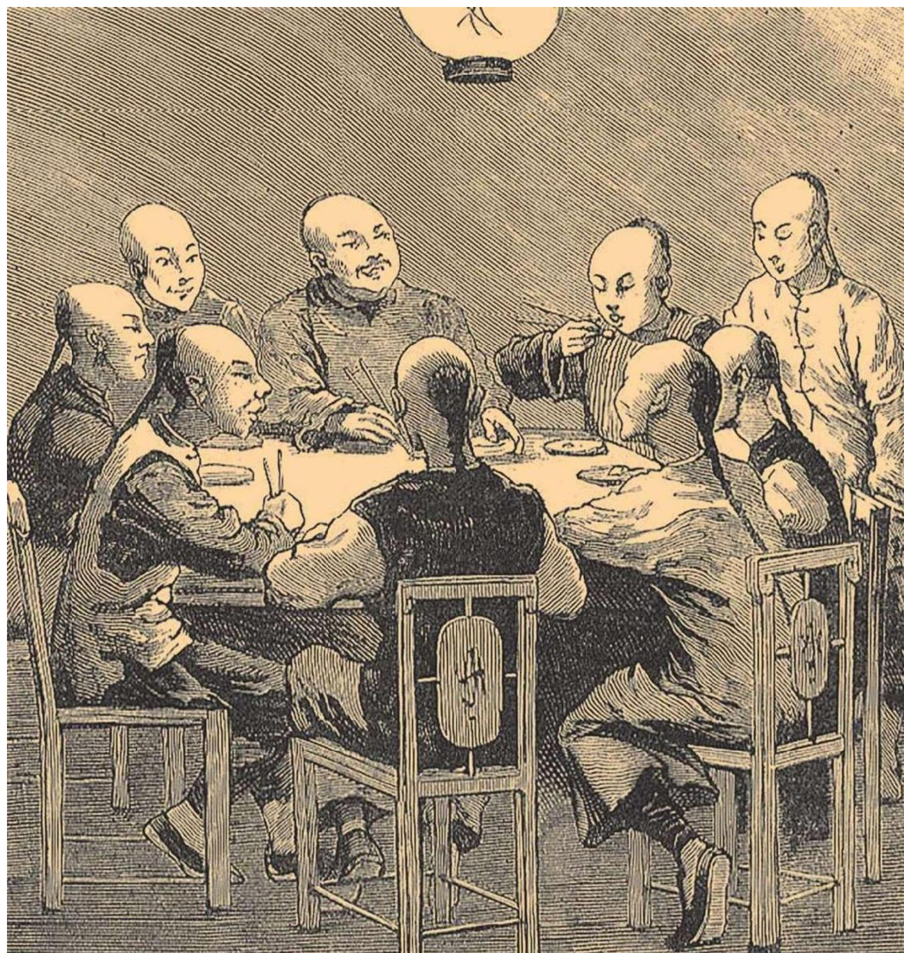
而右页上图中两人边饮边杀，一人在旁嘬着嘴支着儿，站在旁边的那个看客可能是茶馆的店小二。大家都聚精会神，没人注意到，还有一个人也在场，把他们全部定格在了画纸上。

右页下图画的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朋友饭局，中间的那位像是老大，最后要买单的。一桌年轻人手里拿着筷子，但怎么没有人上菜上饭，桌子都是空着的？可能旁边那桌上坐着个洋人，自己也在等菜，闲着就抓了这么个场景。

筷子在中国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作为餐具，既轻巧又灵活，外国人对它总是好奇，也曾被誉为“东方的发明”。人家还没开饭，他却画出了举箸上口的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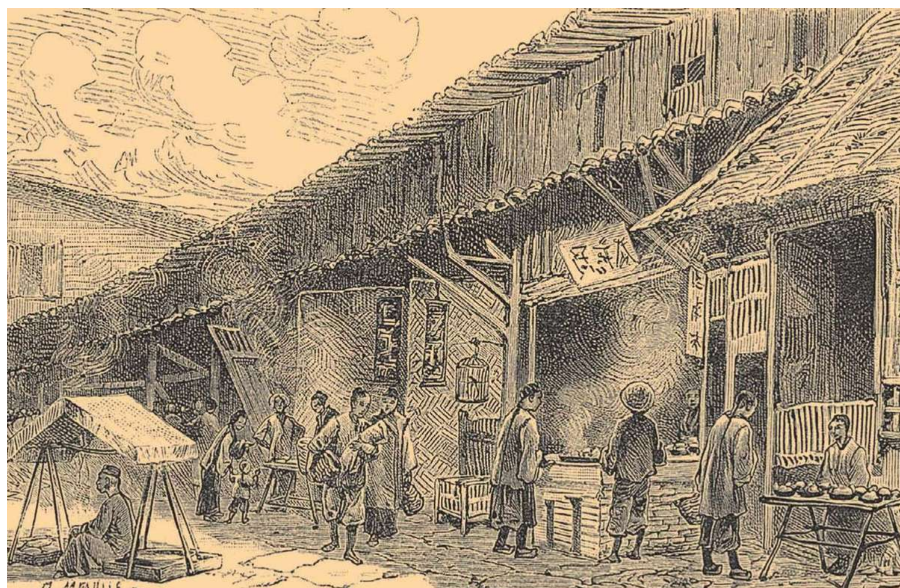
茶馆中对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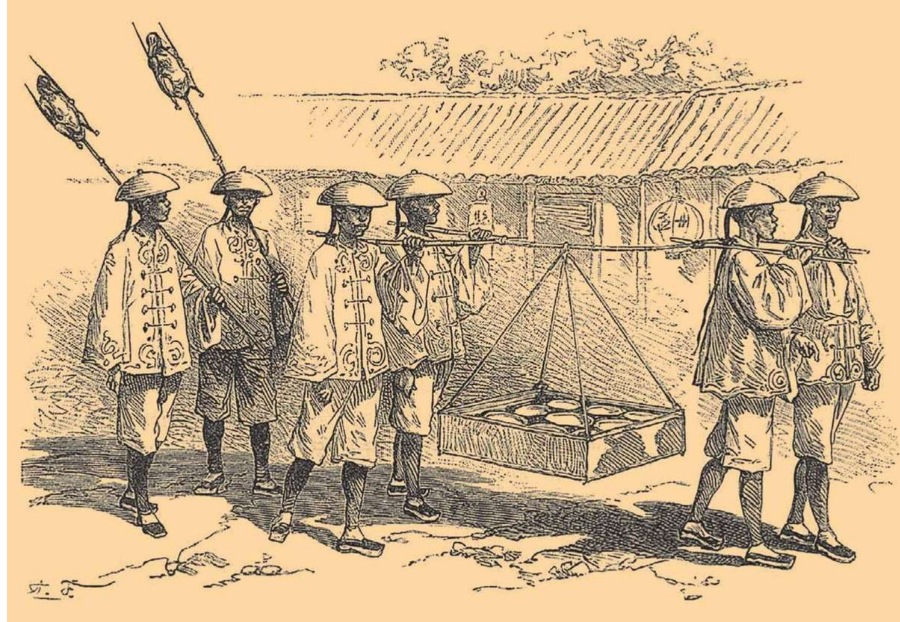
是朋友饭局？

一家一家食棚子里都卖啥好吃的呢？爱新觉罗·瀛生在《京城旧俗》中写道，北京的风味小吃来源极杂，大多数是从少数民族的食品演化而来的。其中最有名的如灌肠、炒肝、火烧、油炸果，都是来自满族、蒙古族的传统菜单，还有穆斯林回族的斋饭食品，几经演变，最后却成了北京饮食文化的品牌。瀛生老人还回忆说，走街串巷叫卖的小吃就更多了，包括熏鱼、卤鸡、甑糕、烫面饺、馄饨，杏仁茶、打冰盏、炸三角、江米酒、水萝卜、糖葫芦等等。这条街肯定不是高档饭食的去处，但你看那一溜儿统一盖起的屋檐，还是很坚固，门脸虽小，颇有规矩。

这是不是著名的北京烤鸭正在送餐路上（见右页图）？看着很像。烤鸭插在杆子上举得高高的，春饼，甜面酱，四小样，放在方方的抬匣子里，四个人抬着，颇有仪仗队的庄严威仪呢。这家富人，只订了两只烤鸭，就这么招摇邪乎？更稀奇的是，还正好让一个好事的画家给赶上了，送餐送出了幽默与体面。



一百多年前的北京饮食一条街



也有外卖送餐服务

四、众生之相面面观

一百多年前生活在天子脚下的臣民，长相如何，各种职业的人是什么形象？中国的传统绘画，常常是将个性面目模糊处理，有时眉眼都略去，胖瘦高低都无分别，而西方人却擅长、偏好人物速写，草民布衣的站姿立势，一点不比大官人的风度差，生活的甜酸苦辣，也都会写在脸上。我们常见的是20世纪初西人的镜头，摄取了大量芸芸众生相，但时间再往前推半个世纪呢？摄影师的前辈是版画师，三刀两笔在做素描。说不定，某人在京城的曾祖父母，无意之中，就是西洋画师的模特呢。



抄书匠

小桌上放着毛笔，手里拿着纸张，这是街头常见的替人抄写信函的书生形象。他们很可能是落榜的考生，只能靠这种营生度日。不识字的底层人很多，也包括家境很好但不能受教育的妇女，常常会来找这街头文书用半生不熟的文言文表达自己对远方丈夫的怀念。

在传统的战争中，督阵鼓手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背后的旗子上写着“督阵”。19世纪的西人搞不清他们在军中有什么用（见图2）。

中国的乞丐之多，状况之恶劣，当时是全球闻名的。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乞讨成了社会底层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乞丐也有帮会，各有各的地盘。这个被外国人称为牌照的挂在脖子上的纸片可能显示的就是

丐帮的标志（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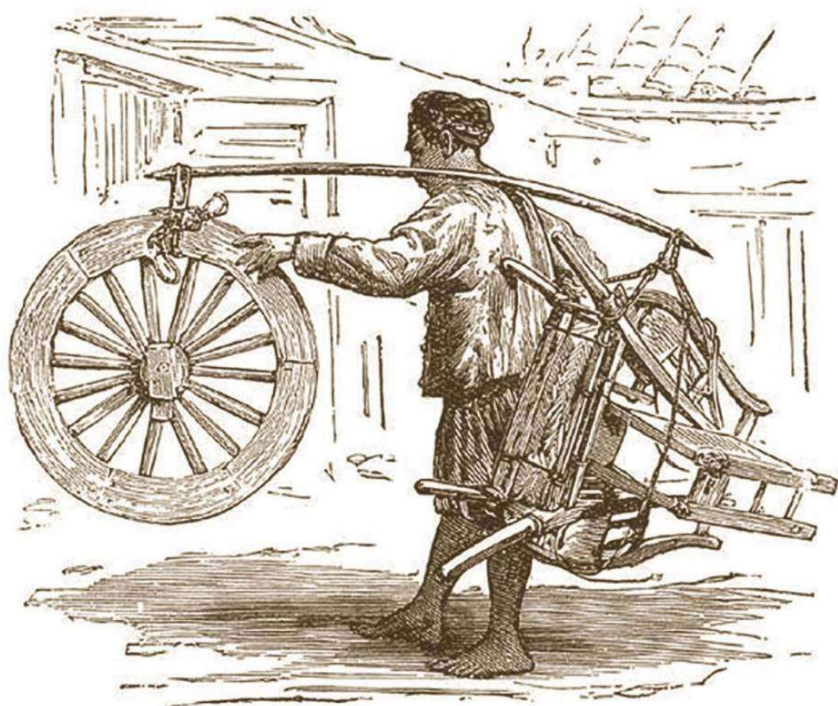


图1. 辛劳一天傍晚归来的独轮车夫



图2. 军中的督军鼓手



图3. 南方来的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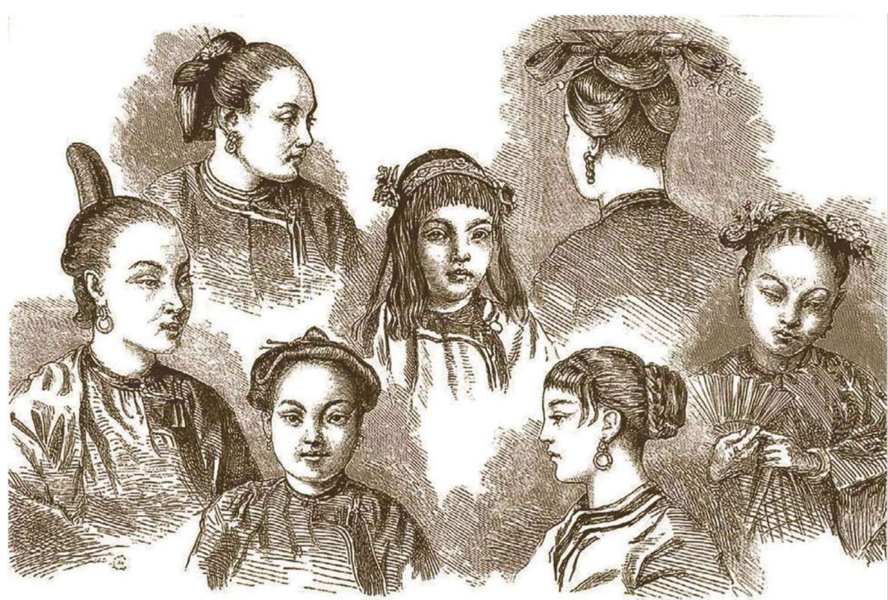
图4. 乞丐



教书匠



一位满族贵妇的衣着与发式



数位满、汉族女子的发式

中国传统文化受孔夫子影响，尊师重教。但教书匠并不是个高层次的职业，尤其是小学的老师，穿着长衫，手中拿着戒尺，唯一的学问就是背得滚瓜烂熟的圣贤书（见前面图）。

汉族女子的发式比较简单，一般是在脑后盘个髻，或梳成大辫子，简单的发式也可以变出更多的花样，少妇和女孩子都愿意把头发做得漂漂亮亮的。满族女子的发式要考究得多，尤其是上层贵族的发式。常见的头型有两把头，如右上角的那一位（见上图）。抓两把头的架子一般是用缎子做的，头髻上常插有鲜艳的装饰品，这就把路上西人的目光都吸引到头上来了。



街头化缘的和尚



街头剃头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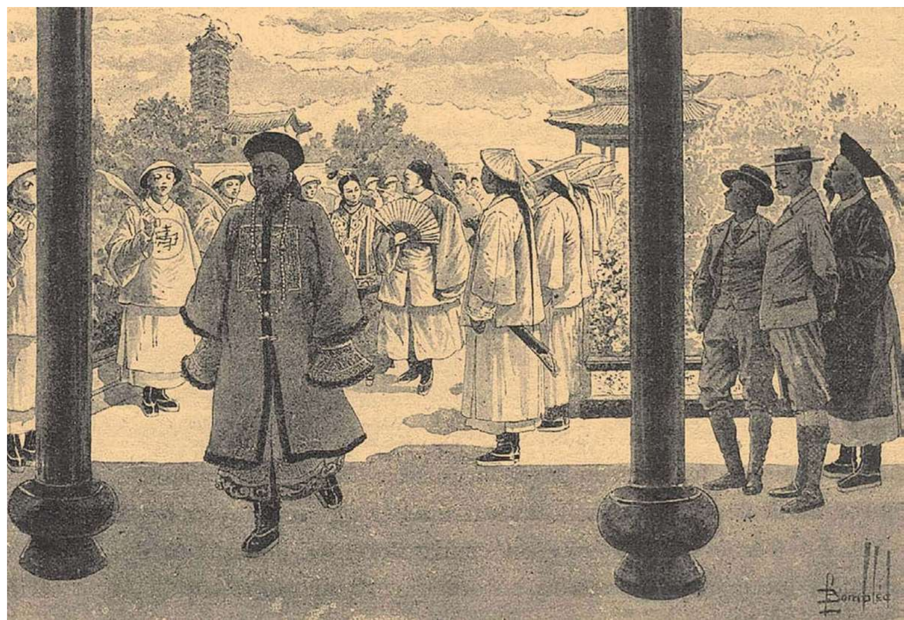


修鞋匠

此夫子令人肃然起敬（见下图）。他留着长长的指甲，头上戴着顶珠官帽，说明他是个旧派人物。但他的上装是小立领，露出了西式的袖口，眼前看着的是横版书，下面还压着“泰晤士”报纸，完全是西化了的读书环境。大清在学问上与世界的接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青萍起于此等夫子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儒生



身居高位、胸有成竹的清朝官员

中国历来是官本位，当官和为朝廷当差总是高人一等。向我们走来的这位大员，出现在19世纪一本法国小说里（见上图）。

五、在家千日好，出行一日难

旧时北京城外四边均有护城河。从12月到第二年的2月，护城河水会结成厚厚的冰，为北京人的出行提供了便捷的冰路。有一种拉冰床的职业，即冰上拉脚。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在脚上绑上平滑的铁片或竹片。这样溜冰既是出行方式，又是一种体育活动。人们在冬日清晨出朝阳门，顺河道溜冰前行，过了二闸，进入运河，继续溜冰前进，到了通州，进城到商店买来通州特产酱豆腐，放入带在身上的小碗里，端着碗溜冰返回朝阳门。如果在刚开城门的时候就溜冰出发，一路速滑，买来酱豆腐，立即溜冰回家，到家时一般不晚于下午三点钟。手里端着盛有酱豆腐的碗，是确实溜到了通州的证据，这事成了老北京人的一乐。

这张冬日冰上出行图被我选为本书第一版的封面，它画了京城融融的暖意，小民的蒸蒸生趣，没有它，我想象不出当年城门、箭楼、闸楼、瓮城连成一体的侧影，想象不出城外墙角下聚集着一片民居、居民脚下踩着冻得坚硬的黄土地（煞风景的是硬土上有几株绿树，版画的创意，有时变得荒谬），也想不出脸上透着骄傲而又自得的大叔大爷，不论是拉冰车的、做冰车的，还是自滑“11”路的，都挺着腰板，不似朝廷上当奴才惯了的哈腰曲背。忙碌的冰上高速路，床来人往，东行左手，西行右手，交通秩序有条不紊。

旁边还站着一老一少，他们是在等着下一个空床吗，就像今人在路边等着打的？史上最酷的“冰上优步”，版画还替咱记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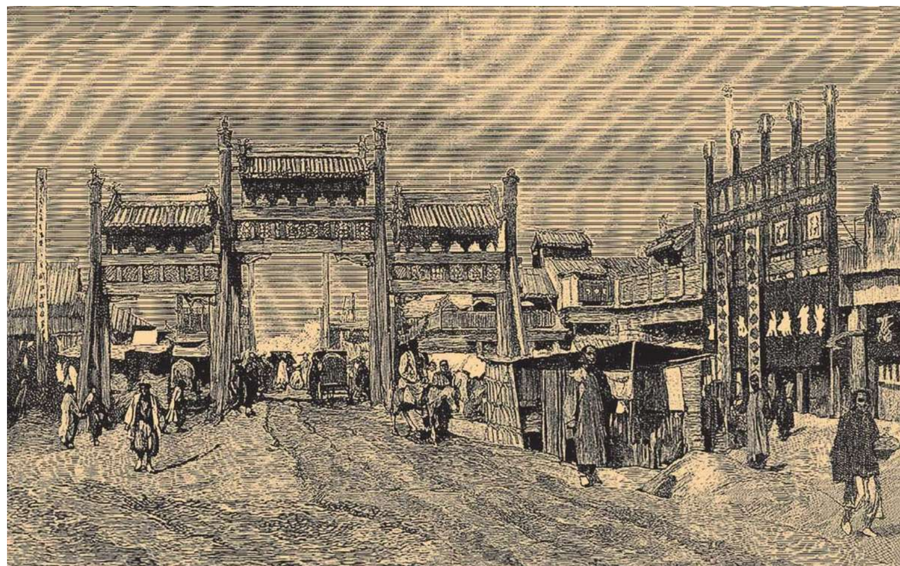
北京冬日出行一景

下图刊于1895年英国的《伦敦新闻画报》。谁都能看出，北京还完好地保留着古老的风貌。只是呼呼的西北风正在转向暖暖春风，脚下看似坚硬的冰路一化，逍遥游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英文原著不辞辛苦，告诉读者北京“冰上优步”如何营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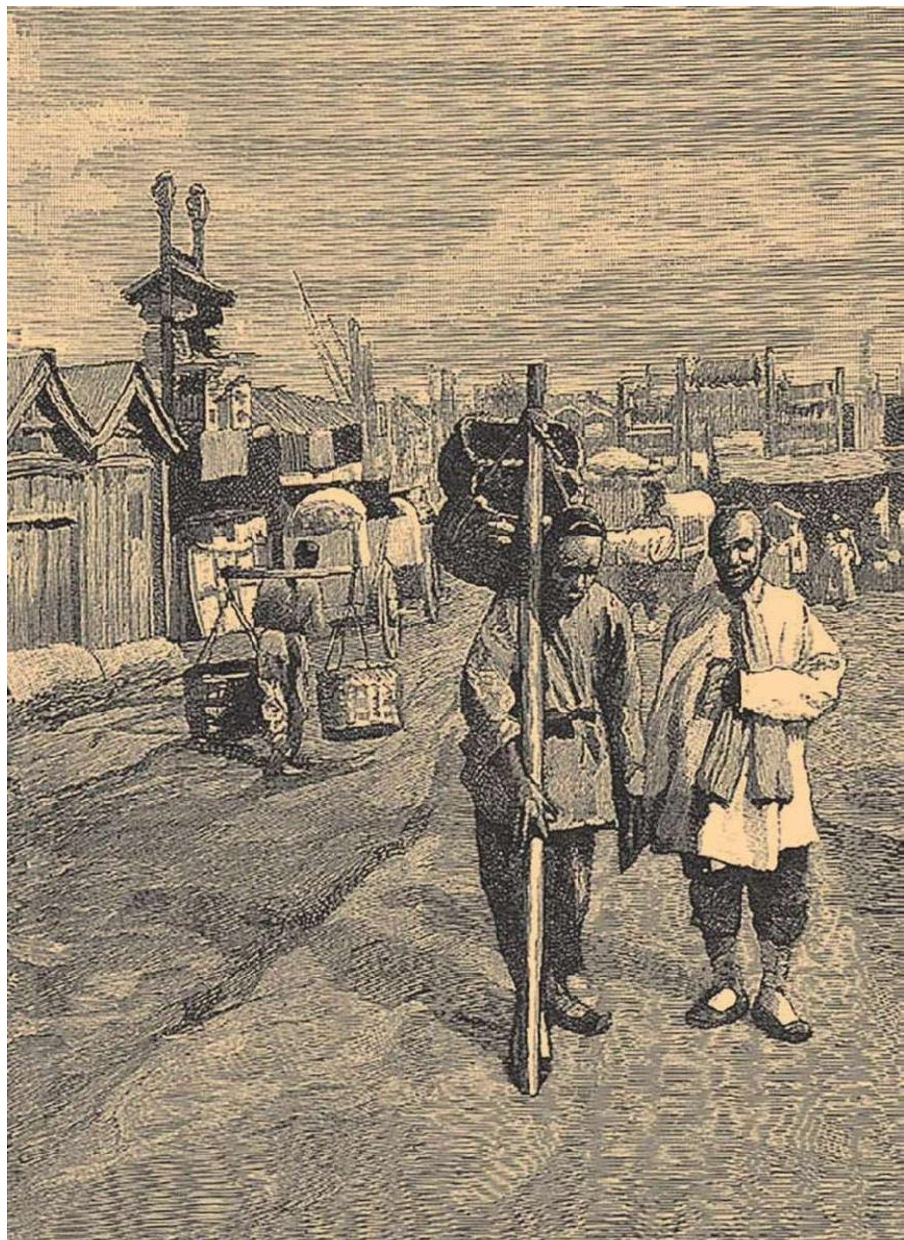
北京的纬度比伦敦要低，但冬天的严寒超过了英国。每年十二月一到，河水海水冰封凿实，直到转年三月才见消融。勤劳肯干的中国人，冰上只要能站得住脚，马上扛着冰床出门，准备开工接客，城内运河与城外护城河上，顿时排满了小巴士。如果客人要出城，冰床就被主人背在肩上，客人便跟在后面，步出城门。冰床是个极简陋的家什，四条腿的一张桌子，脚下绑上了溜滑的铁片。它的动力都是来自前面奔跑的人，他的脚上绑着的是皮子，摩擦力小又防滑。拉到速度飞快的时候，他会一转身跳上冰床，享受自由惯性的恩赐，直到速度减慢，再跳回到冰上疾跑，几个上下，目的地就到啦。

冰床让洋人大开眼界。不过，1860年洋人入京以来，洋画上最多的还是千年未进化的传统交通工具与出行方式，简而言之，就是步行、人扛、车拉、牲口驮的状态。人扛就是靠肩膀“苦力”，车拉是两千年留传下来的木轮板车，牲口驮则是骡马、驴、骆驼满街横穿竖行。当时欧洲已大行其道的铁路运输、胶轮车、马车的减震装置等，1903年以前，在北京尚闻所未闻。这是京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西方的差别，也是古都与现代世界的差别。



堪忧的路况

下图是清末北京的一条大道，也许就在东单或西单牌楼附近。可以看出当时北京城内路面的状况极差，中间的土路坑洼不平，两边还堆起了小山，窝棚占据了部分路面。当时人们形容北京的街道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像画中这样无泥无土的日子，也算是难得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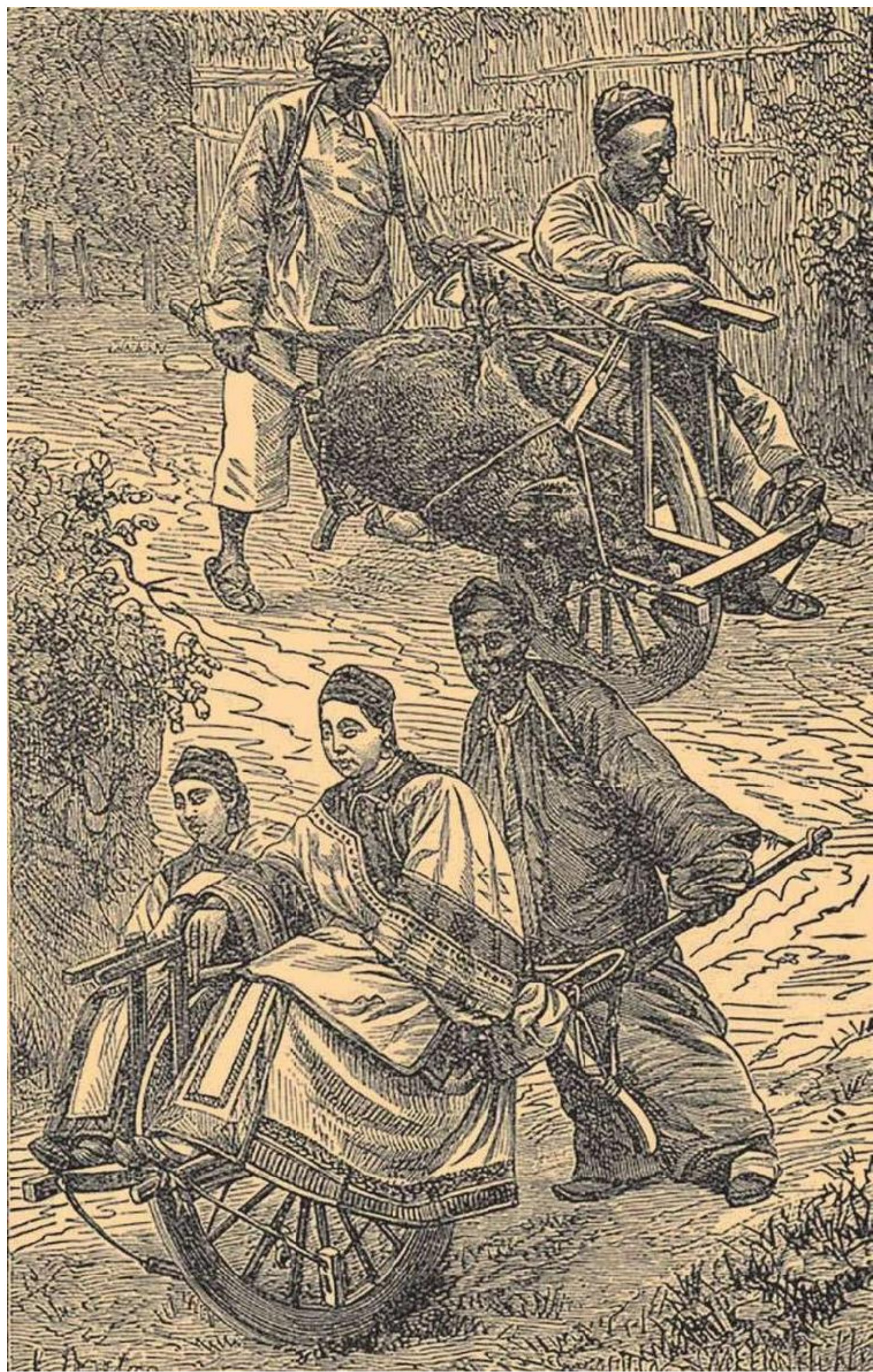


靠肩膀吃饭的苦力

街上这两个扛着杠子背篓筐的人，是当时常见的“挑夫”。对面走过去的那个挑夫已找到活计。挑夫是北京人力货运中能力要求较低的行当。其他搬运工种还有“窝脖儿”“扛大个”“背子手”等等。无论是城里还是往来

京城的路，路途长一些的运输工具主要还是靠牲口。当时有专门出租驴子的行当。

京郊附近的村民及城市中一般的家庭，都有能力拥有一辆独轮车。这种交通工具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20世纪还随处可见。下图前边的独轮车由一男子推着，上面坐了两个人。我在河南农村推过，稍不小心或胳膊不吃劲，就会车倒人翻。这母子二人衣着整洁，如果不想遭此厄运，一定要雇一位老手推车。后边那辆车上一边捆着头猪，要到集市去卖，为了平衡，另一边坐着个搭顺风车的人。



独轮车上的一家子



北京的“出租车”



进出城门的拥挤，车水马龙

稍微有点身份的人出门，都雇得起驴车。伦敦1890年出现了马拉的公共车，城里有固定的线路，也有四处跑的马车，路人一扬手就停靠路边接客，叫“taxi”。画家把京城驴车定义为“出租车”，是有相通之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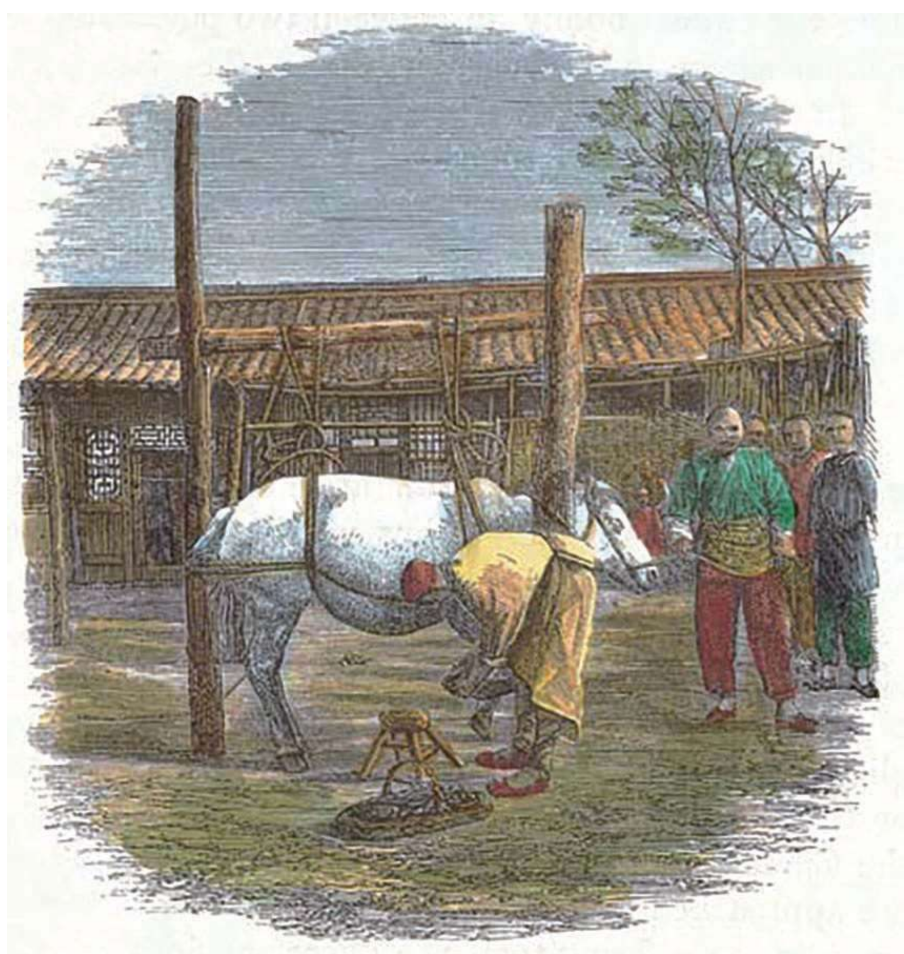
路边客栈的功能与现在的旅馆相仿，白墙上写着“仕官行台，安寓客

商”的字样。除了为客人提供食、住之外，还为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马匹提供草料。

人要换双新鞋，马要钉上新马掌。客栈里就有铁匠，两根木头桩子之间，就是他的流动服务站。京城中心通往郊区，有很多专业钉马掌的铺子，城中街边有很多拴马桩。有些拴马桩是用汉白玉或石头雕出来的，做工精美，流传到今天，已成为精美的艺术古董。



马车进客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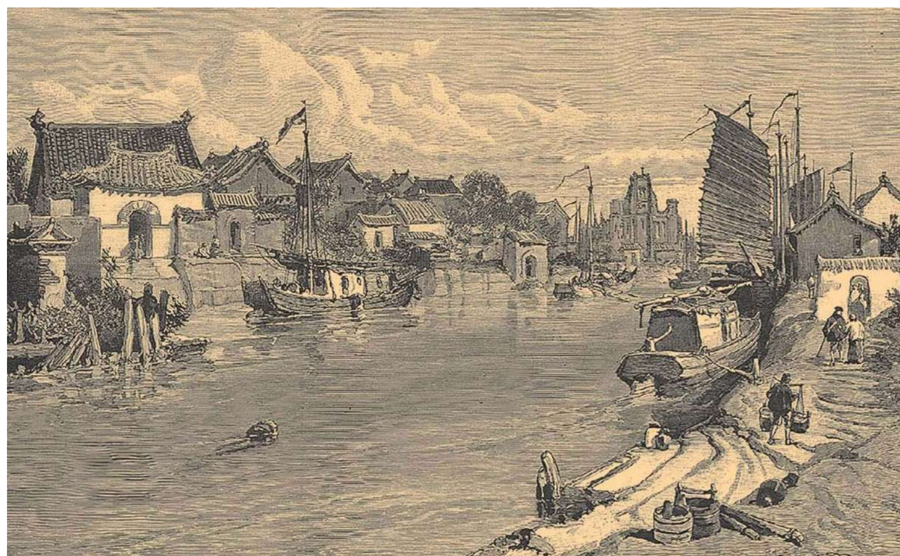
休息一下再上路吧

天津到北京的陆路有百里之遥，路况非常糟糕。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都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原因之一就是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这条道路举步维艰，如再带着辎重，更是困苦不堪。这幅画生动地描绘了风雨京津路上的艰辛（见下图）。



往来津京的陆路

和陆路相比，从天津到北京走水路是当时更可取的选择。这是刚出天津进入大运河的景象，远处还可见到望海楼（见下图）。



往来津京的水路

1895年铁路从天津修到丰台，1897年修到了马家堡，离永定门城墙只有两公里，朝廷不让往前修了，怕冲撞了皇城的王气。这个京南小村庄因此青史留名，据说1902年1月还在这里见到过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宫逃亡回京专列曾停在了这里。火车进京，是1903年以后的事，城墙再厚，也挡不住铁轨与巨大的蒸汽车轮。最初的火车车厢只是大木箱，拉货亦拉人。

这是1902年间的一次军队从塘沽转移的行动（见下图），版画场景逼真：挤上火车的一众年轻清兵笑逐颜开，没上车的人也面带笑容；背对着我们的几个男人，辫子粗得唬人；旁边两个束发的小媳妇，心情看起来也不错，是来给征人送行的？



往来津京的铁路

北京冬日所需的煤炭很多靠驼队运输，一般是几十只骆驼头尾相接鱼贯而行。每只骆驼背上挂着两只装煤的大筐。它们身上长着厚厚的长毛，可以抵御北方冬季凛冽的寒风。走在队列前面的赶驼人也身着厚厚的皮袄，相比之下，旁边骑驴的北京人的衣服轻便多了（见下图）。



刚迈进京西城门的驼队

1873年的《伦敦新闻画报》登出了这幅版画（见下图），带我们目睹了驴轿跨越山海关的艰难。图中可以隐约看出远处的关隘，夹在山坳中间，背后就是盘山而上的长城。今天这里都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但是一百多年前，坐在驴轿子上，恐怕赶得上坐过山车。轿子里金贵的小姐夫人，也只能在沟沟坎坎中颠簸前行，到了北京，估计筋骨都快要颠散架了。啥叫野趣啊？坐坐驴轿吧。



驴轿跨越山海关

从内蒙古到北京的直线距离并不很远，考虑到路况与交通工具，旅程就甚为漫长了。两匹马拉车与驴轿的装置不同，马在车架的两边，小平板轿车四面透风，里面坐了一大汉，还有人为他赶车，也算是艰苦中的奢华（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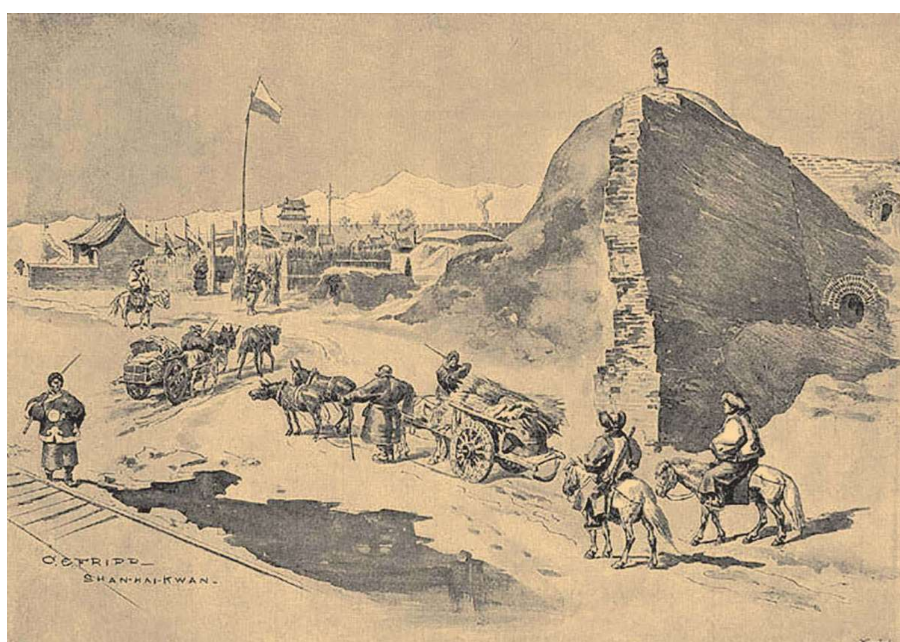
从内蒙古向京城进发

下图注明的是贵妇要去北京。她选择不坐后面跟着的驴轿子，而是自己骑骆驼。在颠簸的石头路上，她的头饰端庄，裙摆平静垂下，手中优雅地持着扇子，好像是特意摆出的架势，风情万般。



从内蒙古向京城进发的贵妇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号称“天下第一关”。此时的山海关城墙被洪水冲出了一个大豁口，正好成了穿行的一条大路。山海关自古即为中国的军事重镇，也是从东北到北京的交通要塞，当年货车、兵车与路人往来频繁，可谓车水马龙（见下图）。



从山海关向京城进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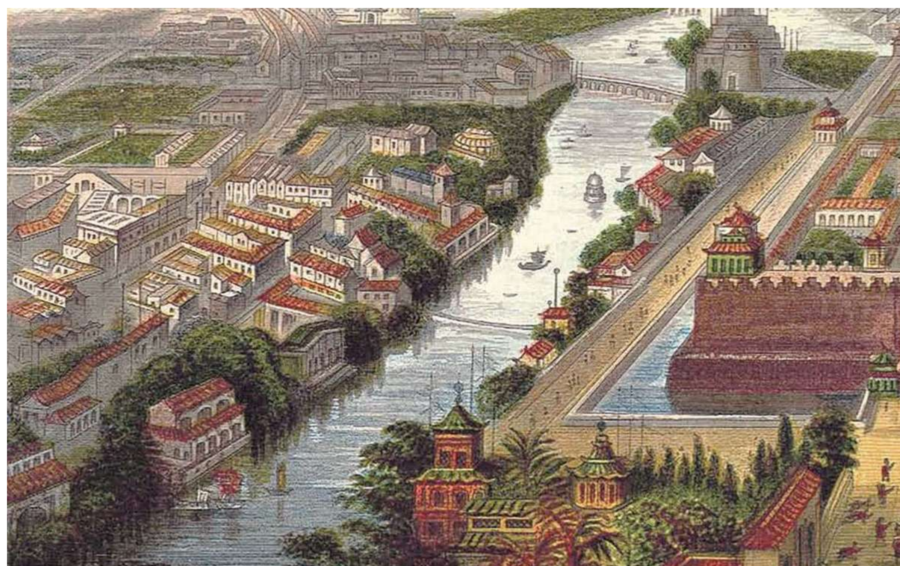
从山西向京城进发

清中期以来，山西成为全国经济金融的重要中心，尤其是山西票号，与

上海的钱庄一样，为大清朝廷与民间的货币流转提供着现代化的金融服务。这是当年从山西通往帝京的一条要道，路边的驿站灯塔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照耀着行人前进的路程。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六章 收藏一幅永远的帝都





从南面望去的紫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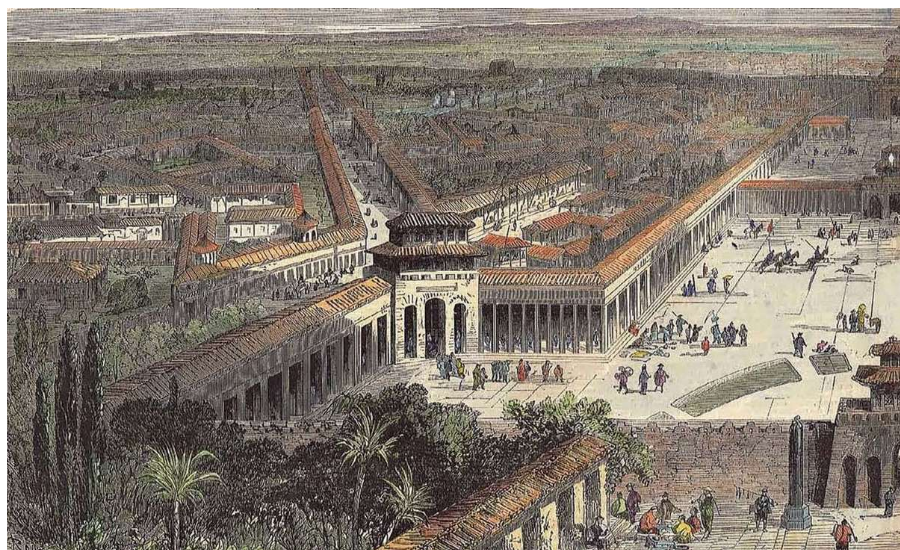
一、如画的皇家宫城

20世纪20年代，一位长驻北京的英国人这样写道："对我和许多西方人来说，直到20世纪30年代，北京悠久的历史仍鲜活地在城内延续着。和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及希腊的帕特农神庙比起来，北京的历史文明更具有现实的魅力，令人心旷神怡。"

这段话，听起来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说帝都北京是鲜活的城市。它不是百科全书中提到的古迹，这里的一砖一石，都在纵情呼吸着，整个城市，是生趣盎然的百花园。今天去参观伦敦的白金汉宫，从外面看，也和天安门一样，只是一座辉煌空置的帝国摆设，但走进里面，就会被告知，新加坡总统不久前刚刚走过同一个廊道，在此拜见了女王，履行国事如仪。文明古城要较真的，不仅是谁的历史起点最久远，更要看谁能把历史的基因一代一代承接下去，不失传。鲜活而古老，本身就是魅力。北京没有乔装打扮，未受现实污染的鲜活古老，更加迷人。

第二层意思是说北京也是一座具有文明地标的都市。英国人提到了举世闻名的城市地标，哪里是北京的“金字塔”“斗兽场”与“帕特农神庙”呢？他没有列出来。但不用他说，我们都知道，那就是紫禁城里的天安门、午门与太和殿。要收藏一幅永远的帝都，首选的肯定就是它们。

19世纪中期的紫禁城，风貌与康乾盛世已不可比，但传统建筑的结晶，皇家精心营造的胜景，依旧灿烂辉耀。洋人经历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与现代化洗礼，对不同文明凝聚的物质遗产，常常抱着科学考察的态度，亦有美学解构的目光。俯瞰着紫禁城，他们感受到了历史文明对现实心灵的震撼，一直震撼到了刀尖笔端。





从北面望去的紫禁城

低头看一看题图和后面一张从北面望去的紫禁城（见上图），能够感受到此等震撼的力量。我觉得这是画家被震晕下的作品。如此肆意拔高紫禁城的宫墙，顶天立地的廊柱，护城河环抱的唯我独尊，砖瓦堆积的财富实力，目光所及，五体投地。如一首歌曾唱的，“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所向披靡呀。

从南向北与从北向南眺望紫禁城的两张图，1858年同时出现在《伦敦新闻画报》上。观看者可能会说，哎，那时英法联军还没有进京，画家绘制紫禁城有技术困难。在两百年的时间里，西人并没有机会找到一个恰当的制高点，摆好画架子，准确测量眼前的景象，所以，紫禁城才被画得像罗马的教堂或斗兽场。这评论说得有道理。但翻翻同期西方的城市版画，地标建筑也没有被画成遗世独立的迪士尼乐园。从北边眺望天安门的那一张，我特意选择了1886年的复制品。此时不但有了写实的版画，而且有了京城的首批照片，西人知道28年前的画作有多么离谱。但他们重印的离谱的那一张，套色精致，看上去更为震撼。

人们选择收藏这幅画，彻底放飞心灵的震撼。

从北面望去，可见的是神武门，即故宫的北大门，作画的最佳地点是景山顶上，当年也不向游人开放。今天在正中的门洞上，有郭沫若所书“故宫博物院”石匾。进了北大门，好像来到了罗马的圣彼得广场，西方的神圣与东方的皇威并肩坐落在了一起。



紫禁城午门前的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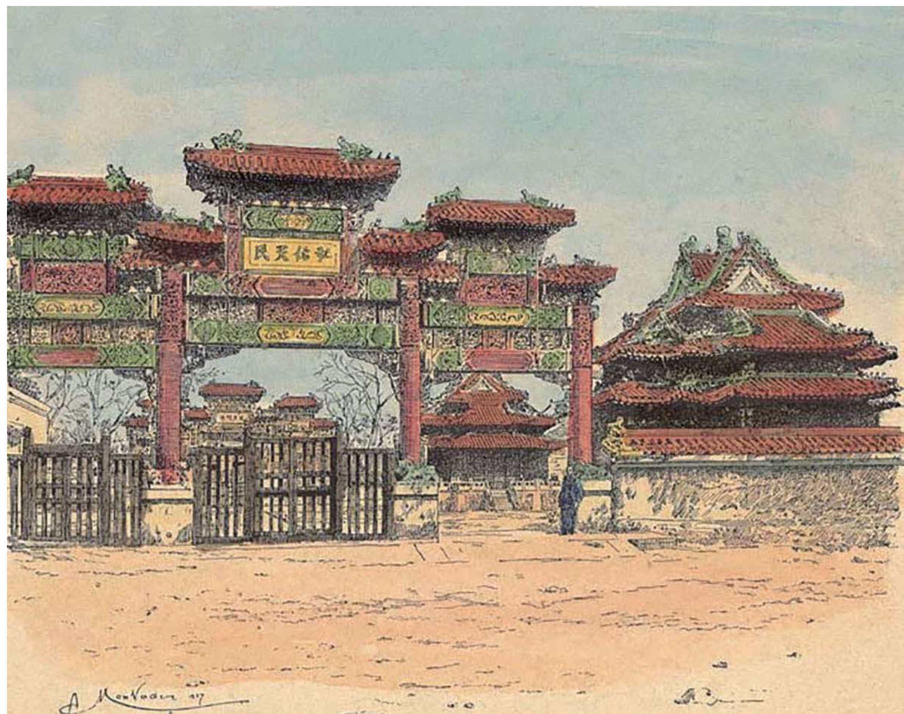
想象1862年，两位英国公使馆的绅士登上了正阳门的至高点。他们站在那里，暗自调侃两年前报纸上登出的全景图。啊哈，令人震撼、气势庞大的紫禁城纵览图，其实画得不咋地，拿来糊弄我大英帝国呢。不过，调侃归调侃，正阳门上的这哥们儿还是会竖起大拇指，给不咋地的版画一个赞，并把它们收藏在箱底，等到150年后，重新有人发现它们的价值。首开禁区作画先河的，就是1858年的这张旧《伦敦新闻画报》，占地数平方公里的皇城全景，包括紫禁城、北海、中海、南海、白塔、景山，还有那座划开了中海与北海的金敖玉栋桥等等。由此，紫禁城从“神父版画”“商旅版画”和后来的“强权版画”中走出来，有了纯粹“风景版画”的意境。

这张版画与前面两张的区别，不言自明，它的比例相当准确，视角恰当舒服。站在东南高地望过去的这座广场，从纽荷夫的时代起，就不停地被人绘制，数量堪比后来的天安门广场，清末的许多大事、盛事就发生在这里。今天，它是游客跨进故宫大门的第一关，长假旺季时，一圈一圈的游人站在这里，望着同一座高大的宫墙，耐心排队等待。

我相信这张版画不是基于雕刻家的想象，一定是有一张照片做参考。可它在1861年就刊出了啊，那张照片是出自谁的手，在哪个高点拍摄的？他一定是一位有过艺术训练、热衷风景摄影、身手敏捷、善于抓住机会的摄影高手。



景山前街原来是大高玄殿



大高玄殿局部放大图

从故宫护城河西北角向东南方向看到过去，景山下的一组建筑群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建成的大高玄殿，即明清两代皇家的道观，经过明万历和清前期的多次重修，到19世纪中叶，大高玄殿整体建筑仍保存完好。这张版画（见左页图）中显示了殿门外的三座牌坊与两座习礼亭，这些建筑后来被拆除。当年的牌坊为四柱七楼式，黄琉璃瓦顶，正楼上书“弘佑天民”。据说这四个题字是明世宗时的宰相严嵩所书。三座牌坊两边均有题字，依次为“大德日升”“干元资始”“太极仙林”“先天明镜”“孔绥皇祚”。从这张版画上可以想见当年三牌楼的金碧辉煌。20世纪90年代，靠近紫禁城护城河的北牌楼被重建。

1860年时从东向西，也就是从景山向北海望去，看到的是已有近千年历史的北海公园。据说这是世界上保留最好、历史最悠久的皇家宫苑，1925年8月1日，由北洋政府主持，宫苑改称公园，开始对公众开放。

90多年来，北海公园积攒了无数靓影，但是没有一个角度有此图上的神奇（见下图）。它出现在1860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上，距今已经有150多年了。这是从一个高点——景山的万春亭，望去另一个高点——北海的白塔。远方的地平线与浮云，遮住了半边蛋黄夕阳，巍峨的白塔下，绿树如波浪。两园之间，是一条泛白的大道，几座四合院与街面商铺清晰可见。皇家园林的傍晚，也是子民百姓的傍晚，共同半掩在落日余晖中。



北海的夕阳

二、拆不掉的城墙在哪里？

没有拆不掉的城墙，留下的都是侥幸。要说有拆不掉的城墙，只有到画影中去找。

内城与外城的城墙城门，是最能代表京城气魄的建筑。城墙这东西并不是北京特有的，也不是中国特有的。全世界还有不少地方保留下古城

墙，如中国的西安、西班牙的阿维拉、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但是，北京的城墙之雄伟壮观，方圆之阔大，层次之多，世界上绝无仅有。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恰当评价它是“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绝非虚言。1920年，一个到过北京的瑞典人，发出这样的赞誉：



正阳门内

远眺城墙，它们宛如一条连绵不绝的长城，其中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气候温暖的时候，城楼上长着一簇簇树丛灌木，增添了几分生气。如果你曾在北京城墙上度过秋季里风和日丽的一天，那你绝对不会忘记在明媚的阳光下，清澈的万物和谐交织成的五彩斑斓的透明色彩。

19世纪西方人留下的零星版画，和20世纪的照片相比，尺寸大，上色由人，未受摧残的城墙城门，突出显示着伟岸深沉。

下图是前门瓮城内景色。可以看到东闸楼及完好的石板路，再往前走就是正阳门北面。瓮城东西各一条路，叫东荷包巷、西荷包巷，当年很繁

华。

瓮城都是弧形的，沿瓮城修筑的大街也呈弧形。不过这条在英文原文中被称为“转弯”的大街是哪里，我还是想不清楚。城墙看着很高大，可城门楼子却矮小，只有双层屋顶，应当不是前门一带。



城墙内转弯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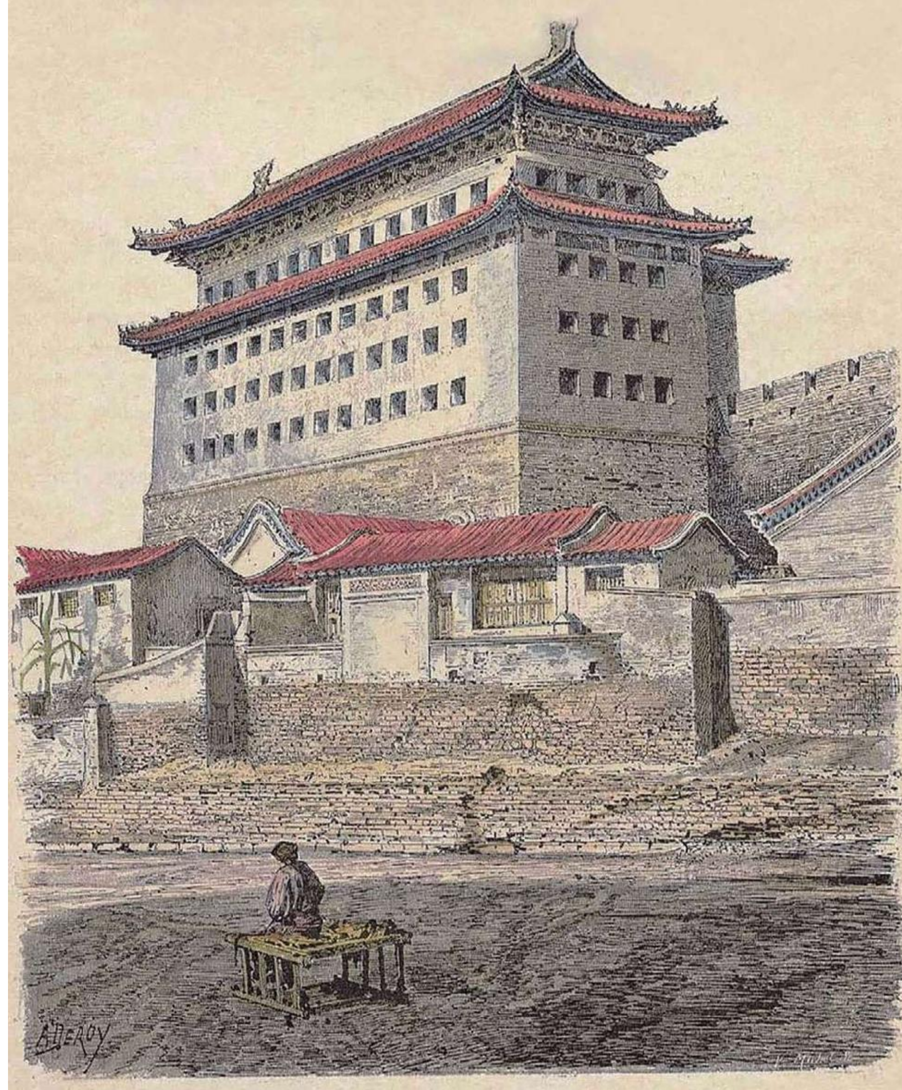


安定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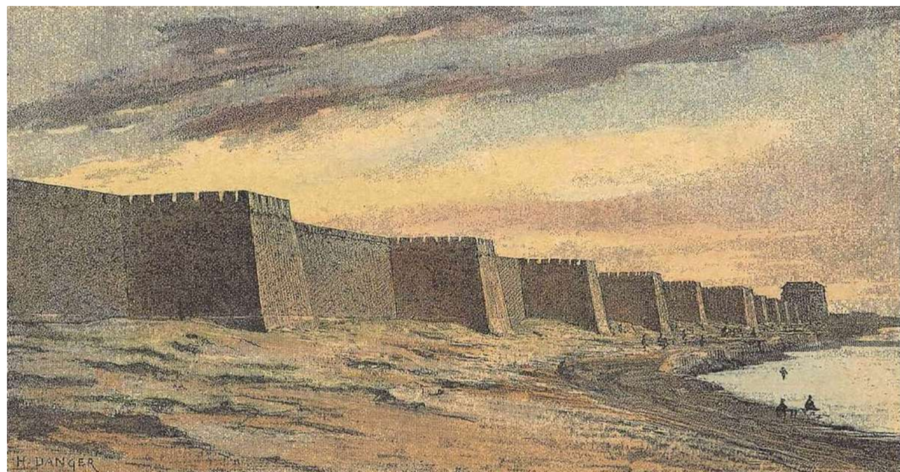
然而这么繁忙的街道，不是前门一带又是哪里？道路两旁店铺林立，招幌高挂，招牌连排，人流乌泱乌泱的。画家看得眼睛迷离，画出来的景色也迷蒙。

明正统元年（1436），诏修北京内城的城楼、瓮城及角楼。内城共九门，即正阳门（前门）、崇文门、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及西直门。京城里防守最严密，也是最重要的城门，就是这“京城九门”。安定门在北京东北。上图可见19世纪后期安定门外景象。20世纪初，门前的大旗杆变成了电线杆。

箭楼位于瓮城之前，原有的功能是作为军事堡垒保护城门。目前能够见到的只有德胜门箭楼，仍雄居于砖石结构的高大城台上。这些城楼当时已有四百年的历史，仍完好如初，城楼下的民房是典型的四合院，显示出某年冬日一片静寂的景色。



巍峨的箭楼



岿巍的防守墩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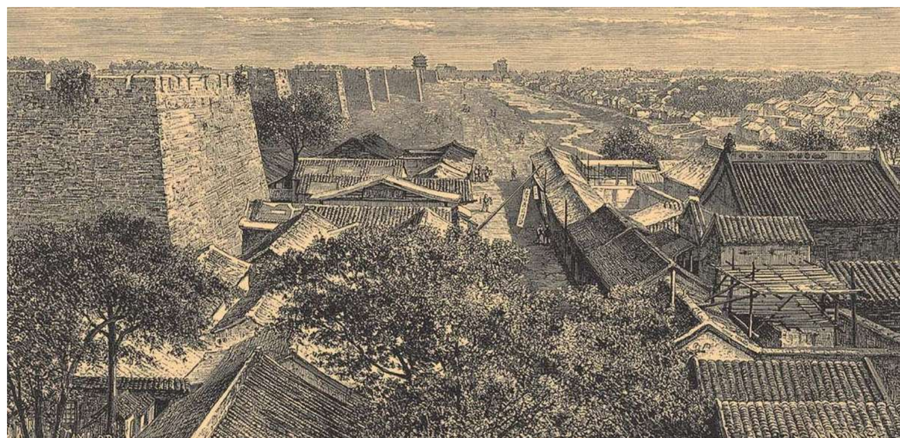
北京内城城墙外体全部包砌砖石。顶部外侧砌雉堞垛口，墙体雄伟高大，防守的墩台一个接一个。墩台还有一个叫法——马面，它们是依一定距离在城墙外侧凸出来的建筑，中国的传统是砌成平面长方形，外国多见圆形，因外观狭长如马面，故名。此图（见上图）上没别的，就是血色苍天下的墩台。墙外坑洼大地很干净，再下面就是护城河。这种景象，明白地让人看出墩台的原始用途，就是为了防御敌人的进攻，墩台之上，可以三面狙击消灭来犯者。

其实到了明代，马面作为城墙的防御工事，已无甚作用。永乐皇帝建北京砖石城墙时，并未修出马面。这么神气的墩台是谁修的呢？书上说是嘉靖朝加建南城时搞出来的，当时叫敌台，共有大小172座。整个明代，北京备受北方各个游牧民族的骚扰。到了清代，游牧民族统治中原，北京的防守也就踏实多了。岿然而立的墩台，失去了敌人的光顾，成了古城第一批建筑艺术品。

内城南城墙连着外城，居住着京城的汉人，他们的房子，有的就贴着墩台盖，甚至借了墩台的墙。北京崇文门东侧有一处明城墙遗址公园，就

是由于民居围住了城墙，才侥幸未被政府拆掉。本来是保护子民的城墙，反倒是得到了民居的保护才幸存到21世纪。下图大部分的民居在护城河外，河道蜿蜒，既无河堤亦无桥，远处可见城墙角楼。

城墙的基厚平均24.5米，顶厚平均18.5米，内侧高平均10.1米，外侧高平均12米。城墙两边均有马道。此图（见下页图）上可见马道入口有个门，似乎是为了挡道。不过两个男人在城墙上打草，并没人拦着。他们打草做什么用呢？是当柴烧，是当猪草？是早上两人相约一齐上城墙，还是有人给他们派活、清理墙头的杂草？看来他们是要干一阵子的，连茶壶茶碗都带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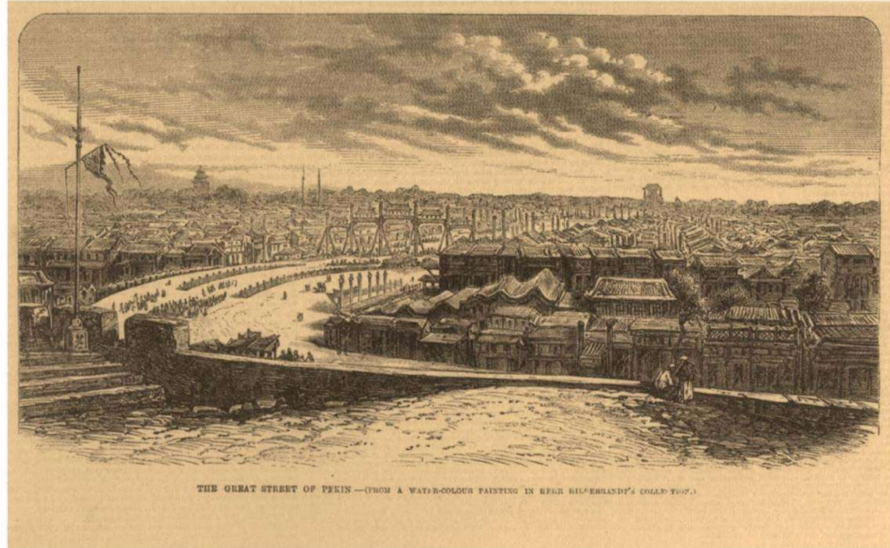
城墙之外



城墙之上

18米宽的城墙上边，地砖平展展的，两边的墙垛子都是齐刷刷的。真能把它辟为高空花园吗？让绿草油油地生长，让游人悠悠地上下，这样的景象，是梁思成先生曾经勾画在纸上的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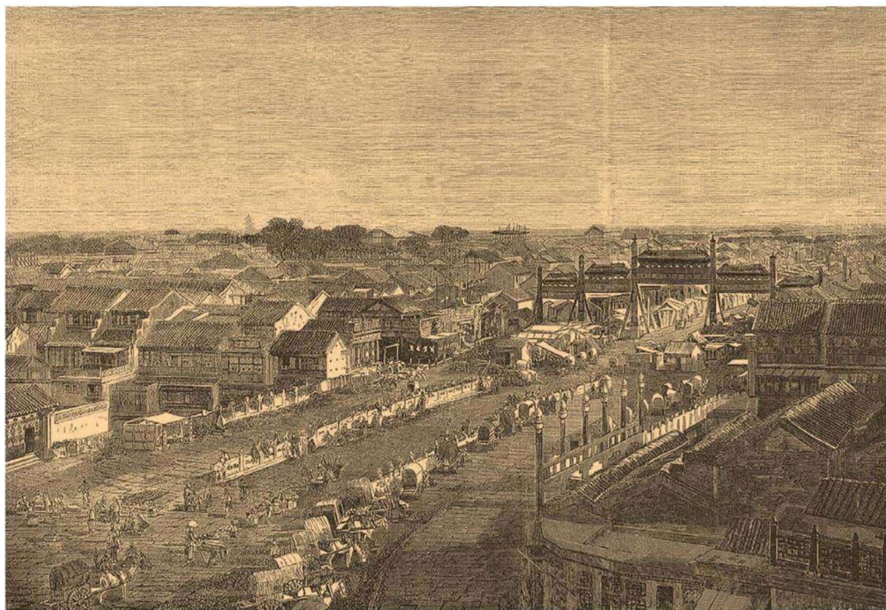
看下图，左下角可以看到城墙垛子，墙边上站着两个人在往下边看。远望可以见到前门五牌楼，来往的行人比蚂蚁还小。城头插着一杆旗，是大清人喜欢的三角形。地平线上的两个高点，一个是天坛，另一个是德胜门。1920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有篇文章：《北京，意想不到的城市》，里面说，前门城头南望，朝天大路无声呼唤着北方草原的广袤，京城就是一座带有粗犷血统的城市。



THE GREAT STREET OF PEKIN.—(FROM A WATER-COLOUR PAINTING IN HERR HILDEBRANDT'S COLLECTION.)

墙头上看前门大街

这张图（见下图）和上图基本上是一个角度，只是对象被拉近了，这是相机镜头的功劳。上图见报是在1866年，从城墙上看下去，视野只能是这么远。1872年，英国人约翰·汤姆斯拍摄了前门大街的照片，下图是张照片版画。这两张图细部还有什么异同，细心的读者可以自己做个比较。



六年后墙头上再看前门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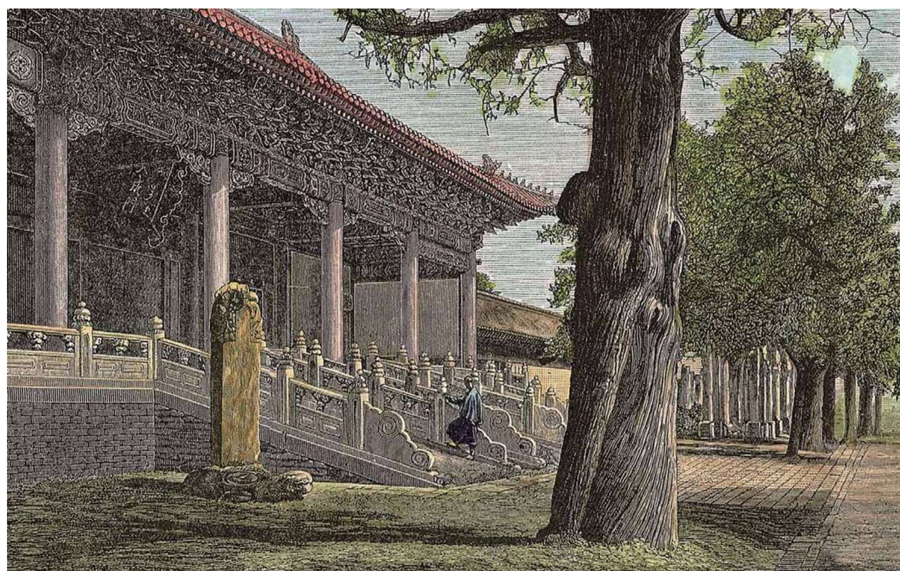
墙头上看哈德门大街，一条披满风尘的大道，通向离京的远方

哈德门是东城崇文门的俗称，始建于1267年，历经元、明、清三朝，740年历史。京城过去有个俗见，东边富气西边贵气，东城的富气，哈德门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地方。其一，这是给皇城运酒的专用通道，被称为“酒门”，又称“酒道”，富借酒香。其二，才子赶考必经此门，人人在此求文昌星，所以被称为“幸运之门”。第三，清后期的税务司就设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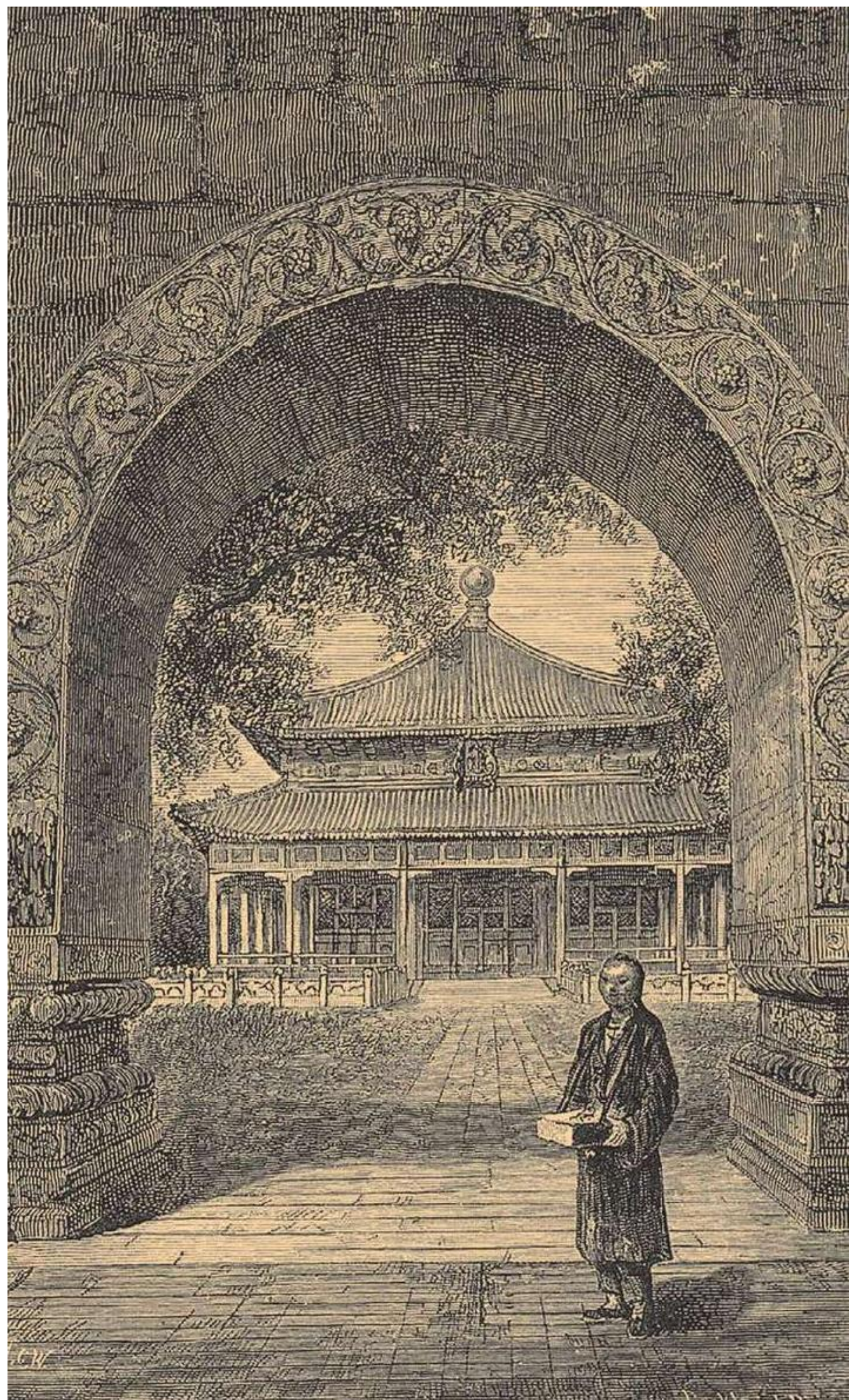
在哈德门内不远处，管钱的人常常出入，这里就是“财富之门”。这么多的美好意头，被压进眼底这条泥巴车辙中。

三、步步是景，回味无穷

北京作为明清两朝帝都，上承近三千年的文明积淀，是文字写不完、忆不尽的。如果古都旧貌能完整保存下来，定是一步一景，步步是景，是中国文化的全景博物馆。这些景致由于天灾人祸，许多已无踪迹可寻。浏览西洋版画，犹如在历史长河中漫步，于画中游历帝京胜景，回味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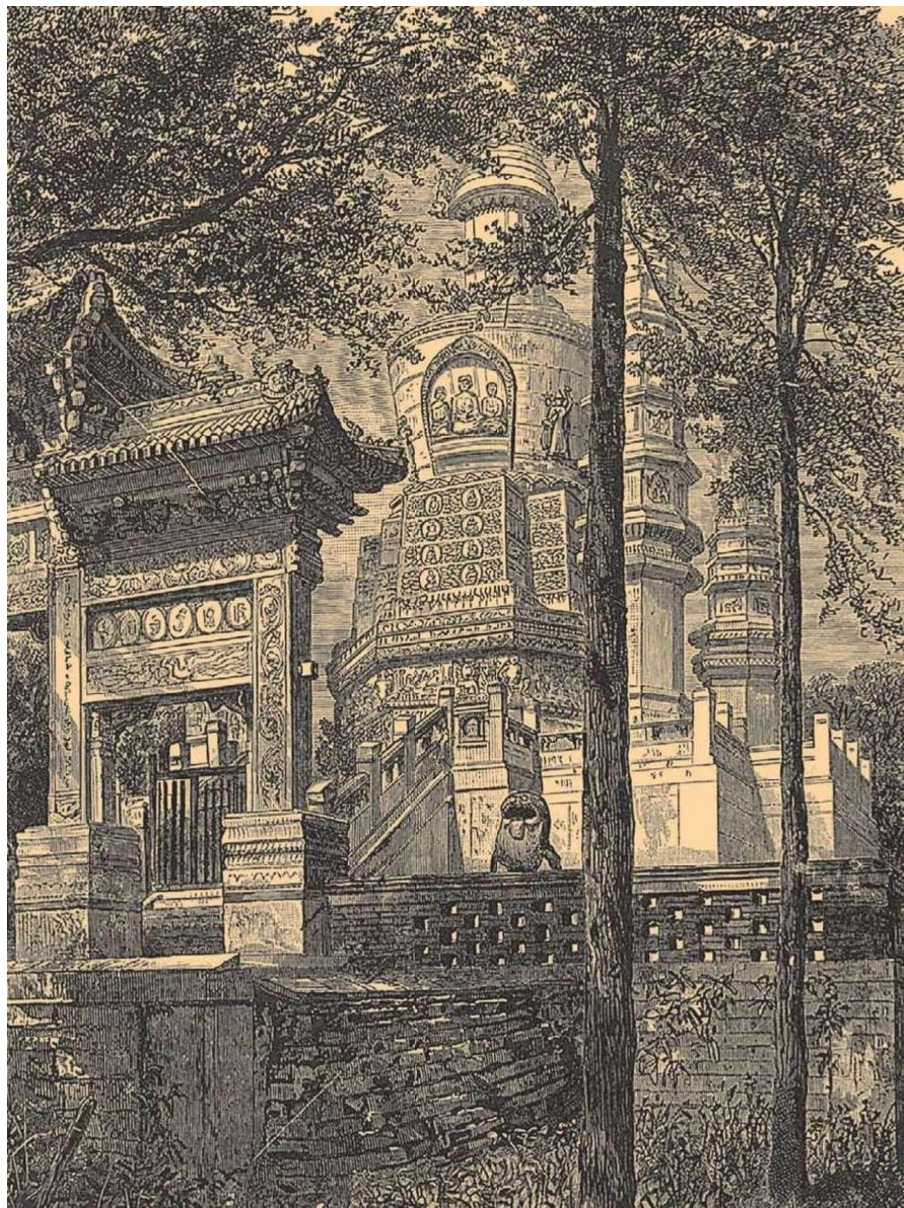


北京孔庙大成殿始建于公元14世纪的元代，元成宗铁穆耳为孔子加谥号“大成至圣文宣王”，现在该匾仍耸立在大成殿门前。



国子监琉璃坊与辟雍殿。元代忽必烈建成元大都后，建国子监，为国内

最高学府。辟雍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是北京“六大宫殿”之一。国子监辟雍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学堂”，是皇帝临雍讲学的场所。国子监曾是清朝人才荟萃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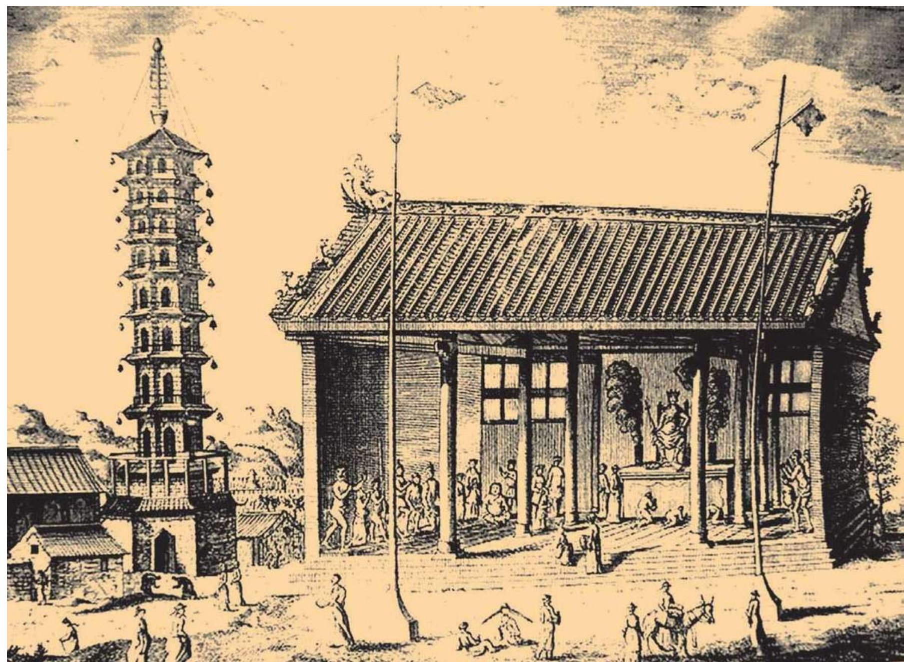


黄寺塔，也叫清净化城塔，坐落在安定门的西黄寺内。1779年，六世班禅进京为乾隆祝七十大寿，不幸圆寂在西黄寺内，乾隆皇帝后来为安放

六世班禅的衣冠经咒修建了此塔。黄寺塔是一座藏式佛塔，由汉白玉砌筑，顶部金光闪耀，熠熠生辉，1979年8月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仍可供游人参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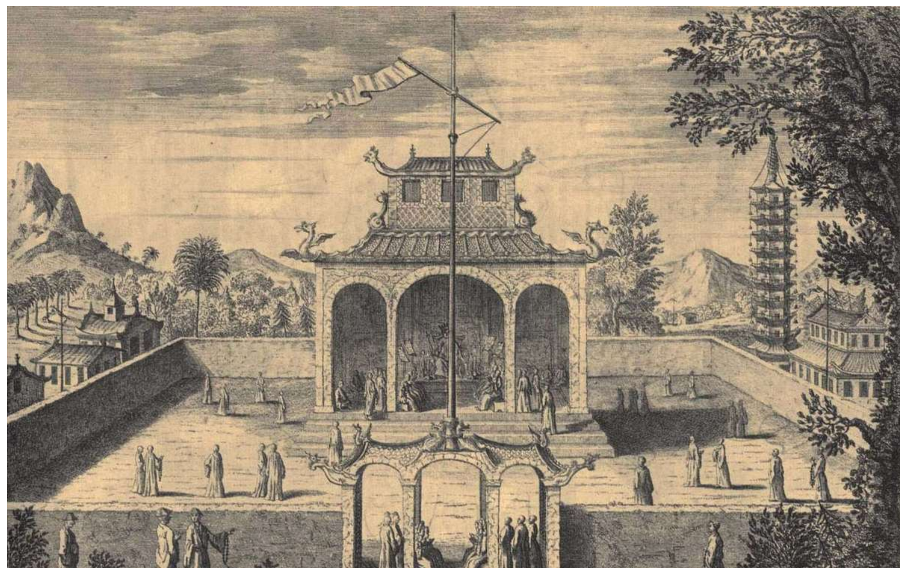


贡院始建于明永乐年间，为明清两代考场。此图显示的是贡院进门后东西两旁低矮的考棚，当年有九千多间，可以接纳来自全国几千名考生同场考试。考场的大门五楹，上悬三匾，中为“天开文运”，东为“明经取士”，西为“为国求贤”。沿中路向前走，有一棵老槐树，叫“文昌槐”，后面的建筑叫“明远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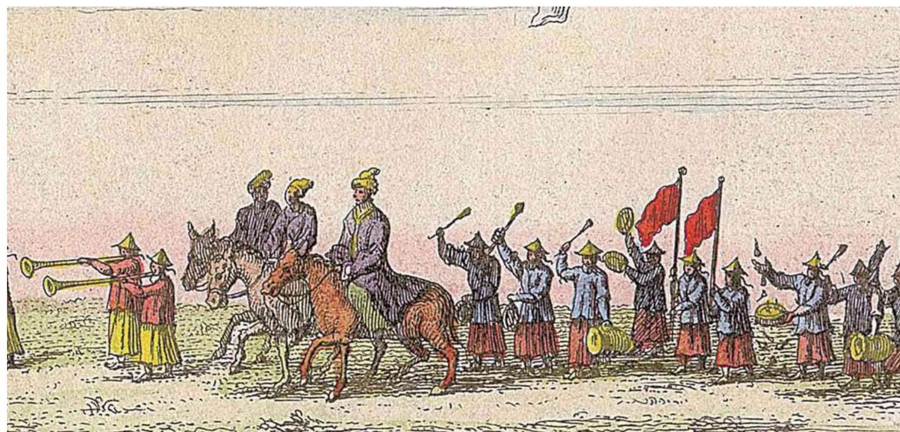


这是北京郊外的一座关帝庙

老北京有许多庙宇，庙宇的前厅一般是敞开的，庙里供着各路神仙，除了关帝，还有观音、十八罗汉，根据节气，经常有村民倾村出动，祈求一个风调雨顺的丰年。北京各类庙宇多得数不胜数，名字也五花八门，反映着庙宇不同的渊源及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仅拿北京朝阳区保留下名称的庙宇来说，就有天仙宫、龙王堂、娘娘庙、关帝庙、观音寺、真武庙、崇兴庵、菩萨庙等。



清早期的庙宇图





村民前去关帝庙的路上



城墙边上的一座小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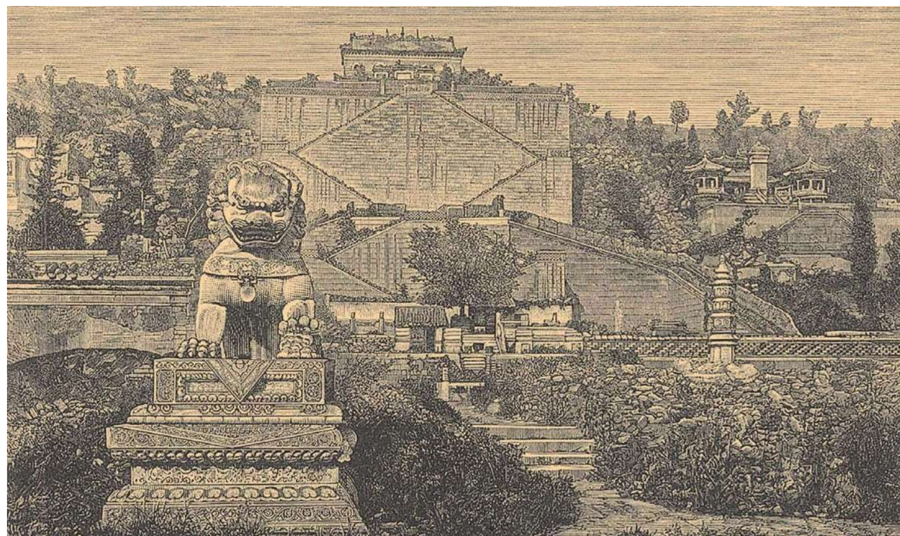
出了西直门再走二三十里地，就来到风景秀丽的西郊。康乾盛世先后一百多年修建的圆明园、清漪园，以及慈禧太后重修的颐和园就坐落在此。圆明园与清漪园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这两张图（第263页图，第264页上图）是园中两处重要建筑的遗像。据纵火人的自述，他们手中拿着照相机，为这些精美的亭子留影，然后心中怀着愧疚，将火把扔向了无辜的建筑。熊熊大火燃烧三天之后，后人只能在照片中憧憬建筑美景了。照片后来也被搞丢，直到21世纪的某一天被人在美国发现。而依据照片所制的版画，不久后就出现在新闻画报上。它们真是巨大的讽刺。看看，为了惩罚中国冥顽不化的统治者，这些野蛮人，毁掉了多么伟大的文明。



清漪园中的文昌阁



圆明园方壶胜境



颐和园万寿山上原建有佛香阁，被英法联军烧毁，此图上新佛香阁尚未开建，这是青黄不接的季节，20米高的八方须弥座仍在，上面顶着一座临时的小佛堂。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重修佛香阁，才恢复了万寿山的原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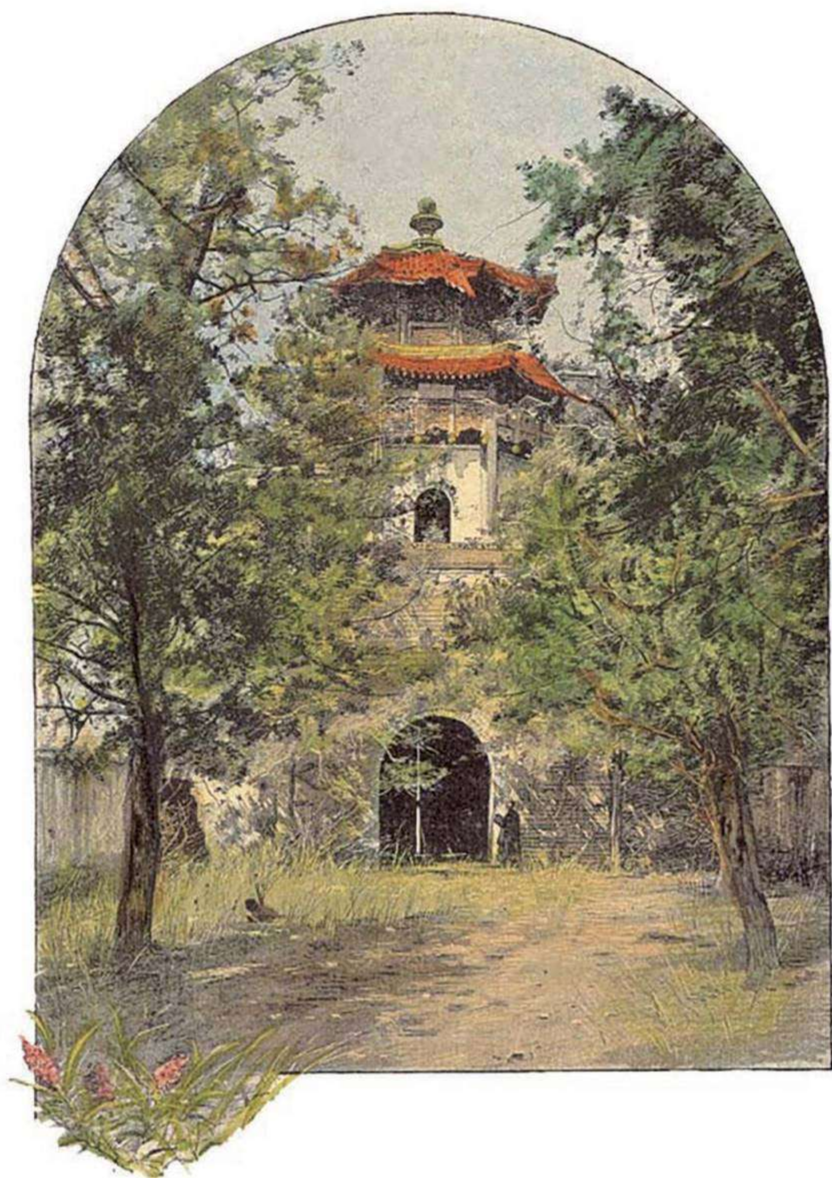


颐和园十七孔桥。这是平版印刷中的精品，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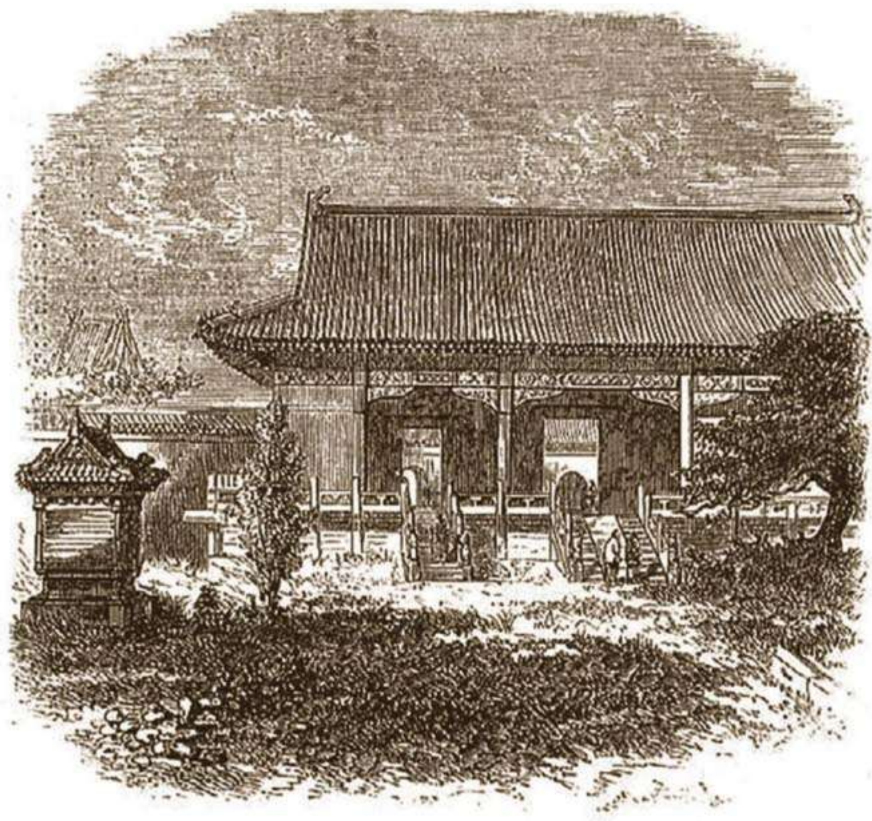


西山多宝琉璃塔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清代塔中的珍品，它华贵玲珑，俊

秀多姿，七层塔檐与垂脊高矮不一，色彩各异。背衬蓝天白云，更显出当年此塔窈窕、挺拔的独特韵味



明代的帝陵



定陵前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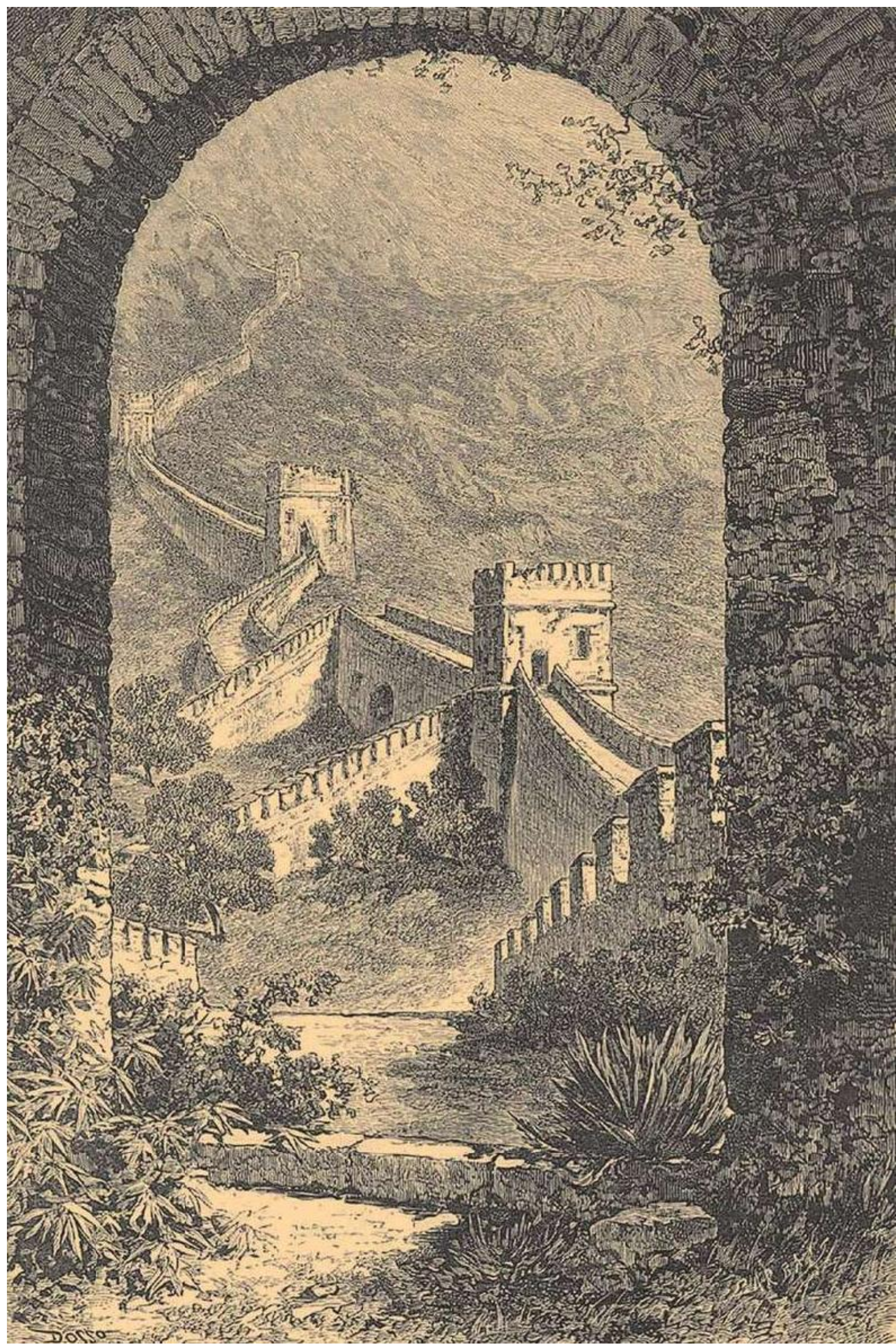


定陵碑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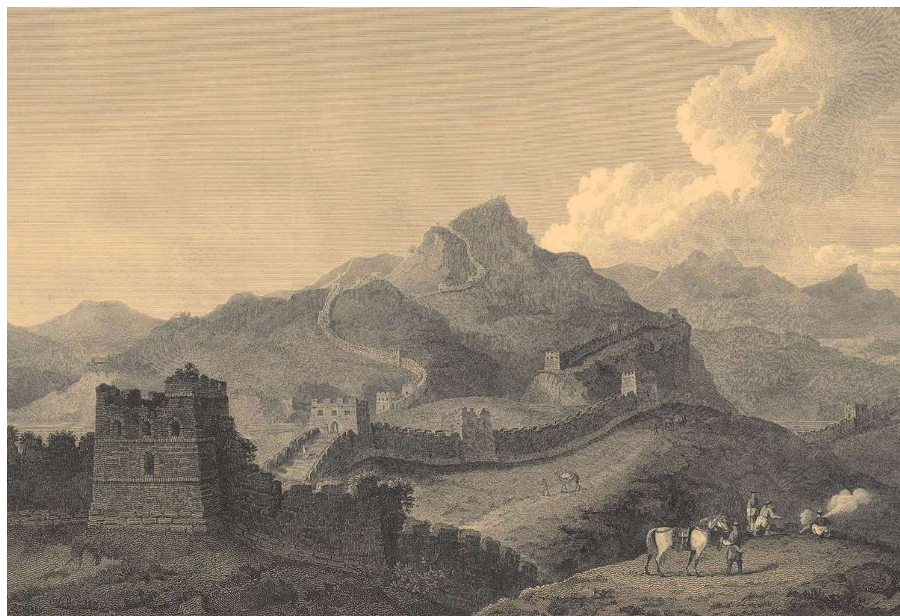
十三陵由于外国人的到访，首次成了旅游景点。上图的彩色图看上去像照片，其实它仍是“照片版画”。这样飞檐高挑的大屋顶，是明代以来帝王陵墓的普遍造型。下面两张是版画，时间是在19世纪末期。它们比照片版画更能显示出帝王过身后，陵寝余威空置，天地苍凉

长城举世闻名，谁没见过它的身影？但是你见过它两百多年前的样子吗？上面没有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也没有人举着相机左拍右照，总是把它当作背景，更没有大客车小轿车，挤在山脚下，小贩拼命向游客兜售纪念品。那时的长城，对朝廷来说，就是前朝资源浪费留下的废墟；越过居庸关、南口，只是让赶脚的人长出一口气，终于进入了京畿重地。歌颂长城宛如巨龙、无比雄浑的人，都是外国人，把它搬上纸头

的，如这张长城景象，也是洋人画的。一位美国人这样评论它的英姿：“长城像一条无休止舞动的身躯，它盘绕卷曲，又伸延无际。它随着山峦而起伏，忽而盘旋而上，忽而齐肩并进，无论你有多少想象力，都不能写尽长城宏伟的雄姿。”



长城景象1



长城景象2

这两张长城版画，由近逐远，既博大又细腻。画师与雕刻师恐怕从未预想到，他们捕捉到的这个画面，后来竟成为首善之都的骄傲，也是祖国伟大形象的标配之一。

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约翰·布洛裴尔法，20世纪30年代曾在北京执教，又娶了一位满汉血统的太太，对古城充满了真挚的爱。眼见得民国对古城的冷落，古树被砍，老墙塌落，他在《辉煌永驻的古城》一书中悲叹："失去了老北京的世界将变得暗淡失色。胡同里的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延续着久远的传统文明，尽管存在着一些难以治愈的痼疾，却是一种独特崇高的文明，具有生生不息的旺盛活力……北京人的智慧、精致、新潮、考究、艺术修养与生活情趣，所有的这一切，在世界城市之林中永远居于卓越超群的地位。"

失去了老北京的世界是不是因此变得暗淡失色？对布先生的第一句话，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但对后面的话，全世界都应发出心领神

会的赞同。恐怕首先是我们自己，倾向于抹掉皇朝旧绪，不够看重旧日的修养与情趣。传统的衣衫不能老是穿在身上，但又不能丢进垃圾堆，那就挂在衣架上吧。华服仍散发着华彩，总是失去了身体的温度与活力。

踏上未来的征程，故都离我们渐行渐远。如果心中仍抱有不解情缘，那就选一张古旧版画挂在家里吧。或许，就把这本遗韵，放在茶几上，随手翻翻，且看且珍惜。